

十之書叢識知界世

治政界世

著德杜·英

賓邵張
宗漢彌
符合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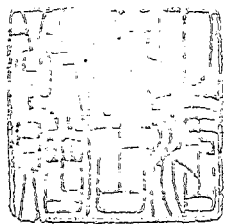
行發店書活生

世界知識叢書之十

世界政治

英·杜德著

張邵賓
宗
蔣漢符
譯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3 0662 7180 4

714
251

2

目次

1

第一章	世界新形勢	一
第二章	世界政治問題	七
一	世界政治的中心問題	九
二	世界團結與世界政治	三
三	世界帝國主義的一般危機	三
第三章	二十年來的一篇清賬	四
一	大戰的結果	四
二	革命與反革命之不穩固的平衡	四

46027

三 戰後的新勢力關係…………… 六三

四 戰後的解決方案…………… 六九

五 安定與崩潰…………… 八一

六 戰後解決方案的清算…………… 九四

第四章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之新興的矛盾…………… 一〇三

一 『國際的』資本主義之謎…………… 一一

二 獨佔『布洛克』的戰爭及生產與貿易的限制…………… 二二

三 貨幣戰爭：英鎊—美元—黃金…………… 三三

四 戰爭與重整軍備的經濟學…………… 四四

第五章 國際組織的企圖…………… 一五五

一	世界國家的問題	一五
二	國際聯盟	一七
三	世界公約與區域公約	二〇
四	集體安全	二六

第六章 世界新分割的問題

一	『有』『無』的理論	二四
二	殖民地或殖民地原料之和平重分割的建議	二五

第七章 世界主要的衝突區域

一	日英美在遠東	二六
二	美國與大英帝國的將來	二九

三	法西斯修約派的挑戰——意大利	三三
四	法西斯修約派的挑戰——納粹德國	三九

第八章 蘇聯與世界

三九

一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	三九
二	法西斯帝國主義的反蘇聯十字軍運動	三九
三	蘇聯的和平政策	四六

第九章 和平的奮鬥與世界組織的未來

四三

一	和平的奮鬥	四三
二	未來的世界社會	四六

第一章 世界新形勢

「大戰以後，可見的惡魔勢力已經格外明顯地普遍自在了。」（鮑爾溫演辭，載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
倫敦太晤士報）

在國際上空密佈着陰霾的今日，世界政治問題的迫急性，已不必多加申述。很明顯地，我們所面對着的問題，就是這一代必須解決的問題，雖同歸於盡，也不能顧惜。在經濟的與政治的每一個範圍內，對立與衝突，正走向着燃燒點。

一九一四年以後整個的世界形勢，在任何一方面都是簇新的，整個的均勢已完全改觀，與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情形大不相同，而且天天還在轉變着，因此我們必須不存錯覺，不存成見，對於當前正在發展着的現代諸問題，予以新的觀察。

休戰以後的十八年，並非一個可劃分的期間；自然，每一種劃分只能是牽強的，每一



個階段多少總是含着推移與轉變的階段，戰前諸問題並未消滅，却融和而變為戰後諸問題，戰後諸問題又融和而變為當前諸問題。可是，對於一九三六年的世界形勢，我們如檢閱其廣泛的輪廓，則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最近這二十年來所累積的現代諸問題，正是達到成熟的階段了。

戰後解決國際問題的種種方案，都已經粉碎了。華盛頓條約已經成為過去了，羅加諾公約也已經成為過去了；凡爾賽和約的一大部份也已經成為過去了，只有關於領土與殖民地的解決，至今尚未失去效力，而這些，就是目前修約派侵略陣線所進攻的目標。隨着世界經濟恐慌的爆發，世界經濟的安定，已告解體。國際聯盟在對付日本征服華北的侵略行動上，已表現它的無能，意阿戰爭再度顯示國際聯盟的無能。世界組織的未來，戰爭或和平的未來與國際政治關係的未來諸問題，都投入了鎔解的釜鍋。

勝利帝國主義國家所欲樹立的戰後秩序，如今正在崩潰着，將由什麼來繼承這戰後秩序呢？在帝國主義之內，國社黨的德國，法西斯蒂的意大利與日本，領導着修約派的

挑戰，推進它們的侵略陣線。這一個問題，支配着今日的世界形勢。賠款，戰債，裁減軍備等等的戰後諸問題，都已經陳廢，佔據今日之時代中心的，是所謂「有」與「無」列強的問題，殖民地的重分配問題，殖民地原料的分配問題，修約主義與維持現狀的問題，集體安全與戰爭區域化的問題，經濟自給自足的問題，與重整軍備問題。這種種問題以及目前流行的口號，很明顯地預示着帝國主義爲了世界的再分割，又向戰爭邁進。一九一四年並未解決了什麼。

第二次大戰的威脅，籠罩了目前的世界形勢。從各方面看來，覺得世界正在無拘束的狀態下，趨向浩劫；可是，大多數的政治領袖與政治家，並未貢獻解決的方案。究將如何呢？第二次大戰能否避免呢？怎樣避免呢？這問題碎裂着每一個國家的人民大眾的心坎。許多人認爲目前的世界形勢，頗與一九一四年的前夜相似，實則有着廣大的差別。這些差別是最近二十年間整個發展的結果，在最近二十年間，發展的速率等於過去的數百年。而且，這些差別不僅在於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上，尤其在於使現社會整個基礎

不斷蛻化之更深刻的社會轉變上。

隨着蘇聯的崛起與第一個社會主義經濟的建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已經起了劇烈的變化。蘇聯的實力一天一天地加強，它的經濟的與政治的優勢，現在佔據着世界列強的第二個位置。過去的歷史是沒有一點可以比擬這形勢的。蘇聯站在實力繼續加強的基礎上，對於世界政治，自能發生擴大的影響。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的關係，特別是資本主義機構內反動的法西斯蒂集團極力要促成反蘇聯戰爭，與蘇聯樹立世界和平陣線的關係，提供未來的許多遠大問題。

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其蛻變的繼續增長，也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直接表現出來。最近二十年間動亂的事態，已使勞動階級在實力上與意識上，產生重大的覺醒。這一種覺醒同時也已影響着民衆的中下層，破壞着舊社會制度的基礎。沒落中的資本主義，漸次採用暴烈的反動與壓迫方法，在許多國家內，則實行法西斯蒂獨裁，以維持統治。相反地，這在許多國家內又引起勞動階級聯合陣線與人民陣線的發展。近年來在奧

國、法國、西班牙、波蘭、中國、印度以及南美諸國所進行的鬥爭，已經顯示目前的世界，不僅站在恐怖的第二次大戰的前夜，並且站在連續的革命鬥爭的前夜。革命鬥爭或將導成偉大的演變，甚至在最有利的條件之下，可以擊退第二次大戰的威脅，或者可以迅速地使第二次大戰產生不同的結果。

這新興的社會勢力，不僅伸展到西歐、中歐與美洲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樣地還伸展到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殖民地民衆現在正努力於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在整個的中國，在印度，在近東與中東，在非洲，在中美與南美，民族革命運動都向前邁進着。

支配舊世界的社會制度，自從二十世紀開始以來，達到了它在帝國主義時期中的頂點，一九一四年大戰的爆發——帝國主義自身所造成的災難，則爲它初次所遭遇的打擊，往後就沒有和平，也未能恢復舊觀。陳腐的破產的帝國主義制度，逐漸向着新興的世界的社會主義制度演進，一九一四年即爲這基本的轉變吹起了歷史的信號。但這個

轉變還不過剛在開始。世界的大部份還在努力着重建舊制度。所以，舊制度的諸問題，仍然以加倍的力量，再現於今日。這是需要我們參加新鬥爭的信號。已經發端的偉大轉變，如今必須使之實現於世界的大部份。

生活在今日的我們，面對着未來的重大問題——世界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不能縮短視線或限制視線。今後的二十年，恐將決定世界與世界組織的未來。我們須有充分的準備，應付今後的二十年。

第二章 世界政治問題

「蘇格拉底曾說，他不是一個雅典人或希臘人，而是一個世界的公民。」（勃魯太許，Pantarch語）

所謂「世界政治」的主題，究竟是什麼呢？今日的世界政治問題爲什麼要比較過去任何時期更形迫切呢？

爲便利於研究這一個問題起見，我們先舉出事實來做說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九日的倫敦觀察者（Observer）登載一篇航空通訊記者的報告如下：

「根據於「最短線」原理而構造的通用式引擎新型飛機，其詳情已於數日之前發表，它的飛程十分廣大，可以從不列顛的航空根據地，直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的首都。換言之，凡邊界距離英國一千五百哩的任何國家，可以憑藉這種飛機，從航空根據地直達英國的任何一處。

「雖然這種通用式引擎的「韋勒斯婁」（Walesley）飛機，並非專爲轟炸而構造，它却能够飛行

八千哩，毫不犧牲載重安全的原動力，只要加足一次燃料，它能够裝載大量炸彈，飛行兩千哩，重返根據地。因此，它在歐洲面積內的活動範圍，可以包括列寧格勒，莫斯科，雅典，羅馬與瑪德里各處。

上面所舉出的事實，是每一個讀者所熟知的。在一百年以前的人聽來，也許覺得離奇，但在今日的我們看來，這種事實以及類此的許許多多事實，已成爲天天可以發生的尋常材料。可是，它確包含着目前世界形勢的十分顯著的小宇宙。

據我們所知，最新型的飛機的單程飛行，能達八千哩，即等於地球周圍的三分之一。不列顛境內最遠的距離只有六百哩，法國也只有六百哩，德國只有五百哩，就是在陸地遼闊的美國，最遠的距離也不過四千哩。這樣看來，我們似乎確實征服了空間，征服了以前國與國間的限制與隔闕。講到現代的交通，今日歐洲各國宛如彼此比鄰的內圍。可是，正因爲如此，我們感覺到現代文明的利器已能轟炸相隔兩千哩的城鎮。尤其值得關心的是，據倫敦觀察者的記者說，如今英國的飛機已能轟炸列寧格勒與莫斯科。

我們如欲瞭解人類進化的這一個階段的原因，我們必須從頭說起，因爲當前這形

勢所顯示的問題，就是所謂「世界政治」的基本問題。

一 世界政治的中心問題

在最近二十年間，世界政治問題一天一天地爲世人所注意，已佔據着最顯要的地位。現代世界的結合性與相依性，國際組織的必需性等等，都是日常討論的題目。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十分露骨的形式，顯示出現存的世界無政府狀態的後果。這世界無政府狀態並非新奇的產物；它從人類歷史的開端直到如今，就繼續着它的盲目的進程。可是，在現代的技術條件與政治環境之下，在空間距離極度短縮的情形之下，人人——包括現社會制度的防衛者與保持者，都清楚地認識，這世界無政府狀態的延續，實在是毀滅的法則，並且也看到這一點：第二次大戰的爆發，即爲世界文明的毀滅。鮑爾溫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曾這樣說過：「歐洲的人士誰不知道西方倘再發生一次大戰，西方文明將如羅馬文明一樣，同歸於盡。」可是，這些現社會制度的贊助者，以帝國主義國家的政治

領袖與政治家的身份，仍然繼續推進第二次大戰的準備，其規模之大為前所未有，而他們所採取的政策，如不加以阻止，最後只能使大戰的爆發成爲不可避免。

這表面上的矛盾究竟是由於什麼緣故呢？我們要瞭解這個矛盾的原因，必須更爲深入地來觀察世界政治的具體的現實。

大戰結束以後的十八年來，舊世界的若干重要政治家，已經宣示了一種新世界秩序的目標。國際組織的新形式如國際聯盟，已經嘗試過了。無數的國際會議已經先後舉行過了。條約、盟約、公約、非戰、軍縮談判、安全保障以及各種國際外交文件，在各國外交部的檔案中，已累積如山。（英國外交部的辦事人員在一九一三年只有一八三名，在一九三二年即增至七六六名，據一九三二年的報告，英國戰後所簽訂的條約，比較戰前七十年間所簽訂的條約，已經需要更多的度藏室了。）自然，我們也不應該無視了這一點：向戰爭邁進的總形勢，已經產生了新因素，這新因素即使在重大的限制之下，却具有阻礙戰爭再度爆發的可能性。

但我們所欲提出的，是這一個問題：我們究已達到什麼程度，什麼境地了呢？如果我們以一九三六年與一九一三年相比較，我們不得不承認整個的世界形勢，在許多方面已經更尖銳化更惡化了。

先講軍備——這是最單純的氣壓表。現階段中軍備競爭的邁進是顯而易見的。其實，軍備在戰後的整個期間，比較戰前的水準，總是繼續不斷地大加擴充着的。據最不完全的官場統計，一九一三年的世界軍事費用總額為二十五萬三千一百萬元，一九二五年為三十五萬二千二百萬元，一九三四年為四十九萬萬元。據紐約外交政策協會所發表的統計，世界五大列強即英法美意與日本，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〇年的期間，軍費總額從十二萬四千三百萬元增加到二十二萬零九百萬元，即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八。這五個國家都是華盛頓條約的簽字國，但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四年的期間，海軍預算從一萬零五百萬鎊增加到一萬九千一百萬鎊，即增加了八千六百萬鎊，或百分之八十二，而在一八八六年至一九一二年的整個期間，不過增加了七千七百萬鎊。（參閱李區

蒙將軍 Admiral Sir Herbert Richmond 的現世界的海軍（德國景氣變動研究所發表下列數字，指示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二年間世界軍費支出與世界生產總值的關係（一九二八年的指數爲一百））

	世界軍費支出	世界生產總值
一九一三年	六四	五四
一九二九年	一〇四	一〇四
一九三〇年	一〇六	八七
一九三二年	一〇七	五六

這些都是世界軍縮會議失敗以前，倫敦海軍會議破裂以前與德國重整軍備所引起的軍備競爭以前的情形。

但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三年這二十年間在軍費上的激增，比較現在已經開始並且日見劇烈的『重整軍備』的新競爭，就失去它的光彩了。英國的軍費在一九三二年爲一萬零四百萬鎊，一九三六年就增加到一萬六千萬鎊，尙有二千五百萬鎊的補充

預算，換言之，英國軍事費用的支出，在最近四年間，除重整軍備的借款程序外，已經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八。美國的軍費則由一九三三年的六萬二千八百萬元，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的十一萬六千一百萬元，即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日本軍費的增加，更屬驚人，在一九三一年為四萬五千四百萬圓，一九三六年為十三萬二千二百萬圓，在四年之間幾乎增加了三倍，軍事預算佔據預算總額的百分之五十八。希特勒執政後，德國進行最偉大的「重整軍備」，至真實的內容，尚在秘密之中。據英國保守黨反對派領袖邱吉爾於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在下院中所提供的數字，德國重整軍備費用的總額，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竟達十五萬萬鎊之鉅。一方面，各國的軍事準備十分猖狂，一方面，德日兩國在東西邊境進行着公然的挑戰，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贊成完全裁軍的蘇聯，也不得不提高軍事費用，一九三四年只有五十萬萬盧布，一九三五年達八十萬萬盧布，至一九三六年就增加到一百四十八萬萬盧布，自然，蘇聯軍事費用在預算總額中所佔據的成數，要比較其它列強為低。

然而軍備的擴充，軍事預算的增加，還不過是現階段中世界形勢之表面的與最顯明的徵象而已。

試觀察目前的國際政治關係，這可以從各國的軍備上反映出來。我們能夠說：目前的世界形勢較善於一九一三年嗎？戰前歐洲列強明確地形成的兩大對立集團，即三國同盟 (Triple Alliance) 與三國協商 (Triple Entente) 雖然尚未再生，但許多戰爭的新動機已經勃發於全世界。法西斯蒂修約派的侵略陣線，在德國、意大利與日本的領導之下向前邁進。日本與意大利已經發動了侵略的戰爭。國社主義德國的威脅，籠罩着全歐洲。戰爭的諸問題已經越出了歐洲的範圍，如英美日在太平洋上的三角矛盾，如英美兩國在全世界的一般對立，如德日兩國聯合進攻蘇聯的戰爭威脅等等。

不錯，在現階段的國際關係中已經產生了許多新因素，如國際聯盟，如實現集體安全的全嘗試（這概念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是沒有人知道的），如各種和平公約與區域安全公約，這些都足以反映阻遏戰爭的企圖，比戰前的海牙會議 (Hague Conference)

或歐洲協調 (Concert of Europe) 還要更進一步。對於戰爭或和平的問題以及外交政策的問題，各國民衆的關切已經更爲強烈；而且爲和平而奮鬥的一方面，已經產生了新興的勢力，這一點以後須詳加闡述。可是迄今爲止，以外交的步骤來消滅矛盾或阻遏戰爭，徒然呈現着懦弱與無能。這是大家看得明白的。過去五年間的事態，已經顯示出現存國際政治制度的機構，一個一個地動搖粉碎。在遠東方面，我們看到了日本的無節制的侵略行動，違背國聯盟約，凱洛格非戰公約與華盛頓九國公約，肢解中國的整體，並以東部亞細亞的擴大戰爭威脅着世界。在南美，我們看到了玻利維亞與巴拉圭的戰爭，也同樣未受阻遏，且爲列強的軍火供給所促成，直到雙方精疲力盡，才停止戰爭。我們看到了世界軍縮會議與世界經濟會議的破裂。我們看到了希特勒在德國掌握政權，國社黨公然鼓勵戰爭，使戰爭的暗影籠罩着歐洲各國。我們也看到了意大利無拘無束地掠奪阿比西尼亞。由於這種種發展的結果，目前國際間的緊張形勢，無疑地遠過於一九一四年，在戰前的時期，歐洲的主要列強，曾於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八年與一九一一年，先後

發生預示戰爭的外交危機。可是在目前的時期，外交危機繼續發生，幾乎沒有間斷，每一個外交危機加重危機的程度，並且爲下一個危機作準備。

那麼，國際的經濟關係又是怎樣的情形呢？戰前經濟安定的舊局面是破壞了，它的影響是格外明顯了。戰前的資本主義原來具着下列幾種特徵：第一是單一的世界金本位，在那個時候的人們看來，金本位簡直像一成不變的自然法，其實它不過反映着英國金融之世界霸權的臨時狀態罷了；第二是世界市場與世界物價的一致性；第三是資本出國的極端流動性；第四是在歐美兩個世界以內人口移殖的相對自由；第五是生產與國際貿易水準的不斷向上。處於安定狀態的舊時資本主義的這些基本特徵，在目前是已經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極端的不安定，貨幣的紊亂，貿易與生產的巧妙的限制，資本輸出的重大的減削，國際貿易水準的降低，經濟戰爭的強化，與獨佔的孤立主義的一般趨勢，後者不嚴格地可以稱爲『國家的自給主義』或『奧太基』(Autarchy)。

最後，從世界各國的內部政治上，我們又看出了階級對立的極端強化，在許多國家

內達到了內戰的爆發點，在地球上的廣大區域內達到了具有世界意義的革命的進展階段，在若干國家內更達到了同時產生反革命的法西斯蒂獨裁政權以維持目前階級統治的程度，由此使不同的國家集團間之不同的政治壁壘更見森嚴，使世界矛盾更趨強化。

所以，今日的世界，不論在國際政治，國際經濟或國內政治的任何一方面，都陷入於矛盾衝突的苦境中。過去二十年間的整個世界形勢，距離世界團結與世界和平的目標更遠，而愈趨向於繼續增長着的世界矛盾，這樣的結論似乎是很恰當的。

這一個進程的意義是什麼呢？世界團結與最後的有秩序的世界社會之概念，真是超乎現實的一種幻象嗎？這確是傳統的反動學派，保守學派或法西斯蒂學派所持的結論，他們對於歷史的看法，將強權的法則，視為人事之不能避免的法則。克里蒙梭（Clemenceau）在晚年發表的一次談話（轉載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號外交季刊）可以說是這種見解的典型的表現：

「有一個時期，我也以為過去不久的世界大戰的恐怖，將永遠消滅歐洲各國的戰爭的狂怒，可是我越加考慮當前的事態，越不敢存着這樣的見解。反之，我相信在達到那一個目標之前，我們尚須通過很遠的路程，並且深恐這一條路程上將鋪滿了屍體，灑遍了千百萬人的血淚。」

「歐洲各國究竟尚需多少時間，才能獲得戰爭實為太殘酷之武器的結論，我不能夠告訴你，因為我並不知道。」

「如果我以為為激動全世界的天良以反對戰爭是可能的話，我就應該聯合任何國家內具着善良意志的人們，永遠地剷除人類間最大的罪惡，把我的晚年盡瘁於這種事業上。可是，我却不易為幻想所束縛。」

這一種見解，其實就是資產階級在世界組織的偉大任務之前，十足意識地表現出來的虛弱無力的狀態，從法西斯蒂把戰爭光榮化，視戰爭為自然的永恆的法則，更從各國參謀本部的實踐的原理，我們如今可以看出這一種見解在邏輯上的成就。這些戰爭之實踐的原理，最近在德國魯登道夫（Ludendorff）將軍所著全體的戰爭（Der Total Krieg 一九二五年出版）一書裏，有着赤裸裸的顯示。現代帝國主義所產生的這

一位出類拔萃的戰略家指出第二次大戰將為全體人類的殲滅戰。所以不論男女老小的整個活動與每一分鐘的時間，必須加以指導，加以組織，準備這未來的殲滅戰。在上述的假定之下，魯登道夫在全體的戰爭一書中所有的顯示，是完全合理而明朗的；其中所含的瘋狂性，乃是世界帝國主義之最後階段的瘋狂性。

自由主義學派以悲觀的目光觀察當前的時代，以為當前是文明解體回復到野蠻主義的時代。自由主義學派的政論家胡爾夫 (L. S. Wolf) 在如何防止戰爭 (The Intelligent Man's Way to Prevent War) 一書的緒言中，曾謂：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戰的期間，歐洲向着回復到野蠻主義的歷程邁進，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三年的期間，它又發動了更大的步伐……』

「我們現在所目覩着的與經歷着的，是我們中間所有野蠻主義者反抗文明的一種叛變。第一次大戰是西方文明之沒落與傾覆的第一個階段，第一次大戰所給予整個人類社會的震撼，又給予野蠻主義者以更進一步地實行毀滅工作的機會。我們如今就處於這第二個階段的中間。野蠻主

義者是已經得勝了，他們已經衝破了文明的疆國，他們現在正從內部摧毀着文明。」

對於世界歷史的現階段給以悲觀的推測，不論是屬於傳統上的反動主義者，屬於公開的法西斯蒂野蠻主義者，或屬於失望沮喪的自由主義者，這樣的趨勢目前十分普遍。它們可以說是一個垂死的階級的情緒之適當表現。但它們對於瞭解與應付目前形勢的諸問題，並無實踐上的價值。歷史的過程從一切動盪與衝突中，創造出新的歷史來。諸種矛盾已經更爲尖銳地表面化，以達將被消融的階段。能夠解決那些矛盾的力量正在興起，而且，已經可以看出在世界形勢中活動着了。凡關切着人類生命與人類價值的未來的人們，都須瞭解世界形勢的真正力量，以及那些力量在世界歷史過程中所佔據的地位。但這需要把思想與見解的傳統方法加以革命化。

世界的聯合，人類活動的相互維繫以及廣播全世界的一般發展，如今已一天一天地成爲現實。這揭開了人類歷史的新頁。世界的聯合在第一個階段是資本主義的功績。資本主義創造世界的市場。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時，它把整個世界曳入

於更爲密接的經濟關係的網羅中，自然這些經濟關係仍以奴役與榨取爲基礎。但資本主義所產生的世界的聯合，是建築在矛盾的基礎之上的。競爭的無政府狀態與階級的征服之內部分裂，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心臟，這內部分裂的現象大規模地再生於全世界。一方面，世界的聯合是基於金融資本的統治，征服了人類的殖民地大眾。另一方面，世界帝國主義包含着互相抗爭的許多獨佔集團，每一個集團謀取優勢與擴展，損人以利己。所以，資本主義雖已奠立世界團結的基礎，世界團結的概念如今雖已成爲可能，並在各方面甚至在現統治階級的重要政治家與思想家之間，雖已頗爲流行，由於資本主義的內部的法則（即內在的矛盾）它却不能實現世界團結。世界歷史的整個現階段，正在顯示出這一點。所以，繼承資本主義的新社會制度，要實現資本主義已經奠立了基礎的世界團結。

世界政治問題，實爲集體的、世界的、組織問題。但解決這一個問題的各種條件，尙須再加確定。

一一 世界團結與世界矛盾

世界縮小的問題，最近已成爲大家所熟知的問題。縮小的過程開始於一百五十年前發明蒸汽的時候，在最近二十年間，由於一切科學上的與技術上的發展，更大大地增加了它的速度。

這不僅是運輸與交通的問題；運輸與交通的加速，以及新工具的擴展，已經改變了世界關係，最後將促進毀滅地域的分離主義之基礎，好像十九世紀鐵路事業的發展，促進毀滅舊自治制度，並確立現代的中央集權政府。

這也是生產對於世界資源，世界面積與世界人口之整個關係的問題。具有極端重要性的相反的趨勢，雖也同時存在着，但大規模的生產在少數的大企業之下集中化與組織化，控制着擴大的生產力，這情形在戰後的時期，已經飛躍地向前邁進。

現代的龐大組織如德國鐵托拉斯 (German Steel Trust) 成立於一九二六年，

資本額七千二百萬鎊)德國染料托拉斯(German Dyestuff Trust)成立於一九二五年,資本額六千萬鎊)英國的皇家化學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成立於一九二八年,資本額六千萬鎊)烏尼勒佛公司(Unilever)成立於一九二九年,所管轄的公司共有資本二萬萬鎊)維克阿姆斯脫朗公司(Vickers-Armstrong)成立於一九二五年,資本額七千八百萬鎊)以及戰前已經存在的龐大組織如美國鋼鐵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成立於一九〇一年,資本額十三萬七千元,一九〇二年,雇用工人十六萬八千,一九二五年增至二十四萬九千名)與英、美兩國霸佔世界市場的煤油托拉斯,已經繼續存在,且遠勝於它們戰前的原型。如今世界帝國主義的二十個左右的大托拉斯,在世界經濟生活中,佔着十分優越的地位,對於所屬國家的政策,具有十分充足而普遍的影響,就是在戰前高度發展的帝國主義階段中的形勢,也相形見拙。

抑又進者,戰後重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已經愈加密切地和經濟組織的整個範

疇成爲一體，活潑地促進每一種工業的托拉斯化與合併組織，並且利用了立法的形式，命令的統制，直接的入股，津貼與金融的援助，以及勾結董事等，更直接地與托拉斯發生關係，因此格外趨向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典型。

現代合理化的工業之龐大組織，需要能夠繼續擴展的世界面積，以容納它們強有力的活動。而這一點却與目前國家的疆域相衝突，所謂國家的疆域，其實就是若干敵對的獨佔集團的反映。以經濟的武器，國家立法的武器，外交的武器，最後以戰爭的武器來求世界的再分割，從而產生日趨於尖銳化的，不斷地更新的衝突，這在實質上就是擴大的世界生產力反抗現行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的衝突之反映，也就是世界政治的難關。

資本主義組織的不斷集中與規模的擴大，不僅是資本與企業機關的集中，同時由於生產之必然的集中與組織的擴大，以及利用科學上與技術上的發明之可能性的必然擴大，又推動了生產之無限制的膨脹，這無限制的膨脹又衝破了現存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戰後生產力的鉅大發展，是不能加以測量的，因爲各種限制使生產力未能全部

運用，但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期間，我們可以獲得若干指示，在這短促的暫時穩定的期間，生產的合理化與膨脹化加速率地向前邁進。在四年間，德國的工業生產膨脹了百分之二十五，美國百分之十五，法國百分之三十，比利士百分之三十五，加拿大百分之四十。蘇聯的榜樣更可以證明，如果生產的資本主義關係的束縛全被解除，則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將超過上述膨脹的數字。可是，這種程度的膨脹就已不能為資本主義世界所容納了。經濟上的大破裂隨之而起。

世界生產的膨脹，即使在資本主義的桎梏以內，即使不將蘇聯的生產列入總額，仍然超過了世界人口的發展程度。根據一九二五年的統計，世界生產雖然經過了大戰的毀滅，在一九二三年已增加了百分之十八，世界人口的增加則僅僅有百分之六。（參閱 Sir Arthur Salter 所著 *Recovery* 第二十三頁。）以後，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生產的膨脹格外迅速。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八年的期間，世界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食料與原料的世界生產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世界工業生產的增加，則更為鉅大。

（參閱國際聯盟一九三〇年出版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世界生產與貿易備忘錄第九頁。）這膨脹不僅限於工業生產，原料與食料的生產同見膨脹，這是值得注意的。世界小麥的生產量（蘇聯除外），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三年，每年的平均額為三十萬零四百萬斛，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每年的平均額增加到三十四萬七千五百萬斛，而一九二八年一年的生產量，則為三十九萬一千五百萬斛，即增加百分之三十，在這個期間，世界人口僅增加百分之九；一九二九年，由於人為的限制，世界小麥生產量降到三十三萬八千萬斛（參閱加利福尼亞史丹福特大學糧食研究院一九三〇年一月出版的小麥研究。）世界經濟恐慌特殊地表徵着世界形勢的現階段，即它是同時發生的食料原料與工業品之生產過剩的恐慌。

因此，我們可以充分明瞭，並無所謂世界人口過剩的問題。反動學派與帝國主義學派，往往以『人口過剩』、『天然資源不足對付人口增加的壓力』等等託詞，為侵略與戰爭的口實，殊不知這些託詞，顯然沒有世界的事實做基礎，詳言之，沒有世界資源與世

界生產之物質上的與技術上的事實做基礎。若干特殊國家內的所謂「人口過剩」第一是與那些國家內之社會關係相對的，第二是與世界經濟整體中之現存的局部制度相對的；實則後者就是前者的反響與後果。就整個世界的範疇說來，生產力與實際生產的進展，遠過於人口增加的進展。

這樣看來，我們確具一切必要的條件，可以實現世界的富足，可以無限量地促進每一個人的生活之向上。因為現存的資本主義束縛如能解除，世界團結如能成功，世界計劃如能實現，則生產的可能膨脹，非目前生產的實際膨脹所能衡量。

可是，目前世界的實際狀態究竟如何呢？第一，我們看到帝國主義世界中每一個國家內的矛盾關係，第二，我們看到這些矛盾關係以更大的輪廓再現於整個的世界。

整個的世界分成許多獨立自主的國家，獨立自主的國家，在名義上有六七十個，實際上則分成擁有附庸國與衛星國的少數列強集團，每一個集團保持獨立行動的自由，不承認共同遵守的法律。所謂「國際公法」的這一個主體，雖然存在着，但它在資本主

義的社會中，缺乏最基要的根據，即缺乏一種能夠執行「國際公法」的主權，而在實際上，它不過是國際關係間次要問題之現行習慣的法典或戰爭習慣的法典，它的效力全恃參加的國家是否有遵守的意志，遇着國際間的重大爭端，就無能爲力了。

這些列強的關係就是不斷衝突的關係，有時爆發而成公然的戰爭，有時則掩藏於外交的形式之下。一位尖刻的現代觀察者，對於政治的現實曾有過這樣一句話：「外交就是潛在的戰爭。」（參閱 R. G. Hawtrey 著一九三〇年出版的 *Economic Aspects of Sovereignty* 第 107 頁。）

各國的疆界或列強集團的疆界，是緊閉着的疆界，或爲獨佔限制之日趨複雜的諸種形式所藩籬着的疆界，祇在爲了訂結局部的同盟以反抗第三者時，始在特殊的方向打開障礙物。

由此形成的世界經濟狀態，是極端的無組織，截斷了世界經濟的發展。這無組織的狀態及其毒害的後果，就是對於資產階級社會，也很爲明顯，如關稅壁壘，進口限制，輸入

分配制等，窒息了國際經濟的流通。但世界經濟之真正的無組織，猶不僅在於這表面上的現象，而更為深入地在於獨佔關係的整個矛盾，以及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國家間的關係，使富有鋼鐵、煤、等動力的天然資源的廣大領土，淪為長期保持着固定的原始水準之落後的農業地域，並阻止財富的發展，這財富的發展本來可以提高整個世界的生
活水準。

世界人口中最大多數的生命，過着低劣而粗陋的生活，不斷地厄於殘酷的貧困，而這貧困也不能再以天然原因做藉口。一方面，帝國主義的若干中心，保持着大規模生產的最高度發展的工具，（一大部份棄而不用，）另一方面，世界人口的大多數却不得不過着小規模生產的原始水準的生活。

繼續的戰爭威脅，籠罩着各方面，不斷地在世界的各處爆發，吸收着最高度發展的國家以內的精力與剩餘，從事於戰爭準備的破壞工作，並且恫嚇着在最近的未來，將發展而成爲第二次的世界大戰。

何以造成這種世界形勢的呢？怎樣才能使它改變呢？這是我們這一代的當前的問題。事實上，世界的無組織狀態這一個問題，不過是更為深入的社會關係的問題之一面。及其表現，不過是階級社會的基本矛盾之一面及其表現。可是，世界的無組織狀態的矛盾，十分顯著，甚至比較內部的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更為尖銳地惹人注意，使人不得不承認有謀取某種解決的必要。

在口頭上唾棄現存的政府形式與政治分野，宣示「世界政府」有創立的必要，這很容易的。但如果進行的方法並未抓住這一個問題的真相，並未瞭解當前形勢的原因，並未瞭解維持現存制度的真正力量，以及為實現世界組織之偉大任務所不可缺少的條件，那麼，它就仍然是抽象的，烏托邦式的，毫無價值的了。

現存的國與國之間的分立，無組織及其矛盾，絕不能視為前資本主義時代的陳舊的殘存之物，絕不能以為最後將被現代帝國主義世界的「文明」所掃除。反之，在工業資本主義的時代，這些分立的力量，從表面上看來似乎削弱下去，因此發生資本主義造

成和平與繁榮的國際自由貿易時代之虛妄的希望，這在十九世紀的中葉有着廣泛的表現。可是，在我們的時代，即在帝國主義的時代，這些分立與矛盾的強度，各國經濟壁壘的高度，孤立主義的傾向與經濟「布洛克」(Block)的樹立，以及戰爭與軍備的規模，已經大大地增加，並且還正在增加起來。

所以，很為明顯地，我們所闡述的，並非屬於前一個時代的正在消滅的殘存之物，而是統治現時代之世界秩序的真正力量，即帝國主義的力量。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一個現實點，對於世界遠景的理解，就只能陷入於抽象的幻想中。倘欲不使帝國主義的力量毀滅我們，我們必須抓住並且征服帝國主義的力量。我們倘欲進行世界組織的偉大任務，也必須抓住並且征服帝國主義的力量。

三 世界帝國主義的一般危機

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對於現時代的基要特徵，尤須加以更為詳密的確定。

完全形成的帝國主義時代，開始於二十世紀的初頭，地面上所有的區域，已由少數的列強，即代表着高度發展的金融資本集團，加以相當完善的分割，在時間上，迄今還不過三十五年左右的懸隔。

帝國主義時代的開端，就呈現着高度的不安定，與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相對的堅固性，形成鮮明的對照。連續的戰爭，自英國在南非的戰爭，國際帝國主義佔領北京的戰爭，日俄戰爭，直到意大利在北非脫利波里（Tripoli）的戰爭，尖銳的國際衝突，最顯著的爲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八年與一九一一年所發生的事件，以及爲前所未有的瘋狂的軍備競爭，指出了趨向於一九一四年大災殃的路程。

帝國主義時代的極端的不安定與日趨尖銳的矛盾，並未因一九一四年的流血而獲得解決，如今反踏入更爲強調更爲深刻的階段，其原因究竟何在？它就是由於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的發展，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達到了更高的階段。

大托拉斯集團的生產力的大膨脹以及尋覓着出路的資本的累積，急迫地要求着

最大限度領域的繼續擴展與獨佔統治。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間，這一種過程對於地面上尙未分割的若干領域，導成急速的攫取，例如非洲的掠奪；在一八七六年至一九〇〇年的期間，歐洲列強佔領非洲土地的面積，從十分之一擴充到十分之九。可是，隨着世界的第一次掠奪與分割的完竣，隨着地面上已不再存在「未經佔領」的區域（卽爲落後的人民所佔據而缺乏武力防衛自己的區域），帝國主義國家的鬥爭，必然地踏入一個新階段。這一個階段的特徵是：帝國主義國家爲已被分割了的世界再起劇烈的衝突，要征服或侵略已被承認的獨立國家的領土，要分瓜中國，要瓜分土耳其，要對南美各國施行經濟的侵略，（直接的政治侵略已被美國的門羅主義所擠斥了），並且再要征服或侵略別一國家的殖民地。這是世界再分割的衝突，也就是帝國主義之特徵的衝突。因爲金融資本集團與工業國家的發展，各以其歷史的條件與階段爲依據，故發展的速率不能平衡，並且也不能與世界的現存分野相適合。所以，日趨尖銳的經濟衝突，向獨佔控制的壁壘侵襲，最後招致以武力摧毀那種壁壘的企圖。這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

戰爭的中心的原動力。

一九一四年以前資本主義之推動的膨脹的勢力，以德國與英國所擁有的勢力爲代表。德國與意大利在殖民地的掠奪中較爲後進。英國已經擁有鉅大的財產，站在繼續掠奪的前線。法國與帝俄也已經獲得十分豐富的贓物。但德國的資本主義，比較歐洲任何國家的資本主義，膨脹得更爲迅速，到了十九世紀的末葉，在重工業方面的決定部門，在技術的組織上與效率上，已經超越了英國的資本主義。到了二十世紀的開端，經濟的挑戰惹起海軍的競爭，與公然的殖民地要求。英國集中了它的力量，去迎擊新興的挑戰的勁敵。所有政治的，經濟的，民族的與種族的多方面的矛盾，則圍繞着中心的英德矛盾。英國的同盟有法俄等滿足的國家，德國的奧援，則僅有不滿足的意大利（隨時準備向英法俄等國出賣）被威脅的奧匈帝國以及土耳其帝國。（據一九三二年出版 J.F.C. Fuller 少將所著 War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第一三四頁，從一八七〇年到一九〇〇年，英國掠奪土地四、七五四、〇〇〇方哩，人口八八、〇〇〇、〇〇〇人；從

一八八四年到一九〇〇年，法國掠奪土地三、五八三、五八〇方哩，人口三六、五五三、〇〇〇人；在同期間，德國僅掠奪土地一、〇二六、二二〇方哩，人口一六、六八七、一〇〇人。）

對於避免迫在眉睫的衝突，各方面有過許多努力。目前爲和平而呼號的回響，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若干危急期間，同樣可以聽到。有人講着英國的衰竭與沒落，但它仍能夠佈置一個外交網，以保護自身的利益，在千鈞一髮之際，仍然能夠給予敵人以無情的打擊。有人主張必須設法應付新興的未滿足國家的殖民地要求。海牙會議企圖創立國際外交機構，以避免戰爭。各國的政治家痛心於方興未艾的軍備競爭，曾談判軍備的休戰。有人向資本主義國家說教，指出戰爭對於他們並無利益，世界之和平的共同的開發，對於他們更具真正的利益。英國與德國的政治家，曾談判殖民地問題的圓滿解決，葡萄牙殖民地的轉讓，英德在近東的殖民地協定等。在帝國主義現狀之內謀取和平解決的一切努力，證明都不能夠阻止最後的武裝衝突。這武裝衝突在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

年，就已達爆發的程度，到了一九一四年，終於爆發起來。

帝國主義的戰爭，比較歷史上的任何一次戰爭，更為殘酷可怕。如今各國整個的人民與經濟，構成了高度的有組織的戰爭機構，這是前所未有的。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犧牲的死亡總額，包括兵士與平民，不下數千萬（據國際議會調查聯合會於一九三一年所發表的統計，達四一、四三五、〇〇〇人，約略等於世界人口總額的四十分之一）。隨着大戰的結束，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發生廣大的激變，形成東歐與中歐帝國的解體。而大戰所產生的最重要的後果，則為俄國革命，新興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在佔據地球的六分之一的面積上獲得勝利，並退出帝國主義的領域。

革命的浪潮促成大戰的結束，在戰時與戰後曾以深淺不同的程度，瀰漫於全世界，但最後只有在俄國獲得勝利。在世界的其它領域內，資本主義的統治雖已缺乏舊時的堅固性，但仍能繼續維持或加以恢復。資本主義的世界秩序，已經遭遇第一次破裂，因此社會主義有着足以拒抗一切攻擊的世界的根據。在其它國家內，資本主義之一般危機

與世界革命之發端所產生的許多新問題，也從舊政治形式之下一天一天地表面化。恢復資本主義或穩定資本主義使重返戰前的模型之企圖，已告失敗，這可以從世界經濟恐慌中顯示出來；在戰後十一年所開始的世界經濟恐慌，招致強化的社會矛盾與政治矛盾。在許多國家內，尤其是意大利與德國，已經採取法西斯蒂獨裁的非常手段，以維持階級統治的現存制度。

在帝國主義關係的範疇內，戰爭並不能解決一切。勝利終究是屬於已具優越資源的國家，而不屬於後進的新興的勢力。勝利的國家再憑藉着勝利，以增加它們的財富，並企圖使它們的勁敵永遠地受着桎梏與屈服。因此，資源的分配愈見不平均，要永遠束縛新興勢力的企圖，終於是徒勞無益。戰後分贓的條約，播下了未來戰爭的種子。同時，在特殊的歐洲領域內，新的衝突又臨到最前線。因此，在戰後的二十年間，世界再分割的問題又以更爲尖銳的姿態出現了。

這樣，我們可以討論到現階段的諸特徵。

第一，世界再分割的問題，如今確已臨到最前線，不論在殖民地的領域方面，在歐洲疆界的再劃分方面，或在主要國家的權力分配方面，都是如此。戰爭已經開始，雖其範圍尚限於局部，但區域的戰爭牽涉到世界的諸問題；而一般的緊張與鄰近戰爭的空氣，也遠過於一九一四年。

第二，在經濟方面，一九二九年爆發的世界經濟恐慌，其範圍的廣泛與時間的持久，均為前所未有，如今已逐漸造成一種特殊的新形勢，就是說，它不再回復到正常的繁榮，不再回復到生產與貿易之更高水準的景氣，却在國內方面與國際方面造成現狀上的極端不穩固性與不平等性，造成局部的與不完善的復興而伴以繼續不斷的大量失業，造成低落的被限制的國際貿易，造成貨幣的持續的不穩定，造成強化的經濟戰爭，尤其可怕而堪注目者，則為軍火工業的相對向上以及戰爭準備的重要性。以上的一切，均無補於和諧的解決，却更為尖銳地顯示現存經濟秩序的破產，並顯示生產力反抗現存資本主義階級獨佔之桎梏的衝突。

第三，在內層的政治方面，現存國家形態的整個機構，由於法西斯主義與防衛民主權利以及促進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民勢力發生猛烈的鬥爭，已經在根本上起了動搖。這就是現存資本主義統治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之現階段的典型的表現。

第四，資本主義國家統治世界的六分之五，社會主義佔據世界的六分之一，這樣的分立如今已經達到對照的一個極點，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相對的逆退，另一方面則為社會主義生產的急遽的前進，因此提出了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之未來關係的嚴重問題。

第五，國際勞工運動已經達到了一個轉向點：世界經濟恐慌與法西斯主義的經驗，已給予舊改良主義者的幻想以致命的打擊，在抗拒法西斯主義與反動的共同鬥爭中，已經產生了一種聯合陣線的堅強的推動力；但鬥爭的更進的步驟仍未明白確定，西歐與美國的工人們趨向於社會主義的整個問題，如今正以最急迫的姿態被提出。

第六，殖民地民衆的解放運動已經開始，不論在亞洲與非洲都是如此，中國民衆為

民族統一與民族解放而反抗瓜分政策的鬥爭，向前邁進；印度的民族解放鬥爭，漸次獲得力量；中東在沸騰中，阿比西尼亞向侵略者抗戰；整個的非洲在激動着。這不僅揭開了一幅佔據人類之最大多數的殖民地民衆與半殖民地民衆的遠景，使他們從被動的歷史工具進而成爲自動的歷史工具，同時，這也反衝着並損害着其餘國家內的帝國主義的基礎，進而動搖着建立於這基礎上的社會政治的機構。

這些不過是今日急需解決的許多問題中的若干問題。我們必須從這些問題的關係與發展中，把它們視爲整個世界過程的一部份。因爲我們必須加以這樣的觀察，對於現時代的一切勢力，必須根據於多方面的瞭解，我們才能討論並把握世界政治的中心問題。

第三章 二十年來的一篇清賬

「我相信，雖然人類也許還不能看到黃金時代，但無論如何，已經可以開始看到漸趨光明的時代，它引導我們攀登高域，使我們看到爲人類的良心所渴望著的事物。」（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國威爾遜總統在英國曼哲斯脫演辭。）

「十七年來的衝突，其間只有短促的不澈底的休戰，已經把整個大國，化爲經濟破產社會騷亂的狀態，」在「三十年代戰爭」以後，無可倫比。」（一九三一年龐蒙茲 Frank H. Simonds 著歐洲能保持和平嗎？）

自一九一四年到現在，爲歷史所造成的世界問題，沒有一個獲得解決，大多數的問題是已經強化了，舊問題之上又增加了許多新問題，同時，戰後的所謂「解決辦法」其中一大部份已經破壞，或正在破壞的過程中。這是我們對於最近十八年間應該認識的

第一個要點。

一 大戰的結果

從帝國主義不能尋覓其它方法來解決矛盾的意義上說來，一九一四年的大戰是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的集中與累積，不斷增加，各個對立集團繼續獵取着新的利潤，這兩種推動的必然的力量，迫使大戰的爆發。由於資本主義的不平均性以及資本主義發展速率的不平均，和平解決是不可能的，換一句話說，賊物的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德國的鋼鐵生產蒸蒸日上，英國則漸趨衰落；英國握着殖民地財產的大部份；資本主義發展較爲激驟的德國，在掠奪殖民地舞台上，則出現較晚。在這些環境之下，在列強與資本主義各方面之複雜性百倍於此的環境之下，永久不變的比率是不能夠存在的。每一個部份須爲自身而鬥爭。每一個政治家或外交家須爲自己的集團而鬥爭，否則就要失去他的地位。每一個工業集團的領袖須爲他的股東們之利潤而鬥爭，否則就要失去他的地

位；每一個報館的編輯人須為他的權力集團之利益而鬥爭，否則也就失去他的地位。沒有一個政治家或資本家能夠把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整體，而加以考量，如果這樣，他們也就不成其為資本家了。真正的『戰爭之起源』（服務於不同集團的教授與政論家們，爲了這一個問題，不知浪費了多少紙張，加以徒勞無益的討論，）並非任何個人或任何集團的特殊野心或特殊陰謀，（他們大多數也許並不直接地意欲着爆發時候的那種形式的戰爭，不過是意欲着特殊的利益，終於促起戰爭而已，）却是他們個人意志的堅決的集體成果，這種個人意旨的總和，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力量的反映，可是他們並不瞭解這一點。

一九一四年大戰的爆發，顯示出帝國主義所放縱的世界力量，已經完全超越了帝國主義政治家的控制。互相頡頏的各國政治家與參謀本部的一切估量，均為事實所擊敗，戰爭急速地顯示出它是獨立的力量，超越了一切控制的可能性。任何方面的政治家，均估量戰爭不致延長，可以獲得迅速的解決，不論勝利屬於任何方面，不致損害到帝國

主義的基礎。德國的國務總理貝士曼·霍爾威格 (Bethmann-Hollweg) 曾於戰爭爆發時宣稱：

『不用說，它將是一陣狂風暴雨，但時間是十分短促的。我估計這一次戰爭只會延續三個月，至多四個月，我的政策都根據於這一個假定而構成。』(參閱 Admiral Sir Herbert Richmond 所著 Sea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第二五一頁)

英國首相格雷 (Edward Grey) 遠在一九〇六年，就宣稱法德兩國一旦決裂，英國勢將援助法國，而在這情形之下，『我們在陸地上應該很少冒險，或者一點也不冒險，在海面上，我們可以把德國的艦隊封鎖於基爾 (Kiel)，使之不能動彈，我們可以不惜一艦，不折一兵或不發一彈。』(參閱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 of the War 第三卷中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五日格雷致 Sir Francis Bertie 函)

格雷更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在下院發表演說，其估量的錯誤，聞名於全世界：『我們的貿易毫無損傷，我們的商業安全如常，我們參加戰爭，比較不參加戰爭，不會惡劣到怎樣

的境地。』

這種種估量均為現實所粉碎。戰爭一旦爆發，就循着自殺的邏輯而前進，所有帝國主義的政治家都捲入了它的漩渦。帝國主義對於和平問題，除了戰爭以外，沒有解決的方法，同樣，對於戰爭問題，也不能夠尋覓解決的方法。經過了急速的行動佈置以後，戰爭便陷入進退維谷的地位，延續着持久的毀滅的僵局或消耗的掙扎，雙方較為老成的帝國主義政治家，憂慮地預見現存社會制度整個崩潰的徵兆，急欲擬定一個維持現狀的解決辦法。這一種希望從各方面表現出來，如蘭東爵士 (Lord Lansdowne) 於一九一六年十一月間的信件（直到一年以後方始發表），謂「戰爭的延續將毀滅文明的世界，」力主「必須及時結束戰爭，以避免世界的巨劫。」如卡爾國皇 (Emperor Karl) 於同月間發表同樣的宣言；如愛士葵斯 內關於一九一六年十二月間準備進行談判，招致內閣的改組，而由喬治勞合 掌握政權；如同月間德國 的和平照會；如「一星期後威爾遜總統 的和平照會；如一九一七年一月間威爾遜總統 發表的『沒有勝利的和平』演說，

（『它必須是沒有勝利的和平；勝利以後的和平，將成爲強施於失敗者的和平；它將使失敗者在屈辱脅迫之下加以接受，它將遺留下一種苦痛，一種憎恨，一種殘酷的回憶，和平的條件不能永久地棲息於苦痛，憎恨或殘酷的回憶之上，因爲後者好像流沙一樣；』）
 如一九一七年春季奧國的和平談判暨齊甯伯爵（Count Czernin）的備忘錄。（『我的論據的基礎就是革命的危險。』）

戰爭所放縱的力量，不易重加約束，以維護舊制度。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作孤注的一擲，以博最後的勝利。各國較有經驗較具遠見的領袖們所發出於審慎的呼聲，均被窒息。這不是十八世紀的『內閣戰爭』，而是現代帝國主義所產生的『猛虎』國家（Tiger States）間求生存的野蠻戰爭。『予以致命打擊』（Knock-out-Blow）的政策，確實地表現着帝國主義時代的統治力量。喬治勞合在英國征服一切了。克利蒙梭在法國征服一切了。魯登道夫將軍，杜壁茲（Von Tirpitz）將軍與無限制的潛水艇戰線，也在德國征服一切了。帝國主義在它的滅亡之鏈上又增加了一環。

帝國主義所不能解決的戰爭之難題，最後由革命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解決。國際社會主義從大戰爆發的時候起，就預言大戰將以革命而結束，大戰果然以革命，並且也只能以革命而結束。人民大眾被他們的統治者以奪取利潤之神聖權利的名義，驅策到前線去，他們感到屠殺的殘酷與無用，他們反對戰爭的這種覺悟，立刻破壞了戰爭的機構，就在那個時候，戰爭的機構正達到了它的最高的動率，雙方的參謀本部已經審慎地擬定一九一九年的作戰準備，俄國革命終止了東部的戰爭，德國革命終止了西部的戰爭。

美國參加戰爭，造成協約國在數量上與物質上的優勢，最後獲得勝利，其實協約國的優勢，就是革命的反映。一九一七年三月的俄國革命，俄國因此勢將退出戰爭的必然遠景以及協約國因此勢將顛覆的威脅，乃為美國於俄國革命爆發後四星期內參加戰爭的決定的動機，唯有這樣，美國才能保障已經投在協約國方面的重大利益。美國駐英大使貝奇（Beck）於一九一七年三月間，以急電致威爾遜總統，極力主張美國有立刻

實行武裝干涉的必要，指出武裝干涉為挽救美國牟利者所投於協約國方面在經濟上與金融上的鉅大利益；接着，威爾遜總統就突然改變政策，於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宣佈對德作戰，與數月以前他所主張的『沒有勝利的和平』路線，完全自相矛盾。這平衡的破壞，是有利於協約國方面的，促成德國在軍事上的潰敗，並加速了德國革命的過程。

隨着世界革命的發端與帝國主義之鏈的最後一環的碎裂，隨着革命的伸展於中歐（已經為四年的戰爭與封閉所損害了）與大多數國家的不同程度之革命鬥爭的擴張，整個的世界形勢大為改觀。世界革命的新問題，逐漸地掩蓋了戰爭的舊問題，並主宰了各國政治家的思想。帝國主義的戰爭，溶解而成為反革命的戰爭，干涉主義者的戰爭與自相殘殺的國內戰爭。

世界歷史從這一點推移而成為兩部歷史，即帝國主義世界的歷史與社會主義世界的歷史。

二 革命與反革命之不穩固的平衡

世界大戰對於現存制度的破產，給以第一次的大警告，在世界大戰的毀滅性的經驗以後，又有什麼發展呢？

當戰爭結束的時候（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一個偉大的選擇面對着人類，尤其是歐洲各國的人民。對於這偉大的選擇，必須審慎討論，因為這一個偉大的分水線，不僅其後果已經開始創造現代的世界，它所提供的問題，也是我們今日所無法逃避的。

選擇的第一條路是：世界主要國家的人民可以循着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途徑，向前邁進，推翻使世界趨向毀滅並已發生動搖的資本主義統治，站於勞動階級奪取政權或無產階級獨裁的基礎上，聯合農民與下層的中產階級，急速地樹立新的社會主義秩序，維護世界團結與和平，療治戰爭的創傷，揭開物質與文化之無限制向上的新時代。

選擇的第二條路是：他們可以重返正在企圖恢復中的戰前秩序，再聽帝國主義的

呼聲——它現在以威爾遜總統的柔和的音調，悔着過去，允許十足「民主主義」的甚至「社會主義」的未來——仍受資本主義統治的屈服，而其後果則為續發的帝國主義衝突，勝利的和平，強化的榨取，以及促進戰爭與反動的複演。

威爾遜抑列寧——這一個問題在大戰結束的時候，廣泛地向全世界提示着。威爾遜代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改革的路線，而仍保存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獨佔生產工具的要素；承認民族自決的目標，而仍保存殖民地統治，在歐洲並犧牲民族自決的要求，以成全帝國主義的目標；承認世界和平的目標，却將互相敵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主權，置於鬆弛無力的國際聯盟。這些目標的內在矛盾，很迅速地從凡爾賽會議時與會議後的結果上顯露出來，從威爾遜對於歐洲外交陷穽之無能為力，遭受美國的擠斥以及所懷理想之最後的痛苦幻滅上顯露出來。在那危急萬分的歷史轉捩點時，威爾遜的名字家喻戶曉，好像是再生的基督。他代表着所謂和平，進步與新世界秩序的化身，以抵抗所謂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恐怖，可是，他却驟從這個尊神的地位，沉落到為世人所憐憫所淡

忘的深淵。這情形，如今許多人很難想像。

列寧的路線是人民大眾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帝國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的獨裁，殖民地國家與落後國家內工農階級的民主獨裁，殖民地民衆的解放，生產組織的集體化，進而達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世界團結。這些目標與客觀形勢的需要相適應，但主觀的力量尙未準備完成。不過，列寧在生前已經能夠看到這些原理，在佔據地面六分之一的俄國，獲得充分結實的勝利；說一句老實話，迅速地建設蘇聯社會主義的一切條件，已經完成，世界共產主義的最後勝利，我們也可以十分信心地期待着。

這兩條路線的問題，就是戰後的問題，實則這問題以相繼的形式，今日仍然面對着我們。這兩條路線在戰後的世界，以廣大的規模表現着，試驗着。在東歐與蘇聯的亞洲領土內，一萬六千萬的人民大眾不懼鬥爭與犧牲，沿着社會主義的路線，冒險前進，達到社會主義的目前勝利。在世界的其餘部份，人民大眾尙未充份準備，尙未充份堅強，尙未展開爲成功的革命鬥爭所必需的領導組織與目標之明確化，而且，仍然受着資本主義的

控制。

這兩條路線的結果，可以從目前的世界形勢中加以分析。有一位聞名的著作家曾謂十九世紀英國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沒有發生革命。從更爲廣大的意義上說來，戰後西歐與中歐以及其它地域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沒有發生社會主義革命。質言之，達於高潮的革命鬥爭，在戰後相繼失敗而終止。凡爾賽和約、世界經濟恐慌、大衆失業與困頓、生活水準低落、軍備競爭以及法西斯主義瘋人院等等的大苦難，暫時掩覆了這一個問題。

不過，革命的問題並非因此可以避免。它如今以更擴大的力量，回到這個充滿了反動與戰爭之暗影的世界。但爲完成革命所必須跋涉的途程，已經證明是更費力的途程，是備嘗磨折與錯誤之痛苦經驗的更遼長更複雜的途程。

戰後帝國主義國家的主要政治家，最初就以極大的注意力，集中於如何使革命挫敗。這一個問題籠罩了巴黎和平會議，喬治勞合於一九一九年致和會的備忘錄中，給予

這一種見解以最清晰最自覺的表現。他說：

「整個歐洲盈溢着革命的精神。它不僅是不滿現狀的深刻情緒，而是工人階級間反對戰前秩序之憤怒與反抗的深刻情緒。在政治的、社會的與經濟的各方面，整個的現存制度，爲歐洲任何一角的人民大眾所懷疑……我們也許將冒着這樣的危險：把全歐洲的人民大眾投入極端主義者的懷抱中……」

「我在現局中所見到的最大危險，就是德國也許將投入布爾什維克主義一方面，把它所有的財力資力以及巨大的組織力，供給革命的狂徒去運用，革命的狂徒則夢想着以武力爲布爾什維克主義征服全世界（原文如此）。這危險並非全然是幻象。德國的現政府是軟弱的；它沒有威信；它的權力受着脅迫；它所以猶豫躊躇，乃因德國除斯巴達卡主義者（*Spartacists*，即德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外，沒有其它辦法，而德國却尚未準備接受斯巴達卡主義。可是，目前斯巴達卡主義者正以極大的努力，發揮着他們的論辯，宣稱只有他們能够把德國從大戰所造成的不可忍受的環境中拯救出來。他們允許把德國的民衆從協約國與資產階級的羽翼上解放出來。他們允許德國的民衆可以完全管理自身的事情，並提供一個新天地的遠景。自然，代價是重大的。無

政府狀態將延橫兩三年，也許將流血，但最後土地仍然是存在的，人民仍然是存在的，住宅與工廠仍然是存在的，鐵路與一切交通的道路也仍然是存在的，而摔去了一切負擔的德國，就能够開始新的努力。

『如果德國傾向到斯巴達卡主義者一方面去，它必然將與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相結合。如果這成爲事實，東歐的全部將捲入布爾什維克主義革命的大漩渦。』

『布爾什維克帝國主義（原文如此）不僅威脅着毗連俄國的若干國家，且威脅着整個亞洲，並也同樣威脅着美國。如謂和平會議對於俄國毫不加以干涉，而能單獨對德媾和，這是在是徒勞無益的設想。』（參閱一九一九年三月廿五日喬治勞合致和會的備忘錄，發表於一九二二年。）

據威爾遜總統的秘書貝克（Stanard Baker）報告，在威爾遜總統乘着華盛頓號郵船啓程赴法的途中，也有着同樣的自覺，認爲進攻布爾什維克主義是和會的斷然的任務：

『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毒素所以能够被接受，乃因爲它是對於現世界之秩序的一種抗議。我們在和會中應該爲一種新秩序而奮鬥。』（參閱貝克的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一書，一九

（一三年出版）

在歐洲主持美國救濟工作的胡佛，也於一九二一年的信件中，有着同樣明晰的表示：

『在休戰後清算期間的整個美國政策，是欲盡其能力使歐洲不淪為布爾什維克，或為布爾什維克的軍隊所蹂躪』（參閱 Louis Fisher 著 The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第一卷第一七四頁，摘錄胡佛於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七日致 O. Garrison Villard 函）

帝國主義的反革命行動，其目標在推翻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並阻止它的發展。東歐的新興國家與擴大的羅馬尼亞，築成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防禦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交通隔斷線』（Cordon Sanitaire）。西歐帝國主義以金錢與武器援助白俄的任何反革命軍隊。英國、法國、美國與日本的武裝軍隊，從各方面侵略蘇聯的領土。倫敦與巴黎的最高機關，組織恐怖主義、暗殺、怠工與捏造的種種行動。法國的軍事教官與英國的軍火，煽惑着波蘭去進攻蘇聯，而侵略的結果殊為不利，紅軍曾達到華沙的城外。帝國主

義以全力構成了二十三個反蘇聯前線。

帝國主義企圖顛覆蘇維埃政制的一切努力與任何方法，均歸完全失敗。巴黎公社的歷史不再複演。帝國主義與反革命勢力在物質上的絕對優越性，並未獲得勝利。這是什麼緣故呢？第一，因為俄國工人與農民的不可摧毀的抵抗，他們知道爲什麼要戰爭，他們對於自己的領導權有着澈底的自信，他們爲保持自己的土地而戰爭，爲要做生活的主人而戰爭，爲反抗榨取者、地主、反動軍官與帝國主義侵略者而戰爭，因此，他們能以超人的精力、毅力與智力去迎擊他們的敵人，就是在革命戰爭的歷史上，也沒有可以比擬的先例。第二，因爲國際革命國際勞動階級的一切力量，在共同鬥爭中已經跟他們聯合起來。侵略軍隊與國內軍隊的接踵而起的叛變，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工潮與騷擾，碼頭工人與運輸工人的拒絕爲反革命軍隊搬運軍火與軍需，麻痺了帝國主義的活動。英國的參謀總長亨利威爾遜（Sir Henry Wilson）於一九一九年一月間，不得不向內閣報告：「就是現在，我們已不敢向軍隊發出不受歡迎的命令，所謂紀律已是過去的東西了。」

(參閱 Loius Fisher 的 The Soviets in the World Affairs 第一六三頁) 並且指出唯一的政策，只有『撤回我們的軍隊，退出歐洲與俄國，集中我們的一切力量於未來的暴風雨中心，如英倫，愛爾蘭，埃及與印度。』（同上，第一八〇頁。）福煦 (Foch)，魯登道夫與邱吉爾 (Churchill) 諸人，企圖大規模共同進攻蘇聯的計劃，終告失敗，這失敗並非由於各國政府缺乏意志，而是因為他們缺乏實行意志的力量。其它國家內的革命浪潮，雖猶不足推翻帝國主義，却足以阻止干涉主義者的軍隊，使之不能征服世界革命的核心。蘇聯擊退帝國主義的優越勢力而獲得的勝利，在任何意義上，是國際革命的勝利，對於整個的未來，具有決定的重要性。

反之，在其它國家內，帝國主義終於也能夠壓倒了革命的動亂。芬蘭的白黨因為不能以自己的力量顛覆工人的統治，於一九一八年的上半年，就引進德國的軍隊推翻工人政府，樹立白色恐怖政府，由曼納赫 (Mannerheim) 掌握政權。協約國在芬蘭，像在波羅的海沿岸國家一樣，自休戰以後，就擔當起維持反革命勢力的任務。匈牙利的蘇維埃

政權維持了三個月，實施許多遠大的改革計劃，協約國對於匈牙利的蘇維埃政權，不僅運用經濟封鎖的武器，並且派遣羅馬尼亞軍隊去推翻它，去掠奪、去摧毀、最後以匈牙利的政權交給霍爾第（Horthy）的白色獨裁。在革命的嚴重期間，協約國仍以封鎖的武器去對付德國，在休戰以後，德國民衆以飢餓而死者達七十五萬人。推進並支持德國革命的工人與士兵委員會的政權，爲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權所損害，社會民主黨並武裝保皇黨的軍官與反動的軍官。這些軍官們槍殺革命的領袖，槍殺獄中的李勃克納西（Liebknecht）與盧森堡（Rosa Luxemburg），殘酷地葬送了革命。以「民主主義」相標榜的威瑪（Weimar）共和國，便建築於這基礎之上，最初向工人階級表示社會改革的寬大讓步，其實這不過是表面而已，暗中則樹立敵視工人階級的反動武力，這些反動的武力最後又推翻民主主義的形式，社會民主黨的傀儡，並樹立公開的法西斯主義。在奧國，也逐步地展開了同樣的歷史；工人與士兵造成革命，他們的政權也從內部受着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權的損害，經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社會改革的階段，一直達到法西斯

主義的最後結果。英、法、美等國，最初對工人階級也採取在經濟的與社會的方面表示讓步的手段，而工人運動的領導者，則以種種方法來抑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間的革命力量。工人階級所獲得的讓步，於是很迅速地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的攻勢所擊破。

戰後中歐與西歐的革命相繼失敗，其原因究竟何在？西歐帝國主義的統治者相信他們的經濟上的武器，即對於戰後擾攘貧困中的國家，先判別它們所採政治制度的性質，然後決定應否予以食糧與生活必需品的接濟，實在是決定一切的武器。因此中歐救濟委員會的英國委員戈特爵士（Sir William Goode）於一九二五年論及『歐洲的建設』時，曾摘錄一九二〇年正式報告中的一段如下：

『匆促造成的新興國家，所以能够維持政權，食糧可以說是唯一的基礎。歐洲的半數國家已經徘徊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邊緣。如果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的期間，沒有一三七、〇〇〇、〇〇〇鎊的救濟借款，貸予中歐與東歐各國，它們就無法供給食糧，燃料以及海陸運輸。沒有食糧，燃料與運輸，奧國與其它幾個國家也許已經步着俄國的後塵……休戰的兩年半以後，中歐、布爾

什維克主義的挫敗，大部份憑藉了救濟債款的力量……從經濟的與政治的觀點說來，一三七、〇〇〇、〇〇〇鎊的支出，也許是歷史上最好的國際投資之一。」（參閱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日本晤士報所載戈特的論文。）

可是，正像軍事的武器一樣（例如羅馬尼亞對於蘇維埃匈牙利的軍事侵略）經濟的武器並非唯一的決定革命之失敗的武器。中歐、東歐與蘇聯的革命大團結，不難抵抗這些武器；而這確也是西歐各國統治者所最恐懼的威脅，喬治勞合在上面所引用的備忘錄中已經顯示出來了。致命的弱點，却是內在的弱點。除俄國以外，歐洲的勞工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是生長於高度發展的帝國主義之環境內的，它們的上層組織感染着帝國主義的影響；高度發展的帝國主義，以榨取殖民地的高度利潤為基礎，能夠給予勞動階級的上層份子，尤其是工人官僚份子以特殊的利益，使他們與工人羣衆以及世界無產階級相隔離。因此西歐與美國的工人階級，自身發生分裂，機會主義滲入於勞工運動的機構內，這在大戰以前就已經明顯了。隨着一九一四年大戰的爆發，勞工運動與社

會主義運動領導權的主體，移轉到敵對的帝國主義官僚份子的手中，第二國際宣告崩潰。所以，當戰爭的過程把工人羣衆與士兵們曳入革命運動的時候，勞工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機構的主體，實際上已成爲反革命的勢力，而爲資本主義的利益服務，以全力鎮壓革命運動，援助資本主義制度的恢復。因爲這個緣故，只要爲環境所需，它們準備採取最暴烈最酷辣的手段，甚至不惜武裝最反動的勢力，以剷除富於鬥爭精神的工人，這樣它們便也替自己挖掘墳墓，準備了最後覆亡的條件。德國的愛伯脫 (Ebert) 希特曼 (Scheidemann) 或諾斯克 (Noske) 奧國的勒納 (Renner) 或巴育 (Bauer) 法國的斐諾特爾 (Renudel) 或托姆斯 (Albert Thomas) 英國的麥唐納 漢德森 (Henderson) 或托麥斯 (J.H. Thomas) 換一句話說，各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權，雖因環境的不同而各異其形式，却担任着同樣的職務。這對於挫敗中歐與西歐的革命，實在是具有決定力量的職務。

戰後的革命巨浪，在一九二〇年達到了它的最高潮，蘇聯的紅軍進迫華沙城外，

德國的卡浦——Kapp 政變失敗，魯爾工人委員會維持短期的統治，英國成立行動委員會。一九二二年，一方面蘇聯完全肅清反革命的勢力，另一方面，德國則有三月事變的失敗，英國則有『不祥的星期五』（Black Friday）的被出賣。一九二三年，法國軍隊侵入魯爾，又使德國的革命形勢高漲。斯脫萊斯曼（Stresemann）甚至認為他的聯立內閣，是德國『最後的議會政府。』西歐政治家對於革命的恐懼，仍未減退。鮑爾溫接見紐約導報的記者時，曾謂：

『這個世界正坐在一個憂慮的位置上，因為法國與德國，均有革命的危險。』（載一九二三年一月八日曼徹斯脫導報）

斯麥茲將軍（Smuts）也說：

『歐洲的經濟的與工業的機構，各方面正在破裂着。』（載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曼徹斯脫導報）

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倫敦太晤士報的社評，則這樣警告着：

『擺脫了所有舊標準的世界，正以空前的速率，向不可知的宇宙衝去。』

仍有勢力而未動搖的美國資本主義，出來援助歐洲帝國主義，終於克服了一九二三年戰後革命浪潮的最後進程。美國慷慨地貸款於歐洲，造成短期穩定的狀態，却也因此奠定了世界經濟恐慌的基礎，即美國本身也無法逃避這個恐慌的漩渦。

隨着戰後革命浪潮的退落，我們便踏入了一個世界革命與反革命之不穩定平衡的時期。一方面，革命已經在蘇俄（一九二二年底以後，應稱蘇聯）的東歐與亞洲領土內獲得勝利，另一方面，革命則失敗於中歐與西歐。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不得不生息於不愉快的休戰狀態中。往後，每一個世界各自表現着內在的發展力量，以達於今日的成果。

可是，戰後深入的革命動亂與強烈的階級鬥爭，並不因革命浪潮的退落而告終止，却連貫地繼續着，有時出現於這一個國家，有時則出現於那一個國家，直到目前。德國、薩克桑尼（Saxony）與吐林其亞（Thuringia）兩地的工人政府，先後為武力所剷除，但

在一九二三年德國的革命形勢之後，却繼續着一九二四年愛沙尼亞（Esthonia）的動亂，一九二五年敘利亞與摩洛哥的殖民地鬥爭，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推進，一九二六年英國的總罷工，一九二七年維也納的事變，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德國局內戰形勢的尖銳化，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印度勞苦大眾的鬥爭，一九三一年西班牙的革命，一九三四年法國的二月事變，一九三四年奧國的武裝衝突，同年阿斯吐里斯（Asturias，在西班牙）的武裝衝突，以及目前西班牙革命的新階段。

因此，戰爭與革命兩個循環間的『休憩』並非靜止的時期。如今一切證據都指示着我們正踏入廣大革命鬥爭的新階段。

三 戰後的新勢力關係

大戰使世界的不平衡的劃分達到了極頂。社會主義革命範圍與資本主義反革命範圍的劃分，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簇新的劃分，這一種劃分成爲戰後世界之永久的地

理特徵；不僅如此，在資本主義世界內，也發展着一種極端的分化。大戰本來是不平衡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後果，大戰既未，能解決那一種的不平衡性，反使資本主義世界的不平衡的劃分，達到更高更極端的階段。統治階級也許能夠暫時克服勞働大衆與蘇聯以外之被統治民族的反叛，但他們的勝利中却潛伏着失敗；因爲他們的勝利不過使內在的分裂及其分解力更趨尖銳化而已。

在大戰以前，資本主義發展的不斷集中，達到了這樣的階段：舊資本主義世界（歐洲）的六大強國，幾乎控制了整個的亞洲，非洲與澳洲，歐洲以外的兩個新興國家——日本與美國，雖發展得十分迅速，却尚未完全跨上國際政治的舞台。一九一四年的大戰，可以說是歐洲六強的殲滅戰。兩個新興國家局部地參加戰爭，乃欲從中攫取最大限度的利益，爲自身爭得優越的地位。

戰後的情形怎樣呢？戰前歐洲六大強國在戰後暫時削去了三大強國。我們現在看到戰勝國與戰敗國的新的劃分。戰勝的國家欲根本摧毀戰敗的敵人——德國的基礎，

剝奪了它的殖民地，運輸業，以及煤鐵礦的主要部份，並且勒索巨額的賠款，以抵償未來的發展。殊不知它們却因此造成了許多新問題，當初均為它們所意料不及。為保證它們的優勢起見，它們樹立許多新的衛星國家（如小協約國家——譯者）與繼承國家（即繼承奧匈帝國之舊領土的國家——譯者）。這些國家在邊境上，外交上與經濟上的種種關係，又造成了許多新問題，即所謂歐洲的「巴爾幹化」。

但歐洲與世界的關係，發生着更為廣大的變化。據事實所昭示，戰爭的最後勝利，並非屬於歐洲的戰勝國，却是屬於歐洲以外的一個新興國家，它現在已經充分地顯露出它的頭角，一改其尚未全部脫離金融依賴性與債務國的地位，而成為在物質上與金融上凌駕全世界的大國，這就是美國。它憑藉了戰爭的利潤，獲得充實的發展，在財富上，資源上與生產力上，均超越任何一個國家。美國採取中立的觀望政策，直到最後的階段，才根據以最後一擊搏取全勝的原則，參加已達極點的決定命運的局面，隨着戰爭的結束，歐洲的交戰國家筋疲力盡，兩敗俱傷，美國則擁有毫未衰退的資源，一躍而成爲戰後新

勢力關係中的最強者，成爲戰後新債務關係中的唯一債權國。此外，日本與英屬自治領也增長了它們的實力，開始威脅着舊世界的霸權，不斷地奪取市場。新的矛盾把歐洲的舊問題投入黑暗中，它們在性質上遠過於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矛盾。

同時，殖民地國家也覺醒起來，反叛起來。新的覺醒的巨流，氾濫於亞洲與非洲。

這樣，橫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戰後世界的極端複雜的圖畫，包括着下列不同的各方面：（一）最強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對於各國均處於債權人的地位，最初欲以和平會議與組織國際聯盟的領導權，來操縱直接的世界支配權，旋即退守孤立政策，可是世界政治的事實却不斷地打擊着這個政策；（二）歐洲以外的國家之崛起——日本與英屬自治領，後者在金融上以及政治上仍然全部或局部處於依賴的地位；（三）歐洲的勝利國：英國分擔着衛護歐洲與世界廣大利益的責任，面對着帝國的紛崩離析的趨勢；法國企圖操縱歐洲大陸上桎梏的霸權，却力有未逮；意大利不滿現狀，有與戰敗國攜手的傾向；（四）歐洲勝利國的衛星國，以及戰前的中立國，都依賴勝利國的援助，以

維持它們的地位；（五）戰敗國，最初是國際政策的被動的對象，逐漸進而處於主動的挑戰的地位；（六）殖民地國家謀取獨立的鬥爭，發展到各種不同的階段；（七）共產主義，如今在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直接掌握政權。至於中間階級，落後國家與半獨立國家的諸種關係，猶未列入。

這就是資本主義發展之極端不平衡性的一幅圖畫。資本主義的諸種矛盾究竟怎樣呢？它們在大戰以後已經消退了嗎？恰巧相反，資本主義的諸種矛盾造成了大戰，大戰的結果，更強化了矛盾；普遍於全世界的許多新的矛盾，已經暴露出來。

爲了這些對立的相互關係與變動的相互作用之錯綜複雜，我們對於未來的世界發展之若干主要的幹線，尤其是戰後『解決方案』的性質與逐漸清算，以及推展到現階段的各點，目前必須加以注意；在現階段中，新的問題又已進迫到斷然的衝突點了。

四 戰後的解決方案

兩種主要的解決方案，統治着戰後的時期：第一種是凡爾賽和約及其附從的許多次要條約，涉及歐洲、近東與戰前德國殖民地諸問題；第二是華盛頓條約，涉及主要的歐洲以外的問題。凡爾賽和約本欲解決整個的世界問題，國際聯盟藉以成立；可是，因為美國與英法集團的主要對立，（實際上反映着戰後帝國主義的主要對立，即美帝國主義的對立，）在實踐上，凡爾賽和約主要地變成了歐洲的解決方案。

戰勝國是獲得勝利了；但到了分配贓物並涉及和平的概念時，它們自己的陣營就激烈地分裂了。

美國本來沒有征服領土的需要，所受戰前德國商業競爭的影響也較為輕微，它於大戰結束時想實現兩個主要目標：第一，在最初的階段，美國欲利用威爾遜總統，以達到世界資本主義的領導地位，與本身的新力量相協調，並成爲歐洲的仲裁者；第二，美國欲

打倒英國的海軍優勢，後者是美國爭取世界霸權的主要障礙，因此美國在戰後即進行龐大的造艦程序。威爾遜總統使美國掌握世界霸權並使自己成爲世界聯合會（The Federation of the World）會長的迷夢，迅速地趨於幻滅。（如今只有國聯盟約第五條，還這樣記着：「大會第一次會議與行政院第一次會議，將由美國總統召集。」）美國戰略上的實力，在英法的威勢之前，尙不足以造成直接的世界霸權的地位。因此，美國改變政策，放棄太嫌直接的威爾遜路線，拒絕簽字於凡爾賽和約，或加入國際聯盟，並採取所謂「孤立」政策的路線，實則是採取金融上，經濟上以及外交上較爲間接的侵入政策，與加強戰略上的準備相輔而行。這是勝利國集團間的第一個罅隙，是發展着的新世界矛盾之信號。

英國與法國在最初的階段聯合打倒德國；但到了如何分配贓物的時候，它們便戲劇地分裂了。英國所關切的是欲在商業、運輸業與海軍的競爭上消滅德國的實力，並掠奪戰前的德國殖民地；在歐洲方面，英國則亟欲避免均勢的長期破壞與過份深刻的傾

墮。反之，在法國方面，則亟欲樹立歐洲的霸權，擴展領土到萊茵河的左岸，掠奪歐洲煤鐵鋼的重要礦區——包括勞崙、魯爾與薩爾，並使德國陷於永遠低劣的地位。這兩個目標必然是對立的，並為不斷的英法衝突的基本原因。在戰後的時期，英法衝突伴着戰利品的分佔而同時存立。

在達到戰爭目標的一點上說來，英國最為成功。據李特爾爵士 (Lord Riddell) 的和會與和會以後之密錄 (Intimate Dia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and After, 一九一八—一九二三) 所載，喬治勞合 會這樣宣稱：

『我們確已達到我們的目標。我們確已獲得所欲獲得的東西……德國的海軍已經剷毀了，德國的商業運輸已經消滅了，德國的殖民地已經放棄了。我們主要的貿易勁敵之一已經十分沉重地失去它的戰鬥力了，我們的同盟國都將成爲它的大債權人了。這不是一個細微的成功。』

這概述是準確的。英國所獲得的，是德國海軍的剷毀，德國商輪的轉讓，與德國工業的殘廢（因爲德國失去了四分之三的铁礦，三分之一的煤礦，並負擔巨額的賠款；）此

外，英國增加了一百六十萬七千零五十三方哩的土地，三千五百萬的人口。（法國所得者，爲四十萬二千三百九十二方哩，人口計四百萬。）可是，我們這裏必須記錄下列的事實：一九二五年，德國的鋼生產量幾已兩倍於英國的水準；一九二七年，德國的工業生產量已超過戰前的百分之十七，英國則降低了百分之八；一九三〇年，德國的輸出超過了英國；一九三五年，英國與德國簽訂重置海軍的協定；一九三六年，英國的政界方面已討論着以殖民地返還德國的需要了。

法國對於戰爭的目標，則不及英國那樣成功。它掠奪了阿爾薩斯與勞崙，但法國參謀部把國境擴展到萊茵河左岸的企圖，爲英美兩國的反對所挫阻，後者提供一種軍事保障條約（Treaty for Military Guarantee），這條約終究也歸於無效。法國所能達到的希望，是協約國共同佔領萊茵河左岸十五年，佔領薩爾煤礦區域十五年，萊茵河右岸五十公里以內建立非武裝區域。協約國共同監督德國裁減軍備，限制常備軍（採募兵制，須十二年替換一次）爲十萬人，並禁止設置重炮與軍用飛機；但對於許多反革命的

武裝團體如民間保衛團 (Ortsch.) 市民同盟 (Einwohnerwehr) 等，則不加注意。這些武裝團體當時用以鎮壓工人革命，頗為需要，後來就成為法西斯蒂組織的細胞。龐大的賠款並不規定總額；（有一位法國財政部長曾想加以估計，從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算起，結果他入了療養院。）但這些龐大賠款的目的，主要地是屬於政治上的，藉以壓迫德國，攫取條約上所未允許的東西。勞崙的鐵，需要魯爾的煤與焦煤；這些礦產的結合，向為德國重工業的基礎；法國的政策就在能夠永久佔領萊茵區域與永久征服魯爾。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賠款問題是一個主要的武器。樸恩克賈 (Poincaré) 曾於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發表下面一段的演說：

「據我個人的意思，假定德國償付賠款，反而要使我痛苦不安，因為我們就須退出來萊茵區域了。你以為何者是上策呢：獲得金錢或獲得新的土地？我個人寧願佔領土地，不欲接納賠款。因此，你就可以明白，我們為什麼需要強有力的陸軍與警惕的愛國心；你就可以明白，救濟凡爾賽和約的唯一方法，在於使被我們擊敗的敵人，不能履行它的條件。」

法國於一九二三年武裝佔領魯爾，這政策便達到了它的最高峯，也達到了它的破裂點。

同時，法國爲樹立歐洲的霸權起見，復與歐洲次等的並受惠於凡爾賽和約的國家，簽訂許多條約（如一九二〇年的法比軍事同盟，一九二一年的法波同盟，一九二一年的捷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三國同盟，一九二四年的法捷同盟，一九二六年的法羅同盟，與一九二七年的法南同盟）。

凡爾賽和約今日已成爲彰明較著的失敗，批評的『衆矢之的』。可是，在事實上，它反映着帝國主義的既定的目標與關係。有人謂凡爾賽和約中關於領土的不能實行的條款，是民族自決的理想動機的後果，這樣的辯解也不能成立。割削德國的人口以及禁止德奧兩國的合併，完全出於戰略上的考慮，與最基本的民族自決的原則相刺謬。殖民地的瓜分，對於民族自決也沒有什麼聯繫。在四個新興的或擴大的歐洲國家內，即受惠於勝利條約的波蘭，捷克，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四個國家內，四千七百九十萬的多數民

族，統治着二千二百七十萬的少數民族（參閱下表）

	多數民族	少數民族
波蘭	一七、六六七、〇〇〇	九、五四七、七七〇
捷克	八、七六〇、〇〇〇	四、八四四、〇〇〇
南斯拉夫	九、九七一、六〇〇	二、一六〇、一〇〇
羅馬尼亞	一一、五七六、〇〇〇	六、二四〇、六〇〇
總計	四七、九七四、六〇〇	二二、七九二、四七〇

（參閱 J.S. Rouseck 著 The Working of the Minorities System Under the League of Nations [一九二九年捷克京城出版，並轉錄於 V. De. Balla 著 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Europe] 一九三二年牛津大學出版）

凡爾賽和約與協約國所簽訂的其它條約，其要地是帝國主義的戰略上的條約，交互地依據了戰略上的利害關係，侵迫着民族自決的呼聲。

緊接着凡爾賽和約以後的世界形勢，為勝利國的兩種主要對立所控制，即美對

立與英法對立。

在德帝國主義暫時地被肅清以後，英德對立即為更廣泛的世界帝國主義對立——英美對立所代替，英美對立在這個新時代中，必然地成為國際帝國主義關係的樞紐。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的期間，英美對立驟見強熾。好斯上校（Colonel House）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日，就已經向威爾遜總統這樣報告了：

「我抵達英國，就感覺到英國敵視美國的心理……英美兩國的關係開始具有着威脅英德關係的同樣性質。」

這衝突的最尖銳的表現，是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間發展着的造艦競爭；實則衝突是普遍於各方面的，其它較為顯著的是煤油衝突，從一九二〇年寇仁（Curzon）與柯爾貝（Colby）兩人關於桑利瑪（San Remo）以及美索巴達米亞（Mesopotamia）煤油問題的激烈書函中，可以看出。美國於一九一八年就擬定一個龐大的造艦程序。一九一九年，喬治勞合在凡爾賽和會中極力向威爾遜總統進攻，要求美國「更為

積極地確認英國的海上地位，或予英國以一種保障，即美國不使海軍競爭推展到足以威脅英國海上霸權的程度。」（參閱好斯上校的 *The Intimate Papers* 第四卷第 四一七頁。）喬治勞合在巴黎和會中曾向好斯上校陳述：

「英國將耗費最後一文錢，使它的海軍優越於美國或任何一國的海軍。」（參閱同上第一八六頁。）

美國海長鄧尼爾（*Daniels*）對於英國主張的反響，在他的日記中表示出來，他以下的措辭，紀錄英國的要求：

「除非美國同意停止大規模的造船程序，喬治勞合不能夠贊助國際聯盟。英國不能夠允許任何一國操縱海上的霸權。」

「我並未答覆這個事實上的哀的美敦書。它使談判暫告終止……在如此驚人的威脅之後，這會講實有終止的必要，使有充份的時間，以冷靜各方的頭腦。」（參閱鄧尼爾的日記，轉錄於 *F. M.*

Orchard America's Naval Challenge 一九一九年紐約出版）

英國欲美國承認它的海軍優勢，這企圖並未成功。一九二〇年，英國放棄要求，宣布所謂『一強標準』(One-Power Standard)；一九二〇年三月七日，英國海相在下院宣布這樣的原則：『英國的海軍實力不應遜於任何一國。』但據美國海軍專家的意見，『不遜於任何一國』的原則，並未保證平等。同時，日本也推進它的造艦程序，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已把國庫收入的半數耗於海軍。一九二一年，英國議會通過建築四艘超特戰艦，比較各國正在建築中的任何戰艦為強大，並計劃在下半年度增造四艘巨型戰艦。

世界經濟恐慌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間的冬季爆發，英國尤其感到重大的壓迫，展開了基本工業的深刻的衰落與大批的失業。世界經濟恐慌阻止了瘋狂的海軍競爭，並迫使英國斂其傲氣。一九二一年的末尾，美國召集華盛頓會議，迫使英國接受主力艦對美平等，迫使日本接受五五三比率，並迫使英日兩國放棄同盟。美國不戰而獲得這樣的勝利，毫未損及經濟上的與金融上的優越實力。不過，鬥爭仍然是繼續着的，這從一九二七年日內瓦海軍會議的決裂，海軍平等的不斷糾紛，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條約

的十分局部的成就，以及一九三四年因日本的廢約行爲所引起的華盛頓基礎的最後破毀，可以顯示出來。

至於華盛頓條約在遠東關係上所具更爲遠大的重要性，當由另章加以闡述考慮。英法對立在和會中已有痕跡，（比較顯著的，如一九一九年三月間喬治勞合的備忘錄，與斯麥茲將軍在簽訂和約時發表和約可加修改的宣言等）在和會以後就發展出來，不僅限於賠款與歐洲政策諸問題，並且也尖銳地涉及近東問題。英法兩國在近東方面，利用希臘與土耳其，推動代理人的戰爭；英國援助希臘，武裝希臘，法國則援助土耳其，武裝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的土耳其，在凱末爾的領導之下，終於能夠撕碎維爾條約（Treaty of Sevres），在英法對立的基礎之上，建樹獨立的國家；一九二一年十月間，法土簽訂友好條約，英國寇仁爵士的抗議，毫無效力。後來希臘軍隊的潰敗，以及一九二二年英國軍隊在海峽（Straits）地帶所遇的香納克（Chanak）危機，直接地招致喬治勞合內閣的覆亡。一九二三年，洛桑條約成立，土耳其實現了民族目標的主要部份，所

餘者，只有摩蘇爾（Mosul）未經收回與海峽地帶須成爲不設防區域而已。（譯者按：一九三六年七月間，洛桑條約簽字國舉行蒙德婁會議，一致通過土耳其政府的要求，撤廢海峽地帶不設防的條款。）

英國在歐洲方面，企圖不放棄凡爾賽和約的基礎，來削弱法國的霸權，它設法援助德國，甚至野心地企圖拉入蘇聯，以改變形勢。一九二二年喬治勞合在基諾亞（Genoa）會議中，悉心擬定了一個歐洲金融銀行團（European Financial Consortium）計劃，欲造成『歐洲的恢復』並準備在金融上與經濟上侵入蘇聯。這企圖爲法國的反抗（樸恩克賽已經代替白里安掌握政權，）與蘇聯的堅決態度所擊敗。蘇聯只準備發生經濟上的關係，不準備被屈辱於狂妄的要求。唯一的成果轉爲德國與蘇聯簽訂拉巴羅條約（Rapallo Treaty），這是對抗英法優勢的第一個平衡力，也是削弱凡爾賽鎖鏈的第一個步驟。喬治勞合在基諾亞所受的失敗以及後來的香納克危機，迫使內閣不得不辭職，而代以軟弱的波納勞（Bonar Law）政府。

法國現在可以自由推行它的政策，不受英國的拘束，一九二三年一月間，樣恩克賽佔領魯爾，英國苦惱地求助於美國，以調整局勢，但條件尚未成熟。英國第一須接受美國的戰債條件，苛重程度，遠勝於任何債務國。一九二三年的末尾，美國意欲踏進歐洲市場，作為輸出過剩資本的尾閘，乃準備有所行動。法國的魯爾冒險計劃，因德國民衆的劇烈反抗而告破裂，英美兩國在金融上與外交上實行暫時合作，迫使法國接受專家計劃，即道威斯（Dawes）計劃，對於德國實行更合乎科學的榨取，以促進英美兩國的金融利益。在一九二四年被採取的道威斯計劃，結束了戰後的第一個時期，揭開了暫時安定的新時期。

五 安定與崩潰

暫時安定時期是從一九二四年起到一九二九年止，這一個時期也很可以稱為欣欣向榮的資本主義的錯覺時期。

這一個時期的開始，就是一九二四年倫敦會議的召集與道威斯計劃的採行，據說後者是在實際的基礎上，解決令人頭痛的賠款問題。（據專家的意見：「所採取的觀點是商業的，不是政治的。」）並展開了恢復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道路。接着，美國的資本與借款源源流入德國及歐洲其它國家，誘導工業的急速發展與膨脹。國際聯盟也貸出許多款項，援助歐洲的若干小國。一九二五年，政治的解決隨着經濟的昭蘇以俱來，這便是羅加諾公約的簽訂，最重要的一點在於保障德國的西境，以英國、法國、德國、比利士與意大利的共同担保為基礎。同年，英國恢復金本位；數年間，大多數的國家也先後恢復金本位。一九二六年，德國加入國際聯盟；在托依萊（Thoiry）地方，法德兩國成立較為密切的合作，法國與德國的資本家聯合於歐洲鋼業卡德爾（European Steel Cartel）的組織之下。白里安與斯脫萊斯曼自稱為「良好的歐洲人」，泛歐洲計劃以半官方面的鼓勵而開始入於討論的階段；大家相信和平與進步的新時代，已放出曙光，逐漸泯滅了舊時的隔閡與紛歧。同年，軍縮會議預備委員會召集會議，一九二七年繼續舉行，並邀請

蘇聯的代表參加。一九二七年，國際聯盟大會決議：『禁止一切侵略的戰爭。』一九二八年，白里安、凱洛格、非戰公約成立，記錄全世界各國的誓約，『申斥以戰爭為國策的工具。』一九一九年，楊格（Young）計劃的專門家，又奠立一個國際銀行的基石，依報告中的措辭，這國際銀行應該『一般地在各國中央銀行機構的合作中，成為緊密的有價值的聯鎖，這合作對於世界信用機構的繼續安定，是十分需要的。』

全世界的生產與貿易躍進。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間，據國際聯盟的統計，世界食物的生產指數，從九八升到一〇三，工業原料品的生產指數，從九二升到一一一，工業品的生產指數，從九二升到一一一，世界貿易總額的指數，也從九二升到一一一。在同一期間，德國工業的生產指數，從八七升到一〇九，美國工業的生產指數，從九五升到一〇九，英國工業的生產指數，從九九升到一一二，法國工業的生產指數，從八八升到一一四。利潤累積起來了；投資激增起來了；股票價格飛躍起來了。工業股票的市價的指數，也高漲起來：在美國，一九二六年為一〇〇，一九二九年則為一八九，在德國，一九二五年為九

三，一九二九年則爲一二六；在英國，一九二五年爲一〇九，一九二九年則爲一三九。

以上是外貌的一面，這外貌表示景氣的狀況，表示所謂安定了的與改造了的資本主義之繁榮，和平與進步，大家認爲安定了的與改造了的資本主義，已經克服它自身的矛盾與對立。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了許多幻象，如「組織化的資本主義」、「貧困的克服」、「危機的終止」以及無限膨脹與世界和平的「新時代」等。美國的胡佛總統會於一九二八年宣稱，「今日對於世界的希望，就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商業膨脹時代，」並謂「真感痛苦的失業，終於消逝；在美國，我們今日對於克服貧困的最後勝利，距離得更近，任何一國的歷史上尋不出這樣的先例。」美國哈佛大學的卡佛教授（Professor N. Carver）於一九二八年出版這個經濟的世界（This Economic World）一書，在該書中他提出「繁榮的普遍能夠維持多久」這一個問題來。他的答覆是：「如謂我們現在所目觀的廣播世界的繁榮，不能夠永遠遞增下去，那是絕對沒有理由的。」這見解爲美國的工業領袖們所贊同。皮塞爾赫鋼業公司（Bethlehem Steel Corpo-

ration) 的總裁於一九二八年宣稱：『我堅信地說，我們已經奠定了一個基礎，在這基礎之上，我們可以樹立一座繁榮的建築，遠勝於我們已經享受的任何事物。』(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鐵時代。)通用汽車公司 (General Motors) 的總裁則謂：『我們一般的經濟狀況與工業狀況，十分健全，我對於一九二九年的觀點，就根據着這一個確信。』(載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紐約時報。)在這個時期中美國膨脹的特殊狀況以及一部份工人所獲的大工資，被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典型。於是表現出這樣的一種見解：資本主義是演進的，隨着資本主義的演進，則為大托拉斯的不斷集中與各國中央銀行的漸趨合作，一直發展到『組織化的資本主義』或『超資本主義』的新典型，就是說，發展到世界經濟的合理生產組織，消滅經濟恐慌，逐漸克服貧困與失業。歐美勞工運動的改良主義者，特別提倡這些見解。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论家希爾弗亭 (Hilferding) 於一九二七年的基爾大會中，曾謂『我們處於資本主義的時代，從大體上看來，資本主義的時代已經克服了自由競爭的時代，我們現在趨臨於一個資本主義的經濟』

組織……趨臨於組織化的經濟，」並謂「實則組織化的資本主義，在理論上表示計民生產的社會主義原則，代替了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原則。」

認為暫時安定的時期，就是永遠安定而欣欣向榮的資本主義的新時代，所有資本主義的政治領袖，商業領袖與經濟理論家們，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現着這種種錯覺。當時只有馬克思主義者正確地分析局勢及其後果。（據官方表示，事後也承認暫時安定時期的虛妄性，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英國政府致美國政府的照會，就這樣宣稱：「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間的繁榮，大體上是迷幻的，實則已經播下了未來痛苦的種子。」不過，英國政府因為要賴債才肯承認罷了。）

實際上確然是大不相同的，一九二九年爆發的世界經濟恐慌，迅速地證明這一點。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與對立並未克服，它們反為戰後資本主義的一般恐慌所強化；而一九二九年爆發的世界經濟恐慌，在強度上超過以前任何一次經濟恐慌。戰後暫時安定的整個基礎，實則是根本腐蝕的。在任何意義上，它並不足以表示回復到相對安定的

戰前水準，反之，它却是建立於促成未來崩潰的勢力上。原因有二：第一在於局部安定過程中的特殊條件；第二在於資本主義完成階段中的一般條件。

歐洲資本主義恢復過程中的直接助力，是流入歐洲尤其是流入德國的美國資本。這奠定了恢復金本位的基礎，並產生繁榮與膨脹的暫時的躍進，實則它蘊藏了一個更為不易解決的重大難題。

大戰的結果，使美國從債務國的地位轉為債權國的地位。不過，它却是一個新式的債權國。英國自十九世紀的中葉起，就處於蒸蒸日上之債權國地位，海外的供獻，使輸入的淨餘年年增加，反之，美國的新債權國地位則與巨額的出超相結合，以高度組織的大規模生產與競爭銷售的各種方法，強迫輸出，同時維持高關稅率並增加稅率以阻遏輸入。這樣造成一個明顯的矛盾。戰後困頓的世界對於財主的美國資本主義，已經負了巨債，同時美國還向世界輸出過剩的商品，更增加了各國的債務。歐洲每年貿易出超須達二萬萬鎊，才能償付美國的債務，但因為美國鼓勵傾銷，歐洲的國際貿易每年反入超四

萬萬鎊。這結果必然地反映於大批黃金的流入美國。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四年的期間，美國存儲的黃金總額，從十九萬二千四百萬元，增加到四十四萬九千九百萬萬元，幾佔世界黃金的半數。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達到了極點。一方面，歐洲以紙幣的膨脹與高貴的信用，掙扎圖存。另一方面，美國却窖藏黃金，以防『黃金的膨脹』。美國前國務卿凱洛格任駐英大使時，倫敦的一位著名銀行家曾對他提出這個問題：『貴國擁有世界大部份的黃金，你們準備作如何措置？』他的答覆是：『採取金本位，恢復歐洲的貨幣，黃金的問題即自行解決。』（載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倫敦泰晤士報）可是，據後來的經驗所昭示，這問題並未如此容易地『自行解決』。

美國向歐洲以及全世界輸出資本，是短命的『解決』辦法。從一九二四年下半年起，貸予政府的與工業的借款與信用借款——道威斯借款是一個主要的例子與路標，源源來自美國流入歐洲。歐洲繁榮的恢復，在充份開展中。民主主義左派（以英國的麥唐納政府與法國的赫禮歐政府為代表）獲得一時的全盛。黃金的流動是轉向了美國。

的黃金不僅開始流入歐洲，也流入歐洲以外的其它國家。在一九二四年的上半年，美國黃金的淨輸入猶達四萬五千萬金元，到了下半年，黃金的淨輸出已有一萬七千萬金元。美元匯兌開始降落，與英國的貨幣標準更相接近。一九二五年，英國乃恢復金本位。

由此看來，恢復繁榮的整個基礎，顯然動搖不穩，必然將招致未來的崩潰。因為美國的資本輸出必須能夠維持下去，這情形才能夠繼續。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的期間，美國對外投資的每年平均總額，達十一萬萬金元。（參閱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三日美國商務報告。）一九二八年，美國從對外投資上所獲的純利，計五萬二千三百萬金元，戰債的收入計二萬一千萬金元，共計七萬三千三百萬金元（參閱一九二八年的 *The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s of United States*）。因此，美國對外新投資的總額，超過純利與戰債的收入。這種形勢，顯然不能夠無限期的繼續下去。可是，在德國方面，據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日德國統計局的數字，一九二五年對外債務總額，約計二十五萬萬馬克，一九二九年增至二百五十萬萬馬克，即從一萬二千五百萬鎊，增至十三

萬五千萬鎊。又據德國統計專家庫辛斯基博士 (Dr. Kugynski) 的估計，一九二八年德國的財富總額，約為五百萬萬金元到六百萬萬金元，其中各種形式的外國存款，約佔一百三十萬萬金元到一百五十萬萬金元，即達財富總額的四分之一（參閱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紐約民族週刊）。因為債台高築，因為連利息也必須舉行新債始能償付，於是每一次的新借款愈見其危險，國外輸入新資金的源泉，愈見其迫近閉塞的結局。如果新資金的源泉一旦閉塞（一九三〇年終於實現），除非在這個期間能有巨額的出超以作彌補，整個的機構勢將崩潰。當『安定』的過程結束時，原封未動的問題，再以更為尖銳的姿態出現。

歐洲各國，尤其是德國，自須大大地增加它們的輸出，以應付當時的局勢。但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的四年間，德國的入超淨額反達七十八萬一千一百萬馬克，即三萬九千萬鎊。就是德國完全把賠款取消，使入超變為出超，足夠償付外債的利息，德國的商品也非氾濫於世界市場不可。德國會以種種努力來完成這個目標，利用借貸的資本，

推行大規模的合理化程序。使德國工業從事於大規模的生產，向世界市場傾銷商品。可是，這努力以不能抵抗世界經濟恐慌之更為深入的原因，而告失敗了。

在局部安定的時期，每一個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大大地擴展它的生產力，欲攫取國際市場的更大部份，以吸收生產品。同時，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內的原料生產，也大為增加。只要實際的生產膨脹，能夠提供膨脹的市場需要，這膨脹的過程在相當時期內，是能夠發展下去的。可是，最後這膨脹終於破裂，因為它受着資本主義榨取環境內大眾消費力的限制。所謂合理化的過程，從削弱的勞働力上榨取繼續增加的生產，並減低勞働者的待遇，更使矛盾強化。在一九二八年的開端，美國勞工統計局局長，就已經提出這個問題：

「一九二七年每一個人這樣問着：減雇勞働力的結果，怎樣能夠購買增加的生產品呢？合理化表
示增加生產。一九二七年並未答覆這個問題。我們希望它在一九二八年也能够同樣順利地閃避過去。」

經濟恐慌的最初信號，顯示於原料生產的存貨之累積。原料生產的世界存貨，如以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標準爲一〇〇，一九二六年的末尾就增加到一三四，一九二八年增加到一六一，一九二九年更增加到一九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發生農業恐慌。

大崩潰爆發於一九二九年，開始於美國，遍及於全世界。被視爲「新資本主義」之典型的美國資本主義，向居於『安定』之主要組織者地位的美國資本主義，竟成爲資本主義破產之主要的表現，世界經濟解體之直接的原因。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糜爛的經濟恐慌。我們無須詳述這一次恐慌的破壞程度，這一次的恐慌，延續而成爲長期的蕭條，其後果影響到每一個人的生活。在恐慌的最高峯與最低線之間，即自一九二九年第二季至一九三二年第三季之間，除蘇聯（同期間的工業生產，幾乎增加了一倍）以外，世界工業生產從一一三·一，降落到六五·九（以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間每年的平均

生產一〇〇為根據，即降落了百分之四二（參閱國際聯盟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二年之世界生產與價格，第四七頁。）我們只須指出一點來加以對照：在戰前的任何一次經濟恐慌，生產降落的最高紀錄從未超過百分之七。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以金元為計算標準的世界貿易，降落了百分之六五，以前降落的最高紀錄，即在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的經濟恐慌中，也只有百分之七。失業數字達到三千萬至五千萬的高額。國際聯盟的國際失業指數，一九二九年為一〇〇，一九三〇年升到一六四，一九三一年升到二三五，一九三二年升到二九一，一九三三年降到二七四，一九三四年仍達二二一。

暫時的安定時期，隨着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崩潰而結束，在最初的階段，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仍蔑視它的重大性，以為是資本主義進展的暫時的間斷，以為是由於孤立的偶然的因素，特別是由於賠款與戰債的不良制度的後果。但胡佛總統於一九三一年宣佈延付賠款與戰債的辦法，並未解決恐慌，僅暴露恐慌的更為深刻的性質而已，恐慌的

更爲深刻的影響，發動於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之間，隨着產生長期的蕭條，因此形成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廣大轉變，這些轉變又改造世界的形勢，並形成新時代。

六 戰後解決方案的清算

世界經濟恐慌在國際政治關係上揭開了一個暴風雨的時代，這暴風雨還是「方與未艾。」和平與妥協的言辭，黯然無光。戰爭與準備戰爭的呼聲，已經公開而高亢。奧斯汀·張伯倫爵士（Sir Austen Chamberlain）於一九三二年二月間發表演說，當他回顧到羅加諾公約與經濟安定等快樂時期的轉變時，他對於未來世界的瞻望，坦率地表示他的恐懼：

「我瞻望目前的世界，我以目前的情形比較當初的情形，我不能不承認爲了某種原因，爲了無從捉摸的某種事物，這世界在最近兩年以來是開着倒車了，是退步了。國與國之間未能更相接近，未能增加善意的程度，未能趨向安定的和平，反之，這世界却陷入疑慮，恐怖與危險的態度，危害着世

界的和平。」（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倫敦太晤士報）

「世界是退步了。」天真的人士也許覺得一個善良的保守主義者，能夠發表這樣的見解，是值得欣喜的。實則世界並未退步。它却以加速的步伐前進着，趨向於增長着的恐慌，趨向於現存資本主義制度之更為明顯的社會破產，經濟破產與政治破產，趨向於拚命的反動手段，趨向於各國內部以及國際間的戰爭與立刻爆發的威脅，趨向於革命鬥爭的開展。這是資本主義恢復繁榮時期最後所招致的結果。

一樁一樁的事件連續發生，摧毀了安定的柱石，摧毀了戰後諸種解決方案的中心。一九三〇年，德國成立緊急政體，停止議會的形式，一直延續到一九三三年，最後轉變為法西斯主義的政體；一九三一年，停付一切賠款與戰債；英國成立國民內閣；英國首先放棄金本位，大多數的國家羣起摹倣；日本侵略中國的東北數省，違背國聯盟約，華盛頓九國公約與非戰公約，日本脫退國際聯盟。一九三二年，軍縮會議開幕，日本的軍隊轟炸瀛滬，軍縮會議延續三年，毫無成果；洛桑（Lausanne）會議決定賠款的終止；渥太華

(Ottawa) 會議表示自由貿易的結束；另一方面，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完成，使蘇聯成爲歐洲的第一個工業國家，成爲全世界的第二個工業國家。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握德國的政權，開始法西斯蒂恐怖的統治，全歐洲發生反響；德國脫退國際聯盟，在軍事方面恢復自由行動；羅斯福總統也在美國樹立緊急性質的新政 (New Deal)；美國也放棄金本位；世界經濟會議迅速地全歸失敗。一九三四年，德國重整軍備繼續邁進，國社黨衝鋒隊的領袖們於六月間舉行清黨運動時，均被屠戮；奧國總理陶爾斐斯 (Dollfus) 被暗殺殞命，法國外長巴爾都 (Barthou) 也慘遭非命；奧國與西班牙均以武力搏擊法西斯主義，因此發生反動；在法國，勞工聯合陣線遏止了法西斯主義，勞工聯合陣線後來發展爲人民陣線；國際政治關係因蘇聯加入國際聯盟而發生變化。一九三五年，德國背違凡爾賽和約，恢復徵兵制度，接着，英德締結海軍協定；法蘇協定的成立，顯示出新的勢力調整；意大利進行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蔑視國際聯盟；日本廢棄華盛頓海軍條約。一九三六年的開端，意大利繼續進行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譯者按：五月間意大利正

式兼併阿比西尼亞，不以國際聯盟的軟弱無力的經濟制裁而受阻礙，日本在華北繼續進行擴大的戰爭，日本中途退出倫敦海軍會議，華盛頓限制海軍的整個體系，全告破裂，英國宣布重整軍備的新程序，德國廢棄羅卡諾公約與萊茵河區域的恢復武裝，揭開了歐洲政治關係的新危機。

在休戰後十八年的今日，在凡爾賽和約後十六年的今日，在華盛頓條約後十四年的今日，在恢復金本位後十一年為世界本位的今日，戰後的一切解決方案，究竟還剩餘些什麼呢？凡爾賽和約是西方勝利帝國主義國家欲使德國在經濟上與軍事上永遠處於屈辱地位的條約。這一個目標已經完全失敗了。

英國在一九一四年之前，感受着德國在經濟上與海軍上『方興未艾』的威脅，因此悉心經營三國協商的包圍計劃，接受戰爭，以一百萬條的性命與八十萬萬金元的鉅額債務，為消滅這個威脅的代價。查在一九一三年，英國仍居世界輸出的首位，佔總額的百分之二三·一，德國佔百分之二·三九，美國佔百分之二·五六。大戰與凡爾

賽和約的最直接的效果，是打倒了德國。一九二四年，在世界貿易總額中，德國降落到百分之五·七五，英國也降落到百分之二·九四，最沾便宜的是美國，增加到百分之六·四五。一九二九年，德國的輸出增加到百分之九·八二，又向英國壓迫，英國又減削到百分之二〇·八六，美國則仍佔百分之五·七七。一九三〇年，德國的輸出總額達六萬零一百萬鎊，英國僅達五萬七千萬鎊，德國的輸出超過英國，這是歷史上的新紀錄。這狀態延續到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才使德國的輸出降落。關於生產，一九二八年的德國生產，佔世界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二〇·六，英國佔百分之八·五；一九三四年，德國佔百分之二〇·四，英國佔百分之二〇·一。

賠款與戰債的整個制度（擬定於八十年內分期償付的詳密辦法），以一九三一年胡佛總統發表延付戰債的宣言而崩潰，更以一九三二年終止賠款的洛桑會議而全部破壞；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英國向美國最後一次以黃金償付到期的戰債，一九三三年，英國仍有兩次表徵的付款，一九三四年終於拒絕償付到期的戰債。

在軍事方面，凡爾賽和約也同樣陷入毀滅的境地。英國鼓勵德國重整軍備（每日郵報為親德的領導者）。凡爾賽和約的軍縮條款，已為一九三五年的德國徵兵法所破壞；空軍限制條款已為德國宣布設置空軍與急速擴充空軍的事實所破壞；海軍限制條款則已為一九三五年的英德海軍協定所破壞，該協定中包括一項特殊的條款，允許德國可以設置等於英國的潛水艇。萊茵河右岸的非武裝地帶，為一九三六年德國的武裝佔領所取消，因此結束了凡爾賽和約中所有的軍事條款。

凡爾賽和約中尚屬完整的部份，只有關於領土的條款，即關於歐洲新國境與分割戰前德國殖民地的條款；目前新興的修約派勢力，正採取着全盤的攻勢，要求對於現存歐洲國境實行廣大的改變，以創造一個在國社黨勢力支配下的新中歐（MittelEuropa）並要求返還德國的殖民地。

西歐列強的羅加諾公約怎樣呢？我們知道，羅加諾公約是暫時安定的唯一柱石，是凡爾賽和約以後新時期的主要支持者。德國於一九三六年宣告廢棄羅加諾公約也同

樣地毀滅了。

國際聯盟如何？美國從未加入，德國與日本已經脫退，意大利蔑視盟約，僅是名義上的會員國。支持國際聯盟的，只有英法兩個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國際聯盟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滿洲」之前，在一九三五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之前，暴露出它的虛弱無力。國際聯盟的前途，懸着一個問號。國際聯盟的貧弱，固已十分明顯，如果說，今日已有某種新生命的徵象開始活動於這個機構之內，那就是因為蘇聯的合作，原來的國聯盟約，從未考慮到蘇聯的加入問題，並且確是老實不客氣地予以拒絕的。

華盛頓條約如何保證中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的華盛頓九國公約，已經爲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的侵華行動所粉碎。華盛頓五強海軍條約及其聯續的倫敦三強條約，也因日本在一九三五年宣告廢棄而歸破壞。一九三六年英美法的倫敦海軍條約，結束了量的限制，英美兩國間海軍平等的遺跡，化爲文件的相互交換，含着極端模糊，極端富於伸縮性的諾言。

凱洛格——白里安的非戰公約，自經各國簽署的時候起，就受着毫無拘束的侵犯。次要的國際條約，如禁止毒瓦斯戰爭的一九二五年議定書，也已經爲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行動所粉碎。

恢復後的金本位與所謂經濟安定又如何除了三個國家外（譯者按——指法國、荷蘭與比利時）各國在名義上或實際上均已放棄金本位，而這些國家不久也有放棄金本位的趨勢（譯者按——法國於一九三六年九月實行佛郎貶值，荷蘭與比利時也有同樣的舉動，事實上都已放棄金本位）貨幣戰爭，經濟的不安定與國際貿易的窒息，益趨強烈，在整個的資本主義時代中，找不出一個先例。

從各方面看來，世界形勢的新局面，顯已繼承了戰後的舊時代。戰後的舊時代的種種條件已經消逝。新的與強烈的矛盾與鬥爭，從各方面勃發起來。

第四章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之新興的矛盾

〔槍砲比奶油更重要〕（摘錄一九三六年一月間戈林將軍演講詞）

世界經濟問題，是世界組織的根基。戰後的世界經濟，仍為資本主義的關係所統制；社會主義經濟雖已存在於六分之一的地面上，雖已超脫了其餘六分之五的資本主義世界之衰落之共同現象，但其力量與範圍，仍不足以轉變整個世界經濟之優越的資本主義的性質。

戰後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十分不健全的。各派的經濟學者對於病情的診斷，雖有不同，但對於十分不健全的一點，是大家同意的。在世界經濟恐慌之前夜的暫時安定的若干年間，一般人相信資本主義已經克服了它的種種困難，踏入欣欣向榮的新時代。可是，世界經濟恐慌的爆發，給予這些幻想以重大的打擊，使一般人不得不廣泛地認識現時

代之更爲深入的矛盾。

資本主義的沒落，並非隨着一九一四年的大戰而開始。據準確的分析所昭示，資本主義的沒落，是隨着帝國主義時代而開始的，因爲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時，獨佔代替了自由貿易，資本主義不再是生產發展的推進的力量，而成爲生產力之發展的桎梏。但這一個過程的後果之充分運用，從一九一四年起才爲一般人所注意；從一九一四年起，累積的矛盾的爆炸力，開始摧毀整個的機構。從一九一四年起，資本主義踏入衰落與崩潰的時期。

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這一種演變，現在已經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

在一九一三年看來，蘊蓄着種種矛盾與困難的資本主義制度，似乎還像世界生產、貿易與金融之活動的與調整的機構，在大體上仍然趨向於生產的繼續膨脹，趨向於整個世界的更爲密切的相互維繫，可是在現階段中，它已顯示出它是一個極端不平衡極端不諧和的制度，如生產的長期低降，生產力與實際生產之間的懸隔，國際關係之破裂

的離心傾向等，而產生了下列的諸種結果：世界貿易採取限制的辦法，不穩定的國際貨幣，造成分立而對抗的金融基礎，獨佔「布洛克」的戰爭益趨強化。其實，這些傾向早已存在於一九一三年的病菌中，但直到戰後才顯示出它們的充分的性質與影響，尤其是在世界經濟恐慌以後。世界經濟恐慌的爆發，距今已有七年，世界經濟恐慌的最低線，距今也已有四年，這些傾向依然強有力地表現着，在若干方面，甚至更有力地表現着，可見上述各點並非暫時不安定期間的暫時因素，而是深入地根植着的現階段之特徵。

對於這種更為深入的演變之認識，久被視一九一三年的景氣為資本主義之「軌範」的傾向所掩蔽，殊不知資本主義已經逸出了這種「軌範」，因此之故，把目前發生的資本主義的病症，推諉到偶然的與突發的不安因素上，推諉到武斷的政治因素的干預上，或者，推諉到政策的特殊謬誤上，而不把現階段視為在一九一三年即已存在的「一種制度之固有力量的充分實踐」。

在大戰結束後的最初數年間，「回復戰前狀態」的這一個概念，可以說是一個共

同的理想。這一個理想的具有特性的表現，則爲一九二一年美國哈定（Harding）總統的『回復常態』的口號，一九二二年英國波納勞首相的『回復平靜』的口號，或一九二〇年世界經濟和平會議最高委員會（Supreme Council）關於經濟的備忘錄，後者把當時的無組織狀態，認爲是『大戰的必然的結果』。

『與以前大多數的戰爭比較起來，目前的形勢並不反常……以協約國全部而論，工業的恢復已屬顯著。如今離開戰事的終止，將近十八個月，因戰事的極度緊張而必然引起的反撥，現正逐漸消逝。每一個國家的人民又已繼續他們的正常的職業，本會從他們的更新的努力中，看到更新的新繁榮之明徵。』（參閱一九二〇年世界經濟和平會議最高委員會宣言）

因此，戰後的第一個局面是：資本主義的主要勢力，只看到一點，即認爲戰後的紊亂是暫時的紊亂，將以『常態』的回復而獲得解決，却不瞭解戰前的『常態』是一去而永遠不能回復的了。

戰後的第二個局面，即在復興過程已告完竣與暫時安定時期已告開始以後，雖然

擯棄了舊的幻想，却又形成了新的幻想。戰後復興過程的完竣，暴露出戰後資本主義結構與資本主義關係之更爲恆久的轉變，（關於這一點，貝爾福工業貿易委員會的報告書，已經局部地加以說明。）同時，一個概念却又應運而生，即以爲安定與合理化的諸種條件，產生了一個資本主義之無限制的前進的新時代，這資本主義之無限制的前進，不斷地克服着舊的危機與矛盾。這一個階段的概念，從一九二七年舉行於日內瓦的世界經濟會議的議事錄中，可以獲得充分的解釋。一九二七年世界經濟會議的報告書，曾經這樣擯斥『回復戰前狀態』的幻想：

『金融上的與經濟上的暫時困厄，一向佔領着一般人的注意力，因爲這些困厄的消逝，我們如今已能清楚地看出並研究世界經濟形勢中之更爲深入地根植着的轉變，要實現一九一三年的狀況來解決這種問題，那是毫無希望的。』

可是，世界經濟會議報告書，却又把它的希望寄托於逐漸揚棄『經濟孤立』政策的一種運動，（該報告書謂『世界的輿論逐漸瞭解到繁榮這樣東西，是不能夠在狹隘

的區域中享受着的。」)並且寄託於合理化的邁進。(該報告書謂「本會一致認識合理化與科學管理的利益,並且認識在這一方面給以更遠大更協調的努力,實有迫切的需要。」)至於在第三章內已加分析的一點,即暫時安定的不穩固的基礎,與隨着合理化之過程以俱來的經濟恐慌的種子,則日內瓦的世界經濟會議,並無確切的認識。

這一個時代的錯覺,在世界經濟恐慌前夕刊行的第十四版大英百科全書內,有着最好的說明。第十四版大英百科全書,刊行於一九二九年,其中包括關於「資本主義」的一篇論文,頌揚戰後的現代資本主義之勝利,頌揚戰後的現代資本主義以優越的世界組織,克服了或緩和了經濟恐慌的「以前的強暴」。

「資本主義仍受人咒詛,以為不可避免的失業應該由資本主義負責,所謂不可避免的失業,乃產生於貿易活動之高峯與低線的週期更迭,「暴騰」與「蕭條」的週期更迭。雖然漲落的若干活動,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些節奏以前所具的強調,在目前和平的時期,確已減退了不_少,這是由於下面的幾種原因:經驗較多,認識較_足;在地球的任何一角所發生的事情,彼此均能

獲得靈敏的消息；運輸便捷，大托拉斯與企業組合運用着估計精密的統制，間接地為銀行組合所操縱；供給與需要之世界的力量，獲得較善的調整。」（參閱第四卷八〇五頁『資本主義』

篇）

所以，直到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後，資本主義世界才醒悟到已經發展着的基本矛盾與許多新問題。世界經濟恐慌的出現於資本主義世界，好像是晴天的霹靂。英國政府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卅一日致美國政府的照會中，曾謂：「在一九二九年的夏季，醞釀着的暴風雨尚未明顯。」（實則一九二九年七月間第三國際第十屆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已經預示着它的來臨及其性質。）當經濟恐慌繼續發展下去，當經濟恐慌可以迅速克服的預言使人感到失望的時候，布爾喬亞的輿論發生普遍的混淆與紊亂。在經濟恐慌的最低線，即從一九三一年年終至一九三二年年終，失望與悲觀的感覺，廣播於統治階級的思想之間。他們企圖從孤立的次要的因素中，從賠款與戰債的影響中，從關稅上，從貨幣政策上，從黃金的分配上……去探求經濟恐慌的原因及其解決的方法。這些互

相頡頏的經濟恐慌「理論」實則反映着各種金融資本或對峙的帝國主義集團間之彼此衝突的利益。可是，因為被嘗試的若干特殊方法，如取消戰債與賠款，脫離金本位採取貨幣管理等等，均未能獲得基本的解決，反而強調了內在的矛盾，布爾喬亞的政策於是轉向新的形態，即以強化的獨佔組織從事於強化的經濟戰爭之路線，並側重於未來的武力戰爭的準備，美國羅斯福政府，英國國民內閣，或德國國社主義統治的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證。

這樣看來，在我們所處的現階段中，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基本矛盾，以極端尖銳的姿態暴露出來。即使把經濟恐慌的最低線置之不論，也不能再回復過去的所謂「正常」的狀態，而達到一個新的更高的水準；在經濟恐慌爆發的七年以後，世界生產尚未達到一九二九年的水準，據紐約統計雜誌的指數，一九三五年第三季的生產，比一九二九年還低百分之一七·七；世界貿易離開一九二九年的水準更遠，據國際聯盟的指數，一九三五年第三季的貿易，比一九二九年要低百分之二三·九；各國的失業狀況仍未消滅；

而就是這種十分有限的『回復』，在許多國家內已經暴露出新的危機之威脅。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均性，達到了極點；若干國家內局部『回復』的程度極端地不平衡；經濟戰爭的各種形態強化；重整軍備與準備戰爭佔據各國經濟的重要部份。

戰後期間的整個經驗，世界經濟恐慌的整個經驗，以及銜接着世界經濟恐慌與蕭條的現階段中的整個經驗，尖銳地顯示着資本主義經濟形態與世界組織之急迫任務間的矛盾，以及趨向世界組織之生產力與現存資本主義關係之桎梏間的衝突。

一 『國際的』資本主義之謎

一八六〇年，當柯勃登（Cobden）進行磋商英法兩國的商約時，他曾經這樣寫給格拉斯東（Gladstone）：

『因為要使英法兩國更多接觸，更多商務關係，以改善英法兩國之道德的與政治的關係起見，我情願從卡雷（Calais）鎮裸足步行到巴黎。』（參閱 W. E. William 著 The Rise of

像這種對於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之國際團結任務的信仰，早已消滅無蹤了。繼承着柯勃登與格拉斯東而爲資本主義之領袖的人物，如今對於前輩的這種小店主式的幻想，往往嗤之以鼻。不過事實上，貿易世界主義與生產世界主義的那些幻想，比較現代帝國主義之典型的贖武主張，高利貸主張與掠奪主張，確要寬博許多。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布爾喬亞，即使他們所採取的政策必然符合着他們支配世界與最高限度地榨取世界的利益，却還相信普遍自由貿易與國際資本主義關係之目標的實現，將摧毀國家的畛域，而導入世界和平，協調與團結——即所謂『人類的議會，世界的聯邦。』

但結果與他們的夢想大不相同。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由於它自身的發展的內部法則，由於放任制度所懲患的資本累積與資本集中的過程，形成了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獨佔的政治理論與自由貿易的政治理論，在性質上是不同的。獨佔的政策排除以自由競爭爲基礎的和平商業侵略，是一種奪取霸權的政策，因此也是征服與暴發的

政策，是運用政治勢力與武力以促進經濟目標的政策。資本輸出與單純的商品推銷相反，最後需要政治的支配權，以確保正常的付款。掠奪被榨取的殖民地，也需要繼續擴充的武力，這不僅是爲了征服與鎮壓殖民地民衆，更重要的是爲了應付互相爭雄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衝突。因此一個國家，既擁有外交的與軍事的一切力量，對於獨佔資本主義的活動，便更爲緊密地發生着聯繫。獨佔資本主義的每一種行爲，基要地變成政治的一種行爲，公開地或非公開地牽涉到一個國家的武力。所謂「純經濟」的時代是已過去了。

一方面，競爭的舊方式，並不因獨佔的發展而消滅，却隨着獨佔的發展而繼續存在。另一方面，獨佔的出現也就是競爭與衝突之更強烈的新方式的出現。競爭從商人與製造家間之相對地和平傾軋着的韻頰，發展到高度組織的集中化的現代國家之可怖的衝突，利用武力與外交陰謀的任何工具，終於招致世界大戰。資本主義的範圍愈廣，集中的程度愈大，衝突愈形猛烈，所採取的手段也愈形強橫而暴厲；隨着生產力的擴展，現有

的市場就相對地減縮，輸出的競爭加強，原料供給與新榨取的地面上的勢力範圍，完全顯著。

柯勃登與和平政治的時代，過渡到張伯倫與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的時代。張伯倫的時代過渡到喬治勞合的時代，世界大戰的時代。世界大戰又遞嬗到凡爾賽和約以後的惡魔政治、賠款、通貨膨脹、反革命、法西斯主義、墨索里尼與希特勒。

集中化與生產力同見增長的資本主義，顯示出它並非在繼續增長中之諧和的與有組織的世界生產體系，而是在繼續增長中之強烈的矛盾體系。資本主義的不平均性繼續擴大；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資本主義國家在分割世界的掠奪戰中，勝利與失敗的壁壘愈分愈清，它們中間的距離也愈隔愈遠，一個一個的國家公開地或祕密地受制於強國，因此處於榨取者地位的獨立自主的國家，在數量上逐漸減少。

所以，以資本主義來達到世界團結的迷夢，隨着帝國主義時代的開始，就已經受到致命的打擊。

可是，這種真實的情形，並未完全爲一般人所認識，不僅在戰前的「武裝」和平期間如此，即在戰後還是如此。一般人的概念，以爲憑藉了世界資本主義，國際資本主義金融以及國際托拉斯等等的活動，經濟的聯繫愈趨緊密，愈使世界和平與世界團結有實現的可能，像這樣的觀念繼續表現着。這是由於帝國主義過程的二重性格。一方面，帝國主義的活動確使世界經濟網更形緊密，使國際分工更進一步（至少在最近期間以前是如此的。）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發展，也就是對峙的帝國主義集團間方興未艾的矛盾與衝突之發展，從強烈的貿易戰爭、關稅戰爭、掠奪讓予權與榨取的地域，以及最後的武裝衝突中表現出來。這兩種傾向並非反對的傾向，而是一種過程的兩方面。這是繼續增長的矛盾的特質。

以一致的金本位與不分畛域的錯綜的金融聯繫來做基礎，而逐漸趨向於協調的「國際」資本主義，像這樣荒唐無稽的概念，在戰前很爲普遍。我們曾經聽到這樣一句老話：「資本不知道有國家，」它輕易地流向全世界，追求最大的利潤。可是，戰前整個體系

的安定程度及其表面上諧和的實踐程度，實際上也就是依賴於英國戰前金融霸權之暫時的並迅趨動搖的基礎。在那個時候，倫敦還是不可挑撥的世界金融中心。英國還是世界的債權者，繼續地吸收着海外的貢物。英國工業聯合會（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關於貨幣政策的備忘錄（公佈於一九三三年）曾經相當準確地提示這一點：

『戰前所行使的金本位，實際上不外是英國貨幣本位。』

接着，該備忘錄又宣稱『向英國霸權挑戰的帝國主義國家之出現，』『不可挽救地摧毀了』這個制度。

『有着獨立自立計劃的德法等國，憑藉了金本位而與英國的計劃構成不可控制的聯合，實是一種不穩固的十分不自然的經濟現象。大戰摧毀了那種聯合，也許是不可挽救的了。大戰以後，美國一躍而成爲主要的債權國，使國際形勢更趨複雜。

『英國於一九三一年九月間放棄金本位，這是說，在戰後再造戰前國際貨幣制度的企圖，（也

許最初就注定要失敗的，) 遭遇最後的失敗。」

戰前整個體系的表面上的安定，實際上不是協調的反映，而是英國霸權的反映，當時英國霸權雖不斷地受着挑撥，却尚未傾頹。新興的對立，終於破壞了安定，但新興的對立之充份影響，在戰前的期間尚未完全暴露出來。

到了戰後的期間，這些狀態是不能夠再持續下去的了。帝國主義「布洛克」尤其是倫敦、巴黎與紐約為奪取世界金融中心的鬥爭，入於公開的階段。安定的狀態是已經消逝了。

不過，在暫時安定的階段，真實的形勢也被掩蓋了一個短促的期間，所謂暫時安定，又招致更為強調的「國際」資本主義的錯覺。所謂「超帝國主義」的理論，或和平的帝國主義世界團結的理論（下一章當再加討論，）獲得了固有的發展領域。一九二九年楊格計劃所倡導而成立於一九三〇年的國際銀行，或稱國際清算銀行，曾被視為國際性的世界金融中心的細胞。楊格報告書說：

「希望在發達的自然進程中，這一個銀行不久將成爲一個重要的組織，它不僅單純地或主要地措置賠款問題，並且還將提供國際商業與國際金融的世界以向來所無的重大的種種便利。特別希望它在各國中央銀行組織的合作上，能够成爲一個緊急的有價值的連鎖，各國中央銀行組織的合作，對於世界信用機構的繼續安定，是必要的。」

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就是設立國際銀行的程序及其地址的問題，也顯示出紐約、倫敦與巴黎間的劇烈鬥爭；設立國際銀行的直接的後果，並非「世界信用機構之安定」的更趨鞏固，却是戰後的世界信用機構之最大的崩潰。

德國的金融權威莫勒斯博士 (Dr. Oscar Mohr) 曾於一九二五年這樣說過：「遏抑生產力，並非解決競爭的方法……解決競爭的方法，必須求之於生產程序的國際組織化與合理化。以德國工業技術的優秀，在國際生產中必居於決定的地位，並非每一個國家要形成一個鎖閉的經濟單位，而是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以共同的瞭解，達到國際生產的目標。」不惜任何代價的一國經濟獨裁」的傾向，必須加以放棄，每一個經濟單位，必須回復到自然注定的生產形態。」（載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金融時報）

在「生產國際組織化」的呼籲的形式下，所謂國際資本主義組織之任何概念的幻想，又給顯示出來了。因為「生產國際組織化」的呼籲之實質，就是要求對於德國「工業技術的優秀」應該予以承認，應該予以世界市場上的適當地位。所謂「國際的」不過是獨佔資本主義之特殊部份的進攻的烟幕而已。不管說反對什麼「鎖閉的經濟單位」什麼「一國經濟獨裁」莫勒斯博士的「國際的」路線，必然地發展到希特勒與沙赫德(Schacht)的路線。

到了一九三一年，英國的政論家恩吉爾(Norman Angell)還懷着這樣的錯覺，以為長期安定與世界金融相互維繫的新基礎，已經確立，並已剷除運用「政治力量與軍事力量」以實現經濟目標的可能性。像在戰前的期間一樣，恩吉爾在戰後的期間，繼續企圖以自由貿易資本主義的概念，適應到帝國主義的條件上去，並且站在這個基礎上，陳說他認為是錯誤的帝國主義之強暴政策與武力政策的性質。

「政治力量與軍事力量，不能再作為經濟榨取的工具。廣泛地說來，在這個國際金本位，國際

銀行制度，國際托拉斯，國際卡脫爾等等的新世界中，不能夠再像以前那樣，運用武力去掠奪財富，去轉移貿易。」（參閱芝加哥國際關係計議會論文集：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一九三二年出版）

恩吉爾的論文，發表於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可是，到了一九三二年九月間，英國就放棄金本位，所謂「國際金本位的新世界」是消逝了，日本爲了經濟榨取的目標，以武力佔領「滿洲」，後來更憑藉了武力的控制，實行煤油專賣，對於英美兩國的抗議，置諸不聞。

實際上，就是戰後暫時安定的短促的階段，如戰前一樣，也反映着一個特殊獨佔集團即美國資本主義的暫時優勢，不過它的基礎更爲不穩固而已。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〇年，美國代替了英國的地位而成爲世界上的最大投資國。但這個領導地位殊欠堅強；英國仍然擁有最大數量的海外資本，並盡力輸出新資本，以再造它的領導地位；整個基礎的不穩固性，從以後的崩潰中顯示出來。當美國的資本輸出耗竭的時候，金本位便

隨着崩潰了。

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擊碎了戰後「國際的」資本主義之長成的幻想，擊碎了趨向於國際團結與利益交織的資本主義之發展的幻想。帝國主義「布洛克」的戰爭，完全暴露出來。互相頹頹的貨幣戰爭，代替了一致的金本位。貿易戰爭與關稅戰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形態的烈度。「孤立主義」或所謂「一國自給自足」或所謂「奧太基」即鎖閉於一個獨佔的領域內，強固經濟的與戰略的地位，以準備世界的衝突，這樣的傾向已經很為有力很為明顯，像德國社黨的德國，羅斯福的美國，以及國民內閣的英國，都是如此。在一個時期，甚至還發生一種倒逆的傾向，即從安定局面的特徵，趨向於世界市場的破裂，國際貿易的緊縮，與資本輸出的耗竭。這種種傾向的未來，是與整個國際形勢的一般發展不能分離的。目前有一點是明顯的：準備着最後一次大屠殺的帝國主義國家間之經濟戰爭與政治戰爭，已經達到了極端強烈極端公開的程度。

二 獨佔「布洛克」的戰爭及生產與貿易的限制

基於上面的認識，在暫時安定階段結束以後的資本主義現階段的特質，因此就是更趨強烈的矛盾與不穩固性。

而膨脹的生產力與束縛的資本主義關係之間繼續增長着的衝突，則深植於整個過程的根基上。初期的資本主義是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到了沒落的時期，資本主義却已逐漸明顯地成爲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鑑於目前的知識與技能，如果私人財產制度的障礙能夠予以剷除，生產力的再發展，是可以迅速完成的。

英國皇家化學公司代表梅爾契脫爵士（Lord Melchett）在一九三五年二月間英國化學製造者協會的宴會上，發表下面的演講辭：

「在最近十年內，每一種重要原料與每一種重要商品的生產，實際可以增加一倍，我想任何專門家都不會否認這一點。從純技術的觀點上看來，這完全是一個切實可行的問題。」

『那末，我們這個世界爲什麼不能夠迅速繁榮，倍於今日的現狀呢？主要的明顯的原因，就在於我們缺乏能够儘量膨脹的經濟機構。』

生產力的發展，足以迅速地剷除世界上的貧困，可是資本主義對於這些鉅大的可能性，其所採取的實際的政策，却完全相異。一九三二年，羅斯福在總統競選演說中曾這樣宣稱

『我們的工業是已經樹立起來了。我們的工業是否樹立得太多，這倒是一個問題。誰欲創設新工廠，新街市或組織新托拉斯；與其說給予我們以助力，不如說給予我們以阻碍。偉大創業者與金融之神的時代，已成過去。我們當前的任務，不是去探求或奪取新的自然財富，不是去生產更大量的商品，而是要學習怎樣保有現存的資源與維持現存的工廠。』（參閱 Gilbert Sel-des 著 *The Gears of Loenst* 第 113 頁）

英國的尼維爾·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 也於一九三三年六月間世界經濟會議中表示同樣的意見，他說：『在目前的條件之下，只須片刻的通知，生產就可以擴充到無限的程度，所以不加約束不加調整地放任生產，是絕對的愚蠢。』

這些表示，給作爲一種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敲了喪鐘。這些表示的意義，因蘇聯生產同時發生躍進的狀態而更爲嚴重。蘇聯的生產是社會化地準備着消費的，所以生產的膨脹，不因消費的限制而受阻碍。據莫洛托夫（Molotov）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間第七次蘇維埃大會中報告，自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蘇聯的工業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二二九，在同樣的期間，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降落了百分之二四。

限制生產力的利用，這是戰後資本主義的顯著的特徵，在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前就已如此。據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倫敦與劍橋經濟服務部的公報宣稱：『我們目前處於安定的狀態中，其生產的水準似乎比較國家的資力與勞力，相去很遠。』其實，這狀態並不限於英國。據一九三五年出版的美國的生産能力（America's Capacity to Produce，作者爲Edwin G. Nourse等）一書的結論，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期間，未經利用的生産工具的能力，達百分之二七至百分之二〇。據審慎的估量，一九二九年的生産可以超過實際生産的百分之二〇；一千五百萬個工人家

庭的收入，每年每家可以增加一千元，即每星期約爲四鎊。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的期間，美國的冶鐵業生產量，每年平均只達生產能力的百分之六七，鋼的生產量只達生產能力的百分之六五。四、電氣業的生產量，只達生產能力的百分之四一·六。在德國，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九年，鋼的生產量每年平均也只達生產能力的百分之八六。這還都是「景氣」期間的事實。

世界經濟恐慌的爆發，更使生產力不能充份利用。除有許多工廠，運輸事業等等強被停止活動，千百萬工人強被停止工作外，我們在這一時代第一次看到所有資本主義的領袖們與主要的資本主義政府，大規模地實行減縮政策與限制政策。（這必須在獨佔基礎上或直接的政府行動上才有可能。）甚至不惜真正消滅原料與農產品，剷除穀物，給予「不生產」津貼，拆毀工廠，船塢與錠子等等。這些例證是大家所知道的，它們的意義也無須特別加以申述。

在經濟恐慌以後的蕭條期間，生產能力未被充份利用的狀態，繼續存在。據德國景

氣變動研究院於一九三五年三月間所發表的統計，未被利用的生產能力，美國與加拿大為百分之四二，法國為百分之三八，意大利為百分之三二，德國為百分之二七，英國為百分之二一。

現存的矛盾雖然迫使獨佔資本主義採取減縮與限制的反動政策，這些政策對於矛盾却不能夠提供一勞永逸的解決。反之，尋求着出路的資本累積，不斷地趨向於膨脹，打擊着一切減縮與限制的政策。所謂趨向於膨脹的意義，從帝國主義『布洛克』之更趨強烈的衝突中表現出來，這衝突在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後達到了它的新的高峰。舊的貿易戰爭與關稅戰爭推展到新的強度，並採取進口分配制，執照制，禁止輸入與貨幣限制等新形式，以及控制貿易活動的直接政府行動的每一種形式，以裨益聯合的集團，損害敵對的集團。

在整個戰後的期間，曾經舉行許多國際會議，通過許多莊嚴而一致的決議案，慨嘆關稅的增高與貿易的限制。最著名的是一九二〇年不魯塞爾金融會議的決議案，一九

二六年國際銀行家宣言書，一九二七月日內瓦世界經濟會議的決議案，一九三〇年歐洲關稅休戰的建議，與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會議（毫無結果而破裂）預備委員會的備忘錄。這些紙上的決議案，反映着獨佔資本主義國家一致不滿於彼此間的關稅壁壘，可是，關稅的增長與貿易的限制却繼續地追隨着這些紙上的決議案，反映着矛盾的真正力量。

就是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的安定期間，即當被視為增加關稅之根據的貨幣不平均與貨幣變動等現象大部份不存在的時候，據國際聯盟的估計，各國關稅的平均水準也都見增加；德國提高了百分之二九，法國百分之三八，比利士百分之五〇，英國百分之二二（實際的水準從百分之四增加到百分之八·五）；至於美國，則一九二二年的福特尼—麥克波（Fordney-McCumber）關稅案，已經規定了很大的增加。一九二七年，德國對於熟製品按價抽徵的稅率，平均為百分之二〇，法國為百分之二一，美國為百分之三四。

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更展開了增加關稅的過程。美國於一九三〇年首先通過史麻脫——哈萊（Smoot-Hawley）關稅案，大大地提高稅率，招致二十九個國家的抗議。一九三二年，英國採取一般的保護，成立渥太華協定。同年，法國一面提高進口稅，一面對於大宗的熟製品與半製品，實行進口分配制。同年九月間，德國重訂關稅率，有許多稅率增加了百分之百。自此以後，貿易限制網的發展，愈為廣大，如所謂緊急關稅，行政機關隨時可以一紙命令抽徵或增加某種特殊稅率，不須國會通過，如進口分配制，禁止輸入制，外匯限制法，更如訂立雙方貿易協定等。

一九二六年，所謂國際銀行家宣言書，為英國大多數的金融巨頭與托拉斯大亨以及少數的外國銀行家所簽署，該宣言書「籲請解除歐洲貿易的束縛，」指稱「國家利益的虛偽觀念，」視「貿易為戰爭的一種形式，」因此「整個的生產已見減縮，」該宣言書的結束，還發出這樣的呼聲：

「經濟自由的確立，實為恢復世界商業與信用的最好的希望。」

該宣言書的價值，最好從它的簽字者的本身加以評判。那些簽字者自以為是衛護「經濟自由」的武士，其實清清楚楚地都是獨佔資本的領袖，或像摩根（Morgan）或像芬萊（Finlay），或像沙赫脫，或像維克（Vickers），或像韋爾（Weir），他們不僅在國內活躍地從事於消滅「自由競爭」的最後殘餘，在國外也同樣積極地推動貿易戰爭，並且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以內，直接地支持高度的關稅。

四年以後，即在一九三〇年，英國的銀行家又單獨地發表新的宣言書，否認了一九二六年的宣言書，內容如下：

「英國從痛苦的經驗中獲得教訓：四年以前在「籲請解除歐洲貿易的束縛」的宣言書中所表示的希望，已經不會實現。

「種種束縛，實質上都已增加，而外國過剩商品在英國市場上的銷路，則都已堅定地發展着。

「我們固然希望全世界自由貿易的範圍，能有最後的擴展，我們却相信為英國商品獲得並擴展市場的直接步驟，在於構成不列顛帝國的各個政府間，能夠訂立互惠的貿易協定。

「英國爲換取這些協定起見，對於構成不列顛帝國的各部份所有的輸入，必須把市場保持公開，同時，對於其它各國的輸入，則必須徵收關稅。」

這刻劃出英國政策的轉向點。一九三二年，英國實施完全的關稅率，成立渥太華協定，以封閉不列顛帝國的全部，於是地面上自由貿易的最後一角，隨着消滅。帝國主義的鬥爭，踏入強烈的新階段。

自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後，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再接再厲地限制輸入與鼓勵輸出，結果使矛盾更形劇烈，而從世界貿易數字的降落在反映出來，即在恐慌的最低線以後，這現象還繼續存在。世界輸出總額一九二九年爲三百三十萬二千一百萬金元（照舊平價計算）一九三〇年爲二百六十四萬八千三百萬金元，一九三一年爲一百八十九萬〇八百萬金元，一九三二年爲一百二十八萬九千五百萬金元，一九三三年爲一百十七萬四千萬金元，一九三四年爲一百十三萬六千四百萬金元，即等於一九二九年水準的三分之一。這樣的黃金估價，在某種限度上，確是誇張了降落的數字；用英國的貨幣

標準計算，降落為百分之四五，更爲價格的變動留下讓步，則實際的降落為百分之二二·五（參閱國際聯盟的一九三四年世界貿易概觀，Review of World Trade, 1934 一九三六年出版）

一九三一年，倫敦金融界的重要言論機關經濟學家（Economist）就已經表示憂鬱：『歐洲各國政府用盡權力所及的一切方法，限制輸入，鼓勵輸出，拚命地企圖「糾正平衡」。許多國家爲應付對外所負的債務起見，都極力向外推銷，却阻止欲達到同樣目標的其它國家，向國內推銷，這是目前的歐洲奇觀。這一條途徑發展的極端，就是國際貿易的終止與世界的破產。』（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

事實上，這一條毀滅路線以及『國際貿易的終止與世界的破產』路線，在邏輯上的抽象的延續，並沒有把帝國主義矛盾的真正的力量，估計在內。據往後數年間的事實所昭示，繼續增長地趨向於所謂『一國自給自足』，決非趨向於孤立，決非趨向於國際接觸的終止；而是趨向於奪取世界市場的更爲強化的衝突，趨向於經濟上的與戰略上

的準備，以支配全世界。

三 貨幣戰爭：英鎊——美元——黃金

帝國主義現階段的特殊面貌，目前動搖與解體的特殊面貌，就是貨幣衝突。這一個面貌反映着目前一切的帝國主義矛盾，尤其是反映着最重要並居於最後支配地位的英美對立。

大戰使倫敦失去了它的國際的金融霸權，但紐約並未能夠堅定地成爲倫敦的繼承者。在大戰以後，當英鎊與美元解除了戰時的人爲的平價時，英鎊的弱點立刻就顯露出來。可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間肯力夫委員會（Cunliffe Committee）的報告書，還確定地以恢復舊日的地位爲目標：

「增加生產，停止政府借貸，以及政府與個人的減縮消費，是恢復原狀的基要的條件。這些必須與統制貨幣以及信用制度的戰前方法之回復，互相聯繫起來，以期在倫敦早日重新建立黃金

的自由市場。」（參閱一九一九年戰後貨幣外匯委員會報告書）

英國以全部的精力，從事於舊基礎的重新建立。歐洲的其它國家以貨幣的膨脹與贬值來應付戰後的困難，英國却反其道而行之，到了一九二五年，金鎊終於重新建立了它的黃金的舊平價，不惜使國內工業與工人加重負擔，而使利潤階級的收入倍增。這一個政策的最主要的目標，就是向美國進攻，奪取世界的金融支配權。關於恢復金本位以及依賴美國之危險的問題，英國財相邱吉爾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向下院發表下面的解釋：

『倫敦跟樹立一切國際交易的共同基礎之趨向，如果不能並駕前進，就不能保持不列顛帝國之中心與世界金融之中心的地位……時常有人說，金本位將使我國受着美國的束縛。其實，金本位將使我們受着現實的束縛。』

邱吉爾繼續解釋下去：

『不論我們是否採取金本位，我們的利益是與美國的利益深刻地密切地牽繫着的。所以，目

前·的問題，並非恢復金本位是否將使我們依附美國，而爲是否將使我們更須依附美國，或損害地屈辱地依附美國。答覆這一個問題，似乎在於我們採取了金本位以後，是否能夠更爲堅強有力。

『英國及其海外自治領，構成了一個偉大而廣博的勢力，足與一個經濟上的金融上的更大勢力，毫無不利地和平相處，共存共榮。』

可是，七年以後，即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邱吉爾却又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向下院宣稱：『通貨緊縮的可怕的过程，實在是我們的苦難之主要原因。』

英國照舊平價恢復金本位，向被廣泛地指摘爲英國戰後金融的根本的罪惡，它的後果確是損害無窮。但事實上，爲抵抗美國的優勢，英國採取這個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否則海外自治領等與美元相聯繫，不列顛帝國將失去它的控制。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經濟家，討論到英國恢復金本位時，曾謂：

『海外自治領迫切的表示，使英國不得不改變政策。海外自治領之一已經決定採取一種步驟，另有海外自治領之一也已經表示將採取一種步驟，如果英國再猶豫不定，則那種步驟將使海

外自治領在貨幣上與美元聯繫起來，而與金鎊脫離關係。」

毫無疑義地，貨幣貶值比較容易實行，故經濟家這樣指出：

「如果我們實行貶值，恢復金本位，使一鎊等於美金四·四元，則毫無疑義地，我們的問題可以緩和了許多。」

但最重要的問題，在於抵抗美國，所以經濟家又這樣指出：

「僅僅是貨幣貶值的建議，已經造成國外懷疑倫敦的空氣，並在紐約與倫敦間奪取商業優勢與金融優勢的鬥爭中，使我們處於不利的地位。」

可是，英國恢復金本位，並未能夠壓倒美國的確較強大的地位。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的金融時報會謂：「即使美國是金本位同盟的主要份子，為本身的利益起見，它在運用權力的時候，仍覺得必須分別待遇。」英國的沒落的經濟基礎，實在不能夠維持金鎊的舊平價；英國地位的真正弱點，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期間，完全暴露出

來。在這個期間，英國雖努力獎勵資本的輸出，但美國輸出的資本，其總額幾達英國的一倍。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的四年間，據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三日的美國商務報告，美國輸出國外的資本，每年平均總額爲十一萬萬金元，英國則爲六萬五千萬金元。一九二八年，美國資本輸出的總額爲十二萬五千一百萬金元，英國爲六萬九千八百萬金元；一九二九年，前者爲六萬七千一百萬金元，後者爲四萬五千九百萬金元。一九三〇年，前者爲九萬〇五百萬金元，後者爲五萬二千九百萬金元；直到經濟恐慌爆發以後，美國資本輸出的數字才大爲降落，一九三一年的總額僅達二萬二千九百萬金元，英國則爲二萬〇九百萬金元，一九三二年，美國的數字又減到二千九百萬金元，英國則爲一萬〇二百萬金元。（參閱國際聯盟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度的 Balance of Payments）據美國商務部金融投資局的胡佛委員會報告書，美國最近經濟變動（Recent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發表於一九二九年（第二卷第七二七頁）的統計，美國一九二三年的對外投資總額爲八十五萬二千二百萬金元，一九二七年增加到一

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萬金元。據溫克婁博士 (Dr. Max Winkler) 的估計，一九二八年美國對外私人投資的總額，約為一百五十六萬萬金元。(參閱一九二九年三月份紐約對外政策協會情報處的增刊 *The Ascendancy of Dollar*) 據金陀斯萊 (Sir Robert Kindersley) 的估計，同年英國的對外投資總額則為二十九萬九千萬鎊，折合一百九十九萬八千萬金元。(見一九二九年三月的經濟月刊) 更據溫克婁博士的估計，到了一九三一年，美國的總額已達一百七十九萬六千八百萬金元。

同時，美國中央銀行存儲的黃金也有急驟的增加。查一九一九年存儲的總額為五萬二千萬鎊，(一九一三年為三萬九千二百萬鎊，連流通的黃金包括在內)，一九二五年，增加到八萬一千九百萬鎊，一九三一年達八萬三千三百萬鎊。英國所存儲的黃金，一九一九年為一萬二千萬鎊，(一九一三年為一萬五千萬鎊，連流通的黃金包括在內)，一九二五年，增加到一萬四千五百萬鎊，一九三一年，降落到一萬二千一百萬鎊。

在這個時期，英國的輸出低降，輸入增加，反映着英國資本主義之衰落的與寄生的

形勢，不利的貿易差額，不能夠支持繼續緊迫着的資本輸出，這便是英國地位之削弱的決定的信號。一九三〇年，英國的淨出超已經降落到二千八百萬鎊，同年海外新投資的總額却達一萬〇八百萬鎊。一九三一年，英國的貿易逆轉，由出超變爲入超，總額達一萬〇四百萬鎊，同年海外新投資的總額，還達四千六百萬鎊。英國終於在一九三一年發生大崩潰。英國對美爭霸的第一個階段，招致自認破產的結果。

直到這個時候，英國始放棄金本位，轉變政策，採取與金元爭霸的另一種方法。英國實行金鎊貶值，作爲一種新武器，以抗衡美國對外輸出的優勢，並樹立英國的貿易地位。英國的貨幣標準成爲鮮明的旗幟，號召着世界上大部份的國家，以進攻黃金豐富的國家。陷於不利地位的美國，開始向英國乞和，要求安定貨幣，可是，英國却給以峻嚴而喪氣的答覆。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的倫敦每日電聞報說：「如果華盛頓極端地渴望倫敦恢復金本位，那麼，請華盛頓先瞭解因戰債之償付而產生的反常的與畸形的黃金之分配與滯積，實爲目前經濟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國會想利用戰債的武器，強迫英國恢

復金本位。英國財相尼維爾張伯倫即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在里茲 (Leeds) 地方發表演說，謂戰債的償付，只能出之於「貨幣貶值或增加對美的關稅。」英美的鬥爭，一直延續到世界經濟會議的預備委員會中。英國政府擬定了安定的四個條件：

- (一) 戰債問題之最後而滿意的解決；
- (二) 降低關稅壁壘，以恢復滿意的貿易差額；
- (三) 提高躉購價格的水準；
- (四) 保證迫使英國放棄金本位的環境之再現，換言之，尤其應該設法避免世界黃金準備之不均的分配。

在這英美鬥爭的第二個階段，英國佔據優勢，由於貨幣貶值與提高關稅的初步效果，經濟呈現着局部的復蘇，美國則踏入內部經濟恐慌之最嚴重的階段。

到了這個時候，強迫英國安定貨幣已告失敗的美國，乃採取反擊的策略。一九三三

年四月間，以全世界最豐富之黃金準備爲後盾的美元，也放棄金本位。華盛頓的國會通過貶值百分之五〇的法案。局勢隨着改變。英國在世界經濟會議中堅決要求貨幣的安定，而爲美國所拒絕。羅斯福總統禁止討論貨幣安定問題的咨文，使世界經濟會議迅速破裂。英國與金集團聯合發表宣言，贊成「儘可能迅速地」恢復金本位，以安定貨幣，這宣言也爲美國所拒絕。英國又與海外自治領聯合發表宣言，贊成以英國貨幣標準爲基礎，採取共同的貨幣政策。

這揭開了英美鬥爭第三個階段，在撰述本書的時候，這鬥爭還繼續着，這鬥爭的三個主要角色是：英鎊集團（不列顛帝國與許多附從的與聯合的國家）；美元集團（美國與美洲的許多國家）；黃金集團（法國與若干聯合的國家）。隨着鬥爭的延續，黃金集團的勢力顯著地削弱下去，比利士已於一九三五年實行貶值，佛郎的貶值也是不可避免的遠景。（譯者按——法國人民陣線政府已於一九三六年九月間實行佛郎的貶值。）

所謂英鎊集團，其實就是英國世界領導地位的一種表現，它的目標漸次有力地爲英國官方與半官方面的言論所宣示。早在一九三二年一月間，倫敦太晤士報就講着「世界的一大部份情願採取英鎊」作爲國際標準的「可能性」，在五月間，並贊成一個廣大的「經濟單位」的計劃，擴展到不列顛帝國的範圍以外。

一九三三年，英國工業聯合會特別宣示以英鎊爲基礎的「世界金融的新體系」

「我們應該立刻致力於樹立一個英國的體系，這體系主要地以不列顛帝國爲基礎，次要地則以願與英鎊發生某種聯繫的其它國家爲基礎，希望這可以爲英國以及整個的不列顛帝國，提供一個穩固與繁榮的合理方法，並能形成一個世界金融的新體系之核心。」（參閱一九三三年英國工業聯合會貨幣政策備忘錄）

所以，今日的貨幣戰爭，反映着帝國主義「布洛克」戰爭之最廣泛的一般化的表現，尤其反映着基本的英美對立，恰如金本位的崩潰顯示出帝國主義決不能成立任何永久的合作一樣。無疑地，再圖實現暫時安定的嘗試是又會進行的；自然，這尙在未定之

數，即使貨幣的暫時安定能夠實現，但鑑於目前不平衡的迅速發展着的勢力聯繫，它的基礎比較前一次的將更爲危險。

四 戰爭與重整軍備的經濟學

現階段的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在任何方面已經達到了對立與向戰爭推進的極端。貿易戰爭，關稅戰爭，貨幣戰爭，掠奪市場，黃金，原料與殖民地的日趨尖銳的衝突，「一國自給自足」的口號，「奧太基」的口號，鎖國與「布洛克」的口號，經濟地與策略地準備着戰爭，這些是繼承着世界經濟恐慌的現階段之特徵。

這一個過程的頂點，並隨着遠東與非洲之局部戰爭的爆發，就是列強的重整軍備，準備最後的與最大的衝突，所有重要的國家如今正以全副的力量進行着。重整軍備與戰略的經濟準備，如今日趨明顯地成爲資本主義經濟之現階段的主要特徵。重整軍備比較直接的擴充軍備計劃，意義更爲廣泛。現代戰爭，即所謂「全盤」戰爭的特質，需要

整個的經濟體系，整個的工業與人力機構，在戰爭的目標之下組織起來。直接的擴充軍備計劃，最易受到注目，最易顯示出正在進行中之一切的真相；重整軍備的程序，則更爲廣泛，我們不能僅以軍事預算來概括它的全部，如今從國家的每一種活動中，從金融資本之主要勢力的每一種活動中，都可以看出它的形跡。軍事法西斯蒂國家像德國、日本與意大利，是實施這個「全盤」程序的最公開最澈底的國家。但英美資本主義之更爲複雜的機構，根據了它們自己所特有的形式，也推進着一種演變，這演變終極地導入同一的趨向。現代國家的整個經濟體系不斷增長地與戰爭相配合，這樣的過程，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最近階段之最獨特與最典型的要徵。

繼承着世界經濟恐慌與蕭條，並隨局部復蘇過程而前進的戰爭加速運動，必然地是現階段資本主義之內在力量所發揮的作用，好像戰後整個發展過程中的各階段一樣。我們已經知道，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摧毀了安定的基礎，大大地強化了帝國主義的一切經濟衝突，並因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拚命地尋覓着鞏固與擴展的方法，以犧牲其

它帝國主義國家，於是又招致政治上的極端不安定。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這種繼續增長的矛盾對立，以及較不滿足的帝國主義國家爲要求世界之再分割的挑撥威脅，一天天地迫近不可避免的後果——戰爭。

這是促進戰爭的基本原因。此外還有一種憑藉重整軍備與戰爭程序以直接促進利潤的因素。因爲某種程度的週期的復蘇，絕對不能擺脫極端不平衡與極端有限制的性質。釀成經濟恐慌的基本矛盾，仍未獲得解決；在現環境之下的過剩生產能力，仍然尋覓着適當的出路；仍有許多資本未被運用，好像勞働力一樣。因爲受着資本主義環境的限制，受着掠奪世界市場之猛烈鬥爭的限制，受着殖民地國家人民大眾之日趨貧困的限制，過剩資本要尋覓大規模的建設性的適當出路，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各國資本家漸次傾向於從重整軍備與戰爭的程序中，爲這種資本尋覓運用的範圍，並獲取利潤，換一句話說，就是把生產力的大部份，移轉到破壞性的用途上。甚至虛僞的經濟理論，也逐漸認爲這一種過程，是經濟復蘇的一種「刺激」。

這樣，現代資本主義在窒息生產力之發展上所盡的開倒車的任务，達到了它的最後階段。直接毀滅商品，毀滅生產工具，限制生產，與限制生產膨脹的種種程序（這些是經濟恐慌後期特有的現象，目前仍然繼續存在），只能夠作為暫時的與局部的緊急手段，因為這些手段即足以幫助着去恢復或增加一大部份現存資本的利潤率，却不能夠提供資本膨脹的領域。這一種過程的最後的完成，就是戰爭，自然不一定立刻就是世界戰爭，從每一個特殊的帝國主義集團的觀點看來，最初是發生於世界之別一領域的『活潑的小規模的地方戰爭』而在它們自己的國家內，接受利潤優渥的軍火定單與擴充軍備的計劃。在地球的任何一角，戰爭推進一步，緊張推進一步，以及重整軍備推進一步，證券市場上的主要股票的市價，也隨着高騰。凱恩斯（Keynes）於一九三三年出版的趨向繁榮之方法（*The Means to Prosperity*）一書中，曾謂：『據犬儒主義者所得的結論，只有戰爭能夠終止目前主要的經濟恐慌。』金融批評家愛因提格博士（*Dr. Paul Einzig*）於一九三四年出版的重整軍備之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Rearmament) 一書中，更以瘋狂的邏輯發揮着這樣的議論：

『在若干時期以前，大家認為在經濟學的範疇內，人類的最高任務便是儘量生產，以改善消費者的生活程度。大家認為消耗於軍備上面的任何原料與勞動力，是絕對的損失，因為這將減削供給消費的商品生產。可是，目前由於科學上的發明，以及實施更有效率的生產方法，這問題已與以前不同了。如今生產已不再需要拚命趕上消費，消費却落在生產能力的後面，甚至落在實際生產的後面。在這樣環境之下，減縮軍備就是減縮世界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意欲，重整軍備就是增加那種消費的能力。重整軍備的作用，就是在於吸收現經濟制度之下所不能銷售的過剩生產的一部份。當世界消費能力與生產能力彼此調整的問題尚未獲得解決的時候，任何商品的需要，無論是怎樣人為的與非生產的，歸結起來，終是有助於貿易的。』

這一位愛因提格博士也同意於『刺激商品的需要還有比較重整軍備更好的方法，』但這些方法『超越實際政治的範圍，』因為『用於軍備上的經費，可以籌措，以生產為目的的經費就不易籌措。』他還主張『在我們這個荒誕的經濟制度之下，一次戰

爭能夠結束一次經濟蕭條。』這一位金融理論家的理論，竟如此高妙。即站在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上看來，這一種理論的根本的荒謬性是很為明顯的。

在最近期間，各國局部『更生』與生產膨脹的一部份，德、日等國局部『更生』與生產膨脹的主要部份，都直接地跟重整軍備與戰爭的推進聯繫着。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出版的經濟家，曾經這樣指出：

『在目前環境中，有一種毒害的因素，暗示着確已產生的復蘇是人為的，不永久，不健全的。我們所指的，就是重整軍備的經濟影響。讀者在我們的國外通訊欄內，一定已經看到驚心觸目的事實：我們數月間的國外通信，時常提及歐洲、美國與日本的軍火定單的刺激力，提及「重整軍備工業」在歐洲往往是進行順利的唯一工業。在德國，這種軍事上的要求例外地重要，因為重整軍備的規模，特別廣大，更因為德國的重整軍備，不僅需要繼續增加的經常費用，並且需要重要設備的費用，如營房、新航空部、軍火製造廠、飛機場等等，這些都是重建軍事機構所不可缺少的。而其它國家的情形，也只在程度上與德國的情形稍有不同。

「我們所以指出這種傾向是毒害的，乃在於軍火定單如果成爲陷入蕭條狀態中的世界之新活動的唯一原因，那麼，任何國家顯然就十分不願減少這樣的定單。政治上的緊張，顯然是促成經濟恐慌與阻碍經濟恐慌之適當解決的因素；如果政治上的緊張，反使既得的經濟利益，要依附於政治上的不安定局面之維持，那麼，這簡直就是一種邪說了。爲和平而努力的各國政治家，當然地憂慮着這樣的一個局勢：只有製造軍火是唯一活躍的貿易。」

整個經濟體系不斷地增長對於重整軍備與戰爭的依賴性，這便是現代軍事法西斯蒂國家如德國、日本與意大利的最特殊的特徵。日本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度斯軍事費用，達預算總額的百分之四六，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度則達百分之五八，國庫的正式收入，甚至不能抵償全部的軍事費用。一九三五年，倫敦泰晤士報就已經這樣報告了：

「在過去三年間，日本的戰爭準備，已經成爲僅次於紡織工業的第二大工業。除了軍火公司與造船公司以外，還有無數的公司局部地甚至全部地依靠着政府的定單，承造各種軍用品。日本的經濟機構，如果終止大規模的戰爭準備，將促成經濟恐慌。」（見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泰晤

(士報)

德國重整軍備的全部內容，均保守秘密；國家債務的全部數字以及預算數字，已不再正式公布。但從非正式的估計與新的主要經費支出的激增上，可以窺見一二。據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的經濟家報告，除了正式承認的債務計一百三十萬萬馬克以外，柏林金融市場紛紛傳說着政府於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六月間所成立的「秘密債務」約達一百五十萬萬馬克至一百七十萬萬馬克，即等於十四萬萬鎊至十六萬萬鎊。邱吉爾於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向下院發表演說，以正式的數字為根據，他估計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的三年間，德國重整軍備費用總額達十五萬萬鎊，在一九三五年的一年間，即佔八萬萬鎊的鉅額。

以整個經濟體系集中於重整軍備與戰爭，這固然是法西斯蒂軍國主義國家如德國、意大利、日本與波蘭等等的顯著的特徵，但不同程度的相同的傾向，也發生於其它資本主義國家內。一九三五年夏季，法國通過「非常公積預算」，每年提供六十萬萬佛郎，

即等於八千萬鎊，以資助重整軍備的公共工程。法國工業生產的指數，兩年以來續見降落，自一九三五年秋季起，即呈上昇。

一九三五年，英國十三家主要軍火公司（飛機製造公司不在其內）的股票價值總額，增加了一千六百七十萬鎊，即股票市價從一千一百二十萬鎊，增加到二千七百九十萬鎊，即增加了百分之一四九。原有飛機製造公司的股票價值總額，增加了七百萬鎊，新飛機製造公司則徵集了七百六十萬鎊的新資本。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期間，維克阿姆斯脫朗（Vickers-Armstrong）軍火公司的股票市價，從九先令九辨士漲到二十五先令六辨士；（票面為六先令八辨士）白朗（John Brown）軍火公司的股票市價，從五先令一·五辨士漲到二十二先令六辨士；（票面為六先令）赫特菲爾茲（Hedfields）軍火公司的股票價值，從九先令漲到二十三先令（票面為十先令）。維克阿姆斯脫朗軍火公司的純利潤，一九三三年為五四三、三六四鎊，一九三五年增加到九二八、一〇五鎊，普通股息從百分之四增加到百分之八，外

加從公積金內撥付的百分之五〇的股本紅利。英國於一九三六年三月間宣布大規模的重整軍備程序，可是在這以前，由於準備戰爭與希望戰爭而來的滾滾黃金，就已經傾入軍火商人的荷包了。『我們已與死亡訂立契約，我們並與地獄表示一致。』

一個循環是完成了。從世界大戰的巨劫，轉向資本主義的復蘇。從資本主義的復蘇，轉向世界經濟恐慌的災難。更從世界經濟恐慌的災難，轉向重整軍備與新的戰爭。在這個循環中，帝國主義的破產是給表現出來了。

●作者於一九二一年八月份的勞工月刊中，曾經批判『回復戰前狀態』這一個口號的假定，並力言『不會再有正常的年頭』。復於同年十月份的勞工月刊中，更為詳細地批判世界經濟和平會議最高委員會的備忘錄，指摘把戰後的期間與拿破崙以後的期間相比擬，實屬不倫，並揭示戰後經濟形勢的初的變動。一九二七年，日內瓦世界經濟會議的報告書，也排斥『回復戰前狀態』的幻想了。

「大戰終結以後，許多人以為個人的、國家的與各洲的經濟關係所以紊亂無狀，其唯一的原因，就是戰爭。在這環境之下，回復戰前狀態似乎是經濟政策的恰當目標，足以消除當前的困難。人類本能的傾向，

往往迷戀過去，忽視未來，即在舊制度被毀棄的時候，往往還執着於過去的觀念，而欲恢復傳統的事態。可是，經驗告訴我們，大戰所遺留下來的諸問題，不能這樣簡單地獲得解決。（參閱一九二七年世界經濟會議最後報告書第一五頁）

布爾喬亞的經濟智慧，常常落在事實發展的後面，而且常常不能夠瞭解現在，因新的經濟勢力之形成，一九二七年的世界，就已經需要面對着十分不同的問題，而這些新的經濟勢力，即準備着世界經濟恐慌；可是，一九二七年的日內瓦世界經濟會議對於這個形勢，仍然熟視無睹。作者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份的勞工月刊中，即指出『安定與局部更生的條件』產生了『新的資本主義危機』，這『新的資本主義危機』不再僅是後果，而是新的戰爭問題的序幕。』試檢閱第三國際以及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家如伏爾加(E. Varga)等的歷次宣示，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對於戰後整個時期的各個階段的分析與先見，很為準確，任何布爾喬亞的經濟理論，均不能與之比擬。

●在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後，各方面對於恐慌所造成的厄境，提供許多互相矛盾的『解決方案』。貝塞爾專家委員會(Basel Experts Committee)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間發表報告書，謂解決『繼續增長的世界金融之危殆的唯一』的最後步驟，『厥為『賠款與戰債的調整』。可是在胡佛總統宣言停付賠款與戰債的一年以後，一九三二年五月四日出版的經濟家，則謂：『一年以前，許多人——包括

胡佛，各國銀行家與政治家相信賠款與戰債的取消，可以轉變經濟恐慌的浪潮。這樣的信念，如今已是不再可能的了；十分明顯地，如今需要規模更大的行動。一九三二年一月份的米特蘭銀行月報 (The Midland Bank Review) 謂「唯一的出路在於提高物價的水準。」一九三二年二月間，寇尼新演講「世界經濟恐慌及其出路」的問題，謂「唯一的解決辦法繫乎普遍的有組織的通貨膨脹。」同年同月，皮佛利治 (Sir William Beveridge) 演講同樣的問題，謂「逃避經濟恐慌的唯一出路，在於以國際的行動，遏阻購買力的無政府狀態，維持生產與滙兌的自由。」同年同月，英國自由貿易宣言書 (British Liberal Free Trade manifesto) 宣稱：「恢復繁榮的唯一方法，為排除一切商品之自由交換的一切障礙。」

以上是英國人士對於經濟恐慌之原因及其解決辦法的不同意見。美國或法國資本主義的意見，以及它們的理論家的意見，不論關於賠款、戰債、黃金、貨幣、關稅或其它因素各方面，跟英國的意見比較，自然又有顯著的分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美國政府在答覆英國政府的照會中，謂「經濟蕭條的原因，並非債務關係，而為比債務關係更形重大的其它因素。」胡佛總統宣稱戰債的取消，美國不能加以考慮，「欲回復物價與貿易，須求之於債務國的實質的補償。」並發展美國農產品與勞動力的市場。」世界最大富人梅隆 (Andrew Mellon) 任美國駐英大使時，於一九三二年四月間的倫敦歡迎席上

宣稱：「我不相信目前世界所遭遇的困難，能有迅速的或奇觀的挽救方法，我也不相信現社會制度，有着任何根本不合理的地方。」法國的經濟學家李斯脫（Charles Rist）與前法蘭西銀行總裁莫洛（Moreau）則認為經濟恐慌的主要原因，在於英國企圖恢復英鎊平價，而無適當的經濟基礎（載一九三二年一月間倫敦太晤士報）。法國的金融家兼政治家卡洛（Caillaux）於一九三二年三月間向倫敦皇家藝術學院演講「世界經濟恐慌」的問題，謂「恐慌的主要原因，既非『貨幣機構之運用的不美滿』，也非『黃金的不均衡』，而是『機械工具的運用之過度』；恐慌的解決，在於擴大非洲殖民地的發展。汎歐主義者戈登羅夫卡勒其（Count Coudenhove-Kalergi）則謂恐慌的解決，在於以戰前的德國殖民地返還德國。白俄宣傳家則又認為蘇聯是世界經濟恐慌的主要原因，欲解決恐慌，必須征服可供榨取的蘇聯領土。

諸如此類，不能枚舉。總之，布爾喬亞對於世界經濟恐慌的種種「理論」，反映着在危機中的資本主義政治之推進，並把尖銳化的帝國主義矛盾，轉到理想的平面上。

第五章 國際組織的企圖

「假如沒有一個國家是需要戰爭的，那末比國際聯盟更有力之解決國際糾紛與保持和平的機關也就沒有了。」（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奧斯汀張伯倫 Sir Austin Chamberlain 在下院中演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在世界的議程上，以沒有一個政治家所能忽視的方法，初次加上了國際組織的問題。在大戰將結束時與戰後的時期中，帝國主義的列強就帶着極端延緩與猜忌的態度，開始討論這個問題，在初步的談判中，就暴露出真正的衝突與對立事實上，他們不能得到解決這問題的真正辦法。國際聯盟或許可為走向國際組織途上的一個里程碑，但這還不是解決國際組織問題的辦法。失敗的原因是由於帝國主義的根本性質所致，這在上面政治經濟二章中關於帝國主義在戰後實際經驗中的控

制勢力的分析，已經說得很明顯了。我們明瞭了帝國主義這種真正的對立勢力後，就一定要研究國際組織的問題，弄清楚在這個時期中的第一個企圖爲什麼祇產生極有限的結果，（不管理想家的幫助與公平的服務是怎樣的大）並且要替將來與最近的未來做個必要的結論。

一 世界國家的問題

世界聯合與最後世界政治統一的觀念，是第一次從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產生的；不過這個觀念却是同資本主義組織的整個基礎，財產關係，經濟政治權力的集中，與國家形式，完全矛盾的。我們在開頭時候，就得弄清楚這個矛盾，這是非常重要的；這種矛盾是國際聯盟與同樣企圖之所有困難的根源，我們在明瞭了這種矛盾後，就可知道在未來社會中如何把它消散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指示了我們怎樣做現階段的實際結論。

世界聯合與一個單一國際社會組織的觀念，考證起來，實有一個很長的歷史。不過

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去追考這個觀念的起源，是很難適合事實的。我們雖可引述古代哲學家與預言家對於世界和平的黃金前途的言論，或是那些超脫地域偏見而自認為『世界公民』者的意見，但這些早期之個別地超越現有國界的企圖，祇能有預示將來的意義，而不能指示促其實現的大路。而在另一方面，過去之範圍廣大的賈元國家或制度，有時被認為未來『世界國家』的模型，像羅馬帝國、中華帝國或者中古時代基督教國（Christendom）的基本統一方案，當時雖各代表某種程度的『文化』統一，但他們的範圍是自覺地有限制的，羅馬帝國是被野蠻主義限制着的，中華帝國是被長城限制的，而中古時代的基督教國也祇在反對回教上，達到一部分的統一。一個普遍的世界觀念仍然缺少。

一直等到資本階級政權興起後，才替世界政治統一的觀念奠下了基礎，因為資本主義之商業的與殖民地的擴展，第一次把整個世界置於人類知識所及的限度內，而創造了單一的世界市場。這種觀念之最初的表现，是見於一六二三年法入克魯賽（Crus-

之新西蘭 (Le Nouveau Cyne) 中他在這書中主張組成一個世界的國家聯合會，包括中國波斯與印度，建立委員國間的自由貿易，建築國際的運河，並以一種包括一個世界議會與一個世界法庭之單一的組織來維持和平。（關於這個計劃與其他相類計劃之摘要敘述，可參看許曼之國際政治頁二三四——二三七。）

以後有聖彼得 (Abbé Saint-pierre) 的永久和平計劃 (Project of International Peace)，這在事實上是一個組織歐洲神聖同盟以維持皇帝皇位的計劃。到了十八世紀的光明期，又產生了盧騷 (Rousseau) 的有名著作聖彼得永久和平計劃摘要 (Extrait du projet de paix perpetuelle de M. l'Abbé Saint-Pierre) 於一七六一年印行，他建議組織一個永久的聯邦，設一最高的議會，不過他的聯邦祇是歐洲的聯邦。這種思想在康德 (Kant) 的有名著作永久和平 (Zum Ewigen Frieden) 中，達到了最高的頂點，這書是一七九五年出版的，內容主張設一普遍之民主國的世界聯邦，人民都為世界的公民。這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國際傾向，可從下面二種事明顯的

表現出來，一件是培恩（Tom Paine）的當選爲法國革命會議的議員，一件是青年黑格爾（Hegel）歡迎拿破崙的侵入封建的德國。拿破崙的自己計劃中本包含有大陸的聯邦，這在他說起來，是代替俄皇稱霸的唯一方法。

資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情感，在康德時是到了最高點，自此以後，就向下降落，經過柯勃登主義（Cobdenism）的夢想與自由貿易的普遍和平，而達到帝國主義之公開反動的與鬪武的哲學。在康德以後，黑格爾就回復到資產階級統治的堅固基礎，獨立的主權國家，即代表一個沒有更高權力之絕對的終點，他們間的國家關係與『自然狀態』相適應。從這關頭以後，國際主義的發展陣線，就越過其在資產階級手中之初期混亂形式，而帶到無產階級的手中，它的形式是馬克斯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國際的社會主義，或者是第一次之完全自覺的有組織的國際狀況與第一回之國際理論和實踐的聯合。這個真正國際主義，尤其是經過俄國革命以後，對於現在資產階級國家混亂形式的打擊，實是近來資產階級想建設威爾遜主義形式的代替物與國際聯盟的主要策動力。

這種國際組織甚至連工黨的正式國際代表也不許參加。

不過資本主義之世界經濟的發展，却初次產生了世界政治統一的理想，而資產階級統治的真實基礎，却同這個理想發生直接的衝突。因為資產階級不是統一的整個，而是代表分離的、劇烈競爭的資本集團。每個國家中的各個資本階級，一方面爲着維持其對國內廣大人民的優勢權，一方面爲着增強其地位與加緊其對敵人的鬥爭（重商主義，入口稅，商船法，殖民地戰爭），都是要爭取國家機構的控制權的。這樣一來，資產階級的興起，就引起了各國關係中之獨立國家主權學說的進展（正如每個國家內個人主義的進展一樣），同時國際衝突與混亂之極端銳化，也就跟着發生。資產階級似乎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 原則的信奉者，而反對中古教皇統治下之歐洲教主統一的封建觀念。依照上面分析，資產階級就被命運注定好要一方面製造一個單一的世界經濟，同時則產生一個極端的國際混亂，這是同他本身制度的法則相適應的。

這個每一國家之獨一的無限制的獨立主權底基本原則，是隨着資產階級的反對

中古主教制度而成長起來，現在仍與資產階級統治的條件不可分地聯結在一起，這就是說，與控治着每一國家之特殊資本家團體的利益聯結在一起。中古時代之統一理想的表現，可從國家制度與王國對於教皇或皇帝之最高統治權力的服從觀念中尋找出來，雖然在這二個統一的極端形式觀念間（即服從教皇或服從皇帝）也有對立存在，如表現於葛爾甫與費皮林（*Guelphs and Ghibellines*）的爭鬥中者。第一個觀念，即所有國家服從統一的教會或教皇政權的觀念，可以在十九世紀阿基那（*St. Thomas Aquinas*）的古典理論著作中，特別是在指導原則（*De Regimine Principum*）與非基督教異說之最高原理（*Summa Contra Gentiles*）中找出來。至於另一個觀念，即所有的統治者服從單一的世界帝國的觀念，則可以在但丁的君主政體（*Dantes De Monarchia*）中找出來，此書係在十四世紀初期所寫，至一五五九年才能出版，而為羅馬教皇所禁止發售。但丁認為羅馬帝國的理想業已過去，為謀世界的幸福，實有建立一個普遍王國或帝國的必要，在對立的統治者的衝突上面，創立一個權力，以保持普遍

的和平與自由：

『人類若能單爲一個王子與一種法律所統治，那末必能達到最佳的境域。所以爲着世界的幸福，應當要有一個單一的君主政制或諸侯國，即人們所說的帝國，顯然是必須的。在無論什麼時候發生糾紛時，總必要有判決。在任何二個獨立的諸侯間，總不免要發生糾紛，因此判決是必須的。不過同等地位的諸侯，是誰也不能統治誰的，所以必須有一個擁有廣大權力而爲此二人之統治者的第三個諸侯，來判定糾紛。這個第三個的統治者，必須是君主或皇帝。』

與這中古世界之整個情形相反對之新興資產階級的新原則，即各個國家之無限制的國家絕對主義的原則，則見於十六世紀以後的著作中，如十六世紀初期之馬夏維里的王子 (Machiavelli's *The Prince*)，十六世紀末葉布丹的共和國論 (Bodin's *De La Republique*) 及十七世紀中葉霍布斯的巨人 (Hobbes's *Leviathan*)，馬夏維里是極明顯地主張新資產階級哲學理論的開路先鋒，他奠下了著名的政治原理：

『幫助別一國家發展的諸侯，必毀滅其自己。』

『不能自己幫助的國家，即其公民或庶民不能防衛的國家，是最怯弱也沒有了。……所以諸侯

應該視戰爭的技術爲他們唯一的研究與職務，因爲這特別是統治者的科學。』

『一個有深慮的諸侯不能實踐諾言，也不應該實踐諾言的，除非實踐諾言時於他自己沒有害處，或者訂立諾言時的環境仍然存在未變。』

隨着資產階級的興起，現代一般所稱之『權力政治』(Power-politics)的原則，在這裏是可找到完全的說明了。

至於獨立國家主權之絕對原則的觀念，則可以在黑格爾的著作中找到完備的說明，黑氏爲後期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其對於各國間之國家關係的定義是很硬性的，沒有留下餘地讓任何較高之國際觀念插足：

『關於各國間的國家關係，他們的主權是基本的原則；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們的相互關係，才會在自然的狀態中，而他們的權利，在他們的上面還另有權力統治的一般情形中，是不會實現的，他們的權利，祇有通過他們特殊的意志才會實現。』

同樣的，賴松 (Lasson) 在同時期中說（見 H. Lauterpacht, private Law

『我們叫做國家的道德人 (Moral Person) 同時也是一個主權人 (Sovereign person)

它本身就是一個目的，……關於它本身以外的一切，它都是沒有限制的與無拘束的。所以國家不能服從一個法律的命令，或者一般地說，它除了自己的意志以外，不能服從另外一個的意志……這是一個放肆的自私自意志……二個國家的相互關係是正像二個腕力的關係一樣。』

這個觀念在十九世紀以至於一九一四年的時期中，是資產階級政治哲學的主潮。

因此戰前帝國主義時期之英國重要政治哲學教授浦桑葵 (Bosanquet) 在他的國家之哲學理論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1899) 一書中說：

• 『國家在一個較大的社會中，沒有一定的任務，不過它本身就是最高的社會，它是一個整個道德世界的保衛者，而不是一個有組織的道德世界中的一個因素。有了有組織的生活，才有道德的關係，不過這樣的一種生活，祇是在國家內的，而不存在於國家與其他社會的關係中。』

• 在一九二〇年發行的該書第三版中，浦桑葵氏因為看到國際聯盟的成立，遂改變論調說：『國家是人類精神的各種結合，……顯然為一個世界規模之合作的單。』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理想主義者對於國家的見解，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可隨時改變的。

所以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在資產階級的國家觀念中，是佔極大部分的。『國際的混亂』實就是資本主義基本原則的原形放大。

反對這個基礎而傾向國際統一之理想主義者的熱望，是由二種原因產生的，一種是資本主義下世界經濟的逐漸統一，一種是世界混亂與衝突結果的可怕經驗。這種熱望頗與前面一種觀念衝突鬥爭，但在資本主義的機構內，是沒有辦法戰勝的。所以在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現實間，發展了一個永久的對生 (dichotomy)，即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雖帶有和平的與國際的熱望，却被它自己的臍帶與資本主義的現實縛在一起。例如格蘭斯登在國際事情方面主張『公權的統治』(rule of public right)，而一方面則去砲轟亞力山德里亞 (Alexandria)。愛士葵斯 (Asquith) 則藉口擁護『歐洲的公法』，並使『較小民族』的權利置於『堅固的基礎』上，而加緊向前行進軍隊的參戰，簽訂了『秘密條約』。威爾遜總統為要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而簽訂了凡爾賽和約。自由主義理想家的現代模型威爾斯 (H. G. Wells) 曾經說過一九一四年

的帝國主義戰爭是一種『神聖的戰爭』，而極力侮蔑馬克思派之暴露這次戰爭之帝國主義的性質，而在二十年後，他却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自傳中認錯了：

『我對於世界中道德的與智慧的一般力量的估計是錯了。我不願來說明這可怕的真理。

『襲來的世界災難是這樣嚴重壓住我的心靈，使我不能不作這個錯誤的說明，不管我的深刻的與最初未定的疑懼，而確定新的世界秩序，隨時隨地與舊的發生衝突。

『經過好幾個月的時間，我才始很不願意地承認這個不愉快的真理，即我所說之「為文化而戰的戰爭」，「消滅戰爭的戰爭」，事實上祇不過是一種聊以自慰的幻象，這如火如荼的現實，其實很簡單，即法蘭西、大不列顛與他們的協約國家，根據他們既定的政策，利益的關係，條約與祕密的諒解，依照公認的歷史的方式，並在他們適當構成的軍事當局的指揮下，來和中歐的同盟國家開戰，同時在現在的條件下，沒有別的戰爭是可能的。』

威爾斯雖有這種的覺醒，但他仍認為走向『世界國家』的理想之路，是經過大規模資本家之善意的合作，是經過一個『世界的銀團』而不必推翻資本主義，或者是經過技術專家與高級『飛行家』之魔術的方法，而對於唯一的真正力量則不注意，『我

對於世界中之道德的與智慧的一般力量的估計是錯了。』這種真正的力量，就是國際勞工階級聯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力量，它能夠單獨摧毀金融資本獨裁的權力，而實現集體合作的未來世界社會。

有許多人假定資本主義進化到一個較高的時期後，它的混亂與矛盾就會烟消雲散，根據這種資本主義合作而起之國際和平的夢想，雖經現實的極大打擊，但自十九世紀而至二十世紀，仍然堅持未放，不過現在它的形式已經改變了。在十九世紀時，為適合於自由貿易之工業資本主義的條件，幻想的形式是採取一個未來世界自由貿易時期的形式，在這個時期中，所有的民族都可由和平貿易的線索聯合起來，而戰爭則不復出現。到了資本主義進化到它的獨佔階段或帝國主義時期，（這是不能避免地要從自由的資本主義條件中生長出來的，）這個夢想就被打得粉碎了。不過當資本主義的真正決鬥已達極端的公開與激烈時，即在帝國主義的時期中，一個新的夢想是起而代替舊的地位。在這些新的夢想者看來，資本集中與獨佔的發展，最後不是也可因同一發展的

法則，而達到一個單一的國際資本獨佔，消滅所有的矛盾與分化嗎？帝國主義是必不可發展成爲『超帝國主義』（ultra-imperialism）嗎？這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重要理論家考次基（Kautsky）所作的定式。一九一三年希爾弗亭（Hilferding）在他的財政資本論（Finanzkapital）中就早已說過：

『就經濟上說，一個指導所有生產而消滅恐慌的世界卡德爾，是有成立可能的，這樣的一個卡德爾，在經濟上是可想像到的，雖然就社會與政治方面說，這樣的一個國家似乎不能實現，因爲利益的衝突緊張到最後的可能限度時，會必然的要使它崩潰的。』

但在一九一五年考次基却跳出這個假定的立場，即經濟上可能而實際上不能實現的理論，而承認一個資本主義的『新階段』（New Phase）『不是不可能的』他在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民族國家帝國主義國家與國際聯盟（Nationalstaat, Imperialistischer Staat und Staatenbund）一書中說：

『從純粹經濟的觀點說，資本主義將經過一個新的階段，卡德爾的政策可延長到外交政策上去，即超帝國主義的階段，並不是不可能的。』

又說：

『進化是朝向獨佔前進的，所以這趨勢是傾向於一個單一的世界獨佔，一個世界的托拉斯。』

這個『國際化的』資本主義之未來和平的、和諧的階段底見解，（假定國際金融集團及國際托拉斯和卡德爾的發展可爲此預示）在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三〇年間，非常流行於自由主義的改良派中。^⑤

我們已在上面對論戰後經濟問題的一章中，敘述過這個假定的漸漸發展之『國際』的統一與資本主義和諧底神話，在實際的經驗中悲慘的崩潰下去，並且知道實際的發展路線，是朝向相反的方向，即敵對的金融資本集團之經濟政治的衝突，貿易戰爭，關稅戰爭，通貨戰爭，以及外交與武裝鬥爭底加緊銳化。現在我們要在原則上研究在帝國主義的發展中，爲什麼這種過程是不能避免的，爲什麼這種過程的發生不是由於偶

●這不但自由主義的改良派如此，就是『現實的和平主義者也有同樣的見解，像諾曼吉爾（Norman Angell）等一班人在大戰前都是如此。不過這一派間自然有相當的不同。』

然因素的攙入。

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下，爲什麼一個「世界國家」或任何穩固國際合作的組織是不可能的呢？這原因可求之於帝國主義的性質中，即在各個國家機構的週圍，都組成敵對的獨佔資本集團，同時每個集團都與其本國國家機構結爲密切的關係，以便利用最大的權力去早日達到競爭的目的，而獲得較大的世界市場、資源、殖民地或勢力範圍。這一個衝突實爲帝國主義世界政治的實體。在這個情境中，自然不能有穩定的國際聯合，而祇能有對付共同敵人之不堅固的同盟與相互關係。即使想組成一個普遍的聯合會，而且組織並不要嚴密，如國際聯盟一樣的，也不易達到普遍的目的，因爲有許多大國仍未加入，即使現在這樣的組織，也不能真正維持和平，而祇表露其僅爲現有衝突的一種繼續與現有衝突的一個戰鬥場。國際聯盟原本是戰勝強國反對戰敗國家與蘇聯的一種聯合；現在則成爲各類的國家反對法西斯的挑戰，反對立刻爆發世界大戰計劃的一種國際組織；將來也許會成爲另外一種性質的組織。不過它從不曾，也不能消除了帝國

主義之中心內的真實權力基礎和它的衝突。

假如許多敵對的獨佔團體，能夠結合為一個單一的獨佔團體，結成爲一個單一的世界托拉斯或卡德爾，那末這種情形才能在帝國主義中改變過來。一個單獨的世界托拉斯如能實現，那末一個單一的世界國家，也能在資本主義下接着成立起來，要是不然的話，那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根本的經濟問題實爲資本主義世界國家問題的基礎，（我們要認清國際聯盟不是一種世界國家，或超國家的聯盟，而祇是組織散漫的一種聯合，其特殊的性質，我們在下面再爲詳論；這類組織的根本難題是仍然同樣的。）

一個單一的世界托拉斯是可能的嗎？當作一個抽象的經濟假定，這在理論上是可想像到的。不過在抽象的想像與其實現中間，則不免存有一個深淵。因爲抽象的假定是不計及資本主義不齊一之經濟政治加速發展的法則的，而這種法則却使它能的事實上實現。

資本之經托拉斯或卡德爾組織而集中的正常過程是怎樣的呢？這種正常過程的

發展，可採下列二式中的任何一式。第一式是一個極強有力的資本團體能夠控制，吞併，擊破，賄買或凍殺一個較弱的對敵者，而一步一步的進到一個獨佔的地位。第二式是在二個或多數競爭者間的互相平等與條件的相對穩定，可以訂成一個分割市場的穩固契約，或者談判一種資本的合作辦法。但是如沒有一個極強有力的資本團體，又沒有相對的平等，尤其是在劇變的條件下，（如某一公司的營業大盛而另一公司則衰落下去，以及各種新技術的發明等）締訂固定的契約是不可能的，因為較強的或者營業發展的資本團體，是寧願繼續他們的鬥爭，而不願穩固於現有的地位。這個不穩定，在形成其流動的與不堅固的性質之所有國際托拉斯與卡德爾的經驗中，是以一種國際的規模明顯地表現出來，從戰後歐洲鋼鐵卡德爾（European Steel Cartel）中，更可作一個特殊的啓發研究，這個卡德爾原來由歐洲大陸的國家組織而反對勢力較強之美國鋼鐵托拉斯（United States Steel Trust），英國起初沒有加入，後來則被吸入在內，不過對立始終未曾解決，在卡德爾中也是如此，祇把對立移轉到競爭比額的戰場上去，時時

發生破裂的危險。

但當這個問題從工業某一部門中之相對的基本條件，移轉到聚合於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周圍間之複雜的獨佔資本組織的關係時，這就變成很明顯的，要找到平等或者一個穩固的比率以訂成分配世界市場的任何穩定的契約，是怎樣的不可行了。因爲第一，每個團體之相對利害的不同因素（現實的與潛在的經濟富源，生產費，可用的勞動力與訓練的程度，地理的與要塞的地位，所控制的領土，某種原料的獨佔，以及武裝強力的因素等）在任何一般的比率中，是不能比較的；第二，在動的前進力量與沒落力量間的條件，是常常在變動的。最強的獨佔團體，必不願任何的合併，例如美國的不願加入國聯；而動的前進力量，則仍願戰爭以改進他們的地位（例如德日）。因此就必然要接着發生不斷的重發的重分世界的鬥爭，這就是帝國主義的永久歷史。這種鬥爭，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中，祇有等到某一強國獲得最後的完全的勝利，其他的國家都屈服於他的世界霸權之下，才能終止。不過協約國訂立凡爾賽和約與道威斯計劃來永遠屈服德國，使

成爲一個殖民地之企圖的失敗，已表明這條路的不通了。要達到這個最後世界霸權的目的（事實上帝國主義正在努力走向這個目的），必須經過戰爭與破壞的吸血沼澤，包括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與社會的大激變，而在這樣毀滅與破壞的面前，羣衆的反抗即使事前不能阻止其發生，也會在帝國主義能完成其單一的世界獨霸的目的之前，達到世界革命的勝利。

這種情形足以說明帝國主義列強之世界規模的任何穩固的國際合作，是不可能的，而且它不但可以說明資本主義之世界國家的可能性問題，並可解釋現在資本主義之國聯組織企圖（包括國際聯盟）的性質與矛盾。

二 國際聯盟

我們前面所已討論過的，是祇在原則上涉到帝國主義條件下國際組織（範圍較小的與技術的除外）的障礙物，或妨害帝國主義之世界規模的穩定的國際合作底因

難。現在我們要轉而討論國際聯盟與戰後其他同樣企圖之經歷中的實際成績了。

在日本侵略中國的前夜，有一個曾經做過國聯行政院最初理事的柯南查 (M. H. Cornéjo) 出版了一本叫做各洲的均勢 (L'Equilibre des continents) 的書，有普恩克雷 (Poincaré) 所作的導言。他對於國聯的地位與任務，在書中有一個熱情的描寫：『一個自發的與不可避免的反對熱情的常設聯盟，已在國際聯盟的機構內組成了。這個聯盟常常會得到極大勢力的幫助，以反對一個眼光短淺之政府的偏見，（假如這種偏見表現出來時，）這種政府是反對同沒落帝國主義之錯誤思想相矛盾的和平傾向的。在一個普遍的聯合中，利益的關聯創造了一種於和平有利之道德的慣性。這種慣性形成了一條力量的線，不為任何要脫離國聯所指示之走向和解與協定道路的國家所破壞……國聯的權力是一天比一天更為客觀，它尋求公平的解決反對各國的自私主義，而成為一個調整利益的機關。每當一種訴諸武力的威脅可在一種態度的背後感覺到時，即最佳的動機也會必然失敗。運用帝國主義手段的國家，會無情地被隔離開來這是不能避免之和平的聯盟。』

這書是在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中國與國聯的無能表現出來以前寫的，所以更有

許多批評的地方，以後的言論則完全不同，這可以從不列顛政府的『國防』覺書中（一九三五年三月發表）找到典型的表現：

『英國的輿論，自來即相信現在國際政治的機構是適合於和平的維持，並以爲對於舊式的國防方法的依賴，是不再需要的。

『不過世界事情的力量，已經表明這個確信未免有些早熟……』

『世界各部的形勢已經表明，各國仍在他們所認爲國家必要的衝動下，準備施用武力；一等到採取行動後，就不能依賴現在的國際機關來做抵抗侵略的保護者了。』

在這二個極端的見解中，即一方面是樂觀主義的幻想，一方面是『現實主義者』的反對幻想，而堅主獨立的武裝的鬥爭準備，在這二者間可以找出帝國主義與國際關係中之形式與現實間的典型對照。

國際聯盟過去是意見劇烈紛歧的主題，現在仍舊繼續如此。它的理想方面，已引起許多人的熱誠擁護，他們以爲國際聯盟不論是怎樣的不健全，總是各國間國際合作與消滅戰爭的唯一工具，其中的多數人都以爲這是一個未來的世界國家聯合會的核心。

而在另一方面，國聯則從帝國主義國家中受到不斷的實際的攻擊與空言無補的待遇，更爲顯武主義者與侵略份子刻毒攻擊的目標，這些顯武主義者是反對所有形式的國際合作，而公開承認戰爭之不可避免的。此外，在社會主義的圈子中，國際聯盟與資本主義的特殊問題，已經引起極大的紛歧意見與相反的見解。

爲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需客觀地與歷史地研究國際聯盟的問題，明瞭了戰後時期帝國主義關係的背景，這種背景不但與國聯的起源有關，而且與國聯以後發展的變遷形式也有關係，如在最近的時期，當蘇聯成爲一個世界的強國而加入國聯，從帝國主義以外，引入一個新因素而造成一種新的勢力關係，也是同這個背景有關的。

國際聯盟是什麼？國際聯盟絕不是一個「世界國家」或超國家的聯合會，可對其組成份子行施獨立的權力。國聯會員國的主權是仍然完全無缺的。這我們觀於國聯表決所有重大問題時須經全體一致通過一點，就可以知道。有些人有時辯論着說，會員國之遵守國聯盟約義務的本身，就是一種對於主權的限制。不過這種主權的限制，同訂立

一種多邊條約所受的限制沒有什麼不同。凡是條約義務的解釋，行動與否的決定，會員國自己都有權決定，會員國如認為於他們有利益時，隨時可以脫離國聯，而恢復自由行動，像德日二國所做的一樣。所以武裝權力的重要基礎是握在各會員國的手中，而不在國聯的手中。

國聯這種對於其會員國，尤其是強大會員國之最高權力的依賴，實於它的性質有決定的關係。這種依賴情形可以打破各種各樣的錯誤對比，即把國聯與會員國間的關係認為一個國家對其人民的關係中間的錯誤對比：如國聯的『憲兵任務』（Police role），國聯為『法律統治權』（reign of law）的合體，『增加法律力量而非增加訴訟人力量』（arming the law, not the litigants）的觀念，會員國戰爭與私人決鬥間的相似等等。（事實上國聯並不禁止所謂『私戰』 Private war 而認此為調解失敗與行政院理事國意見又不一致時解決會員國間糾紛之最後辦法。）在現代的國家中，警察與法律是一個最高當局之力量的正式反映，這種權力是為大多數的人民所承認，或

被強迫承認；事實上，一個代表相互密切關係的資本團體的資產階級，是真實的統治力量，而國家則是它的機關。但在國際方面，則沒有統一的資產階級，因此也就沒有單元的統治權以做它的機關；所以在國際事情方面，不能有像一個特殊國家內同樣意義的『警察』與『法律』，因為根本沒有最高的權力。有些人有時認國聯祕書處為『國際的文官制度』（international civil service），其實是不對的，因為實際上所有較高的重要位置，都是依照現存的勢力關係，慎重地分配於各國之間，而這些職員都各同他本國的政策與訓令，保持密切的關係。國聯這種須聽命於各會員之最高權力之情形，是帝國主義的必然反映，因為帝國主義不是一個國際的統一制度，而是一個勢力時常變遷之各種國家集團的對立制度。

因為在國際上沒有一個統一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如沒有單一世界托拉斯或單一的有力資本集團），因此同樣的，在國際上也不會有統一的資本主義的政治機關。國際聯盟的這種根本困難，即缺少組成上層政治機構的任何經濟基礎，以及它的存

在是各國間的而不在一國內的性質，在國聯組成前的最初談判中，就已有了一種特殊意義的表現。

齊滿恩教授(Professor Alfred Zimmern)在其新近出版的戰後國際聯盟與法規(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Rule of Law 1918—1935)一書中，關於大戰終止時所正式提出的流產計劃，曾有一個敘述。這個計劃就是協約國間的經濟統制制度延長到戰後時期，並把它擴充而成爲一個包括範圍極廣的國際制度。這個計劃的性質與它失敗的理由，是有很大的教訓意義。

世界大戰已把世界經濟分成爲二個很整齊的集中制度，一個是協約國的，一個是中歐同盟國的。協約國的經濟制度，藉着海上力量的控制，把大多數的中立國家都拉攏在內，而包含世界的大部領土。由一個單一的經濟統制中心機關，控制着所有重要商品與船支的移動。我們且引濟教授的話說：

「世界的經濟生活，從來不曾像大戰末期一樣的，是在一個完全的控制下。十九世紀發生而

來視爲當然之寬弛的私人國際經濟組織，是突然的消聲匿跡，而由二個幾乎包括整個世界之極有組織的政府機關，起而代之的地位，中立國家與遠離主要戰區國家之英協約國經濟制度的密切關係，我們可以下面的事實來說明：即在大戰終止的幾個月中，全世界海運噸數的百分之九十，是在協約國政府的控制下——換一句話說，即在協約國海運委員會（Allied Maritime Transport Council）的控制下。這委員會的任務是分派協約國的貨運與處理人民的旅行事宜。（一四六頁）

這是資本主義所得到之超國家經濟組織的最高形式。我們要注意這個表現是非常重要的，因爲一方面證明一個社會如欲極迅速地將世界經濟組成爲一個控制的中心，在技術上是可能的，而同時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下這種廣大的統一組織形式，祇有爲着戰爭的目的，爲着與敵對制度的鬥爭時，才能夠形成。

在大戰的終止時期，有人建議這種制度應在戰後繼續下去，並擴充範圍，把中立國家與先前的敵國也包括在內，而由他們派遣代表出席管理機關。很明顯的，假如這個建議有實現的可能，那末一個建築在勝利協約國的優勢基礎上之有組織的國際資本主

義制度，也會建立起立了，而這種制度就可替企圖中的資本主義世界國家，奠下了一個可能的基石。可惜這個計劃是立刻失敗了。延長協約國經濟組織的建議，原由英法政府向美國政府提出，他們主張協約國的經濟控制制度應在戰後繼續下去，並應包括中國國家之商船與供給品的統制。當時美國的經濟地位比疲弱的歐洲國家不知要强多少倍，它的答覆，是一個完全的否定，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胡佛的照會說：

『美國政府對於戰後任何與協約國統制我人富源類似的計劃，都不願贊成。恢復和平以後，全世界所有輸出糧食的供給，有一半以上將來自美國，由此類商品的多數購買者，對我人決定它的價格與分配，那是完全不能想像的，原料品也與此同樣情形。』

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一個和諧的超帝國主義之任何計劃的意見，是沒有比這個說明更明顯了。

齊滿恩教授對於這個打擊之封鎖了未來國聯的命運，頗為悼惜。他以為這個計劃的「目的，是在於造成條件，在這種條件下，（祇有在這種條件下，）國聯才始有早日組

成爲一個政治團體的希望；』他並做着結論說：

『假如和平如時常所說的，是失敗了，那末所遭受之第一次的大失敗，也許是最大的失敗，不是在和平會議的本身中，而是在緊接着休戰後的時日中，當經濟的勢力是被准許從政治家的統制中消逝的時候。』（一五五頁）

但是很明顯的，事實上所表現的，並不是由於政治家的偶然錯誤。這裏所表現的，實是戰爭的壓力剛移開後之帝國主義的基本對立，這是與資本主義的整個組織不能分離的。在德國敵人剛剛打倒後，帝國主義之新的主要的英美對立，就連同次要的英法對立，即刻爆發出來。比較強大的帝國主義列強，都拒絕參加任何穩定的契約或集團。美國在退出經濟合作的戰場後，也就接着退出政治的合作場地，美國的退出使國聯不能成爲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組織。所以這裏無所謂偶然的事，而實爲帝國主義基本法則的演出。

因此國聯的歷史，祇能從帝國主義之關係與對立的基礎上去考察。國聯與凡爾賽

和約的根本連繫也是從這裏發生的。一般地說，資本主義國家的聯合，祇有在對付一個共同敵人的時候才能實現。拿破崙戰爭後神聖同盟的發展，是爲着鎮壓革命的勢力，維持維也納會議的解決辦法與王室的復辟。從國際聯盟的起源中，也可以找出相似的因素，因爲那時現存的秩序又遭受革命的威脅，長期的戰爭已使協約國終得勝利，而重新分配歐洲與世界的土地。國際聯盟就是維持大戰結果所造成的秩序，而反對新的修約戰爭或革命變動底遮牆石。同時在這根本反動的基礎上，又加上消滅世界戰爭之十字軍的理想主義，這點又同神聖同盟有某種程度的類似。

因此我們可以從國際聯盟的組成中，找出三個的因素來。第一，是戰勝帝國主義列強維持其戰勝結果的目的。第二，是整個資本主義維持其被威脅的統治而鎮壓勞苦大眾與殖民地人民革命的目的。第三，是阻碍未來戰爭的目的。這些目的在事實上都是自相矛盾的，後來的歷史都把這些矛盾更充分的表現出來。

國際聯盟之與神聖同盟相似的一面，即它爲帝國主義鎮壓革命與殖民地人民的

一個組織，在它的最初階段中，即戰後革命潮最高漲的時期中，是特別的明顯。因為整個資產階級的最高共同利益，是在於維持被搾取大眾的服從一點上，於是資本主義之最高度的合作，也祇有階級優勢的共同利益直接受到威脅時才能實現，合作的程度是同威脅的程度成正比例的。這個可以拿蒂愛爾（Thiers）與俾斯麥（Bismarck）的合作反對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來說明；同樣的，在帝國主義時期中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的進攻中國義和團而洗劫北京，也是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共同聯合的一個例子，（雖然他們內部的對立與暗鬥非常劇烈。）還有帝國主義列強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聯合武裝進攻俄國革命，也是一個例子。

國際聯盟之這一方面的性質，在它的組成時與最初時期中，就表現得很明顯。事實上國際聯盟實不是『各國』的聯盟，而是戰勝帝國主義列強同二等國家的一種聯合。殖民地的人民祇由他們的主人『代表』出席。蘇聯也同戰敗的德與匈土一樣的，沒有被邀參加，而『委任統治』制度，祇是分割戰敗國家之殖民地掠奪品的一種明顯掩護。

物。日本提出的建議，即主張在國聯盟約中承認『民族平等與公平待遇的原則』並保證『不因種族與民族的不同而有歧視』的建議，雖經多數國家贊同，但因英美的反對而失敗；薛西爾爵士（Lord Cecil）反對說，這種建議『要引起不列顛帝國內部的極端嚴重問題』，威爾遜總統抗議說，這建議『要在全世界引起種族的問題』。

反對世界社會革命的戰鬥意識，在國際聯盟組成的最初時期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英國外交部關於國聯計劃的一個照會說（此照會係第一次發表於齊滿恩教授的著作中）：

『我們必須向前顧到未來時期的情形，即布爾什維克主義——或國際階級鬥爭的宗教——將成爲歐洲政局中的一個永久因素，並可隨時攫取國聯會員國或願加入國聯之國家的政權。我們必須以確切的詞句規定，凡是鼓勵傾覆隣國政府之宣傳的國家，都不許他加入國聯做會員國。我們的態度可根據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五日威爾遜演說中所定的原則上：以後和平的根基，必需建立於有利害關係與權力的公衆上，他們應使各國遵守這樣的義務，即其國內人民所

進行的一切活動，如有鼓勵或幫助他國的革命者，都須予以嚴厲的有效的制止。』

同樣的，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斯麥茲(Smins)的國聯計劃，也無情地建議一個『委任統治』制度，使加入國聯組織的西歐國家，可藉這個制度而攫取東歐的控制權：

『歐洲是正在清算中，國際聯盟應該是這大遺產的繼承者。俄奧土諸國瓦解後所遺下的人民，都是最沒有政治訓練的；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既不能自治，又缺少自治的權力；他們是最貧窮的，而要用很大的力量去扶助其達到經濟政治的獨立。』

所以喬治勞合於一九一九年二月致和平會議的備忘錄中也公開的承認國際聯盟是『防止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唯一辦法』(alternative to Bolshevism)：

『假如我們要獻給歐洲以一個防止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唯一辦法，那末我們必須要使國際聯盟，一方面成爲對那些願與隣國公平交涉之國家的一個保障，一方面則又爲對於那些侵犯隣國主權之國家的一個威脅，不管這些國家是帝國主義的帝國，或者是帝國主義的布爾什維克派。』

國際聯盟最初觀念中之這種公開的反革命任務，是蔭蔽於『德謨克拉西』的旗

轍下，所謂德謨克拉西實就是帝國主義本質的掩護物。在威爾遜的哲學中，戰爭是君主或皇帝侵略野心的結果，這是同經過二種過程而獲得解放之人民的和平熱望相反對的，所謂二種的過程，就是民族的自決與議會的民主政治；（其實他所說的民族自決，是祇適用於敵人統治下的民衆，而不適用於協約國統治下的更大多數的人民，）他們不承認資本主義下的『德謨克拉西』制度，實就是金融資本的統治，這種統治實是歷史中最有侵略性的勢力，世界現代戰爭的策動力。

因為國際聯盟創始者的原來計劃，是想把國聯組成爲一個維持帝國主義對其人民的統治優勢，壓迫德國永處屈服地位，以及共同榨取與瓜分俄國，東歐與近東的機關，所以蘇俄就視國聯的最初觀念爲『某幾個國家圖謀侵佔他國權力的一種聯合』，一個『假的國際團體』，其『真正的任務，是把大國或其屬國之帝國主義政策的侵略目的，掩藏起來，不使大衆知道。』（見一九二三年蘇俄致國聯祕書處的照會）蘇俄的這種觀察，自然是非常有理由的。國際聯盟觀念中的二重性質，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四

日齊姬林致威爾遜總統關於國聯問題的照會中，曾顯明的指出，這二個觀念一方面是人民的和平聯盟觀念，另一方面是帝國主義之聯合霸權機關的觀念。齊氏在同一照會中還提出布爾什維克黨對於組織一個真正國際聯盟之建設性質的建議，這些建設性質的建議包括：（1）所有民族的自決，包括協約國統治下的人民在內；（2）取消一切的戰債；（3）驅逐各國內的資本家，而將國際經濟合作組織建立於集體的經濟上；（4）國際裁軍。齊姬林說：

『在我們同意於參加與不能代表人民公意的政府談判同時，我們應該從你處詳細考察你所建議以促進和平工作之國際聯盟的觀念。你要求波蘭塞爾維亞比利時的獨立，與奧匈帝國人民的解放。你的意思大概是說各地的人民大眾，爲着以後參加一個自由的國際聯盟起見，應當將他們命運的決定權，首先握在他們自己的手中。不過極奇怪的，在你的要求中，並沒有看見愛爾蘭埃及印度甚至菲律賓的解放，我們極希望這些人民，經過他們自由選舉出來的代表，應有機會會同我們一同參加國際聯盟的組織。』

『在開始談判國際聯盟的建立以前，我們還希望你確切的說明，你提議用什麼方法去解決含有經濟性質而於和平前途有極重大關係的許多問題。……你也同我們一樣的認識，這一次大戰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之政策的結果。……』

『所以我們建議國際聯盟的組織，應該建立於驅除各國資本家的基礎上。……假如你同意於這點，假如新戰爭的根源都以這種方式永遠的封閉起來，那末毫無疑義的，一切經濟的壁壘都很容易移除，所有控制生產方法的人民，也對於生產品的相互交換，即以他們之所不需易他們的所需，感到極大的興趣。這樣的結果，各國間必互相交換商品，每個國家都製造他最精良的出品，而國際聯盟就成為對於勞動大眾的一個相互幫助的聯盟了。這時就很容易地把維持內部公共安全的武裝勢力，減低到最低的必要限度了。……』

『我們會精密地草成我們關於國際聯盟的建議，藉以阻止國際聯盟之變成爲一個反對他國之資本家的聯盟。』

但是還有『另一種的可能性』

『但是還有另一種的可能性。我們須同威爾遜總統交涉阿昌奇爾（Archangel）的攻擊

與西伯利亞的侵入事件，我們又須同威爾遜總統商談國際聯盟的和平計劃。當時指導美國資產階級政府之政策的真正威爾遜總統，實際上不就是這二個事件的製造者嗎？他不是美國政府，美國聯合股票公司，工商鐵路托拉斯與銀行家的政府——簡單說，他不是美國資本家的政府嗎？假如是的話，那麼這個美國資產階級政府所草擬之組織國際聯盟的建議，實際上將以新的鎖鏈束縛人民，這不是可能的嗎？一個新的國際托拉斯將被組成，以剝削勞工階級，壓迫弱小民族，也不是可能的嗎？」

我們可以看出一九一八年十月蘇聯關於組織國際聯盟的建議，已經涉到永久的國際人民組織的基本問題。可是這條路線沒有被採用，所採用的是另一條的路線，即「剝削勞工階級，壓迫弱小民族之國際托拉斯」的路線。

不過這條路線，「國際托辣斯」的路線，根據我們前面分析過的原因，也是不能實現的，因為帝國主義的內部對立，阻止了這個計劃的實現。老實說，沒有一個帝國主義的世界聯合是能夠實現的。接連不斷的脫退、分裂、衝突，使國聯的地位大為減弱，以至於祇

剩有二個帝國主義的大國還參加國聯的工作。由於國聯力量的極端減弱，於是在國聯組成十四年後的時候，就不得不邀請蘇聯加入，以增強它的地位。自此蘇聯就開始在原先組織起來反對它的國際聯盟內，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了。

爲要明瞭這種變遷在整個形勢中的情形，和最近階段中國聯的組織與任務，我們必須首先考察國聯內外之帝國主義的對立，這種對立打破了國聯之爲帝國主義世界聯合的原來任務，而經過以後力量的減弱以達於現在的新階段。這在事實上就要使我們討論到國聯之爲帝國主義對立的決鬥場的第二個性質。這一性質在國聯存在的第二個階段，即暫時穩定時期，才明顯的表現出來，也就是說，隨着國聯之爲戰勝帝國主義國家反對戰敗國家與世界革命之聯合會的性質之漸漸消逝，而比例地明顯起來。這時各國已允許德國加入國聯，而國聯也成爲公認的歐洲主要帝國主義列強的談判會晤地。不過國聯之爲帝國主義對立的決戰地的一個性質，實際上在組織國聯的初步談判時，就早已很顯明了。

對於國聯的組成最有重大影響的，有三個帝國主義的強國，即美、英、法三個國家。但是這些國家所力求實現的目的與政策，事實上都是互相矛盾的；這些矛盾的政策就反映於國聯中，如在盟約中就可以看出來。說起國聯盟約，實不是一個單一的文件，而祇是一種混合物，可以有極不同的解釋，在嚴重的國際糾紛中，它的實效是極可懷疑的。

法國是最關心於保障他從凡爾賽和約所得來的利益及建立於許多新興國家基礎上的歐洲霸權的，因此它要建立國聯，並增強它的地位，使成爲一個有法律束縛的國際機關，共同維持凡爾賽和約與新劃定的邊境。與此相適合的，法國並要組織一個國際聯盟下的國際軍隊，但爲英美所反對而失敗。法國後來又同樣的極力主張訂立議定書，規定被侵略時立即自動互助的辦法，但也因英國的反對而失敗。

至於英國，它從凡爾賽和約所得的直接利益，都在歐洲以外的地方，他反對一般性質的或在他直接利益範圍以外的任何約束義務。所以他最初即反對國聯盟約第十條中的文字：『保障所有會員國之領土完整，以防禦外來之侵略。』（爲美、法所贊助）後

來又屢次的「解釋」說不能太固執於文義。英國的政策是要把國聯縮小爲一個國際諮詢的機關，一個舊式「歐洲協商」(Concert of Europe)的繼續與延長。英國對於整個國聯機構與「集體安全」觀念之懷疑的正式表明，可從戰後時期中追尋出來：一九一九年英國政府對國際聯盟的註釋(見第一五一號國會文書)說，「私戰」仍然是「看作可能的」，而國際聯盟祇是「建立一個組織，以利於和平的合作」；一九二五年英國政府對於行政院的宣言(見二二六八號文件)謂國聯雖能解決「誤會」的問題，但不能視爲有力禁止「從根深蒂固的衝突原因中爆發出來的戰爭，這種戰爭由於歷史的或其他的原因，把強大的國家分離開來」；一九三五年英國政府的照會(第四八二七號文件)說，「現存的國際機關不能依賴之而爲防止侵略的保障。」

至於美國政策的第一階段，如威爾遜總統所表示出來的，是想經過國際聯盟而建立一個在美國把持下的世界和平聯合會，因爲世界的和平對於美國之經濟金融的侵略，是最有利的，而且於它的高強的經濟力也能適應。而在另一方面則，美國不像英法一

樣的注意於凡爾賽和約的直接掠奪品或歐洲的解決辦法。在美國知道它自己由於英法的反對，不能在這樣的任何集團中佔得優勢的時候，在美國知道它的政策反而牽入到與他沒有利益關係的歐洲義務與糾紛中去的時候，威爾遜的政策就行改變，而美國也拒絕加入國際聯盟了。

美國的退出，實為國聯之想組成爲帝國主義之世界集團的第一個重要裂痕。帝國主義的基本對立，比國際聯盟中的聯合力量要強大得多。從這個觀點觀察，國際聯盟實不復是一個一般的聯合會，而祇是英法把持下之一個局部的聯合會。美國的退出國聯，立刻就被英國用來做藉口，說國聯不能再視爲有實效的機關，國聯的盟約不能再視爲有像最初原意一樣的束縛性。一九三五年英國政府的宣言說：

「現在形式的國際聯盟，是非國聯盟約起草者所擬的國際聯盟了。他們無疑地顧慮到，並盡可能地消除由於某些國家未加入爲會員國而起的困難。但是他們從不想到在這些未加入的國

家中，可找出這許多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他們更絕不會預料到其中之一就是美國。」

同樣的，國聯的『國際封鎖委員會』於一九二二年就報告說，因為美國的退出，盟約第十六條的制裁條款，不能再視為自動的與普遍的有效的，如盟約所規定的。

在美國退出以後，英法的對立就控制住國聯的進行而使它的行動無能。法國力爭着要訂立互助議定書，英國則以訂立羅加諾條約（Locarno Pact）來反攻，這個條約表面上似乎是增重了英國在歐洲的義務，而實際上則表示英國之退出國聯的一般束縛，因為這條約把英國的義務明顯地祇限於西歐一帶區域。英國又為反抗法國的稱霸歐洲起見，把德國也請進國聯中來。一九二六年德國的加入國聯，起初是擴充了國聯的性質，改變其為戰勝國家機關之單方面的任務，並把含有一個濃厚反蘇聯傾向之西歐帝國主義聯合會的觀念，重又顯現出來，尤其是在英國政策的目的中。可惜這個目的又失敗了，新興日爾曼帝國主義之凡爾賽和約的挑戰，祇增加國聯中新的對立。德國之加入國聯，如後來發表之斯特萊斯曼（Stresemann）致前皇太子的信件所說明的，是為策略上的目的；等到後來時機成熟時，德國就退出國聯，以便自由地將鬥爭進展到一個

新的階段了。不過在這時候，一個極深的變遷是正在整個國際形勢中進行了。

世界的經濟恐慌及其結果，使國際政治局面大為改變，所有的對立更普遍地尖化，這於國際聯盟的整個性質上，自然發生很大的影響。就恐慌時期爲止，國際聯盟在表面上是主要帝國主義列強（美國除外）的一般聯合會，但在新的尖銳化的局面下，這種情形就不能再繼續下去了。發展中之新戰爭性質的第一個信號，是一九三一年日本的侵略中國戰爭；中日二國都是國聯的會員國，中國曾向國聯申訴，但是英國在外交上幫助日本，以致國聯不能有所行動。國聯在牽涉一個大國之第一次戰爭中，表現出這種的無能，對於其爲阻止戰爭之一個機關的名譽上，實爲一個致命的打擊。

日本行動的影響還不止此。國聯雖沒有採取反日本的行動，不過最後也草就一個斥責日本侵略行爲的報告書，這報告書雖有許多地方對日本表示讓步，但爲日本所否決。日本並且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宣布退出國聯。這表明爲着實現侵略戰爭的目的起見，脫離國聯後是更可自由的行動。到了一九三三年秋季，德國也步着日本之後而脫離國

聯了。這樣就形成一個新的形勢，即準備立刻戰爭的強國是正退出國聯，（意大利以後也祇是名義上仍爲國聯會員國，）而仍留在國聯的，則爲反對立刻爆發戰爭的國家。這是國際聯盟新性質中的第一個因素。

與第一個因素相關聯的第二個因素，是國聯中之二等國與小國的地位與活動，隨着大國地位的轉弱而增強起來。原來，在最初的觀念與計劃中，國際聯盟是全由大國把持的，小國的地位極不重要。國聯盟約就規定掌握國聯實際權力的行政院，由五個常任理事與四個非常任理事組成，常任理事由五個戰勝大國担任，四個非常任理事則由許多小國中選出，而且這四個席位還是經小國在和會中力爭後才始設立的。這種組織就表明大國在行政院中應該佔有一個永久的多數。不過各強國間對立的銳化，把這種情形改變而毀壞了。一方面，國聯中之帝國主義強國的數目減低到三個國家，而另一方面，由於各種衝突與陰謀而起的不斷變化，代表二等國與小國之非常任理事的席位，由四個而增到九個，這樣就把國聯的原來均勢改變了。這種變遷沒有打破大國，尤其是美

法二國對於國聯的實際把持，但也不全然是形式上的，而實於均勢中反映出某種的變遷。因為大多數的小國，都很怕戰爭，很怕隣國的野心或修約目的，所以極想使國聯發展為一個維持集體和平的機關。小協約國，波羅的海諸國，巴爾幹半島的多數國家以及斯堪的那維島國家，都於這方面在國聯中演着一個活躍的角色。隨着法西斯侵略戰爭威脅的增高，大部份小國之努力使國聯成爲一個集體防衛侵略行爲之有效機關的活動，也加緊起來，這種威脅的增高並使他們不得不在國聯的動作中挺身而出。而在這個爲和平而戰的鬥爭中，他們現在是在蘇聯發覺一個有力的同盟者了。這就要使我們說到國聯形勢變遷中之第三個與最重要的因素了。

第三個因素產生於蘇聯國力的增強。國際聯盟之原始神聖同盟的性質，其失敗與消滅的原因，不在於其創造者的計劃，而是由於世界形勢的向前發展，蘇聯國力的增強，與帝國主義勢力因內部分化而減弱。蘇聯已打敗了它的敵人，建立起它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而漸漸成爲一個力量不能忽視的世界強國。法國爲要應付新與德國的威脅與國

聯力量的減弱，就極力設法使蘇聯加入國際聯盟。到了一九三四年，蘇聯就加入國際聯盟而造成一個完全新的局面。帝國主義的鍊索是第一次被打破了，帝國主義圈外的一個強國，却已在國聯內部的行政院中行使職務。

一個遠大的關係的轉變就這樣展開了。國聯雖然仍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一個聯合，其中祇有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但是最活躍的挑戰國家則已經退出國聯，或對於國聯採取一種公開消極的態度。新加入的社會主義國家，很能在國聯中起影響的作用。恐懼戰爭的小國，力使國聯發展為一個維持和平的機關。帝國主義強國已分為二派，一派公開在國聯以外準備戰爭或向國聯挑戰，一派則不願或反對立刻爆發戰爭，而極遲疑地與矛盾地要維持國聯成爲一個阻止或延緩戰爭的機關。因此民衆就能利用帝國主義陣營中的這個分化與國聯中之新的勢力關係，而作爲增強反對帝國主義之法西斯挑戰的鬥爭底一種方法了。

這種極端複雜的新形勢的矛盾勢力，一部分可以一九三五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

尼亞的戰爭來說明。在意阿戰爭中，帝國主義列強的形勢是這樣的：不列顛帝國主義爲着保衛其在北非、蘇彝士運河與地中海的利益，已被捲入漩渦而阻止意大利的行動，法國則爲要得到意大利的助其防止納粹德國的威脅，已同意意大利獲得密切諒解的基礎。在英國對於德國未來侵略行爲的態度未明白表示以前，法國不敢迅速決定反對意國。祇有蘇聯一個國家，表明其在原則上反對意大利的殖民地侵略，並聲言準備參加防衛和平，反對侵略的集體行動。國聯之採取極有限度的行動，即一部分的經濟制裁，以反對一個大國，在國聯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不過這種行動是極遲緩而懦弱，而在英法把持下的五國委員會（Committee of Five）從開頭即違反國聯盟約，對意大利提出許多的讓步。英法帝國主義所草的所謂霍爾賴伐爾的解決辦法（Hoare-Laval settlement），更不惜以阿比西尼亞大部的土地，去酬報意大利的侵略行爲，他們並以這種方法來延緩煤油的禁運，因爲煤油的禁運是能使戰爭終止的。這種辦法的提出，實完成了窒息國聯任務的工作。這種結果，依事實的發展，又再度表明國聯的不能阻止戰爭或保衛

和平，不過事實已表現出爲和平而鬥爭的力量底增長，人民的壓力在促成所採取之極有限度的行動上與擊破霍爾賴伐爾的計劃上，已起一部分的作用，並且暴露出國聯中最近勢力關係的極端不穩定情形。

國際聯盟在中日事件與意阿戰爭前面所表現出的無能，以及對德國於最近的將來在歐洲侵略行動的沒有辦法，使各國對於國聯的前途，分化爲二派的主張。第一派可以拿英國統治階級的輿論來代表，他們以爲國聯業已失敗，集體安全的整個觀念已經破產，將來國聯的任務，祇可限制爲一個國際諮詢與和解的團體，而取消或清算盟約中集體維持和平的規定。在國民政府的宣言中，就暗示着集體安全的整個問題須在最近的將來重新考慮，這個觀念尤得樂黛助爵坦白的表明：

『我是不願意地要下這樣的結論我們唯一之榮譽的與實際的途徑，是立刻聲明在一年之後，我們將不再接受包含於國聯盟約第十條與第十六條中之自動的與普遍的參戰義務，而要邀請會員國來討論怎樣才能恢復國聯之基礎的普遍性，並繼續成爲一個國際和解的機關。』見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太陽報（士報）

第二派的意見，可以一九三六年四月法國的和平計劃爲代表，他們主張以一種保障條約的補充制度來增強國聯的力量，這種保障條約規定所有參加國家，須負集體制止侵略的確切義務。

因此在最近的時期中，關於國聯的前途，將見有一個重要的鬥爭。現在的情形是帝國主義陣營中眼前極端不穩定的一種表現，一方面是法西斯勢力與挑戰分子的前進，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勢力與人民和平陣線的發展，而主要帝國主義陣營中之政策的分化與態度的不決，尤爲顯明。很明顯的，這種情形不是靜的情形，是很可能向下述的任何一方面迅速發展。即一方面，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進展，或人民陣線過渡時期的進展，能夠使國際聯盟中的均勢，發生一種迅速的與甚至重要的變遷。而在另一方面，主要的帝國主義勢力將會以各種努力去恢復舊有的均勢，邀請德國重入國聯，並再度重建國際聯盟內的暫時動搖之帝國主義反革命的陣線。

在最近的將來，這種鬥爭尤其會在下面二派間發展，一派是企圖清算國聯爲一種

集體和平機關的基礎，重拉法西斯國家加入其內，修改或刪除盟約第十條與第十六條。另一派是企圖增強國聯的基礎，而輔以一種互助安全公約的制度，使之成爲一種共同防衛侵略的有效機關。

這種鬥爭反映出現局中各種社會的政治的勢力，其結果如何，是要看大國中之內在的社會政治鬥爭的未來發展怎樣而決定，關於國聯的前途，現在不能夠作獨斷的結論，因爲國聯不是絕對不變的機關，而祇是不斷變遷勢力的一種關係；因此在任何一個時期中國聯的任務與意義，祇有同那個時期的關係連繫起來，才能下具體的判斷。

三 世界公約與區域公約

帝國主義列強從開頭就沒有信任過國聯是一個普遍的安全機構。美國拋棄它，英國懷疑並拒絕擔負任何的一般約束，法國一方面增重盟約的拘束性質，一方面則又首先發展一種保障它本國安全的條約與同盟制度。

威爾遜已說過：

「在一般的與公共的國際聯盟家庭中，不能再有小的聯盟，同盟，或特別的公約與担保。」

但威爾遜總統自己開頭即違反這個說法，而建議訂立英法保障條約 (British-American-French Treaty of Guarantee)。這個建議後來祇因美國的拋棄而未成功。因為各方面不信任國聯的集體制度，於是各國間的許多個別條約就繼之而起，這些條約有的是在國聯範圍之外訂立，有的是在國聯機構之內訂立。帝國主義下列強關係的分離傾向，要比國際聯盟的普遍制度強得多了。

在戰後時期內的這許多條約中，我們必須分為二種形式。第一種是世界公約，如凱洛格公約或巴黎公約 (Kellogg Pact or Paris Pact)。這個公約是想建立一個世界的「非戰」制度，與國聯分離，並在國聯之外。第二種是許多的區域公約，從小規模之二國間的不侵略公約以至於區域廣大的制度，如遠東的華盛頓九國公約，西歐的羅加諾條約，泛美聯盟 (Pan-American League) 的運動，流產了的「泛歐羅巴」 (Pan-

互助公約的訂立，已有一部分實現（等都是 Europe）計劃，以及建議中之東歐安全公約（Eastern Security Pact）此約因法蘇

美國的發起凱洛格公約，是想在英法領導下的國聯之外，另建一個在美國領導下的世界制度。凱洛格公約於一九二八年簽字，最後批准的國家共有六十五個，比國聯會員國的數目還要多。這在形式上雖為第一個包括世界各國的制度，但它所以能夠含有全世界國家的性質，就是因為沒真實的內容。這公約規明：

（1）締約國代表各該國人民鄭重宣言，反對用戰爭以解決國際爭執，並否認在各國相互關係中，以戰爭作國家政策的工具。

（2）各締約國承認，凡締約國間的一切糾紛及爭執，不問其起因及性質若何，其處理及解決，不得用和平方法以外的方法。

但事實上所有簽字的帝國主義國家，從頭即以一種完全與辟的意思來看待這種誓約。這於各國在簽字前的聲明與保留中，已說得很明白了。美國政府把其為維持子羅

主義所採的任何行動除外，法國政府堅持自衛的戰爭或履行條約義務的戰爭，不違反巴黎公約，英國政府則更提出包含極廣的保留，它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九日照會中說：

「某部分的世界區域，其人民的福利與領土的完整，於我們的和平與安全，構成一個特殊的與重大的利益。英國政府已在過去苦心說明，這些區域內是不容許外來干涉的。保護他們不被攻擊，對於不列顛帝國實為一種自衛的方策，英國政府之加入一個新約，是確切明白這新約並不妨礙英國在這方面的行動自由，這是必須說明的。」

從這個照會中，我們可以看出英國不滿意於帝國的『防衛』而在任何未列舉的『世界區域』中，保留完全的『行動自由』，只要這些區域隨便什麼時候於英國有『一種特殊的與重大的利益』。不列顛帝國主義這種範圍廣大的要求，如同孟羅主義比起來，那末孟羅主義的範圍要狹得多了。不用說的，這種要求後來也被其他強國拿來同樣的應用，如意大利出席日內瓦的代表，就特別引述這種保留，來證明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並沒有破壞凱洛格公約。

這樣凱洛格公約在簽字的時候，還遺留下什麼內容呢？「自衛」的戰爭顯然是認爲不在反對之列的，維持殖民地的戰爭，或履行條約義務的戰爭，也同樣的認爲不在其內，還有爲保持任何「世界區域」中之「特殊的與重大的利益」的戰爭，也當然不包括在內。帝國主義簽約國的「反對」戰爭，是除了這些不大的「例外」的。這難怪一般誠實無僞的人，要懷疑所剩下讓他們反對的，不知是些什麼東西了。不過許多的法律家却預備好一個答案說，帝國主義列強已反對「侵略」的戰爭了。大家都知道沒有一個現代國家，是會自己承認會發動一個「侵略」的戰爭的，因此這種非戰的誓約，並不是不容易遵守的。

自從凱洛格公約締訂以後，大家已注意到世界上沒有再發生過一次「戰爭」。包含大屠殺與大破壞的軍事行動，雖然老早已在遠東南美與非洲發生，但在每一種的軍事行動爆發之前，從不曾發表過一個宣戰書。據參謀部的意見，這種先例可在將來繼續下去。這大概就是帝國主義對於消滅「戰爭」之最大限度的貢獻了。

美國領導下之世界制度的凱洛格公約，在日本侵佔滿洲中，經過一次的試驗。美國政府認為公約簽字國的『諮詢』，是公約被破壞後的必然結局。斯汀生（Stimson）國務卿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的演說中說：

『當凱洛格公約受到破壞的威脅時，簽字國間的諮詢，是不能避免的。世界輿論力量的任何有力懇求，是請求討論與諮詢。在公約簽字國贊助美國在過去三年中所努力建立之引起統一的有生氣的輿論精神，以為公約的一種制裁的政策時，在這個途徑被簽字的世界各國採取與贊成時，那末應該採取諮詢，這是輿論一致的一個附屬物。』

斯汀生的呼籲，實際上是沒有人理睬他。英國那時正在幫助日本。美國的屢次提議都被阻止住了。英美的基本衝突重又擊碎一個世界制度的企圖。

由於補救這種防止戰爭之世界公約（以國聯盟約與凱洛格公約為代表）的失敗，一種正確的前進途徑應為相互安全的區域公約底理論，就已發生，因為這種區域互助公約是最適合於有關國家之密切的眼前利益的。不過這裏也須有個說明。這種鄰國

間互助性質的協定，一方面固有阻止戰爭爆發的效力，但在另一方面，很顯然的，（尤其有大國的問題牽入在內）現代國家不能這樣分成許多的部分，某一區域內的戰爭一定要影響到另一區域，因此任何區域公約如要望它發生完全效力，需要使之成爲一個更大的世界制度的一部分。這種情形可以拿過去所訂的重要區域公約的運命來說，華盛頓九國公約與羅加諾條約，都是屬於分離的性質的，已經破毀了。現在成立的法蘇互助公約，是一種新式的條約，顯然不是排他的，而是歡迎他國加入，以冀成爲一個更廣大制度的一部，他的效力如何，還有待於試驗。

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九國公約雖規定保障中國領土的完整，確立對華門戶開放的原則，但在成立後的十年中間，却不能阻止簽約各國屢次在中國境內行施軍事行動。到了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入滿洲並於一九三二年組織滿洲傀儡國後，九國公約是全被扯破了。

一九二五年的羅加諾條約是以一種複雜的相互保障的制度，將西歐的安全問題

同東歐分離開來，由英法比德意五國担保德國與法比二國相聯的西境邊界。這個條約雖在形式上附屬於國聯之內，而實際上則代表英國政策的路線，即使英國脫離東歐方面的義務，而使德國在英國領導下之西歐帝國主義制度中，恢復其同法國同等的地位。這個條約有一個時期幫助着新德意志帝國主義的復興，但德意志勢力之更進一步的發展已將這個機構破壞了。一九三六年德國就宣布廢棄羅加諾條約，以便進行萊茵河右岸的重行武裝，同時並提議在這基礎上重新訂立一個西歐公約。

泛歐羅巴聯合會(Pan-European Union)的計劃，是在資本主義暫時穩定時期提出的。一九三六年斯脫萊斯曼和白里安(Briand)在托依萊(Thoiry)舉行談話，商討法德合作，即為這個計劃之第一階段的反映。『泛歐羅巴』的名稱，實際上是不妥的，因為這原來的計劃沒有把蘇聯（佔歐洲領土百分之四十五）與英國包括在內，而同時却把歐洲大陸國家的非洲殖民地包括在內，它們的面積比加入『泛歐羅巴』的歐洲國家的土地要大三倍。（關於這點，可參看卡萊琪所著 Pan-Europa A B C, 1931

P. 28) 這『泛歐羅巴』的整個計劃，實是想組成一個與蘇聯、英國、美國相敵對的集團。就這計劃之最活躍的贊助者，如卡萊琪 (Count Condemhove-Kalergi) 與泛歐羅巴聯合會來說，(此聯合會於一九二三年成立，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三〇年會舉行由重要政治家參加的半官會議，) 這計劃的主要意義，是組成一個反蘇聯的集團。泛歐羅巴運動雜誌『泛歐羅巴』(Panaeuropa) 的主要論題，就是『歐洲必須封閉它反俄的經濟陣線，』歐洲必須組織一個反俄國危險的軍隊。』同樣的，當一九二九年白里安正積極促成其泛歐羅巴的政策時，曼徹斯脫導報會刊文記述他的意見：

『他已被共產黨的危險所嚇住了，俄國的孤立已成爲他的政策中的一個主要目的。使俄國成爲孤立的希望，必與他的歐洲聯邦的計劃有相當的關係，這是有理由可以相信的。』(一九二九年十月四日曼徹斯脫導報)

一九三〇年白里安把他歐洲聯邦的備忘錄 (Memorandum for a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送交除了蘇聯外之所有的歐洲國家。不過英國的政策，因爲負有

歐洲以外的約束，根本反對參加這樣的一個歐洲聯邦，也不允許組成一個不包含英國的歐洲聯邦。英國有些政治家對於歐洲聯邦之為一種反美集團組織的觀念，都很眩惑：

『即在那些友善的區域（自治殖民地）內，也已受到威脅的美國敵人的損害，美國已在這些地方與世界其他部分獲得利益，而損害我們的利益。美國之佔有世界一半的黃金與擁有五倍於英國每年收入的資金事實，已使歐洲大陸的政治家不得不想法應付。歐洲聯邦觀念的產生與形成為均衡大西洋對岸之可怕經濟勢力的一種方策，是沒有什麼奇怪的。』（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六日霍因爵士 Sir Robert Horne 在憲法俱樂部 Constitutional Club 的演說）

不過英國的主要政策却不是這樣。愛米萊（Amery）在一九三〇年五月柏林的泛歐羅巴會議中說：『我們不同時屬於泛歐羅巴聯盟與不列顛共和國（British Commonwealth）』一九三〇年五月五日，太晤士報的社論也說：

『假如英國不參加歐洲聯盟，那末熱心於推行歐洲計劃的國家必不多，因此由於英國之不願參加一個排他的歐洲政治團體，一個新的政治聯合會是絕不會從現在的談判中產生的。』

英國的反對，實為歐洲聯邦計劃失敗的主因。

這種形式的區域公約，根本是一種反動的建議，祇會擴張對立的形勢，同時並與歐洲帝國主義的實在衝突相矛盾的。當歐洲仍為許多帝國主義的都城中心，在各洲佔有殖民地附屬物，同時並對於這些殖民地的分配發生極端對立的時候，『歐洲聯邦』或『泛歐羅巴』不是一種海市蜃樓，就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計劃。世界大聯合會中之歐洲各國的密切聯合，祇有在另一條路上，即在歐洲各國之帝國主義基礎被推翻時，才能獲得成功。

締訂範圍較廣之區域公約運動的第二個階段，是採取一種新的形式，這可以關於東歐互助公約 (Eastern European Pact of Mutual Security) 的談判來說明。(為最近時期之重要發展而範圍較狹的重要區域公約，如小協約國的密切政治合作，波羅的公約，與巴爾幹公約等，我們暫且放開不談。) 在東歐互助公約的談判中，蘇聯的和平政策實演着主要的角色。在一九二九年時，蘇聯就已同它的隣國，波羅的海諸國，波蘭

羅馬尼亞以及土耳其與波斯談判締訂一個不侵略公約。到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後，它就公開宣布國社黨侵略中東歐的政策與佔領蘇聯的土地，一九三四年初德波條約又告成立，這一切都表明歐洲戰爭威脅的焦點就在東歐。一九三四年五月，李維諾夫（Litvinov）因看到裁軍會議的明顯失敗，就提議裁軍會議應該重新改組為一個永久和平會議（Permanent Peace Conference），擔負阻止戰爭與計劃一個能實行的保障制度底任務。這計劃同時又發展為一個東歐安全公約，或東歐羅加諾（Eastern Locarno），如起初一般人所說的，這『東歐羅加諾』應當包括德國蘇聯波蘭波羅的海諸國芬蘭與捷克於一個防止攻擊的相互保障條約中，同時並訂立一個法德蘇三國相互保障條約。德波二國自始即對這樣一種和平公約的觀念，表示敵視的態度。英國起初是猶疑不決，但後來到一九三四年夏天時，即正式表示贊成，不過他自己不願擔負任何的約束。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的倫敦會議中，英法二國所同意的公報，則認這個建立於區域公約制度的基礎上之『一般解決』的明白建議，是『促進國際間信仰的

恢復與和平的前途的最佳方法。』

『這個一般的解決，是歐洲安全組織的準備，特別是用訂立公約的方法，由一切有關的國家自由談判而確保東歐各國的相互援助。』

這個決定，在一九三五年四月的英法意三國斯脫萊薩 (Stresa) 會議中，又重新申述了一次。

不過所有這些建議，都碰到德波的明顯反對。德國所預備同意的，不是防止攻擊的相互幫助，而是抽象的『不侵略』原則（這已包含於凱洛格公約中，並已證明無效力了）與『對侵略者不互助』的原則，這也就是法西斯之『戰爭地方化』的原則。東歐互助公約本應當包括法蘇三國，但因德國的反對加入，最後結果祇由法蘇二國於一九三五年五月成立互助公約。

法蘇公約成立後，立刻被所有納粹的與法西斯的宣傳所攻擊，說是一種『軍事同盟』與包圍德國的條約。不過這與真理離得太遠了。法蘇公約的條文，明白規定這是在

國聯盟約的範圍內訂立的，並開這類維持和平協定的先聲，在他所附的議定書中，明白包含歡迎德國加入的宣言：

『二國政府聲明，本條約的簽訂，係由以前多次談判的結果。以前多次談判之進行，為謀成立一個安全協定，而將東北歐各國——如蘇聯、德國、捷克、波蘭及隣接蘇聯領土之波羅的海諸國，悉數包括在內。在此協定以外，更須訂立一個蘇法德三國間的互助協定，規定三國中之一國，侵略另一國時，則其他一國應對被侵略國援助。此種協定雖為締約國所相望，但至目前為止，各方情勢，迄未容許其成立，因此簽約國商定，法蘇互助公約所規定的約束，僅得在最初計劃之三國協定的範圍內適用之。』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德國所謂的『包圍』形式，實在是太奇怪了，因為所謂『被包圍』的國家，是被繼續邀請以同等的地位加入這個公約的，德國之所以拒絕加入，祇不過是為着實行其公開宣佈的侵略計劃罷了。

在羅加諾公約與所有其他和平工具被破壞的時候，國聯盟約範圍內的法蘇互助公約，就外交機構所能做到的來說，現在實是主要的和平支柱。這個制度之擴展為許多

相類的協定，在反對立刻爆發戰爭的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方面，仍是外交戰場中和平奮鬥的中心，這種制度的擴大，在現在的情勢下，必能更形增強外交戰場中的和平陣線，以使戰爭的爆發至少延緩一個時期。

四 集體安全

從上面的分析中，關於『集體安全』的複雜問題，可以作若干暫時的結論。

集體安全的抽象原則，可以簡略地來說明。這原則的產生是世界的相互依賴與『和平的不可分割』之確切事實的現實結論。這原則的要點可作如下的定義：在許多獨立主權國家的世界中，如果不能成立一個有力的聯盟或任何共同的最高主權，那末維持他們中間之和平的唯一條件，是愛好和平國家的所有力量聯合起來，以共同的行動去維持與實行一個誓約，以反對任何發動戰爭的國家，這樣，結果因反戰勢力的強大，實際上可阻止任何國家的發動戰爭，或者在戰爭發生時，可很迅速的終止戰事。

這樣抽象地說，集體安全的理論實有一種數學比例的確實程度；也祇有這樣抽象地說，才沒有人敢提出爭論，除非是那些相信『戰爭地方化』的法西斯理論的人們，他們以為戰爭是不能避免的，使戰爭『地方化』是政治家的最高責任，在這些的批評家看來，集體安全理論似乎就是『戰爭的普遍化』(Universalisation of war)

『集體安全的新理論，祇不過是一個極易令人誤會之軍事同盟的名字，集體安全的影響，將使所有的地方性質的糾紛，變成爲一個世界的大戰。』(樂鄉勳爵在林肯法學院 Lincoln's Inn 的演說，見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太晤士報)

所有國際和平的擁護者，必會嚴正地反對這種實際上代表法西斯派或傾向法西斯派思想的批評家，而保衛比較上代表和平奮鬥陣線的集體安全路線的。

但當我們來把這個集體安全的抽象原則，應用到帝國主義的現實情形時，我們所碰到的問題，就要更複雜了。因爲我們這時要考慮到帝國主義強國的真實關係，這種關係一定要爲他們自己的目的，而缺少或誤解集體安全的原则。由於這種的事實，法西斯

的辯論家就故意曲解，以便打破集體安全的整個原則，而鋪平他們走向戰爭的道路。

第一，帝國主義列強的普遍聯合，事實上不能成立。國際聯盟的經驗與美國孤立政策引起的基本分裂，都反映出帝國主義的主要對立，這種情形已經說明普遍聯合的不可能；此後準備戰爭最烈之強國的退出國聯，也已說明這種關係。所有國家聯合起來以反對一個破壞和平之國家的理想，是同帝國主義強國之矛盾的特殊利益與關係相衝突的，因此結果世界上總屢次發生破壞的事件。國聯的經驗業已表明：在處理小國間的爭議或侵略案件時（如一九二五年希臘與保加利亞的爭議），如大國的意見都已一致，那末恢復和平的集體行動，是很迅速而有實效的。但是假如大國的意見不能一致，或其中一國的行動還有問題時，那末集體行動的路，立刻會被大大地破壞，因為違法的強國是常常能夠得到其他強國之公開的或秘密的援助的。例如一九三一年日本破壞國聯盟約，發動戰爭時，英國就在外交上幫助日本，而使國聯任何的行動無效。又如一九三五年意大利破壞盟約，發動戰爭，法國即在外交上同意大利聯在一起，而延緩國聯的行動。

同時，英法爲以前對意分割協定所束縛，屢次想獲得一種「解決」，獻以贖物而不顧到受侵略犧牲者的利益。又如德國於一九三五年與一九三六年繼續破壞國際條約時，英國就予德國以外交上的助力，而破壞共同的陣線：如一九三五年英國聯同他國正式斥責德國軍方面破壞條約而增加軍備後不久，即於同年六月與德訂立英德海軍協定，又在一九三六年德國廢棄羅加諾公約，重整萊茵河區域武裝的事件中，也表現出同樣情形。

這些帝國主義關係的事實，我們把集體安全路線估計作爲阻止戰爭陣線之可能性的時候，是應當考慮在內的。這並不是說，集體安全路線就可視爲沒有價值而丟棄之。但這也不是說，集體安全路線是永遠不能成爲各國人民大衆之獨立和平奮鬥的代替物，或反對準備戰爭之政府政策的代替物，因爲集體安全的實現是依賴於帝國主義政府的政策的。在現在的情形中，真正關心於集體安全路線爲一個普遍路線的唯一國家，就是蘇維埃聯邦。在其他所有國家中，當政權仍握在資本主義的手中時，他們所行的政策，一方面是要看資本主義各部門的勢力變遷如何而定，一方面是要看資本主義與

民衆運動間的勢力關係如何而定的。這可以拿法國人民陣線經過很久的奮鬥，最後戰勝右派對於批准法蘇公約的反對，而極力維持之的地位來說明。和平奮鬥中的中心因素，是獨立的羣衆鬥爭，由工人領導而與蘇聯的和平政策相聯合。集體安全路線的實現程度如何，實際上也將由這個因素的強力來決定。

這樣我們就要走到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和平與集體安全的奮鬥陣線，不再是抽象地宣傳一個法理觀念爲萬應靈藥，因爲這個是常被一個無感性的世界所忽視與破壞的，和平與奮鬥的陣線是成爲活動的組織，與蘇聯聯合一起，以反對戰爭而擁護和平，並利用集體安全的外交機構，來做羣衆戰鬥之基本武器（如國際工人聯合行動，斷絕法西斯挑戰者的供養等）外的一個輔助武器。但這是一個新的，更澈底的，現實的集體安全觀念。

所有抽象的自由主義理想家，都從法律方面認集體安全爲反戰的萬應靈丹，他們失敗的基本原因，是因爲他們把其觀念建築於一個同等主權國家之世界的完全抽象

的法律方面，而不建立於帝國主義世界的現實方面，他們常誤認在國家社會與個人社會中間有一個相同性，因之以爲用集體安全制度來防止各國戰爭的建議，就同一個國家維持人民之『法律與秩序』的方法相似。所以胡爾夫 (L. S. Woolf) 就主張建立『一個秩序的國家社會』由『集體保障與共同安全』制度來管理，他說：

『在國家內，我們從經驗得知，如果人性不受法律與秩序的節制，則文明的生活必不可能。在數百年間，我們已經完全改變人類的行爲，文化人都與他的隔鄰和平相處，即使他與鄰人有爭論或意見不同，他也不能做自已案件的法官，也不能打鄰人的頭，或刀刺他的背脊，或槍殺他；他解決爭議的辦法，或者是和解與仲裁，或者是將案件提交法庭，由法官依法判決。爲着使各人都能這樣行爲起見，人民就組織一個警察勢力，以阻止各人「擅自執行法律」。但在國際關係與各國間的關係中，我們却採取完全相反的方法。我們所維持的是一個無政府制度……阻止戰爭的問題，是以一種不同的制度，一個國際法與秩序，來代替這個無政府的問題。』(華爾夫所著知識階級與戰爭方法 The Intelligent man's way to Prevent war 一書的導言，頁十一)

九三三年出版)

這種相類的比喻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不但是由於現代國家的「法律與秩序」是一個絕對最高權力的反映，而各國在「集體保障與共同安全」基礎上組織的制度中，却沒有與這最高主權相對的東西，同時是因為各國間的關係是不能同人民間的關係相比較的。抽象的研究是沒有顧到各國力量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下已達到極點。假如這六十個或名義上的最高主權國家，多少都是平等的相類單位，那末可以想像到的，多數國家對於某一事件的共同利益，是可阻止一個或少數國家的任何破壞行動的。但是事實上，最大的力量是在大國的方面，現在祇有六個帝國主義的強國與一個社會主義的強國。在這樣一個小的集團中，任何「集體的」秩序組織問題，就含有一種極可懷疑的與不定的性質。假如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破壞盟約，而拉攏另一大國與之訂立同盟，那末全部的均勢就被推倒了，而為集體秩序的鬥爭，是有變成為敵對同盟的鬥爭底危險。換一句話說，我們在討論為世界政治之中心問題的帝國主義列強時，也就是討論一大羣的強盜王帝，及其不斷的為着各自的領土與贓物，從事於自相

殘殺的衝突，而並不是討論一個理想的公民社會，這種社會中的問題是建立人民間之法律與秩序的初步。對於這些人，「集體安全」的理想建設，是很不合適或沒有興趣的，除非是當作戰鬥中的一個新的巧計，以贏得一分去反對一個敵人。

因此我們必須要當心對於集團安全問題上之所有抽象的法理的幻想。我們還須當心這樣的可能性，即在一個特殊事件中，企圖將集體安全的口號轉變到相反的方面去，而使之成爲帝國主義衝突的掩護物。這點是特別重要的，因爲集體安全的原則通常是同國聯盟約相一致的。一般的說，在最近的將來，可望這二者能共同前進，因爲在蘇聯充任行政院的常任理事時，行政院是不會「一致」採取反動之帝國主義性質的決議的，這種決議他們可以借着集體安全的名義來促其實行——這是蘇聯加入國聯以前附於盟約的主要危險。這種危險在於蘇聯有關的爭議案件中，仍然存在着，因爲除了於爭議有關的國家外，其餘行政院理事的一致，是足夠使任何已決的議案施諸實行；而這種權力是能夠握於行政院中之帝國主義國家的手中的，假如他們聯合成一個集團，毫

不遲疑地利用國聯的機構，不願爭議案件的事實與蘇聯的和平政策而反對蘇聯的話。不過這種事情現在還不至於發生，尤其是在法蘇互助公約有效的時候。但是盟約仍然包含着許多有缺點的與反動的帝國主義要素：如關於委任統治制度的第二十二條；盟約第十五條的規定仍然准許『私戰』；而第十條，第十五條與第十六條關於集體安全條文的施行，仍然是非常含混，不確實，與潛伏着法理的陷阱。（當中國依照盟約第十條伸訴其領土完整的破壞時，國聯即議定任何決議均須一致的通過，即須得破約者日本的同意；第十六條的規定說，在任何國家訴諸戰爭時，『則據此事實應即視爲對於所有其他國聯會員有戰爭行爲，其他各會員担任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之關係，』但這種原來的意義，在對意實行部分的與漸進的經濟制裁時，早已被破壞了。）一致的原則可使行政院中的任何帝國主義國家或法西斯國家，（如非直接爲某爭議案的當事國時，）阻止任何有效的行動決議，而在任何需要的時候，可以破壞集體安全的原則。（法蘇互助公約關於這種可能發生的事故，有特別條文的規定。）

由於這一切的結果，我們不能單純地或在法律方面相信國際聯盟的盟約的實效而認為集體安全原則的自動表現。我們必需當心帝國主義政府之和平主義者的陷阱，他們是想以信仰國聯的宣傳，來瓦解羣衆的和平奮鬥。爲和平而奮鬥的力量不堪把一張空頭支票，置在任何帝國主義機構的手中，以免變成帝國主義的質物，而需要獨立地在每點上決定爲集體安全與和平而奮鬥的路線。

這種獨立性在應用到各國的勞工運動，未來世界秩序的代表時，尤其重要。獨立的勞工階級鬥爭與統一的勞工階級陣線，是爲和平而奮鬥的樞軸。與蘇聯在一起之爲和平而奮鬥的世界力量，須在每一個特殊案件與形勢中，依照和平奮鬥與反對戰爭製造者的目的，具體地決定他們的路線。

第二，我們必須記住集體安全的原則，不是弭戰問題的永久解決。集體安全的原則，是用來阻止以戰爭爲解決各國間爭執的方法，而強迫改用和平的方法。什麼是和平的方法呢？所有較小的問題，所謂可用法庭判決的問題，以及事實的或條約解釋的問題，是

可用許多有仲裁或法理性質的方法，如國聯盟約規定下所組成的世界常設法庭（W. o. rld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美國尚未參加）或許多國家間仲裁條約的規定，來謀和平的解決。不過關於帝國主義衝突的大問題，違反簽約國一造的志願的條約修改，邊疆的改變，領土、殖民地或勢力範圍的要求，總之，凡是關於世界新分割的問題，在最高權力的帝國主義列強的世界中，到底是沒有和平解決的方法的；因為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是勢力關係的反映，不是任何抽象的法律，『正義』、『公道』的反映，而這種勢力的關係，最後祇能夠以戰爭來試驗的。沒有一個仲裁法庭能夠強迫一個主權國家違反它的意志，而割讓土地或修改條約。盟約第十九條規定國聯大會有權『請各委員國重行考慮已不適用的條約』，但這規定祇有被玻里維亞、祕魯與中國引用過三次，而結果都是被擱置不討論。假如佔有殖民地的強國不願改變現狀，而挑戰的國家是被禁止用戰爭的武器或威脅去強迫改變現狀，那末在缺少一個最高世界主權時，就沒有強迫改變的方法了。

這種辯論的方式，被法西斯主義用來攻擊集體安全的整個原則，說是『現狀的永續。』法西斯主義就在這點上反對集體安全，並主張戰爭的權利是改變現狀之必要的與不能避免的武器。很明顯的，這種法西斯主義的辯論，祇對於那些接受帝國主義者關於擴展中的帝國主義強國應有『權利』分沾世界霸權之前提的人，才有效力。這是完全真確的，集體安全的原則，實際上有維持現狀的傾向，這種現狀的本身，祇是前次戰爭與勝利條約的結果，這就是說，集體安全的原則，事實上是維持一個與理想相差極遠的局勢。不過法西斯的戰爭『補救』比這本身的缺點更為惡劣。集體安全的確實價值，不在於其為解決帝國主義問題的方法，（就其性質論，這是不可能的，）而在於帝國主義條件下延緩戰爭爆發的一個暫時方法。從現在世界分割中所發生的問題，在帝國主義社會中是不能解決的；有些所謂和平擁護者之想尋找這種解決的方法，祇不過是幫助戰爭的進攻。這問題在下章中有詳細的討論。

實在的困難，是起於把集體安全看做為一個可能的世界組織的永久制度，（視現

在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爲永久的，是永不可能的，而不視爲在到新社會秩序的過渡時期中防止迫急的戰爭威脅底暫時方法。集體安全制度實際上是傾向於鞏固帝國主義的現存關係的，我們如果想維持集體安全制度以爲世界組織的永久制度，那末毫無疑義的，帝國主義中間之發展的動力，遲早會爆發出來反對它而打倒它的。——要是帝國主義在那個時期以前還未先被推翻的話。集體安全不是戰爭問題的永久解決辦法，至多是反對迫切的戰爭威脅之一個暫時的應急方法。

這樣說來，法西斯的結論，即主張戰爭爲實現世界新分割的假定之歷史上的必要方法，就是合理的嗎？完全相反的，因爲戰爭的方法，即使在不很確實的事件中，證明挑戰國家的成功，而走向新的分割，但是也會以同樣的邏輯，而再度引到重分割的新戰爭上去的。沿着這條路上，是沒有解決的辦法的。不管是認作永久制度之集體安全的人造穩定，或者是法西斯戰爭的破壞道路，都不能貢獻任何解決引起戰爭之世界問題的方法，因爲帝國主義的條件不許任何的解決方法。最後的解決法，祇存在於帝國主義的條件

外，經過統一的世界社會主義的組織，沿着完全的民族解放（蘇聯可做區域範圍內民族完全解放的例子），這樣消滅了世界分割的問題，殖民地與邊界的問題，原料品獨占等問題。由勞工階級領導之反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戰爭的羣衆鬥爭，是領着路走向這個最後的解決辦法去。爲集體安全的奮鬥，祇不過是這個鬥爭中的一個暫時武器罷了。

第六章 世界新分割的問題

「世界的所有權是永遠握在那些現已佔有各種領土者的手中而固定不變嗎？……現世界仍繼續不斷的把鏤爛的獎章，貢獻給那些擁有堅強武器與利劍的人，所以未來國家的經驗，要在任何物質方面，與人類的迴光返照後所遇見者不同，是絕對不確實的。」（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盤根哈德爵士 Lord Birtenshead 在格拉斯哥 Glasgow 大學的演說）

自從第一次重分世界的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在戰後的時期中，我們已很明顯的看出，帝國主義由於它內在的行動法則，已繼續不斷的向前躍進，而重新燃起世界新分割的鬥爭了。

現在，這帝國主義的躍進，已經變成爲一個走向戰爭之莽撞亂衝的賽跑了。所有的國家都正在擴充軍備，準備比上次大戰規模更大的戰爭。日本與意大利早已投入漩渦而發動征服的戰爭，納粹主義的德國，也正在組織所有的力量，準備未來的鬥爭。此外法

國正在增強它的軍力，英國則從事於一個新的軍備擴充計劃的實行，而美國也加緊其海陸空軍的準備。至於蘇聯，他雖是列強中沒有殖民地或屬地與領土野心的國家，但因為東西二面都被抱着公然向外侵略目的的德日所包圍，於是也不得不增厚他的自衛的軍事力量了。

帝國主義列強之積極擴充軍備，爲的是什麼呢？像意日二國似的，他們爲什麼驅使他們的子孫去屠殺呢？是爲『自衛』嗎？製造戰爭的列強底公開宣傳，已經否認這種說法而且毫不隱瞞的承認擴充軍備與從事戰爭的目的，是爲『向外擴展』的需要。和平主義者的邏輯，想把這個普遍軍備擴張的奇論，解釋爲『自衛』的目的，可是這個和平主義的邏輯，並不影響到帝國主義的真實邏輯。帝國主義列強的擴張軍備，是爲的準備世界新分割的鬥爭啊。

一 「有」與「無」的理論

從前有過一個很長時期的幻想，以為上次大戰結束時的解決辦法，已替這個厭惡戰爭的世界建立了一個最後的解決辦法，但在今日，世界重新分割的問題已經跑到一般意識的前面，而成爲一個熱烈地討論着的問題了。現行各強國間財富、資源與殖民地之『不平等的』分配，是各方面的在討論着，而殖民地、委任統治地或原料供給之一種可能的『重分配』的各種建議，也以一種開明的政治家風度的精神提出來了。一邊是希特勒、慕索里尼與荒木大將，一邊是英國的外交部長約克 (York) 的大主教與藍斯堡先生 (Mr. Lansburg)，他們都加入了這合唱隊，同聲歌唱。在他們看來，現在殖民地的『不平等』分配，是國際糾紛與備戰的真正原因，而解決的辦法，則唯有求之於一種和平的『改組』與『重分配』的計劃中。

帝國主義戰爭之流行的時髦理論，即『有』與『無』的理論 (The theory of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就這樣的開展起來了。這種理論事實上是用來做備戰的護符的。對於純潔的讀者，我們也許應該指明，在這個流行的布爾喬亞的理論

中，所謂「有」與「無」並不就是指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的意思；這所謂「無」實就是日爾曼的，意大利的，與日本的百萬富翁啊！

這個理論含有一種危險的半真實，而把帝國主義的真正動力完全掩蔽起來。它在實際上的危險與錯誤，像任何代替一個正確的帝國主義的理論底學說一樣的是由於下述的四個原因。

第一、因為這種理論在實際上是替法西斯蒂的備戰作護符的，是把法西斯國家中艱難悲苦之根基的真實階級問題以及向外擴張的動力掩藏起來的，是把人們的視線祇移轉到假定的國外問題上去的。

第二、因為這個理論是把現代軍備最強與最有侵略性的英美帝國主義國家，看成爲世界上真正尋求和平的勢力。

第三、因為這個理論引起改良派的幻想，以殖民地的重分配與原料的國際共有等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帝國主義者間的對立。

第四、因為這整個的理論是建築在帝國主義之錯誤的假定上的，這假定就是殖民地的人民必需被人奴役而永受剝削，這個理論並且以為『不公正』與衝突的原因，是在於某些國家沒有殖民地，而不是由於殖民地制度的本身關係。

所以在我們研究帝國主義者的主要衝突區域與現在備戰的主要勢力以前，是值得先來詳細考察這個理論對於帝國主義者的備戰與世界重新分割之真實性質的關係的。

『有』與『無』的理論，或者說『滿足的』（Satisfied）與『不滿足的』（unsatisfied）國家的理論，它本身並不是一個新的理論。如果這樣抽象地說，它實在是外交上永久的老套話。在很久以前，俾斯麥就把『吃飽了的』與『未吃飽的』（Satiated and unsatiated）國家，分別得很清楚。至於現代的代表意見，可從一本美國的著作中找到，這就是一九三五年在紐約出版之席蒙茲與伊米尼合著的世界政治中的列強（*The Great Powers in World Politics*, by F. H. Simonds and Books

Emery, New York, 1935.) 書中關於主要強國的有關資源，有一個很有價值的研究：

「在各強國之間，存在着一個基本的不同，這在於確立它們外交政策的性質上，有一個決定的影響。……強大的國家可以分成二種：一種是已有殖民地的，一種是正要尋求殖民地的。因此前者的主要目的，必然要保衛它已經獲得的利益；而後者的目的，却為獲取相似的利益。所以第一種國家的國策是靜的，而第二種國家的政策則為動的。」

「一個國家的政策，不論是靜的，或者是動的，都必然是根據於它的自然環境，地理上的經濟上的以及人口統計上的條件的。這政策的主要因素，都是從這自然環境中推演出來的。總而言之，一國政策的鎖鑰，一定要從這個國家的地理地位、資源的範圍與性質，以及該國人民之經濟的與人種的情形中去找尋。」

「一個動的國家，為了要使它的國策能够實施成功，除了訴諸武力外，是沒有第二條路的。如要在靜的與動的國家間建築一條橋樑，因而成立實際和平的一個條件，那未必需在前者的權利與後者的要求中間，謀得一些調和的辦法……要是缺少了這種調和的辦法，則動靜二種國家間的

合作，很明顯的就不啻等於有與無國家間的一種聯合。這種聯合將使前者永遠富庶，而後者則一輩子窮困的。這樣的一種交易顯然是離題太遠了。另外惟一的辦法是「有」的團結成一個同盟，用他們較強的實力迫使「無」的國家永遠維持「現狀」(Status quo)不過這裏要注意的，「有」的國家間的合作，祇有在平等的基礎上才始可能……

「所以一個國家的國策之為靜的或動的，實際上並不是由於他們人民的智慧，善惡以及受過教育與否。也不是因為他們的皮膚是白的或黃的，他們所講的語言是英國話，法國話，德國話或意大利話。甚至於政府的形式，是民主主義的也好，法西斯主義的也好，或共產主義的也好，都於這問題沒有多大的關係，雖然勵行國策的精神是可由政府的形式來決定的……」

「因此所成為重要原因的，是人民之是否住在海島上或住在大陸上，他們的國家是否位於歐洲，亞洲或美洲，他們是否有自然的富源供給他們的工業，與充足的糧食供養他們的人民。」

在所有的流行政論中，我們都能夠找出與這相同的意見來。在帝國主義者爭奪世界殖民地的尖銳鬥爭時期，那些舊有神聖的，半神聖的，抽象政治的或自由派之理想主義的歷史理論與政策，（這在引起一九一四年戰爭的意識中仍佔有極大勢力）都已

動搖得不可捉摸。因此就代以一種未成熟之自然經濟地理的唯物論，這種唯物論仍然把帝國主義之基礎的階級勢力與財產關係底真實動力掩蔽起來，而且還極力將帝國主義看做爲永久『自然』法的一種表現。這種理論也使人完全同情於法西斯之向外擴張的戰爭準備。這我們可以引述英國易休爵士（Lord Fisher）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在上院中的演說來做例證：

『德國與日本是向外擴展的與動的國家，這與一百年前英國的情形極爲相像，所以我們應當完全瞭解它們的觀點。國聯（或者說是國聯中的強國）對於那些向外擴展與動的國家之處理失敗，已經迫得它們都退出國聯了。結果是所有吃飽了的國家都聚在國聯之內，而飢餓的國家則在國聯之外，以致國聯在實際上完全不成爲一個國聯，而變成爲那些滿意於現狀的國家反對那些不滿意於現狀的國家底一種聯盟了。我們的利益，是在於加入一個真正的國聯，而不是加入一個聯盟。』

這個理論的毒素還散佈於勞工運動的上層階級中。因此在日本侵略滿洲與砲轟上海的時候，工黨政府的一個前任關員李斯密斯（H. B. Lees-Smith）就發表同情日

本行動的演說（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九日在威林區 Welinborough 的演說）

『日本有一個迫切的問題，同全世界其餘國家的利益相衝突，這是我們現在必需承認的。日本要是沒有國外貿易，那就不能養活它的人民，因為賴着國外貿易，它才能獲得糧食與原料，沒有這些，日本就不能生存了。過去日本是怎樣生存的？它是很悽慘的。要是我們易地以處，站在日本的位置，那我們也決不會坐以待斃，我們一定毫無疑義的要在某些地方發動，像日本在滿洲與上海所做的一樣。』

同樣的，沙爾德博士（Dr. Sater）也贊成工黨的行動，召集一個『均分原料與市場』的國際會議。他並引述霍蘭爵士（Sir Thomas Holland）關於二十五種必不可少的主要商品之分配的有名分析，來證實他的論據。在這二十五種主要商品中，英國有十八種是有適當的供給的，所缺少的祇有五種，而日本則缺少十八種，德國缺少十九種，意大利則缺少二十一種（他忘記說法國也缺少十九種）。沙博士接着說：

『要是這些事實是大致真實的話，那就不啻表明在這個世界中，必有一個合法地自命為「無的」國家的集團存在着。在這些時候，要希望那些英武的，剛邁的與有精神的國家，靜坐下來而安

於現狀，限制自我的發展，剝削現代文化生活的實際必需品，而不顧到他們大部的人民實際上在半飢餓狀態中生活着，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

這個工黨代表熱誠地替這樣「英武的，剛邁的與有精神的國家，」像納粹的德國，法西斯的意大利以及軍人法西斯的日本，說公道話，真是難得之至。不過，我們可以看出沙博士業已把「無的」觀念，從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不列顛帝國的無產工人中，（他們實際上是生活於半飢餓的狀態中的）轉用於富強的製造戰爭之法西斯國家的帝國主義集團中去了。沙博士的責任本來是該代表工人的利益的，而現在這個超和平主義者（ultra-pacifist）却已使他自已成爲法西斯帝國主義集團的發言人了。

對於這個太生硬的「有」與「無」的呆板說素，古處博士（Dr. G. P. Gooch）曾想用一個更暗昧之「滿足的」與「不滿足的」國家底說法，來糾正它的不當。古博士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在倫敦歷史學會（Historical Association in London）演講戰後的英國外交政策時說：

「英國對於戰後所得的許多利益，是絕對滿足的。自從一八九八年佔有蘇丹（Sudan）及一九〇二年征服鮑爾共和國（Boer Republics）後，我們可以說英國是個已吃飽了的國家。這就是說，我們在這世界上所需要的東西，我們都已有了。這種情形，到了一九一八年大戰結束後我們又獲得大量的殖民地時，是更爲真確了。」

這裏我們可以很顯然的看出這個理論的漏洞。古處說英國在一九〇二年就已是『吃飽了的』但到了一九一八年却還有很好的胃口，吞下『大量的殖民地』並且說這時是『絕對滿足』了，但恐怕要到下次再獲得『大量殖民地』時，才會『絕對滿足』罷！古處博士好像不知道他自己的矛盾點，並進而解說他的分類：

「戰後所有擾亂以及現世界所有擾亂底主要原因，都可以說是由於滿足的與不滿意的國家間底尖銳的對立。我不喜歡用「有」與「無」的普通說法。因為德國在現階段中固然是一個「無的」國家，但我們能夠切實地說日本也是一個「無的」國家嗎？這「有」與「無」的說法，是太通行得無從糾正了，而且又是不合科學的，我們還不如說滿足的與不滿意的國家，要來得簡單與正確多了。」

「所謂滿足的國家有英法美等國，而不滿足的國家則有日本意大利與德意志三個國家。滿足的國家自然希望維持「現狀」，或發生最小限度的變亂；而不滿足的國家，即使不真的要求恢復「老的現狀」，但無論如何，他們是要用外交的或者也許是戰爭的方法，來改變「新的現狀」，以達到與它們有利的地位。至於戰後英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是在於和平的維持。英國之所以要維持和平，並不單單是因為我們英國人酷愛和平，厭惡戰爭，而且是因為我們對於自己所享有的殖民地以及在世界中的地位，是完全而絕對滿意的。」

從這些以及類似的引證中，我們可以看出世界新分割的鬥爭的觀念，在所有的流行的意見中，現在都被公開地認為世界政治的樞軸。上面這些引證，不論是屬於那一方面或那一派，在現在的時候，它的意義都是相同的。不過這眼前的表面事實，雖然迫使我們承認世界新分割的問題是世界政治的樞軸，尤其是日意德三國之公開向外侵略的行動，迫得大家都不得不認為是關鍵的問題，可是現在對於這實際情形的普通解說，還是把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間矛盾底真正策動力掩蔽起來。結果就引起了解決方法的

幻想觀念。

總結前面這些淺見政論家的解釋，帝國主義者的向外擴展，是由於「自然上的吃虧」(natural disabilities)以及空間、土地、富源與原料的缺乏。結果在他們的國內發生「人口過剩」的現象，人民生活於「半飢餓」的狀態中，以致它們不得不「在某些地方發動了」(引李斯密斯話)。這些自然的與地理上的吃虧，是現世界不公平分割的結果，這在他們看來，是「無的」國家向外擴展與準備戰爭的原因，是決定每個國家（不論採行任何政制）的外交政策的永久因素，而且也是世界政治中根本問題的必然主題。

可是我們不必經過詳細的觀察，就可看出這種研究是不健全的與片面的，因為它們把地理的經濟的因素，從一國生產關係的歷史結構與實際的階級制度中分離出來。因此他們的研究，不但是不健全的與片面的，而且還與世界政治中的明顯事實不相符合。例如他們的論斷，很奇怪，祇常常適用於強大的國家，而永不曾應用到弱小的國家。

中去。在他們看來，強國是可叫囂着並用武力的方法，向這個現實的世界分割挑戰，強要滿足他們對於所缺少之資源的要求。至於小國，他們所缺少的資源雖然要比大國所缺少的更多，但他們祇好儘可能的善自利用。我們假如承認二十五種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商品，是改組派與向外擴展派的政策底決定原因，那末弱小的國家，理應是最主要之改組的與向外擴展的國家了。可是事實上，這些弱小國家却反而是這資本主義世界中集體安全制度之最可靠的支柱。同樣的，我們假如承認相對的『人口過剩』（意思是與可耕種土地相比的極端人口密度與極低的生活程度而言）是向外擴展的必然原因，那麼印度中國與爪哇，理應是世界上最需要向外擴展的國家了。所以這個錯誤的理論，並不是國家與一般人民以及人民之經濟需要的理論，而祇不過是帝國主義國家，適應它們以帝國主義任務為基礎的需要的一種理論。

換一句話說，所謂『向外擴展的必要』、『向外擴展的不能避免』，是同所說國家中的現存社會秩序有密切的關聯的。這我們可以俄國革命前後情形的對照，來做最明

顯的例證。帝國主義國家的帝俄，是採取向外擴展政策的，而社會主義的蘇聯，雖然它所佔的領土要比帝俄時代縮小，但它是實行和平政策的。這原因是由於蘇聯實行超越的社會制度，能夠以比帝俄時代強大無數倍的效率，開發它的土地，並繼續不斷的提高其人民的生活程度，而用不到採取向外擴展的政策。帝國主義之假科學派的理論家，又慣用俄國「在地理上」『必不可免的』要有一個不凍的出海港口，來替帝俄時代的向外擴展政策，與攫奪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行動辯護。這種政策直至十月革命前的米留柯夫（Miliukov）與克倫斯基（Kerensky）政府時，還繼續維持着。可是這種理論現在是怎樣的呢？現在這些同一的理論家却冷酷地說，蘇聯之所以採取和平政策，是因為『俄羅斯』（比帝俄時代的領土要小）已顯然地屬於『滿足的』一類國家了。照他們這樣說來，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從克倫斯基政府過渡到蘇維埃制度的時期，俄國就從『不滿足的』國家變成『滿足的』國家了，他們却還說『政府的形式，是民主主義的也好，法西斯主義的也好，或共產主義的也好，都於這問題沒有多大的關

係。』（見上面所引席蒙茲與伊米尼的話。）這是多麼漂亮動聽的理論啊！這些理論家的醜態還不僅就此而已，我們還可舉出一個顯例來。在幾年以前，蘇聯因遵守同德國訂立之拉巴羅條約（Rapallo）的規定，在外交上幫助民主共和的德國，以反對凡爾賽集團的稱霸，因此常被人認為是同德意一起的『修改和約』的集團（“Revisionist”Bloc）例如巴賴在其歐洲的新均勢（De Balla, 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Europe, 1932）中所說的就是。這些同一的理論家對於蘇聯之與『修約』集團接近的解釋，是由於蘇聯為一個反對『現狀』的『不滿足的』國家。可是到了現在，在德日意法西斯的挑戰前面，蘇聯因為擁護集體安全制度，反對戰爭，於是這些理論家就又反過來說，蘇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她是一個『滿足的』國家了。這些帝國主義辯護家之理論的混亂與自相矛盾，真是說不勝說，這裏也不必多所引述了。

那麼一國的外交政策是怎樣決定的呢？簡單的說，一國的外交政策是它內在的階級關係的制度底一種職能，反之則不然。擁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與『動的』或挑

戰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現行衝突，如果不從帝國主義的整個動力與它向外擴展的關係中去觀察，那是不能瞭解的。現在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與帝國主義者關係的矛盾，都是由於這種關係引起的。至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與戰爭，可以分開三個主要的階段來研究。這三個階段是同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相同的。

第一個是商業資本主義時期。在這時期中，初期的資本主義形式還正在打破封建主義的束縛。資本主義的貿易已先開始，而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還未發生，同時國內的市場也未完全開發。這時期的戰爭，主要的是推翻舊式封建的、地方的障礙，而建立起中央政府的戰爭，或者是征服殖民地、發展商業與掠奪，以謀奠下早期資本主義之積累基礎的戰爭。

第二個是工業資本主義時期。在這個時期中，殖民地的實際價值還無顯明表現。至資本主義的生產已經組織起來，國內市場也已完全開闢，而廉價貨物的大量生產更突破了一切的障礙。這時期的主要戰爭，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或國內市場區域的戰爭，或

是爲打破自由貿易的特別障礙之例外的殖民地戰爭，像英國對中國的鴉片戰爭這樣的。

第二個時期是帝國主義或獨佔資本主義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因爲每個獨佔的集團，爲了原料品與市場的控制以及資本的輸出，都極力想獲得最大開拓區域之完全的獨霸權，因此殖民地的問題就成爲外國政治與戰爭的中心問題。資本的不斷累積而尋求出路，生產力的擴展，資本主義之階級關係狀態中所起的消費限制，以及因此而必然發生之經濟衰疲與利潤降低的不斷威脅，這些原因都要迫使資本主義國家不斷的向外擴展，尋求殖民地，以便開發起來，一方面當作資本輸出的市場，一方面也當作商品輸出的市場。輸出的商品大多是生產品與鐵道設備等，一小都分則爲消費品。同時在另一方面，則將從土人手中提取來的原料運回本國，並以國家權力所及的各種強硬方法，去迫使土人做工，所給的工資還不足以供他們一飽。經過這全部的過程，帝國主義的『超利潤』(Super-profit)或建築於殖民地的剝削基礎上的高利潤率，是實現了。同時建立於這個基礎之上都市的社會機構也發展了。這個擴展過程的加速前進，又要在少

數的帝國主義國家間，引起了整個世界的迅速分割。於是在帝國主義完全發展的時期中，二大帝國主義集團間之世界重分割的鬥爭就開始了。一方面是新興的獨佔集團，它們所有的殖民地，不能同其潛在的擴展率『並駕齊驅』；另一方面則為已經擁有大量殖民地與人民的獨佔集團。現代帝國主義戰爭的題目，就是這個鬥爭構成的。第一次的帝國主義戰爭是一九一四年發生的，第二次的大戰現在正日益迫近了。

這個不斷的與時常重燃的鬥爭，在帝國主義的狀態中，是繼續不斷地發展的。這個衝突在任何時期的特別表現，所謂『滿足的』與『不滿足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鬥爭，所謂『有』與『無』國家間的鬥爭，都祇不過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法則的反映，而要繼續不斷的在每次新的『解決』中重復爆發出來的。自由主義的和平主義者，想以殖民地的重分配與國際共管，以及原料品的自由享用等方法，來和平解決帝國主義狀態中的鬥爭。這種理論實在是錯誤的；錯誤的原因，是由於他們不瞭解帝國主義的動作方式，以致結果形成了一種基本的錯誤假定，以為相互競爭之獨佔的資本集團間

的勢力，是一種靜的關係，儘管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不同，它仍能以不同的速度發展着的。他們尤其不懂得帝國主義之殖民政策的目的，並且因為他們極力想把工業資本主義與自由買賣的觀念，應用到帝國主義或獨佔資本主義的狀態中去，以致完全錯誤了。原來帝國主義的本質，是在極力奪取某一開拓區域的完全獨霸權。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還要在下節中加以詳細的研究。

擁有殖民地而受挑戰國家之攻擊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地位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把它們看作是『吃飽了的』國家，因而認它們是基本的與永久的和平國家嗎？這種想法就是不列顛帝國主義的辯護家的理論。●這種理論的錯誤，是因為不曾想到沒有一個帝國主義是會永遠『吃飽了的』。帝國主義者的向外擴展，只要可能性存在，是永遠沒有止境的。這個說法之最簡單的證明，是不列顛帝國主義在一九一四年前後所負的任務。現在的一般辯護家說不列顛帝國主義是『吃飽了的』國家，因此也就是一個和平的國家，這種辯論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就早已提出過。我們可以比較前面引述過之古

處博士的演說。古博士說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時期，「我們是已「吃飽了的」國家，這就是說，我們在這個世界所需要的東西，我們都已有了。」但這種情形並不能阻止在那個時期中，不列顛帝國主義仍在忙着計劃擴展它在波斯與中東（Middle East）的勢力，指揮索謀里蘭（Somaliland）與西藏的軍事行動，強謀瓜分或共管中國政策的實現，運用完全外交的機智以準備反德意志帝國主義的大戰，而在戰爭結束後，獲得大勝，獲得二百萬方哩的土地。所以這樣說來，一個「吃飽了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完全能夠向前更行擴展與組織新的大戰的。拿不列顛帝國主義來做擁有殖民地國家的代表，其地位的唯一不同處是：保衛它已獲得之大量殖民地問題更為複雜些，所以任何新的戰爭對於它的危險也比較大，祇有在確保必勝的條件下，經過極端的慎重將事與準備，它才會發動戰爭，要是不然的話，某種局面中的和平均勢就會被推翻的。而且它們所正在組織中的戰爭方式，絕不是一類小規模的殖民地戰爭，而是一種在新與敵人的實力還未完全鞏固的時候，就把他們一舉而擊破之的集團戰爭。這是對於不列顛帝國主義之

「和平」任務的最高估量。但也是一隻衰老而將失去弱勢的老虎，走起路來雖然非常謹慎，而在發動鬥爭的一刹那，也許是最危險的。這個經驗，德意志帝國主義在一九一四年已經領教過了。在未來的新關係中，還可以重新領教這一課。到了那時，那些輕信替老虎辯護之和平主義者的幻想底純潔人們，必然是會大吃一驚的。

●不列顛帝國主義「和平」角色的這個理論的毒素，已經蔓延到勞工運動的上層，因此我們在工人專校的出版物爲什麼戰爭(Why War)一書中，就可以找出這樣的話：

「『和平國家』與『戰爭國家』的差別，也就是滿足的與不滿意的國家間的差別，法蘭西與不列顛都已擁有廣大的殖民地，雖經一次戰爭，也不能再得廣大土地……這樣，不列顛自然是比其他國家更誠心贊助裁軍了。」(頁三六)

所謂不列顛比「其他各國」更「誠心」贊助裁軍，我們倒可以毫無疑義的拿二件事來證明：一是英國否決了所有的蘇聯裁軍建議，二是倫敦德里爵士(Lord Londonderry)對於打消廢除轟炸機提議獲得成功後有名的自誇。上面這個所謂工黨的觀點，比之英國出席裁軍會議的一個代表愛須皮夫人(Mrs Corbett Ashby)所發表的意見，更有利於不列顛帝國主義。愛夫人說：

「護軍會議的破裂，英國須負大部的責任，這是我熟思後的意見。」（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曼徹斯特導報 *Manchester Guardian*）

● 寫就上文後，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日的上院辯論中，曾發現倫敦主教（*Bishop of London*）關於不列顛軍擴計劃的宣言：

「當他以前在中國時，他們慣常說英國是已落了牙齒的一隻老虎。好，現在讓我給這老虎鎮上一付新牙齒罷。」

這話是說得多胆大呵！這比大多數牧師的語言以及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實話要感實得多了！

二 殖民地或殖民地原料之和平重分割的建議

帝國主義之世界重分割的新戰爭，是一天迫近一天，它最凶惡的一個信號，是各方面（包括官場方面）都提出建議，想以一種大家同意之部分的殖民地重分配辦法，來謀衝突問題的和平解決。這些避免眼前衝突之建議的提出，可說是完全意識的，這不但

自由主義的理想家是如此，就是官場人士，在某種形勢的相當限度內，也是這樣。自由主義的理想家懷着幻想，以為帝國主義在新基礎上有某種國際聯合的可能，像最近威爾斯(H. G. Wells)建議，以一個「國際的委任統治地制度」來代替所有的殖民地，以一個世界的銀行團、一個聯邦局，來管理世界的生產與貿易。至於官場人士方面，他們所提出的少數建議，如原料分配的國際調查，或一部分委任統治地的重分派，都代表一些試探的意見，使擁有殖民地的列強對於挑戰的列強，給以較小的讓步，以阻止一個較大的攻擊。不過這些建議對於衝突問題的本質，是沒有，也不能有什麼作用的，因為擁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列強，是沒有一個會願意不經過一次鬥爭而即遭受重大的損失的。因此，現在這些到處提出之提議與討論的意義，還不如說是世界新分割問題之極度緊張的一個晴雨表。

這種說法，我們可以拿過去的歷史來證明。在一九一四年大戰的前夜，英德二國會舉行殖民地重分配的談話，幾乎得到成功。一九一三年八月間，英德間議訂一個協定，規

定將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安哥拉 (Angola) 莫三鼻克 (Mozambique) 散托美 (San Thomé) 普林西普 (Principe) 割讓德國。一九一四年七月間，關於計劃中的巴格達 (Bagdad) 鐵道與共同開發美索波達米亞 (Mesopotamia) 問題，英德曾擬訂定一個專約，但這一切努力都不能阻止帝國主義的戰爭於一九一四年的八月間爆發出來。

到了現在，殖民地的重分割，或委任統治地與殖民地原料之一種『較妥適』的分配底舊調，又復重彈起來了。這個舊調是由英國外相霍爾爵士 (Sir Samuel Hoare) 開始彈奏的，他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在日內瓦國聯大會中的演說，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我將以世界的經濟富源及其在未來善為利用之可能性的問題，來做一個例子。原料的豐富供給，對於那些有這些原料的國家，似乎有特別的利益，這樣一種利益的決定性質，是很容易誇大的，因為那些祇有很少或完全沒有豐富的自然富源的國家，也能够以工商業的發展來使他們國家富強，那末已有豐富原料的，當然更加有利益了。』

「不過事實仍然是這樣的：有些國家，不論是在他們的本土，或在他們的殖民地，的確是佔有所謂超越的利益，而有些較吃虧的國家，則以不安的態度來看這個現狀。尤其是關於殖民地的原料，這樣的一種形勢，自然會引起恐懼，怕要形成絕對的獨佔，損及沒有殖民地國家的利益。」

「這問題既然引起不滿與憂慮，那末最聰明的方法，就是去研究它，看用什麼建議去處理它，以及難題的真實範圍是什麼；如果這難題是本質的，那末要設法消除之。英國政府的意見以為這問題與其說是政治的或領土的，倒還不如說是經濟的。獨佔（殖民地基本原料的壟佔）的恐怖，實是引起恐慌的原因。」

「這問題之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是由於希望獲得一種保證，以使原料的分配不受不公平的阻止。我很確切的感覺到，我們應當準備担起我們對於這些問題研究之應盡的一部責任。」

「我的印象是這樣的：在現在的情形下，任何殖民地不願意把它們的原料賣給任何顧客，是沒有這樣問題的。相反，困難的問題是在於他們不能夠以一種有利的價格把原料品賣出去。一九三三年在倫敦開會之貨幣經濟會議（Monetary and Economic Conference）的一個委員會，曾經討論過這一方面的問題。獲得具體的結果，根本主張經過生產與市場的調整，而提高售價

的價格；但這種行動有一條規定，對於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各方，都須公平待遇，不應對於某一特殊國家加以差別的待遇，並且還要儘可能的與輸入國的消費者誠心合作。

『這個先例，可以做我們研究之適當的指示路線。在這個條件中，這研究應限於殖民區域（包括被保護國與委任統治地）的原料。爲供參考起見，我建議我們應當注重於這類原料之自由分配於需要的工業國家，因此一切獨占的恐懼心都可永久消除了。

『我知道我所代表的政府，對於任何集體的企圖，以一種公平的與有效的方法，去處理現時困擾人民及將來更困擾人民的問題，決準備盡他所應負的一部責任。不過這樣的一種研究，很顯然的需要鎮靜的與公平的思慮，而這種鎮靜的與公平的思慮，在戰爭與戰爭的威脅底空氣中是不可能的。（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霍爾外相在國聯大會的演說。）

對於這個現代獨佔主義派意見之最有力的代表作，要阻止我們不作詳細的批評，是很困難的，因爲這演說中的每一句話，都是值得批評的；不過在研討霍爾的特殊建議以前，我們必須對於這些問題的一般研究，先作進一步的檢視。

霍爾的演說正式開始了這問題的討論，不過在半官方面，那時是早已在普遍地討

論這個問題了，這正與意大利的進攻阿比西尼亞的戰爭相適應的。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太晤士報上，就登有駐巴黎通信員的通訊：

「殖民地問題將是歐洲所要遇到的第二個大問題。它是意大利冒險的根本原因，而在德國下一次之要求表的頭上，也可找到。此間如同英國一樣的，有許多思慮周詳的人士，都以爲殖民地分配的改變，遲早是不能避免的，並且以爲如果愈早以坦白的態度去討論事實，則將來的解決也愈容易，所費的代價也愈小。」

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約克主教發佈一篇無線電廣播演說，內中說：

「在有國際聯盟的任何觀念之前，我們就已佔有地球與原料供給的一大部分……要是我們現在對於那些需要向外發展的國家說，「爲了愛與友誼……就不要干涉罷！」我們就犯了極大的偽善病了。假如我們的確相信國際社會的，那末我們必須準備，很明顯的準備開始工作，替那些缺少出路的國家，安排方法，以滿足他們的需要。這問題將爲人類的政治手腕所遇到之最困難的問題。所有貪得無厭者之缺少犧牲的精神，住在有關土地之上之人民的權利，以及其他許多的因素，都

將使這個問題不能解決，除非那些完全以真正的善意來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們，則又當別論。不過我們必須要準備來試試看，而國際聯盟必須是代表公道與法律的。』

一九三五年九月英國職工會大會(Trade Union Congress)通過一個決議案，後來又被工黨大會(Labor Party Conference)採用，這決議案說：

『我們要求不列顛政府慫恿國際聯盟召集一個世界經濟會議，議題中應列入原料供給來源的國際管理，在世界上未發展區域中，對於所有國家，須應用機會平等的原則。』(全國勞工委員會 National Labor Council 的決議，而為一九三五年九月職工會大會與一九三五年十月工黨大會所採用。)

一九三五年十月全國和平委員會(National Peace Council)召集一個討論『和平與殖民地問題』的大會，出席的人各方面都有。沙爾德爵士(Sir Arthur Salter)樂鄉勳爵(Lord Lothian)詹望士博士(Stanley Jevons)以及其他人士等都發表演說，主張重新分配殖民地，以期滿足『不滿足』之帝國主義列強的要求，並主張擴大委任統治制度的範圍。

在一九三五年的九十月間，外交家、基督教徒、和平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以及工黨黨員都突然的討論起殖民地的重分配問題，並替沒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列強德意日本主張「正義」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這答案是太明顯得無容考察了。簡單的說，這答案就在於意大利之準備征服阿比西尼亞的戰爭中，而以日本的挑戰與德國的戰爭準備和殖民地要求為背景。意德日本的坦克車與轟炸機已經在這許多的基督教徒與和平主義的胸懷中，造出這個主張「正義」的熱情了。

但是這個殖民地問題的「正義」觀念過去是一個奇異的見解，現在也仍然如此。和平主義者所有之同情的奔放，都是寄予那些軍備最強的帝國主義列強的，這些強國對於殖民地掠奪物或原料品（這是從殖民地人民之強迫的、血汗的勞動中以血淚剝取來的）的供給，都不會得到適當的滿足。在他們看起來，殖民地人民對帝國主義之剝削者的服從，是神的一種自然的特許。「正義」就存在於掠奪品的重分配中。我們在研究英國全國和平委員會所召集之「和平與殖民地問題」會議的程序與探討重要演

說者的演說，替沒有殖民地之『無的』列強作開明的慈善的同情呼籲時，就不能不回憶起一個小孩子的故事來，這個小孩子在看了一幅『獅子吞食基督教徒』（Christians Thrown to the Lions）的圖畫時，就對那『不曾攪得基督教徒的獅子』（Lion who had not got a Christian）表示十分的同情。

不過在全國和平委員會所召集之『和平與殖民地問題』大會中，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黑人代表在一般討論中的呼聲，華德（Mr. Arnold Ward of Barbados）說：

『依我個人的鄙見，我以為這個會議祇是切望滿足歐洲的國家。而對於殖民地的人民，却沒有注意到。這個會議所絮絮討論的，祇是世界上軍備最強與先進國家間的一種和平，因為在討論殖民地的原料品、移民以及割讓時，這些特殊國家的人民，似乎是完全不知道的。他們對於其國家的割讓，沒有發言權，他們雖然要生產原料品，可是在出賣這些原料品時，是沒有發言地位的。沒有一個人建議，應當向這些特殊國家的居民徵詢意見。我們倒要請問沙爾德爵士，他是否有任何的證據，

足以證明這些黑人沒有能力統治他們自己的。假如他說黑人是沒有能力為不列顛資本家的利益而統治他們自己的，那我一定說他是完全對的，但是如果他說這些黑人沒有能力為他們自己人民的利益而統治他們自己，那我要說他是完全錯了。」

這個演說全沒有為繼起的演說者所注意，不過等到以後所謂著名專家的貢獻全被遺忘後，這個演說就要成為這次大會所遺下的唯一寶物了。同這個為「殖民地問題」之主題的人民底呼聲相應和的，是蘇聯出席日內瓦代表的率直演說，蘇聯代表在一九三五年九月霍爾發表演說的時候說：

「蘇聯政府在原則上是反對殖民地的制度、勢力範圍的政策以及含有帝國主義國目的之任何制度的。」

老實說，殖民地或殖民地利益之和平重分配的討論與建議，是不能得到什麼解決的結果的，因為他們的基礎是錯誤的，因為這些討論與建議，在事實上祇不過是盜賊爭奪贓物的表現，而「在盜賊中間，是沒有什麼廉恥的。」我們如愈詳細討論具體的問題，

則這事的真相是更明顯的表現出來。因為我們即使承認這些『實際的』專家的基礎，即使承認他們所說之帝國主義有剝削殖民地人民之『必要』的基礎，但是他們的建議，對於帝國主義之殖民地利益的對立，究竟貢獻了什麼可能的解決辦法呢？

爲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探究帝國主義爲什麼需要殖民地？關於這問題的答案，在流行的帝國主義的研究中，顯得極端的混亂。我們可把帝國主義任務之『道德的』、『文化的』一派理論丟開不說，因爲帝國主義列強爲着熱情於競爭『道德的』、『文化的』任務，而從事於破壞的戰爭，是說不過去的。在流行的帝國主義者的意見中，我們可以舉出四類主要的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理論。

第一類是『白』種人應該統治他種人的舊式理論，也就是『白人責任』（white man's burden）的理論，這種理論現仍流行於法西斯與反動的國家中，他們拿這來掩護其殖民政策的物質目的；近來雖因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別成功，『黃人』也負起一部的責任，可是在希特勒的演說中，仍然可以找出一個回聲：

『白人是命運注定好要統治他人的，它生來就有一種統治的欲求，……當白種人取消其統治全世界的根基時，那就要失掉統治權了。這個統治實是歐洲政治組織的根基。』（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希特勒在僧城演說）

很明顯的，這個極端混雜的解釋，並不是一種理論，而祇不過是帝國主義稱霸行動的一種表現。其實這種種族的理論，從日本的社會結構也達到獨占資本主義的階段，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迫得它不得不承認與其他帝國主義相同的基礎時候起，早已取消，就是那些倡導的人也不再主張了。

第二類仍然流行之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理論，是『人口過剩』與需要殖民地以做其國內過多人民之『出路』的理論。法西斯主義者，軍國主義者以及帝國主義者，都交互發表演說，悲嘆他們國內人口生產率的降低，而大聲疾呼要用各種的有力方法，增進它人口的增加，同時則又在另一方面指出人口的增加，是需要殖民地以作『無地立足人民』（peoples without space）的出路之無可爭辯的證據。

這個理論之與事實不合，又是非常明顯的。爲帝國主義劇烈競爭的大部殖民地，都是人口稠密，不容多所移植，或不適宜於殖民國人民的居住的。這在英國全國和平委員會之『和平與殖民地問題』大會中，沙爾德爵士已解釋得很明白了：

『我以爲這可以用很強的語氣，來說明殖民地對於世界過剩人口的移植，簡直沒有絲毫的貢獻。……不管十年內日本在滿洲做些什麼工作，滿洲的日本人決不會比日本人口在半年中增加的多。假如意大利征服整個的阿比西尼亞而極力移植人民，但十年內在阿比西尼亞的意人，也比不上意國人口在二個月中所增加的多。再以中央的赤道非洲來說，在二十五年中，所有移植於各殖民地的歐人，也不及意大利人口在一年中所增加的來得多。……』

『在無論什麼地方，除了一個與現存商業經濟制度有關而並爲這制度所引起之人口過剩外，是沒有什麼人口過剩這樣一個東西的。』

沙爾德的話是顯然正確的；但是帝國主義爲什麼需要殖民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於是第二種之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理論就起來了。這就是帝國主義需要殖民地以供

給原料品的理論，現在非常流行。德國國社黨宣傳部長郭培爾 (Goebbels) 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的演說中，就用這些名詞坦白的說：

『我們是一個窮苦的國家。我們沒有殖民地，也沒有原料品。但是我們必需對其他的國家說，我們一定要收回我們的殖民地的時間就要到臨了。……要是不能允許這樣的要求，這於全世界是很危險的，因為砲彈總有一天要爆發出來的。』

這個理論是同事實更进一步的說法，但這也祇更近一步而已，因為它雖視殖民地為工業發達之帝國主義國家的農業腹地，但它仍把殖民地剝削的真正性質掩藏起來。假如殖民地的任務祇是那種農業國家，以原料品去交換殖民國家的工業品，那末又何必需要一種殖民制度來強使這種任務的實行？這種論辯是慣被擁有殖民地列強的代表所用來反駁那些要求殖民地的國家的，而且很見效力，因為他們指出原料品是誰也可以購買的（有時稍有例外），正常的困難問題，倒還是找尋多量的顧客。所以沙爾德爵士在上面所引述過的一次演說中辯論着說：

『困難的問題是什麼呢？困難不在於原料之供給不出產的國家，有一種差別的待遇，原料品是以同等的條件供給任何前來購買的顧客的，即使有一些例外存在，那也是不重要的。而且原料品常有過剩，生產者是極渴望能夠把他們售出的。真正的困難問題，是在於他們的顧客須用外國貨幣購買原料的事實，因為世界貨幣制度的紊亂，以致德意商人要籌得購買外貨所必需的外幣，是很困難的。但是這種困難的發生，是由於那些國家的國內政策所致，而不能以殖民政策來切實解決的。』

這樣說來，殖民地的佔有，對於殖民國家內資本家之獲得原料的供給，是沒有什麼經濟的利益的；原料品之於所有顧主都是『平等的』；唯一的『困難』是從世界經濟恐慌所必然產生的情境中發生的，而與殖民的政策無關。

這些論辯雖然不會說服那些要求殖民地的國家，但却已使擁有殖民地國家的代言人，以及主張殖民地對於占有國家毫無經濟價值之自由主義的理論家，深信無疑，不過因為他們太深信這個論辯了，以致他們無法解釋資本家為什麼要這樣劇烈地爭奪

殖民地的佔有問題。因此，第四類殖民政策的理論出來了，這是新近纔發現的。這個理論以爲殖民地的要求，實在不是一個經濟的問題，而是一個『心理的』問題，一個『威信』(Prestige)的問題。這個觀念，巴恩斯(Leonard Barnes)在『和平與殖民地問題』大會中曾經說過。巴氏以前是不列顛殖民地中的一個官吏，曾做過帝國的責任(The Duty of Empire)一書，他說：

『講到這個不滿足的問題，這大部是一個『威信』的問題。在這範圍內，這是一個『心理的』問題，而需要『心理的』解決。我想沒有一個人知道，殖民地對於宗主國家是否有真實的價值或有多少的價值，但是當我們從威信的觀點，來觀察這個問題時，那就無關重要了。』

同樣的，工黨的機關報每日捷報(Daily Herald)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六日殖民地與和平的社論中說：

『但是什麼是殖民地問題呢？這是經濟的問題，還是心理的問題呢？』

『所有關於人口、原料與貿易出路之經濟的論爭，都是錯誤的，這個見解，無論從理論或事實觀察，』

都是對的。

『這根本不是一個貿易的問題，這是威信的問題，身份的問題，危險的緊張情形不是經濟的，而是心理的。迫切紛亂的根源是自卑的感覺。(sense of inferiority)』

這樣看來，帝國主義之殖民政策的理論，無論是右派的也好，左派的也好，結果都是互相矛盾的。他們的所以自相矛盾，是因為他們不能揭破殖民地剝削的中心事實，因此就創造出一大套的神話，來解釋殖民政策的目的了。在右派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種族的神話或殖民地為過剩人口之出路的神話。這些神話被左派的批評家，批評得一錢不值，他們却另外造出一種神話，說殖民政策是一種『心理的』現象，為欺騙的帝國主義者因『威信』的理由而奉行，絲毫不計利益。同時殖民地的人民，他們自己却很明白的知道帝國主義者為什麼要佔有他們的領土。

金融資本的領袖們，在用他們權力內的各種武器去征服或佔有殖民地的鬥爭中，對於實際利益的注重，事實上是比心理的滿足為更甚的。這些實質的利益是什麼呢？讓

我們先來討論帝國主義的主要對立，即英美的對立，而將德意日三國的特殊問題放在以後再說。下面是一張渥太華會議前，一九三〇年英美二國對世界各主要國家的輸出表：（根據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英國經濟學家週刊）

一九三〇年英美的輸出表

國別	英國的輸出值		美國的輸出值		美國輸出對英國的百分比
	值	百分比	值	百分比	
印度	五二、九四四	(百鎊)	九、〇三九	(百鎊)	一七
愛爾蘭自由邦	三四、四九七		二、七四五		八
澳洲	三一、六七八		一五、一九八		四八
法國	二六、六九〇		四四、七九二		一五〇
加拿大	二九、一三八		一三一、八一九		四五三
德國	二六、八〇九		五五、六五二		二〇七
南非	二六、四六二		七、六一六		二九
阿根廷	二五、二三四		二五、九七二		一〇三

巴 西	日 本	中 國	西 班 牙	埃 及	瑞 典	丹 麥	馬 來 亞	挪 威	意 大 利	比 利 時	新 西 蘭	荷 蘭
七、九七〇	八、二二九	八、五七四	九、三三五	九、八〇八	一〇、〇六八	一〇、二四九	一〇、四七五	一二、九三一	一三、八三五	一五、〇三五	一七、八六七	一八、八六〇
一〇、七六二	三二、九一四	一七、九二一	一一、五〇一	一、七八一	八、九八四	八、〇四九	一、九二〇	四、〇五六	二〇、〇八六	一七、二〇〇	五、九六五	二〇、九八三
一三四	四〇〇	二〇九	一二四	一八	九〇	七九	一八	三一	一四六	一一五	三三	一一一

蘇聯	六、七二	二二、二七二	三三〇
尼其里亞	六、四八〇	七八六	一一
智利	五、九六三	九、二七五	一五五

這張表說明些什麼呢？假如我們放開英美的二個隣國，即愛爾蘭與加拿大的特別情形不說，那末我們可以發見下列的現象：英國的輸出，在印度澳洲南非新西蘭埃及馬來亞尼其里亞及斯堪的那維亞三個國家中佔着優勢，而美國的輸出，則在法德比意荷蘭西班牙中國日本巴西智利阿根廷與蘇聯等國佔優勢。

這二條貿易優勢的陣線，很足夠表明經濟力較強的美國，已於一九三〇年把英國在世界上所有主要國家中的優勢權排擠出去了。除了不列顛帝國的領土與斯堪的那維亞三個國家以外（這三個國家與英國相隔極近，前任殖民大臣愛米萊 Amery曾建議這三個國家應同不列顛帝國聯合起來。）

假如我們再作進一步的考察，則事實更爲明顯。現在英國仍佔優勢而美國的輸出

值不達英國百分之二十的，是那些國家呢？這一共有四個，即印度、埃及、尼其里亞與馬來亞。是。換句話說，這四個國家在上表中代表不獨立的、專制統治的帝國或真正的殖民制度。

這非單純地為一個關稅與特惠稅制的問題。主權國在其殖民地中的利益，不僅僅依賴於這樣直接的方法上，這我們只要考察一下中非洲殖民地的地位，就可以明白。中非洲殖民地因剛果流域條約（Congo Basin Treaty）與英法公約（Anglo-French Convention）關係，仍大部奉行『門戶開放』原則而摺棄特惠關稅。巴恩斯在其殖民地的未來（The Future of Colony）一書中，關於這些殖民地的形勢，曾舉出幾個有趣的統計表：

一九三三年尼其里亞對各國之輸出口表

輸入百分比

輸出百分比

英國

六七

三七

德國	八	一六
意國	三	四

一九三二年比屬剛果對各國之輸出入表

比利時	四六	七六
-----	----	----

英國	一一	〇・〇九
德國	七	一・六
意大利	〇・八	〇・一

一九三〇年法屬西非對各國之輸入表

法國	四七・三
英國	一五・八
德國	七・六

輸入百分比

輸出百分比

巴恩斯從這個研究中下着結論說：「單單不施行差別的稅則，顯然不能建立有效的平等的事實上，宗主國無論在殖民地或委任統治區域中，總是佔着優勢的，即使『門戶開放』的原則仍然有效，也沒有用。」

換句話說，普遍的『門戶開放』原則，不是解決的辦法。這種原則是改良派所提出來解決殖民地問題的，如英國工黨所通過的決議，『在世界未開發的區域中，所有國家應該機會均等，』就是顯例。在某特定殖民地中獲取經濟利益的主要問題，還是握有那個殖民地的『主權，』（這些殖民地是否委任統治地的形式，都無關係，）除了這個以外，是沒有解決這問題的和乎方法了。

我們單考察殖民地佔有之市場的一面，就可以說殖民地問題祇是一個獨佔市場的問題嗎？這是絕對不是的。市場祇不過是殖民地問題的一面，而且在實際上也不能同其他的各面分離開來的。殖民地市場的占有，還備有一種購買所需要之殖民地原料的方便，（沒有這種方便，非殖民國家也有購買原料的『平等，』就沒有什麼價值了；）這

二者又是同資本的輸出相關聯的；而這一切，最後則都建立於剝削殖民地工農的特殊條件上。

殖民地的佔有，對於殖民國金融資本家的利益，如把它分離開來，祇認作一個輸出商品的市場，一個輸出資本的市場，一個獨占原料的來源地，或者一個以剝削方法獲得超利潤的泉源，那是不完全真確的，因為帝國主義下的現代殖民地制度，事實上是有這些因素之『單一的綜合』(a single complex)沒有這個，殖民制度就要崩潰了，而這整個『綜合』的樞軸，則為殖民國家握有殖民地的主權與軍事的佔領。

殖民地與帝國主義關係的本質，是不平等。殖民地的人民被帝國主義者用一大串的方法，如剝奪土地權，茅屋稅，人頭稅等，去強迫他們工作，並生產低價的原料品，這種價格祇可使他們生活在饑餓線上。而輸到殖民地去的商品，則價格非常之高。所以這是一種不平等的交換，事實上是用武力維持的，對於統治國家的資本家當然給以高度的超利潤。除了這不平等的交換外，還加上直接的資本輸出。

帝國主義列強之剝奪殖民地的要求，就是因為他們對於殖民地之特權地位的關係，與殖民地剝削中所得的超利潤。當他們在這魔力圈外的時候，而向他們解釋說，他們有完全的『平等』去向獨佔者以獨佔價格（不是付給殖民地中生產者與農的價格）購買原料品，這是毫無用處的。假如他們必須依照國際錫礦專賣公司（International Tin Monopoly 在英國殖民地統治下）或國際橡皮調整委員會（International Rubber Regulation Committee 為英荷所霸持）的價格購買原料，那末霍爾雖說過對於他們並無『差別的待遇』，同時他們祇要付出與其他顧客相同的價格就可購買原料，但事實並不能使他們分沾到一些殖民地剝削之掠奪物的餘惠。

敵對的帝國主義列強間之殖民地占有的鬥爭，是一種統治的獨佔的鬥爭，這就是說，要握有殖民地的主權。這不能由調整條例、國際協定、委任統治制度、『門戶開放』公約或甚至霍爾所建議之『研究』所解決的。這我們可以舉出許多的事實來。例如不列顛帝國主義自從一九〇二年以後，即竭力要把它從美國棉花的獨佔下解放出來，

而組織帝國棉花生產會 (Empire Cotton Growing Association) 以很大的補助金與大規模的建築工程，去發展蘇丹 印度 肯耶 (Kenya) 烏根大 (Uganda) 與伊拉克的棉花生產，以致到一九三三年美國總統不得不支出津貼金，叫棉花種植者去鏟除其沒有銷場的棉花收穫，而不列顛則仍支出補助金把辛德 (Sind) 荒地變成棉花種植場。又如不列顛帝國主義到處派出代理人去採掘煤油，以脫離美國煤油的獨占，分裂土耳其帝國，統治波斯，創立伊拉克新興國，挑起墨西哥的內戰，直到今天與它對敵的煤油獨占勢力已散佈於全球各地。再如美國帝國主義極力要脫離英國對於橡皮的獨占，而支出數百萬的金錢去發展南美「殖民地」之橡皮種植。這些事實的原因是什麼呢？答案是很顯明的，這就是獨占者鬥爭的表現。而在這個鬥爭中，殖民地的佔有或半殖民地國家之為獨占強國的勢力範圍，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樣的情境下，主要的獨占帝國代言人霍爾之類所提供之「沒有獨占的恐懼」與建議「研究」的巧滑保證，是沒有什麼用處的。當殖民地（無論是委任統治地或其

他的形式)的主權,也就是實在所有權與殖民地剝削利潤之有效的統治權,握在殖民帝國的手中時,所有殖民地原料、市場等之『公正的』、『國際的』、『平等享有』的善意建議,都是不能解除真正的糾紛的。所以占有的與挑戰的帝國主義列強間爲爭奪殖民地占有的鬥爭,是不能避免的。

上面所說的建議,既然沒用,那末把特殊殖民地從現在的主權國脫離,而讓給德意之殖民地或委任統治地之直接的『重分配』的建議如何呢?在小的案件中,特別是關於較弱殖民國家的殖民地,這種在大國的家畜市場中交換殖民地人民的建議,並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一九一四年戰爭前,英國會想把其屬國葡萄牙的殖民地大度地獻予德國,以遏止德國的挑戰;同樣的,英國在一九二五年也想以朱巴蘭(Jubaland)的讓渡,去安慰意大利的失望。在將來,葡萄牙的殖民地也許會再被用來作這樣的買賣的。不過這種提供的讓步,同殖民地整個的掠奪物比較起來,那不管是小巫見大巫;這種讓步也許可稍稍延緩衝突的爆發,但結果,祇不過是對挑戰國家的開胃物,而不是解決實際

對立的辦法。

總之，要和平地重分現在的殖民帝國而不發生戰爭，是不可能的，甚至不重要的讓步建議，也會引起嚴重的反對。這我們從太晤士報對霍爾建議之非正式的評論中，就很明顯的看出來，該報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的社論殖民地的事實與謬說（Colonial Facts and Fallacies）中說：

『共同的出發點，自然是不列顛的殖民地為帝國領土完全無缺的部分，並為忠誠、驕視和自利的連鎖與帝國聯在一起。這些殖民地不是買賣的對象，也不是雜題的一部，可以為了政治的目的而從這個主人移轉到另一個主人的。』

同樣的，一九三六年二月六日每日電聞（Daily Telegraph）也發表一篇委任統治地改變的危險（Mandate Revision Dangers）的社論，糾正霍爾的錯誤見解：

『霍爾所說之完全錯誤的觀念，不久即將表面化，而在某一部分中，這種希望甚至被人鼓勵着說，英國已經準備考慮劃分其殖民帝國的問題。假如這樣的佈告發表出去後，應徵的人一定是很多的。』

爲答復這散播很廣的輿論起見，英國的殖民部長湯麥斯（J.H. Thomas）就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日在議會中給了一個保證：

『英國政府在過去不會考慮過，把它任何一處的殖民地或委任統治下的土地出讓給人，現在也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這個明顯的否認，事實上是祇限於過去的，而對於政府的未來意向，則未提及。這個否認的後果却爲財政部長尼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於一九三六年四月六日在下院中的演說所打破了：

『殖民地與委任統治地有一個很明顯的不同。就我所知，沒有一個人已請求或建議過，不列顛帝國應當放棄他任何一處的殖民地，假如有這樣的要求提出，也不會立時予以考慮採納，這是不用我說的。委任統治地不是殖民地，他們的種類是有些不同的，在通俗的意義上，他們祇是不列顛帝國的部分……』

『要使一個委任統治地的轉移發生實效，那末至少須得到受任統治國，將接受委任的統治國以及國聯行政院三方面的同意……』

『至於將來的清勢如何，我想要我担保未來政府的行動，是不合理的，不過我可以說，無論如何委任統治地不儘英國一國保有。我不能預想任何政府，會不顧別國委任統治地的如何處置而討論它的委任統治地的轉移問題。並且我還可以說，我們承認我們對於居留這些土地內的人民，負有確切的責任，即使是爲了達到我們所切望之一般和平解決的目的，我們也不想放棄這些責任，或把領土移交任何的國家，除非是住居這些領土內之所有各部的人民之利益，都已受到爲我們所認爲滿意的完全保障。』

從這些以及其後的演辭中，我們很明顯地看出，在英德的一般談判中，不列顛國民政府已正在事實上考慮把委任統治地的土地移交給納粹的德國了。

這個就可表明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衝突與戰爭的醞釀能完全解決嗎？這是完全相反的。德國前屬殖民地的割讓，同危險的問題比較起來，祇是一種蚤咬，無關重要，祇對於英國國民政府與希特勒的合作上有一些意義罷了。納粹德國向外發展之最迫切的目的，是在歐洲，現在如能重得委任統治地以增強其戰爭的資源與準備，那麼向外發

展的目的，當更堅強。假如這些在歐洲擴展的目的允其成功，則它的最後目的必會從委任統治地擴展開來，而不可避免的要在最後時期中轉而反攻不列顛帝國，關於這點，許多有遠大眼光之英帝國主義的領袖們已經開始承認了。以委任統治地割讓給納粹德國的問題，現在雖正在英國國民政府的考慮中，而將大有助於德國。但是對於最後問題的解決，並不見得比一九一三年把葡萄牙殖民地讓給德國的條約為有實效。

總之，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下，世界新分割的鬥爭，已站在帝國主義的面前，而沒有辦法解決了。

第七章 世界主要的衝突區域

「大戰以後，我會以大部分的時間注意於國際政治，我不想自稱為悲觀主義者，但我要說，我常常覺得自己是置身於瘋人院中。」（一九三五年四月八日鮑爾溫在威爾斯自由教會全國會議中的演說）

爲了重分領土和勢力範圍的集合的鬥爭，在世界的每個角落裏進行着。

站在最前線的就有三個挑釁的列強：日本在遠東，德國在歐洲，和意大利在北非乃至近東。

但在他們的後面，又展露着擁有殖民地的主要帝國主義列強的基本對立——英美的對立和英法的對立。正由於這種擁有殖民地的主要列強的分裂及其各自有着特殊的爭執目標，這纔給予了侵略的擴展勢力以公然活躍的機會。

日本在遠東的加速躍進，是利用了英美對立的背景。德國的擴展及撕毀凡爾賽和羅加諾兩約，意大利在非洲的侵略，則都是利用着英法對立的背景而進行。

那動的製造戰爭的勢力，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在今日趨向戰爭的國際情勢中，實佔據了最前線；因此，對於他們力量加以精確的估計，正跟密切地注意那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英、美、法）其任務是一樣的必要。

還有，在這一切的背後，橫斷着轉移各列強間關係的，是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敵視。這種敵視，今日正爲法西斯侵略的列強所領導所嘶聲疾呼，特別是德國和日本，而同時也得到英國統治階級以及其他國家統治階級中一部分的支持。跟這相反的，則是蘇聯的抗拒力量 and 一切反對目前戰爭的分子相聯結，組成了一個全世界集體安全與和平的聯合陣線，以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威脅。

所有這些的力量都是休戚相關的。深刻的英美對立，表現於全世界的經濟範圍上，軍事範圍上，特別是在遠東，自治殖民地和南美，雖然還不致成爲目前戰爭的威脅，但是

它的影響，對於一切帝國主義間的關係，却具有重要的關鍵。眼前戰爭的迫切威脅是因日本在遠東和德國在歐洲的挑戰所引起，他們更以進攻蘇聯為共同目標而密切地聯繫着，一九三六年德日軍事同盟就是明證。關於帝國主義對蘇聯挑戰的特殊情形，我們將在下一章中作較詳盡的敘述；而在本章中，則特別注意於帝國主義列強間的鬥爭。

錯綜複雜的關係，已使任何堅固的區域條約成爲廢紙了。我們必須對列強間各種勢力在主要衝突地點上的關係和情勢，以及未來戰爭的地方來簡略地檢視一下。

一 日英美在遠東

當帝國主義新分割的鬥爭蔓延到全世界，兩個主要衝突的地點就劃分了出來。第一是遠東的錯綜複雜的矛盾，集中於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英、美、日三國間的鬥爭，帝國主義對蘇聯的仇視以及帝國主義對殖民地革命的鎮壓。第二是以法西斯修約派在歐洲的挑釁爲中心，最先爲納粹的德國所發動，繼之以意大利，它的鋒芒且超越了

歐洲而及於北非和近東。英帝國主義對於兩方面的戰爭情勢兼有着深切的關係，這就是她的特殊地位和進退兩難的地方。

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在遠東侵略的挑釁，展開了一個緊接穩定時期的新的戰爭階段。日本開始採取了帝國主義斷然的手段，以謀武力重分世界。這種擴大的挑釁現在已毫無阻礙地繼續了五年，範圍和目標日見增大；祇是，至今還未達到它的頂點。經了五年的征服，日本現在已把『滿洲國』、『熱河』、『內蒙古』以及華北諸省置於她直接的軍事控制之下，面積要比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合攏來的總面積還大，而人口則幾達一萬萬；它更企圖直接控制中國政府和中國的全部。在『滿洲國』邊境，它以威脅外蒙古向着蘇聯挑戰；軍部的終極的目標是在於囊括東亞以至最後把英國、法國和美國逐出遠東。

一九三一年以後的遠東局勢，完全為日本擴大侵略所主宰。那末，促進日本侵略的動因又是什麼呢？日本侵略的本身反映着二部分重要的原因。第一是日本內部的情形：

加深的經濟恐慌和現行統治集團的階級矛盾，新興的農業危機和革命的騷動，以及統治的軍人法西斯分子想竭力以戰爭和侵略的冒險來尋求解決的途徑。第二是外部的形勢，在遠東國際矛盾極端緊張之下，在中國革命和反革命勢力極端分化之下，給予了日本以活躍的機會。日本侵略之能夠達到現在的強度，實際上是基於英美的矛盾，基於帝國主義對蘇聯的矛盾，以及基於帝國主義列強和中國反革命勢力鎮壓民族革命鬥爭的共同利益。直到目前為止，日本征服戰爭成功的要訣，完全是在於巧妙地利用了這些矛盾，特別是英美的分化。而促成日本躍進到最近階段的主要力量，却還是英國的政策。雖然這種政策運用的結果已使英帝國主義傷促不安，而陷於極端猶豫的窮途。這就是日本侵略的國際背景，其影響於目前世界情勢是非常重大的。

自從一九三一年日本開始侵略以後，遠東一切現行的關係和均勢都給投入熔爐中了。遠東更明顯地成了世界政治的重心。任何把遠東從整個世界政治分離的企圖，必有造成幻象的危險，而另一方面，更將低估了納粹侵略的重要性，納粹侵略是可能成爲

目前暴亂的中心和第二次大戰的起點。在最近時期中，遠東是站在世界帝國主義最後劇烈決戰和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地點，那是絲毫沒有疑問的。

●自從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就已經有許多觀察者認為遠東是注定的世界矛盾的主要焦點。當二十世紀初，美國國務卿漢約翰(John Hay)曾申說了這種見解：『世界動亂的中心已轉移到……中國了。誰要明瞭這個偉大的帝國，對於未來五世紀的世界政治，也就有了門徑了。』(漢約翰，1898—1905美國國務卿，引見蒙恩帝國主義與世界政治，紐約一九二八版，P. 321)

當一九二一年，英德矛盾快將清算時，英帝國主義的領袖政治家斯麥茲將軍也曾發表同樣的意見，以為世界政治的中心，從此後必將移到太平洋：『我國的傾向還是以為歐洲舞台是頂頂的重要。這已不復是如此了……這些實際上已不復是第一等重要的事情……無疑地背景已從歐洲移到太平洋了。就我想來，太平洋問題實是未坐五十多年中的世界問題。』(斯麥茲將軍在一九二一年帝國會議中的演講詞。)這個解說反映着一九二一年的形勢，當時在戰後第一時期中，英美的矛盾正是非常的尖銳。事實上，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使遠東局勢安定了十年。但由於一九三一年日本的啓釐，這安定的局勢崩潰後，遠東的爭端就達到了現在緊張的階段，主宰着——跟納粹在歐洲挑戰密切聯繫着——整個世界政治的形勢。

遠東之所以成爲現階段世界矛盾的主要中心，那是不能避免地隨着太平洋區域中各種勢力的關係而造成的。

第一、對於世界重要利益的新分割以及對於四萬五千萬中國人民整個的征服，成了帝國主義列強霸佔遠東的目標，而最後要達到控制太平洋的野心，尤須超越了中國，囊括東亞，以至於東印度羣島、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

第二、世界四大帝國主義列強——英、美、日以及次要的法國——在這裏因殖民地勢力範圍的鄰接，以及擴展的目標的衝突，而直接相對立；爲了反對英國在這區域中繼續的獨霸，日本的擴展現在正積極地進行着，而美國也正在急切準備最後的決戰。

第三、跟現在帝國主義的爭霸和擴展計劃相反，那殖民地民族解放的鬥爭也以這裏爲中心：三十年來迅速地發展着的中國民族的革命鬥爭，就是全世界殖民地解放鬥爭的領袖和先鋒。

第四、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二大世界的體系，在這裏有着它們主要的決鬥點。日本

的向外擴展，在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反動勢力支持之下，不斷地向着蘇聯施行壓迫，而日本軍事法西斯的有力分子又公然盡力挑撥戰爭。

這區域內的矛盾是深刻的。太平洋沿岸的人口數為十萬萬，約達全世界人口之半。但是帝國主義的壁壘造成了一種土地和人口分配極端不平均的形勢。主要地帶的人口密度是這樣的（每方哩）。

澳大利亞.....	二·二
加拿大.....	三·〇
美國.....	四一·三
暹羅.....	五九·七
印度支那.....	七五·〇
馬來亞.....	八一·八
中國.....	一〇四·三
日本.....	三四九·四

爪哇……………六七八·〇

(參考斐爾特 V. F. Field 編太平洋區域經濟手冊，太平洋關係研究會出版，紐約，一九三四。)

加拿大擁有三百六十萬方哩的面積，人口只在一千一百萬以下。美國擁了較小的面積（雖然可墾種的地域很大），却有人口一萬二千六百萬。澳大利亞以三百萬方哩的面積，所住人口不到七百萬。在新西蘭十萬四千方哩的面積中，所住人口只有一百五十萬。東亞人口的擁擠密集，却恰跟這相反：日本七千萬，中國四萬五千萬，爪哇四千萬，印度三萬六千萬。土地合理分配的障礙，完全為武裝列強違反了大多數人民的意志而維持着，因為資本主義的條件是決不能做到普遍利益的。霸佔太平洋的目標不僅是中國和東亞，並且還有不列顛的自治領。

因帝國主義列強間領土分配的非常不平均，結果引起了擴展的列強對現狀不斷的挑釁，這樣全區域中土地和人口分配不相稱的情勢也就更形深刻化了。英帝國主義以前原曾獨霸遠東、中國和太平洋，至今還是擁有最大殖民地、利益和勢力範圍的惟一

強國，在這種情勢下，日美帝國主義的突飛猛進以及民族解放運動的風起雲湧，使它感着日益增劇的恐慌。英國至今是在遠東擁有殖民地的主要強國，但在它戰略上的力量，却已不復跟其所領有的土地相稱了。事實上，它已無力在太平洋中維持強大的海軍來保護它的屬地及其在中國原有的特權地位，這就使英帝國主義面對了進退兩難的窮境。我們從著名海軍專家白華脫（H. C. Bywater）的言詞中可以證明：

『新加坡根據地已失去它許多原有的重要性了。從軍略上講，它的價值無異等於一座半途裏的屋子。香港，我們在遠東唯一另外的要港，又沒有現代的國防設備，最近二十年來，由於條約的限制，它始終維持着現狀。說我們是勉強地管轄着香港也不為過言。不過，話雖如此，實在情形卻是在於我們目前還沒有好好的準備保衛我們在太平洋廣大的無價的利益……日本的代言人曾公開的宣說，無論英國和美國，是再不能以武力來保護它在西太平洋的領土了。』（白華脫，太平洋的海軍力序言，一九三四版，頁一七——一八）

這個說明忽略了現在事實上已經積極進行的加速準備。但其估計的真實，對於太

平洋上現行各種勢力的關係，對於不亞於美國的英國政策上必然引起的問題，却是非常重要的。

到十九世紀終了爲止，英國在遠東始終握着無敵的獨霸地位。自鴉片戰爭以後，它獲得了中國大部份的利益。香港在英國手中成了軍略上重要的根據地，和進口貨物主要的集散口岸；上海因爲公共租界是在英國的統治之下，也成了商業工業開拓的中心，和貿易金融機關的大本營。中國的貿易（一九一三年，中國進口的貨物，幾乎有一半是從英國或經由香港輸入的，五分之一從日本，不到十六分之一從美國）資本的輸出，銀行和金融，鐵路的管制以及工業上的外資，大部份是在英國的手中。中國被降到了次殖民地的地位，在對立的帝國主義列強間被劃成了許多拓展的範圍，而以大英帝國執其牛耳。

但從二十世紀開始以後，英國的地位就不斷的受着挑釁。敵對的各帝國主義列強的擴展要求，特別是美國、帝俄、和德國，使他們自己都開始奮揚其國威了。一八九八年，美

國以征服菲律賓建立了它的軍事根據地。一八九九年，美帝國主義發動了它第一次的挑戰，國務卿漢約翰提出聲明書，要求承認對中國門戶開放的原則。其他的帝國主義列強也都磨刀霍霍地準備鬥爭。在一八九八年，德國租借了膠州灣，俄國租借了旅順口，法國租借了廣州灣，英國也急起租借了威海衛，這一切的租借地都是準備作海軍根據地之用的。同時，德帝國主義一往無前的挑戰也間接地影響了遠東的均勢。因一九〇〇年德國的新海軍法公然地針對着英國的優勢，英國必須把它海軍的力量集中於北海，它就不能單只在太平洋維持其霸權。這樣一來，英國在遠東軍事上的地位從此大為削弱，而同時，其他的列強又都趁機活躍起來。

在這樣情勢下，英國乃轉而另覓一條解決的途徑，這在以後整個時期中是有很大的影響的。英國跟當時還是二等強國的日本締結了同盟，以作它在遠東的夥伴。同盟的第一步是一八九四年英日協定的成立。英國創建了、資助了、訓練了日本的海軍。在一八九四年英日協定成立後的二星期中，日本就對中國發動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第一

次戰爭。戰爭結果日本完成了朝鮮對中國的分離（不久後即歸併）和遼東半島的租借，但經俄國、德國和法國（英國不在內）的聯合反對，終於強迫日本歸還了征服品。一九〇二年接着有英日條約的締結，正同一八九四年英日協定開了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和日本歸併朝鮮的先路一樣，一九〇二年的英日條約實開了日俄戰爭（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和日本征服旅順、遼東半島以及南滿的先路。一九〇五年的第二次英日條約更加强了第一次條款的力量，如日本幫助英國維持對印度的統治，同時還包括了任何簽約國與其他任何列強開戰時，簽約國之一有互助的義務，這所謂任何列強，指的當然是美國。

這樣，直到世界大戰的二十年中，日本在大英帝國的保護之下繼續擴展着。而大戰限制了歐洲帝國主義列強向其他任何方向發展的可能，日本攫住了這個機會，懷着它獨占霸權的更進一步的野心企圖，向前直進；它在一九一五年向中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中，展露了奴屬中國的全部計畫，同時並佔據了山東、福建、東三省、內蒙古以及在

反布爾什維克的煙幕之下）東西伯利亞。

然而日帝國主義這種野心的嘗試終究是未成熟的。當大戰結束時，帝國主義的力量正達到了勝過其他列強的高峯，它便出來說話了。日本雖然有英國的支持，但終於遭美國的壓迫，先後在巴黎會議中，和華盛頓會議中，部分的乃至全部的歸還了征服品。日本在巴黎保持了山東，在華盛頓却被迫交還。英日同盟因美國要求的壓迫而正式解了體。英國被迫接受了對美主力艦平等的原則。中國領土的完整定了保障，而門戶開放也正式得了九國公約的同意。太平洋中炮台和新海軍根據地的建立，在劃定的一個很大範圍中是禁止的。這樣便不致使三國的艦隊發生大衝突。十年以來，美國竭力的維持它在太平洋的和平，因為這和平原是跟它商業和金融的擴展利益是息息相關的。

在維持現狀（Status quo）的基礎之上，敵對的列強依照現行勢力範圍向中國民族聯合進取着。這樣，遠東一個安定的時期便告奠定了。在一九一三到一九二五年間，美國對華的輸入從百分之六升到百分之十五，而英國和香港的輸入，却從百分之四六降

到百分之二八了。

帝國主義列強的局部合作，因中國革命的進展而加強。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間，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從其根據地廣州出發，席捲了中國的大部，打敗了那受帝國主義津貼的軍閥，而以一九二七年春天的佔領上海，完成了中國國民革命的統一。

但帝國主義的對立，依然在安定時期中加深着。英日同盟雖已正式解體，實際上英日合作却仍繼續着。英國和日本是始終不甘受華盛頓條約的束縛的。英國的海軍專家白華脫說：「自一九二一年來，美國總是多方企圖控制英國的海軍政策，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海軍的檢視 A Searchlight on the Navy 頁一五九）在一九三四年版的同書中，他繼續論及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約，這海約就是把華盛頓海約延長五年並擴大其範圍的：

「幸而這海約就要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滿期了。滿期以後一切令其繼續生效的提議，

無論出於怎樣的立場，都應予以堅決的拒絕。考實說，這條約已使英國的海軍力受了一個致命的打擊了。」（白華脫海軍的檢視，一九三四年版，頁二十七。）

那海約沒有繼續生效。日本於一九三四年通告廢棄，並且因為它平等的要求遭了拒絕，乃又退出一九三六年的海軍會議。一九三六年英法美的倫敦海約，只是一種『冒充貨』，包括了『質』的限制和造艦程序的相互通知，但卻沒有『量』的限制。舊日一定總噸數的海軍限制，維持了十五年，就在一九三六年底告終了。英國政府已宣布丁它重整海軍的程序，大批的新主力艦就將在舊約滿期次天的一九三七年着手建造了。

自從華盛頓條約以來，英國和日本的政治家自始至終不曾錯過重申舊好的機會。雖然英日條約已經正式廢棄，它的『精神』却依然不變。最足為代表的當是一九二五年日本駐英大使林男爵留別宴中一席有力的演說。約克公爵（The Duke of York）在論及英日同盟後這樣說：

『縱然世界的公意反對軍事同盟，反對我們與日本的聯盟擴充為一個包括太平洋利益有關的

主要國家的公約，以維持世界這一部分的和平，但英日的友誼却仍是遠東和平所賴的基礎。（約克公爵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演詞，見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太晤士報）

英國外長接着作更明確的引伸：

「同盟雖已放棄而求更廣泛的諒解，操制同盟的感情今日却仍不減於簽約的時候。我希望日本不僅在表面上，而且在精神上都應該承認英國的忠實。」（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奧斯汀·張伯倫的演說，見同年七月一日太晤士報）

一九二八年太晤士報的東京通信同樣報告說：

「我們必須指出，雖然英日條約已歸併於一九二二年在華盛頓簽訂的更廣泛的條約中了，但它的精神却依然存在，正如兩國政治家所一再申說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太晤士報通信）

近如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廣田在解釋日本外交政策時說「英日合作」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太晤士報（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注釋說：「他似乎不僅想着

友誼關係的延續呢。」

這樣，英日合作起於一八九四年，以正式條約的形式存在到一九二一年，而事實上毫不變更的繼續到一九三一年新時期的開始。這種英日合作，事實上也就是基本的英美對立的一部，對於在遠東至今的一貫發展，實是根本重要的。但從一九三一年開展的新形勢，却又產生了新的問題。

隨着安定時期的崩潰，爭霸遠東的武裝衝突又重行開始了。世界經濟危機削弱了美帝國主義的勢力，並使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無力應付他們內部的困難，正當這時候，日本突在一九三一年拔出了拳頭開始向滿洲侵略，在以後幾年中，更把範圍擴充到華北諸省，並要求統制中國政府及其政策。當一九三一——三二年之間，日本征服了滿洲，一九三二年建立了滿洲傀儡國，同時又發動了對上海的武力進攻。一九三三年，日本把征服的範圍擴展到熱河，並退出國際聯盟。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以軍部正式的公文宣告「九國公約」是廢棄了，美國和歐洲諸國不明瞭遠東的實際情形，不應當管中國的

事情；而外務省的聲明並宣布中國爲日本的保護國：

『爲維持東亞的和平與秩序，我們必須單獨負起我們自己的責任……而在地位上足以與日本分負維持東亞和平責任的，除了中國以外，就沒有第二個……列強各國假名技術上或財政上互助的任何聯合的行動，都必然牽及政治的意義……日本是必須在原則上反對這種企圖的。』（日本外務省公告，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太陽報）

日本駐華盛頓大使更對這次公告的原則加以引伸：

『日本必須單獨斷行何者於中國爲有利……商人在去中國經商之前先來跟東京商議，一定會覺得方便多了。』（日駐美大使齋藤對華盛頓星報記者談話，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太陽報）

在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間，日本把她的征服範圍擴充到內蒙古和華北，在她的統治之下組織傀儡的政治組織，一面向外蒙古挑戰，一面又對着西北的共產黨。到一九三六年，在法西斯軍人暗殺元老重臣（因爲他們批評軍部的極端政策）的政變之後成立的廣田內閣，宣布了日本對華三原則的程序（其實，這在一九三五年與南京

政府談判時已經提出了。(一)中日合作防共。(二)中國除得日本之允許及在日本之統制下外，不得與其他各國發生關係。(三)中日「滿」組成單一的經濟集團。

對於日本這種獨霸中國和遠東的擴大侵略，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態度究竟怎樣呢？

在侵略的早期中，日本是曾經受過英國和法國的有力支持的。英國之所以支持日本，不僅是爲了拉攏日本去一致對美，同時還把它當做遠東鎮壓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以及最後反蘇聯的最強武力。美國會一再籲請英國共同合作，去反對公然撕毀華盛頓九國公約的暴行，可是都給拒絕了。（當時太晤士報的華盛頓通信便是充分的證據，這後來英國是想竭力辯護掩飾的。）西門（John Simon）往日內瓦替日本做了特別辯護人，並且竭力反對美國務卿斯汀生（Stimson）的蒞臨，當時斯汀生爲了促成國聯和美國合作，也在日內瓦。國聯對公然破壞盟約行動的緘默，以及反對美國合作的呼籲，都是由英國爲其支持着。國聯滿洲調查團主席李頓爵士（Lord Lytton）說得好：

『美國一再的呼籲，都不曾得到答覆，我國政府之不能為斯汀生君の後盾也許是它一切錯誤中最可痛惜的一種了。』

同樣地，樂鄉勳爵士對英國之拒絕與美國合作也曾提出具體的分析：

『我常常想，當時英國政策之錯誤，是在於拒絕了斯汀生君的要求與我們共同合作維護太平洋集體安全制的呼籲，因為這實一改其一九二〇年以來的孤立主義。我們不能在一九三二年實踐華盛頓條約的精神和義務，又驅使美國歸復於孤立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樂鄉勳爵士演說，見國際事件，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月號）

這段插話對於英美關係的全部發展，實是非凡之重要的。

甚至那一九三四年『不干涉中國』（Hands off China）的宣言，在美國引起了深切的憤慨，但英國官方却很平靜的接受了。美國當即發出重申九國公約和反對任何列強片面廢約的正式聲明。同為九國公約簽字國的英國政府，却並不參加這次的聲明。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外長西門在衆院中被質問英國的態度時回答說：『英國政府對於這個特殊問題是不願與問的。』

英國保守黨和半官的論調都公然支持日本，把它認為鎮壓中國民族運動，反蘇聯以及反美國的先鋒。這觀於巴恩壁爵士 (Lord Bannockburn) 領導下的英國工業協會調查團派遣到『滿洲國』和東京去，就可得到一個有力的證明。該團的主要團員而兼銀行家塞利格曼 (Charles Seligman) 在對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的訪問中這樣說：

『我可以說，實際上每個有思想的英國人，都是同意恢復英日同盟的。』

在經濟時報 (Financial Times) 中，有一篇題叫英國發現了滿洲國 (因國聯決議的限定，英國沒有承認『滿洲國』) 的論文，其中有一段說：

『多數負責的意見，都以為這調查團是政府所贊助的，以為這是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的第一步，並且以為這樣的承認，也許可以恢復一九二一年以前英日間密切的關係。』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經濟時報)

但在這條路線上，却是注定了有着困難的。英國工業協會調查團的經驗就並不樂觀。很明顯的，『滿洲國』絕對排斥着一切非日本貨，包括英國貨在內。日本的經濟侵入，

特別是紡織品，深刻地妨礙了英國在遠東、印度以及全世界市場的利益。尖銳的貿易戰正在英日之間發展着；英國已開始令其殖民地盡力負責抵制日貨了。同時，日本目標之並不限於華北，以及對英國利益的不顧，也日益顯然。誠有如一九三四年的公開宣言所說：它是正在向着獨霸全中國的方向進展呢。

英國的對日合作派，事實上完全是以某種打算為根據。他們深信日本可以當英國在遠東的警犬，而仍無害於英國自己的殖民地和利益，換句話說，可以把地域劃分成若干適當的範圍，這樣，日本儘可在華北進行其擴展，而英國則仍在華中和華南維持霸權。或者說，日本進一步的擴展野心，儘可移對於蘇聯。可是日本，正跟希特勒一樣，借了準備反蘇聯的口實，以博得英國對其政策的支持，事實上，日本却早已決定在全中國建立它自己獨佔的霸權，而決不替英國做工具的了。希特勒在英國反動派前面自命為反布爾什維克的先鋒，不但是為了反蘇聯的根本戰爭，同時還為了進行他獨霸中歐的急切慾望，同樣地，日本也利用了英國反動派對蘇聯的仇恨，以堅決地進行它對中國的宰制。

雖然英國和日本儘能共同合作，但以傾軋的增長，到了現在，日本擴展的根本目標，終於不可避免地與英國在遠東的霸權相衝突了。這些根本擴展的目標並不是祕密的，在軍部的文件中有着公開的解說。那著名的一九二七年的田中奏摺就曾以「泛亞細亞」的形式對他們的目標加以解釋。（這奏摺的真實性雖仍有人懷疑，但並未經日本官方的否認，而且其內容又與以後施行的政策大致相符；其一般的原則，更可從日本軍部許多無可置疑的宣言來證明。）

『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我們如能征服支那，則其他一切亞細亞國家以及南洋諸國，必將懼而降我。到那時候，世界這纔知道東亞是我們的了……』

『我們果能奪得中國全部的富源，我們還將進而征服印度、南洋羣島、小亞細亞、中亞細亞以及歐洲。但第一步必須奪得滿蒙的控制。……爲了取得北滿資源而與俄國在蒙古交戰的必然性，正是我們國家發展程序的一部分。……我們遲早必須對蘇俄開戰。……』

『有朝一日我們還將對美國開戰。如果我們將來要想統治中國，我們必須先摧毀了美國。』

這裏所列舉妄想的最後目標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却是一九三一年以來擴大

侵略中按步履行的直接進展的步驟，我們可以看出，這種進展的步驟是第一，佔領滿蒙以爲征服中國的根據地；第二，隨了佔領蒙古以後，就發動『不可避免』的反蘇聯的戰爭；第三，再後爲了霸佔西太平洋和東亞所有土地實行反美戰爭，而且最後還暗中反英帝國主義。

這樣的步驟必然包含着對英的最後決戰。這種未來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在石丸籐太最近出版英日必戰論一書中，已有着說明了，其中一段說：

『英國是在下坡。日本却開始在上坡。這兩者必然要來一次火併，因爲英國想竭力捏住她的所有，而日本則必須擴展。』

『英國有着很多的土地富源；她儘可以放棄一些。日本却大感不足，土地於她實是一件生死的事。英國寧願忍受她的驕傲，多方讓步，以免一戰。日本帝國却必須在滿洲和中國各部有充分行動的自由，並在澳洲尋取門戶的開放……』

『要是英帝國不知道目前問題的根本因子，日本必將利用大英帝國的衰落，自治領的疏離，以及帝國海軍的薄弱，即大英帝國的海軍必須分散於七大海的時機，突然進攻。澳洲和新西蘭將成爲』

日本征服的最初目標，香港也必馬上被佔奪了去，而印度也將有被侵入的危險。（石丸藤太，日本必戰論，一九三五年。）

這樣，英國的政策便起了一種深切的猶豫了。因日本侵滿事件而根本對集體安全制的背信，結果却反而害了自己。這種進退兩難的窮境在一九三二年渥太華帝國會議時就已深深地感到了。一九三二年七月裏斯蒂特（Wickham Steed）在外國報紙上發表一篇文章中也曾加以申說：

『美國的人民深信只有武力，纔能逐出日本在遠東的獨霸。因此要求着大量的擴充美國海軍。英國政府如果忽略擴軍新時期就要在歐洲開始，它必將自陷於可怕的窮途。英國當前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大規模的擴充英國海軍，以對美維持著名的「平等」或者放棄她在太平洋的海軍地位。情勢愈向日美決戰方面發展，這種進退兩難的選擇也就更形殘酷，因為增加海軍費就要威脅預算的平衡，而放棄英國在遠東的海軍地位，却又將逼迫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投在美國懷抱裏去尋求他們的安全。』

『我相信，這個問題一定將在渥太華會議中提出，跟正式議程上其他問題一樣慎重地被討論着。』

大家都感到我們是正趨向於一次新的世界戰爭，這樣也許會驅使自治領對英國在經濟和政治問題上成立妥協。』（重譯自白魯塞爾晚報，一九三二年七月八日）

自從華盛頓條約撕毀以後，自從一切對日本侵略的外交抗議失敗以後，美國是正在看着準備對日本未來的決戰。這種將來戰爭的策畫，且已公開的見之於美國軍事專家的言辭中：

『日本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我們的飛機應當準備去攻擊它。』（一九三四年十月密采爾團長 Br.adier-General William Mitchell 在聯邦航空委員會中演說）

最近出版的派馥 (Nathaniel Peffer) 所著我們必須在亞洲作戰嗎 (Must we Fight in Asia) 一書 (紐約，一九三五年版)——在英國出版者改名為日本與太平洋——也很詳細的討論着這『不可避免』的戰爭。在經濟上對英日利益第一次的打擊，當要算是吸盡中國白銀並擾亂中國幣制的一九三四年的購銀法令 (Silver Purchase Act of 1934)，然而阻止日本前進的根本企圖，却還是在於一九三三年年底美國的承

「從經濟上講，承認俄國的結果也許要失望的……但是承認俄國却另有不同於經濟關係的更

遠大的意義。它實代表着一個牽制日本在上海和滿洲侵略的砝碼。」（西愛斯 L. M. Sears）美國

外交史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第二版，一九三五年，頁六一六）

繼着承認之後，美國想促動日蘇戰爭的明白企圖，是完全給蘇聯的和平政策所克服了。現在美國是正集中力量於軍事上的準備，以應付未來對日本的戰爭，同時又非常懷疑着英國的政策，惟恐她以「善意的中立」來支持日本。美國跨越太平洋的航路和航空根據地是正在迅速地發展着。華盛頓條約的撕毀，表示海軍根據地的開闢，現在可以毫無拘束地進行了，而以前太平洋上大規模海軍戰的重重障礙，也已在掃除了。

蘇聯堅忍地恪守着它和平政策的路線，反抗一切的侵略，但却盡量容忍不含有直接侵略意味的挑戰。一九三六年三月史太林談話中對進攻外蒙的警告，以及隨後蘇聯與外蒙人民共和國締結的共同防守同盟，更強化了這種堅決的立場，同時還促起了日

本軍閥在發動他們威脅戰爭之前的再度反省。

在這樣情勢之下，英國的政策究竟如何呢？當一九三五年中，英國是在兩種企圖中間躊躇着：它想與日本在共同掠奪中國上尋求一個妥協的條件，又想與中國南京政府成立一種諒解的基礎，以制禦日本的獨霸。一九三五年初對華國際借款的建議，就是針對着日本單獨宰制南京政府的野心而維持英國在華的經濟領導權。可是這個建議却受了日本「不干涉」的嚴厲警告。一九三五年秋，那以財政專家李滋羅斯(Clair Roper)爲領袖的英國調查團，在東京遭受很冷淡的接待。據日本報紙的半官消息，日本所提出對英妥協的條件，不但包括了英國承認日本在華的優勢，並且在遠東英國所有的屬地甚至整個帝國的範圍之內，英國還應同意給予日本的貿易和資本以「門戶開放」的便利。羅斯調查團隨後又到南京去，改組了中國的幣制，使中國放棄了銀本位，並且建立了一種以英國信用爲後盾的不兌現的紙幣制；這種舉措實代表着對美國白銀政策和日本霸權的一個打擊，而企圖在南京樹立英國的勢力，以阻止日本造成一般的「中

「妥協」的行動，換句話說，阻止南京政府依附於日本的統治。

在英國有力的意見中間，對於目前遠東的僵局，展開着兩種相反的说法。一種傾向現在已日見引起注意，就是主張英美暫時的合作以對付日本（這種見解為自治殖民地所竭力支持，而以斯麥茲將軍的演說為其嚆矢。）還有一種則仍認為支持日本是保護英國利益的唯一策略，並且以為根本的解決，當期之於日本最後向蘇聯的進攻。

關於對美合作的見解，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斯麥茲將軍在皇家國際問題協會（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中曾經解釋說：

『就我看來，在我們大英帝國的未來政策中，對美關係一定要比對世界任何集團為密切。如果在未來的危機中，我們要選擇一個友人，那末，我想，美國應該是我們手携着手走向遠大未來的伴侶。自治殖民地親美的傾向，更甚於親英。因為在自治殖民地與美國之間，有着共同的前途，共同的利益，乃至共同的最後命運。

『因此，我以為，我們的遠東政策，應當以與任何人友善為基礎，不與誰成立單獨的聯盟或諒解，這種政策的根本目標，應當繼續與我們在大戰中的對美關係相符合。』（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

日，斯麥茲將軍在皇家國際協會演講詞）

根據同樣的見解，樂鄉勳爵也曾說：

『如果日本領袖採取軍閥的政策，那美國與大英帝國聯合以抗日是絕對當然的事。這只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罷了。』（樂鄉文載觀察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另一種要求與日本繼續合作的論調，特別為英國海陸軍當局方面所贊助。克納第（D. M. Kennedy）大尉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每日郵報發表的關於日本遠東政策的論文中，曾經這樣說：

『日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也可成爲最危險的敵人，那是沒有什麼疑問的。』

『這情形對於我們自己尤爲準確：因爲一旦真的衝突起來，孤立的香港有成爲旅順或青島第二的危險，而我們在上海和華北的大隊駐兵就將斷絕一切可能的接濟了。就是新加坡，也不是可樂觀的地位……』

『如果我們聽從了那些鼓吹英美合作以抗日者的勸告，我們必將碰到了上述的許多困難，前途是未容樂觀的。』（克納第大尉論文，見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每日郵報）

在日本方面，軍事作家平田晉策於一九三三年就曾發表過同樣的論調：

「如以日本的海軍爲敵，英國艦隊就將在遠東、地中海以及大西洋同時陷於不利的地位；如以日本的海軍爲友，那末，英帝國在太平洋的安全可以無憂，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就將佔絕對的優勢了……就我看來，對日軍事合作實是改造大英帝國的先決條件。」（平田晉策：Japan Chronicle 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

集體安全制的破壞，對日本侵華的支持，以冀維持跟日本攜手參加遠東的分割，以及同時對美對蘇的仇視，造成了英國猶豫不定的必然結果。

帝國主義的衝突在遠東日益尖銳地發展着，而且一天明顯一天的，除了戰爭外不會有別的結果。同時，中國人民反帝的民族革命鬥爭進展着；中國人民民族革命的聯合陣線也在進展着。

這樣，一面由於國際帝國主義的衝突，另一面由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進展，英、美、日三國中帝國主義者的傾向，都繼續不斷地努力想把日本的侵略轉移爲反蘇聯戰爭，

以求得一個幻想的『出路』這種結果，已是一天明顯一天了。日本的軍事法西斯份子就公然懷着這種根本的企圖，日本已跟納粹德國締結了軍事同盟，以作一旦歐洲時機成熟時的未來戰爭的準備。英國的反動派和親法西斯分子也一樣公然地支持着鼓勵着日本的這種企圖。在美國，同樣的傾向也在那與英日同一的階層中間存在着，這我們可以拿戰後干涉蘇聯的美軍總司令格雷武（Gen. W. S. Graves）的話來證明：

『要進行對一等強國的戰爭，日本必須有經濟的扶助和接濟。我相信日本不難得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幫助。在美國，有許多人正樂意於毀滅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而這個同樣的情緒，在英國也可以看到。』（格雷武，見現代史料，一九三四年八月。）

關於這種英美日反動派所公然倡導的冒險政策，我們將留待下面蘇聯與帝國主義的關係一章中去討論。

二 美國與大英帝國的將來

在上節講到太平洋和海軍問題時，曾經略討論過英美的對立，這種對立不僅在遠東發展着，而且是泛世界的，特別是在南美和英領自治殖民地。研究它們在南美各國，面如阿根廷、巴西、祕魯以及玻巴、大度、谷戰爭中的鬥爭，那不在本書的範圍之內。但是英國自治殖民地之政治的經濟的離心傾向，英國統治階級加強維護這種連繫的掙扎，以及美國的日益滋長，而可能成爲英國自治殖民地的承繼者，和英語世界未來的政治中心，却都是大英帝國前途的問題，也正是戰後世界中帝國主義鬥爭的要素之一。

大英帝國是世界最大的帝國，在敵對的帝國主義列強眼中看來，也正代表着世界新分割戰爭中最富有的對象。嚴格的說，大英帝國擁有着一千三百三十萬方哩的土地和五萬萬的人口；換句話說，就是擁有世界四分之一不到的地面和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口。如果再加上了那名義上『獨立』而實際在英國軍事佔領下的埃及、英國空軍佔領下的伊拉克、喜馬拉雅附近諸國，以及密切依附於它的葡萄牙和荷蘭兩帝國，那末，總共就有一千六百萬方哩的領土和六萬萬的人口，是在大英帝國的勢力範圍之內。

但是英帝國主義的力量却遠不能和帝國的大小相稱合。單是帝國本部五萬萬的人口，就有三萬六千萬，代表着印度的民族，正在堅忍地爲獨立而鬥爭；再從另一方面說，總共有四萬三千萬，或百分之八十六的人口，是代表着非歐洲族的殖民地附屬民族，在專制的統治之下，各自進行着不同程度的叛亂。此外便是剩下來約莫七千萬的白種人，以與美國一萬一千萬的白種人相較，要差得多了，而在這七千萬中，五千萬佔居於英倫三島（三百萬組成了愛爾蘭自由邦，跟英帝國主義尖銳地對立着）；二千萬分佈於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四個海外自治殖民地的國家中，這些國家代表半獨立的二等帝國主義的列強，對英帝國主義只維持着有限的附屬關係。但這佔世界百分之一的二千萬人口，佔據了七分之一以上的地面，採行着一種嚴厲限制非英國人民移入的排外政策，而實際上，就是從英國移入也是限制着的（單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一的十三年中，從英國本部移入者爲三百二十五萬，但在最近時期中，回返英國的人數却超過了移入的人數。）這種限制自然更給帝國以外國家或種族的移民以有力的打擊。

英國自治殖民地擁有着資本主義世界中未經開發的無人居住的主要土地。無疑地，別的帝國主義列強都以貪婪的目光窺視着，正同他們窺視大英帝國從殖民地臣民所奪得的豐富利益一樣。

我們已經看過日帝國主義的擴展政策是在怎樣希望繼承英國在太平洋的土地。我們將來還可看到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謀在地中海、近東、乃至北非繼承英帝國的同樣夢想。而除此之外，美國也兩眼注視英國的自治殖民地，想把他們拉入自己懷抱裏去；大英帝國的衰落以及最後的崩潰，已被公認為世界政治的現實；而它的殖民地則被視為世界新分割決戰的最豐富的贖物。因此，英帝國主義是正爲了保護它的殖民地而盡力掙扎着。

一九二四年，在那以貝爾福爲主席的英語協會（English-Speaking Union）會議席上，蓋得斯（Auckland Geddes）繼包爾溫等演說之後提出了一個警告。他說：「自治殖民地都說我們是母國；」可是在這種說明以及他們對英國的態度中，含有着一即

使沒有衰老，多少是老大了』的暗示。他繼續說：

「一般注意太平洋的人都覺得華盛頓是能諒解他們（按即自治殖民地——譯者）在唐寧街所無法說明的苦衷的。……當我們的自治殖民地向我們願盼，往往沒有同情的回答，也沒有諒解；於是他們轉而問華盛頓，華盛頓却決不閉了眼睛不理，而總報之以秋波的。」（蓋得斯在英語協會中的演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曼徹斯脫導報。）

在以後幾年中，這段演講詞更有了證明。一九二四年美國商業部報告第四十四期中說：『從社會上和經濟上說，加拿大可以算是美國北部延長的部分。』一九二五年，澳洲聯邦總理勃魯斯（S. M. Bruce）宣稱：『誠實的澳洲人』也開始懷疑『我們單靠了英國的海軍是否安全了。』（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太晤士報。）這不僅是一個海軍問題。新的財政借款也在進行着。美國不僅在加拿大排斥了英國而爲主要的外國投資者，它同樣侵入澳洲的第一步工作也已開始了。澳洲以前只單受倫敦方面的財政資助。一九二五年却向紐約舉了一筆一萬萬美金的借款；金融界（City）都一致承認『將來倫

「敦恐怕沒有充足的錢，可以適應澳洲的需要了。」（一九二五年七月九日太陽報）在一九二六年的帝國會議中，自治殖民地退出了因內部社會鬥爭而日形衰弱的英國資本主義的機構，自治殖民地獨立的著名宣言，後來曾明載於韋斯敏斯德法令（*Statute of Westminster*）中。據自由黨政治家麥古築（*McCurdy*）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號的現代評論中所述，在這次會議中，自治殖民地第一次提出了英國經濟的穩固問題：「在今年以前，他們從來不曾提出關於大英帝國自身的經濟穩固這樣密切的問題。」英首相鮑爾溫在會中辯解說，英國曾在一九二五年放款八萬五千萬鎊給自治殖民地：「無論從什麼地方，決不能在這樣優越的條件下借到一筆這樣鉅大的款子，」可是這種掩飾，也終屬徒然。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澳洲總理嚴厲地質問英國的經濟能力，是否還足以繼續供給自治殖民地的需要：

「如果在以後幾年中，英國的過剩資本恐怕不足以維持過去一樣的借貸政策，那末快把這個事實坦白地承認吧。」（澳洲聯邦總理勃魯斯語，見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太陽報）

還有在同月貝奇紀念詞 (Page Memorial lecture) 中他說：

「澳大利亞的人們，對美國之應當有一種自然的同情，那是值得大驚小怪的。他們有着同樣的發展的問題，還有一種連繫便是他們對於歐洲隨時可以引起的紛爭，採取不干涉政策的一致態度。他們能為美國在十八世紀為自由而奮鬥，也就是今日為各自治殖民地而奮鬥，而她的成功已在他們充分的帝國公民權中獲得證明了。」（勃魯斯·貝奇紀念詞，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太陽報）

一九二七年，美國政論家席蒙茲 (Frank H. Simonds) 這樣寫着：

「假使美國採取了一種像孟羅主義一樣的太平洋政策，而給我們以「維持現狀」的保障，那麼，英澳聯合的最後物質基礎，也將消滅了……看看地圖吧，很明顯地，一切地理上的理由證明着我們必有一天成為英語世界的中心。」（席蒙茲，見一九二七年二月——三月英國評論之評論，引自美國評論之評論）

即近如一九三四年，在英國積極準備反攻和美國的冒險擴展受了經濟恐慌阻滯

之後，斯麥茲將軍在其十一月演說中還這樣地說：

『自治殖民地親美的傾向，更甚於親英。因為在自治殖民地與美國之間，有着共同的前途，共同的利益，乃至共同的最後命運。』（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斯麥茲在皇家國際協會中之演詞。）

自治殖民地之日益從英國原有的霸權和地位中疏離出來，而親近美國的根因是什麼呢？促成這種動向的，乃是大英帝國內部經濟的分裂，以及戰後與之俱來的政治的分裂，尤其是英國本部對自治殖民地的關係。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九年間，帝國海外領地由英國本部的輸入從百分之四四降為百分之三四，對英國本部的輸出也從百分之四二降為百分之三四。在同一時期中，帝國海外領地由美國輸入的，却從百分之二二昇為百分之二六。這樣，至一九二九年，英國握有着帝國市場百分之三四，縱然尚佔優勢，可是美國却已昇為百分之二六了。這種情形，更因美國在加拿大市場壓倒英國的結果而被誇張着（一九二九年，美國以百分之六八勝過英國的百分之一五。）就是在其他自

治殖民地以及印度、美國、的猛進和英國的衰退也很顯然。同時，在澳洲、美國的市場從百分之二四進為百分之二五，而英國則從百分之五二退為百分之四〇；在南非，美國從百分之九進為百分之八，而英國則從百分之五七退為百分之四四；在印度，美國從百分之三進為百分之九，而英國則從百分之六五退為百分之四三。

帝國海外領地在經濟上是這樣地疏離了英國，但同時，英國對英國海外領地的倚賴性，却日見增加着。英國總輸出額中對帝國各部的輸出（包括愛爾蘭自由邦）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三二·九上昇為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間平均的百分之四〇·九；英國總輸入額中從帝國各部輸入的，也從百分之二四·九上昇為百分之三〇·六。英國爲了在外國市場上經濟勢力的衰退，便更有賴於帝國了；然而帝國內部的對英經濟關係，却又離心地演進着。

那自治殖民地，以前原是靠了英國的資本而發展，替英國工業資本主義盡着農業補助和原料取給的殖民地的任務。可是現在，他們却已達到了獨立的工業資本主義國

家的地位，雖然在經濟上軍略上還是受着英國的拘束。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三一年間，澳洲生產品的價格從三千九百萬鎊增至一萬零六百萬鎊，換句話說，就是從總產額的百分之二增至三分之一以上；南非生產品從一九一一年的一千七百萬鎊增至一九三〇年的一萬一千二百萬鎊；加拿大從一九一一年十一萬六千六百萬美金的總價格增至一九三二年的二十六萬九千八百萬美金。（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韋斯敏斯德銀行月刊）同時，英國生產品的輸出却從一九一三年的四萬一千一百萬鎊減為一九三三年的二萬八千萬鎊。

跟着這種經濟離心的演進，政治離心的傾向也日見急劇了。愛爾蘭爲了共和國的獨立而進行武裝的鬥爭，反抗英國統治下『黑色與茶褐色傢伙』（Black and Tan——譯者按：指英國當時派至愛爾蘭鎮壓革命的援兵，爲愛爾蘭人所極端痛恨，因他們的制服爲茶褐色，帽子與臂帶皆爲黑色，故名。）的恐怖，最後，在擴大『戰爭』的直接威脅之下，纔於一九二二年從英首相獲得了『愛爾蘭自由邦』的分離和不完全的獨立。

南非在赫左格 (Herzog) 領導之下強求獨立和自治權。澳洲的總理，我們上面曾談起過，他援引美國的獨立戰爭，以為這是『今日各自治殖民地奮起』的範本。一九二二年香納克 (Chanak) 的危機證明了一旦戰爭爆發時，自治殖民地是未必與英國站在一起的。一九二五年的羅加諾公約，是祇由英國簽字，而並不包括自治殖民地。一九二六年的帝國會議中，全體屬地聯合向英國爭得了殖民地自治的宣言，在決議裏說明聯合王國與自治殖民地的關係爲：『不列顛帝國中各自治集團地位相等，雖因共同矢忠於英皇的關係而團結一致，但在它們內外事務的任何方面，彼此絲毫不相統屬，並自由結合而爲不列顛聯邦國的各分子。』不過那帝國內部關係委員會的報告，雖包含了這個原則，却直截的限定『平等的原則，只適用於地位上，而不及於普遍的作用。』至關於外交政策，『則概認在這個範圍以及在國防範圍內，大部分的責任現在必須仍由大英政府繼續擔負到相當的時候。』還有應須注意的，即一九三一年的韋斯敏斯德法令，雖將上述原則加以法律的說明，但規定除在以前通行的情形之下外，不得修改自治殖民

地的憲法。

英國統治階級並不願容忍這政治的離心傾向。那在內部極端困難下強逼出來的一九二六年宣言，其深遠的意義乃為官場所輕視的：「這也許會有給猜忌的國家主義者藉口的用處，但亦僅此而已。」這兩句話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太陽報社評的意見，它駁斥這新的原則，認為只無異是英皇頭銜上一種「小小的變化」。據一九二七年三月的圓桌所載，自治殖民地曾被允許「除了分離權以外的一切」。一九二九年，英國官方的法律專家摩根教授（Professor J. H. Morgan）在昌塞羅爾爵士（Lord Chancellor）主持下的倫敦四法學院（Inns of Court）演說，反對「時下「自治殖民地主權」這名詞的濫用，」他認為一九二六年的宣言「當然不是法律；這只是一種政治的而不是法律的條例。……自治殖民地的地位從未為樞密院所規定」（但一九三一年韋斯敏斯德法令和一九三五年樞密院決議愛爾蘭自由邦有權取消愛爾蘭的條約，却攻破了這種論調的正確性。）他繼續說：

『自治殖民地法律上不是獨立的自主國，因為他們沒有擅自宣戰之權。一旦英皇因其庸寧衛大臣的奏言而宣戰，自治殖民地絕不能宣布獨立以保持其中立。』（摩根教授在四法學院演說）

的羅特斯 Rhodes 紀念詞，見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六日太晤士報）

美帝國主義（自治殖民地也是的）對於一九二六年宣言的意義，却抱着不同的見解。據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宣稱：

『從此以後，美國對於不列顛聯邦國的各國，應該個別的交往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華盛頓郵報）

特別是在經濟的範圍中，英帝國主義者竭力反抗着分裂的傾向和拉緊帝國寬弛的連繫。自十九世紀後期以來，這種努力是向着幾種帝國關稅同盟的形式而發展。

『一八九六年，在倫敦加拿大俱樂部的宴會席上，當時的殖民大臣張伯倫曾發表一種“Zollverein”（關稅同盟）的意見，就是帝國內部間關稅的聯盟。在帝國之內施行自由貿易，而對外國則採取一種共同的賦稅政策。這個提議終於遭各殖民地的反對，他們因稅收的理由，認為廢棄他們的關稅是不可能的。』（德雷治 G. Drage 帝國的貿易組織（The Imperial Organization

這種努力，雖然熱烈地宣傳着，却終因不可避免的利益矛盾而失敗了：在一方面，自治殖民地不願再爲英帝國主義的農業附屬物，而想發展他們自己獨立的工業；另一方面，英國製造業、商業、航業和金融業之泛世界的利益仍非常重要，英國的貿易有三分之二是在帝國以外，且建有精密的世界網，所以，自由貿易的政策依然是適合的。一切所已做到的只是很有限的殖民地特惠稅率；而這實際的價值，據一九二四年貝爾福『海外市場調查』(Survey of Overseas Markets) 委員會報告說：『顯著的事實就是英國輸出品在帝國境內稅率的增加，平均按值征稅幾已增三分之二，而在外國，雖因美國關稅的提高，但平均按值征稅却減低了五分之一。』

這樣，當英國資本主義在戰後世界市場上日益衰微的情形之下，特別是在美國資本主義的猛進和聲勢浩大的競爭之下，英國乃退而努力重整其帝國內部特惠市場和原料供給地的陣線，從事於帝國經濟緊密的結合。可是由於極端矛盾的條件，『自給帝

國』(Self-Contained)的夢想，(或是『自由貿易帝國』Empire Free Trade，當時保守黨最活躍的勢力美爾徹脫——俾弗布盧克 Malcher-Beaverbrook的說法)終不能在世界的現實中達到實現。在一九一三年，英國輸入的四分之三是來自帝國以外，輸出的三分之二是銷往帝國以外；到了一九二九年，這種比例還是很少有變更。另一方面，在帝國各部的總輸出中，有許多主要的貨物還不足適應英國輸入的需要，這種缺少的貨物最顯著的是牛肉、羊肉、燕麥、大麥、鹹肉和牛油；同時，有許多帝國主要貨物的總輸出額，却又不能盡為英國的輸入數所吸受，而必須到外國市場去找出路，這過剩貨物特別多的是小麥和羊毛（詳細數字參閱格羅陀那 L. St. Clare Girdona 帝國存貨的清查 Empire Stock-Taking）還有，自治殖民地對英國出產品放棄關稅，也不能說沒有問題。因此，那『自由貿易帝國』或『自給帝國』的夢想只是宣傳家的一套神話。一切所能嘗試的就是部分較密切的經濟關係的調整。

一九三二年渥太華帝國會議就是這方面的嘗試。英國表示以前世界的獨占是移

轉了，它放棄了自由貿易，採取了完全的關稅制度；它在各部分織成重重關稅以及變態關稅的密網，以食物的供給，換取自治殖民地對其製造品進口的特惠。然而自治殖民地所報答的特惠關稅，價值却極其有限；因為，稅率還是很高。一九三四年英國工業聯合會對商業政策的備忘錄裏（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 Memorandum on Commercial Policy）申訴說：『渥太華會議之於自治殖民地，實較對大不列顛帝國爲有利。』

渥太華協定是一種經濟戰爭的武器，主要地是針對着美國並企圖挽回帝國分裂的傾向。英國首相鮑爾溫，在會議開幕的前夕這樣說：

『我們顯然站在歧路的上面了。……我們或者是積極維持帝國內部密切的賦稅關係，或者讓它鬆散』（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鮑爾溫在衆院演說）

英國工業聯合會並且公開地宣布了阻止『別的外國經濟集團控制』自治殖民地的企圖：

「如果帝國各領地決定以孤立代替了合作，那末他們最後必至個個落入別的外國經濟集團的控制之下。」（渥太華會議中英國工業聯合會帝國經濟政策的備忘錄）

美國的意見也確認渥太華協定是戰爭的武器。代議院多數派領袖雷內（Rainey）認為這是『於美國最危險的』。美國官方估計美國貿易因此而受的損失，約值三萬萬美金（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太陽報）。

要估計渥太華會議的最後結果，還嫌太早，這只不過是帝國主義集團綜合的經濟戰爭的一個前兆而已。他們雖然一時獲得了牽制分裂傾向的有限成效，但真非常之有限，主要的却還是增加了英國對帝國寄生的倚賴性。英國對帝國各部的輸出（愛爾蘭自由邦除外）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三二·九昇至一九三一年的百分之四一·一，以至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四一·八。英國從帝國各部的輸入則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二四·九昇至一九三一年的百分之二八·八，以至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三六·九。

（參閱許斯忒 George Schuster 渥太華會議前後的帝國貿易 Empire Trade Be-

fore and After Ottawa 經濟學者增刊，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日。以後的數字仍說明着這個趨勢延續的進展。很明顯地，這主要的結果反是增加了英國作為自治殖民地市場的任務，而英國對帝國市場的脆弱連繫，所增強的却是極少。帝國各部來自英國的輸入，原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四四降到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三四，至一九三三年也不過增至百分之三六。然而，無論如何，當時也確曾給予了美國的侵入帝國市場以一個打擊。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之間，加拿大來自美國的輸入，從百分之六〇·六降為百分之五四·五，而英國則從百分之一八·三昇為百分之二四·二；新西蘭的輸入從百分之一五·八降為百分之一一·四，英國則從百分之四九昇為百分之五九；印度的輸入從百分之九·九降為百分之六·一，英國則從百分之三六·七昇為百分之四一·八。但其實，在這個進程中，經濟恐慌和通貨漲縮的結果，也許比渥太華會議有着更大的影響吧。

這種經濟鬥爭只是進展着的廣大鬥爭的一面。美國活躍的侵略勢力侵入了不列

顛帝國，而衰弱的英帝國主義則死命反抗着以加強握住它的屬地，這樣，英美的衝突便在各部分無時或休地進展着而且加深着，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之內，永遠沒有解決的方法。這裏不會有美國自動的經濟勝利，（像但內 Ludwell Denny 在美國征服了英國 American Conquers Britain 一書中所說的幻想，此書寫於美國經濟恐慌爆發的前夕，出版於一九三〇年，當時他還把這當作美國對於世界經濟必然勝利的凱歌呢，）也不會有不列顛帝國自動的崩潰。只要帝國主義存在一天，有的只是衝突的必然加深，最後決戰的愈見可能而已。

三 法西斯修約派的挑戰——意大利

歐洲以外的問題，以遠東爲其爆發的中心，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世界新分割鬥爭的主要區域，這區域以法西斯修約派在歐洲的挑釁爲其中心，針對着東歐、中歐和東南歐，並展延至地中海、北非乃至近東。這侵略戰爭在歐洲的第一個領袖和組織者是納粹的

德國第二個在地中海區域的領袖是法西斯的意大利。

自從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獲得政權以後，法西斯修約派的挑戰就更形迫切了。在目前的時期中，這種挑戰正左右着歐洲的局勢。

在歐洲，反凡爾賽和約的修約派的挑戰，無論如何是要發動的，而且當希特勒以前的時期中也已在發展着了。德國、奧國、匈牙利和保加利亞聯合反對各和約的條款，以與法國、波蘭和小協約的集團相對立。因為修約運動當時代表着較弱的、失敗的和沒有武裝的國家對凡爾賽和約的不公平的反抗，而法國當時又為最有力的反動的帝國主義勢力的領袖，維持着高度的軍備，為凡爾賽霸權和反蘇聯而奮鬥，在這時期中，蘇聯常和土耳其在有許多問題上自列於修約的集團，特別是在裁軍問題上。一九二二年蘇聯和德國所訂的拉巴羅條約（The Rapallo Treaty）一直延續到一九二六年的柏林條約。同時，那代表勝利的列強中不滿意分子的意大利，為了它自己擴展的企圖而與修約派勢力相聯結。這樣，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時期中，歐洲的勢力就已形成了分野，這是被

公認爲基本的新陣線的。這也就是巴賴 (V. de Bolla) 的歐洲的新均勢 (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Europe) 一書的根據。該書出版於一九三二年，作者在書中發他的企圖說：

『本書的研究是想敘述歐洲新均勢的形成及其戰爭或和平的可能結果。二大政治集團正在爭取軍事上的優勢。其中一個集團想維持歐洲的政治組織；另一個則想竭力變更它。』(巴賴歐洲的新均勢序言，一九三二版)

這個關於帝國主義在歐洲新的綜合鬥爭的一般定義是沒有錯的。可是這書作者對於兩個陣營特殊的分析，却還不夠真確。在修約派的陣營裏，他不但放了德國、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亞，並且還包括蘇聯和土耳其。在另一個陣營裏，他放了法國、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連年以來的事實證明了這種分析的錯誤。

很明顯地，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之下，修約問題是遲早會引起戰爭的。自來沒有和平的修改條約，如果修約而影響列強的疆土的話。幾乎是例外的，那要算一九〇五年瑞典

和挪威的和平分離；可是這也正因沒有列強關係的影響。國聯、盟約雖然包含有修改條約的正式條款；但是，像在第五章所說的，這個條款等於具文，而一切使其生效的企圖，在實際上都給不加思索地排斥了。誠如泰狄歐（Tardieu）在一九三一年論及法帝國主義時公開地說：

『如果修約的程序放在一個國際會議的議程上而多少有着成功的希望，不出二月之內我們就要碰到世界大戰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泰狄歐在法衆院中演說。）

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之內，和平修約的希望是沒有的。現行和約下的不公平和各式各種的民族壓迫，如果不引起戰爭，只能在深刻的社會和政治的轉變之中，去求得最後的解決。

因此之故，我們必須深切認清在現狀下『修約』的問題。修約的要求本身也許是一種反抗現行條約不公平的和平而公正的要求。但當修約問題成爲一個帝國主義集團的基礎時，它就變了完全不同的本質，而成爲土地新分割的公然挑戰；不但絲毫沒有

解·除·不·公·平·的·意·圖，而且還存着新的征服和掠奪的野心，把現行的平衡轉移到別一方面去。

這就是法西斯修約派挑戰的本質，也就是法西斯主義領導修約運動的意義。修約主義是一面旗幟，在這旗幟之下，法西斯主義進行着它擴展戰爭的野心。

當希特勒上台之前，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就已顯著地扮演着這個角色了。意大利在一九一五年英法意的倫敦條約中所表示的擴展要求，（雖然關於小亞細亞部分遭了英法在暗中締結賽克斯·畢各協定 Sykes-Picot 的欺騙）大部分是給和會中主要的列強所阻撓了。意大利也同後來的德國一樣，法西斯主義最初發展為衰弱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布爾喬亞的武器，不但用以鎮壓勞工階級的革命，並且還攻擊其他列強以進行它侵略戰爭的企圖，法西斯主義對內對外的任務，實際上原是密切相關的啊。

在希特勒握權的許多年以前，意大利已曾積極地提出修約的要求。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在上院的演詞中，墨沙里尼特別要求修改凡爾賽和約；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五

日在南卜爾斯演說，他又攻擊戰後所分配的「領土的荒謬」(Territorial Absurdities)：『如果和約中某些條款不變更，要言改造歐洲是不可能的。』墨沙里尼以恢復政治家的風度，要求修改戰後「領土的荒謬」的分配，可是在這種要求中，不用說，他不曾明言他是無意於降服那由聖日曼條約歸併於意國的南的羅爾省中非意大利的人民，他所關心的，只是替意大利在巴爾幹、非洲以及小亞細亞擴展的目標，取得一條自由的道路罷了。

到了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嚴重的影響和希特勒在德國奪得政權以後，這纔給法西斯修約派的挑戰開了行動之路。一九三四年六月墨沙里尼和希特勒在威尼斯的會晤，就是兩大法西斯戰爭的獨裁者建立聯合的外交政策的嘗試。可是這個嘗試終因對奧統治的對立而決裂了。意大利建立了自己的集團，以對奧匈的密切聯合為基礎（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國的羅馬議定書就是具體的表現，因一九三六年三月第二次羅馬議定書的締定而更形加強）。德國雖已撕毀了凡爾賽和約的軍事條款，但在重整軍備的程

序未完成之前却，還不能即刻行動這樣，意大利就於一九三五年以進攻阿比西尼亞而首先行動了。法西斯的侵略戰爭遂以開始。

意大利法西斯的挑戰立刻跟英帝國主義的利益發生了衝突。英國的政策原曾給予了法西斯修約派的挑戰以大量支持，從外交上從物質上幫助德國的重整軍備；它一方面想以此抵制法國在歐洲的霸權，另一方面也正是有力的反動派的根本企圖，想以此鼓勵納粹侵入東歐，進攻蘇聯的計畫。可是這危險的政策現在却產生了自害的惡果了。原來法西斯侵略戰爭第一次爆發的地方，正是英帝國主義利益深切有關的所在啊。

從英國利益的觀點看來，意大利的征服阿比西尼亞並不是要不得的。照一九三五年六月麥斐各部委員會報告（Maffey 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Report）明白表示，這種征服雖是戰時的「威脅」，却也許是和平情形下的「福利」。如果英國能夠得到阿比西尼亞北部的統治地位，就是英國在塔納湖（Lake Tana）和尼羅流域的特殊利益也可由共同分割而得。

「一旦意大利和大不列顛發生了戰爭，意大利統治下的阿比西尼亞就將成爲鄰近的英國殖民地的威脅，但在平日普通的行政上，却又是一種利便……」

「英國在阿比西尼亞的主要利益，包括了塔納湖和尼羅流域……要是阿比西尼亞失去了獨立國的地位，英國政府就可設法得到與蘇丹相聯接的一個走廊的領土了。」（一九三五年六月殖民部常務次長麥斐 John Marley 主持下各部委員會的報告。見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意大利日報 *Giornale d'Italia*，轉載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太晤士報）

因此，就當地所關的利益而言，這種共同分割的方法並不是不可能的。但那「戰時的威脅」以及意大利侵略的更大野心所引起的軍略上的廣大利益，却發生了問題。英國的統治地中海和紅海，代表着它至非洲、近東、中東、印度和澳洲的帝國交通的生命線。要是意大利在統治以里特里亞（Eritrea）、阿比西尼亞和索謀里蘭（Somaliland）的堅實連鎖以及對岸的葉門（Yemen）以外，再控制了紅海的區域，這不但於這條交通線有致命的危險，並且當意國西從里比亞（Libya）南從阿比西尼亞征伐蘇丹和埃及時，還將成爲會合決戰的起點。意帝國主義的最後野心是無容置疑的。據英帝國主義

一個言論平實的主要機關報說：

「墨沙里尼久已想到意大利要解決她迫切的需要，如人口的出路、市場和原料等，只有犧牲不列顛帝國。據說她蓄意建立一個足以消滅英國在地中海海軍優勢的艦隊；歸併阿比西尼亞部分的爲了意大利的移殖，部分的想以此爲市場和原料供給地，而一部分還是爲了樹立一枝大規模的黑色軍；然後，在里比亞築成通到埃及和蘇丹邊境的鐵路，飛機場以及公路之後，就首先趁了國際危機所造成的機會，奪取蘇丹、埃及以及英國在東地中海所有的殖民地。又據說，墨沙里尼像他以前的許多歐陸獨裁者一樣，曾經看到不列顛帝國及其自治殖民地都是「和平主義者」而且衰老了，而不列顛聯邦國是一條「擱淺的鯨魚」(Stranded whale)從它割取一些脂肪是毫無危險的。」

這就是意大利挑戰促起了英帝國主義行動的局面。英國一反了它以前對日本侵入滿洲保持沉默的態度，一反了以前不斷削弱國聯盟約和集體安全制整個原則的態度，(如一九二五年貝爾福宣言以及最近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鮑爾溫宣言中所重申

「集體和平是完全不能實行的」而且「不值得考慮。」這次它的政策却起了突然的轉變，而利用盟約來動員各國的支持以抵制意大利，同時，又復不顧盟約，犧牲了阿比西尼亞，不斷地對意讓步，以圖達到部分分割的解決。

可是這兩面的政策，終因對意侵略的有效制裁的失效而告終了。那遲延的冷淡的、乞援於盟約的嘗試，不僅背棄英法兩國對意所許的瓜分的保證，而且更違反了英國在廣大的國際場合上所採取對法西斯修約派挑戰的支持的一般政策。因為英國支持着納粹的德國，法國決定對意採取異議，而於一九三五年一月訂立法意羅馬協定給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擴展以放手做去的自由。因此，法國並不準備採取對意的任何有效的行動，除非英國能給法國以聯合制裁納粹德國在歐洲任何侵略的保證。可是這種保證正是英國所不預備擔負的。法國提出的每個堅持的問題，所得到的總是推諉的答覆，如一九三五年九月的英國通牒，堅持着盟約運用時的「伸縮性」(elasticity)

「一到訴諸武力，很顯然的，罪惡和侵略也儘有程度上的不同，結果假如盟約第十二條是運用了，

根據盟約而採取的行動的性質，也儘可因種種特殊事件的環境而變異……伸縮性是安全的一部分……那世界並不是靜止的。」（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英國答覆法國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咨文的通牒，法國的咨文是詢問英國對集體行動制裁任何歐洲侵略的態度。）

英國對於集體制裁納粹德國在歐洲的侵略，拒絕給法國以任何的保證。當事情還並不迫切的時候，法國決意支持意大利，實際上阻撓着集體制裁意大利法西斯在東非侵略的要求。這樣，基於英法的對立，特別是英國的支持納粹德國，以及一般帝國主義者對意大利擴展野心的複雜關係和恐懼法西斯集團在意大利的衰微，那集體安全政策實際上在法西斯侵略戰爭發動之前就已崩潰了。這樣，意大利法西斯就在阿比西尼亞民族中間施行屠殺和破壞，毫不受那很微弱的部分的經濟制裁的阻礙。

意大利征阿戰爭的成功，不但給國聯受了一個很重大的打擊，又一次證明了它的無能；同時也給英帝國主義以打擊，它會積極地關切着這個問題，但却因自己政策的矛盾而麻痺了，只鼓勵了阿比西尼亞的抵抗而並不給阿比西尼亞以任何有效的援助。

(並且不顧一九三〇年的條約，在戰爭爆發之前，還維持着對阿比西尼亞的軍火禁令；不久又實施對阿國經濟援助的禁令，不顧累次的呼籲。)這結果更增加英國政策的猶豫。雖然在阿迭斯阿勃(Addis Ababa)樹立意大利政權之後，墨沙里尼曾經宣說，(對每日郵報記者談話)意大利從此可以列入『滿足』的國家中，不復有別的野心了，然而這種保證原是法西斯以及一切帝國主義的慣技，是欺瞞不了誰的。很顯然的，意大利擴展的野心只有因對阿侵略未受抵抗的鼓勵而積極向着巴爾幹乃至英國在地中海的現行利益和殖民地方面推進。對集體安全制的背信，是又一次自食其惡果了。

一九三六年春，萊茵危機趁着意阿戰爭的時會爆發了，於是國際的談判和交涉跟着意阿戰爭同時進行着，特別是英法間迫切的交換意見，這明白表示着，左右國際政治形勢的不是意大利的侵阿戰爭，而是納粹的德國。這也是決定英法政策的主要關鍵。三年來在法西斯統治下的意大利，雖然屢次發表挑戰的誇言，但在國際場合上被迫扮演着一個小的角色，它的暴亂被限於科甫砲轟(Corfu bombardment)這樣的小

事件上，直到現在纔能發動大規模的征服戰，因為整個的國際形勢是因納粹德國的躍進而陷入混亂中了。意大利侵阿的戰爭，事實上只是法西斯侵略戰的前奏。那法西斯挑戰的真正的核心，現在日益明顯地左右着歐洲全部形勢的，却還是納粹的德國。

四 法西斯修約派的挑戰——納粹德國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的握政，一改國際政治的形勢。就對內說，這是歷史上最野蠻的、沒落中的階級獨裁的反動政權，是一切文化的公敵，統制了美國以外技術上最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槓桿。就對外說，這個新型的『極權』(totalitarian)帝國主義國家，超過了以前一切帝國主義的典型，正在把其全部的人口、經濟和思想組成一部單一的有訓練的戰爭機器，一當必要的軍備和外交準備完成時，就會立刻發動戰爭，以達其侵略和擴展領土的公開野心。戰後初期的凡爾賽和約以及社會民主政策的罪惡和幻想，實已種下它們的惡果了。

納粹德國之侵略的和擴展的野心，是公開而毫無隱諱的。那完全根據於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整個特質；這種國家社會主義，是德國金融資本的極端帝國主義的、愛國的、和反動的分子的，以及其主要軍事機關參謀部的科學工具，不但用以鎮壓內部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並且還要推翻一九一四——一八年戰爭所造成的結果，以樹立德國在歐洲的軍事霸權。最後，且企圖擴展於世界的範圍，以替德國金融資本找求適當的出路。

這些野心，在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聖經，也就是它的黨綱之惟一權威作希特勒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中，非常明白地敘述着。（英文的譯本叫做“*My Struggle*”，會得德國政府的允許而出版，有許多顯著挑戰的地方都給刪去了，原書的真面目仍流行於德國；同時還有一種是全譯的法文本“*Mon Combat*”，送經德國要求法國法院查禁，但無效果。）在今日，納粹的宣傳以及希特勒執政以來幾次的『和平』演說，曾屢次託辭辯稱我的奮鬥已經「失了時效」，以冀淆惑國外的視聽；因此我們必須認識清

楚：第一，我的奮鬥在政府贊助之下仍舊幾百萬份地銷行德國，它是納粹政綱上正式的和權威的著作，且為每個公民所必讀；第二，鄰國領袖雖曾加以詰難（如莫洛托夫 Molotov 在一九三五年第七屆全國蘇維埃大會中之主席演辭，和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法總理佛蘭亭 Frandrin 之演辭）要求立即取消所有公然主張擴展的野心言辭，但結果却一再遭了拒絕；第三，在戰爭時機未成熟以前，故意借名『和平演說』以作烟幕的宣傳，在納粹理論中原被認為一種合法而且必需的武器。（希特勒外交的這種方法，例子是不勝枚舉的：如最初宣言『自願』接受而且擁護羅加諾公約，結果放棄了它；薩爾投票以後宣稱不復有影響德法邊境的問題，結果發生了萊茵重行武裝的事變；

● 參閱前普魯士教育部長及現任德國教育部長魯斯脫博士 (Dr. Rust) 於一九三三年三月納粹政權開始時所發表的官方傳單：『我要求學校當局特別注意於適當的書本和課程。第一當然必須先讀領袖的我的奮鬥。我們應該馬上做到沒有一個不曾讀過這書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神已在我的奮鬥中具體化了，提高真正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神，以為教誨的指導的法則，這是每個教師的責任。』

或隱蔽和謊報空軍的力量，這後來據鮑爾溫的自白，是完全「迷惑」了英國國民內閣。●直到本書執筆時止，我的奮鬥還依然是目前德國獨裁統治正式的未經放棄的政策說明。

那末，關於納粹獨裁統治的外交政策的目標，我的奮鬥中究竟怎麼說着呢？我們且撇開一般反動的譚辭，種族的誇大狂，對於猶太人，捷克人，波蘭人，斯拉夫人，「野生的」(bastardised)「黑奴的」(Negroid)的法蘭西人，以及對其他的「劣種」的咒詛煽惑不說，而只限於注意外交政策目標的特殊說明。全部引句都摘自一九三六年版

●一般的法則可見於納粹軍事權威之一希爾上校(Colonel Hierl)所著一書，該書叫做德國戰爭政治的基礎(Foundations of German War Politics)裏面敘述着：「和平主義有兩種：真正的和平主義是勝性的產物，而虛偽的和平主義則被公認為準備戰爭所必需的政治武器。以和平的宣言安慰其敵人，使他疏忽了他的武備。因此，可能的使敵人受了言辭煙幕的蒙蔽，這同時又盡了秘密我們自己軍備的任務。」這種「和平主義」的技術原是一切帝國主義所熟知的；但也像帝國主義的其他技術方法一樣，這給納粹當局運用着達到了高度發展的程度。

的我的奮鬥（第一七四版）這在本書執筆時還正式銷行於德國。

第一，戰爭的推進是人種的理想，而和平則是破壞：

『在永久的戰爭中，人類變成偉大了——在永久的和平中，人類卻要毀滅了。』（頁一四九）

第二，任何聯盟的目標，必須是戰爭：

『一種聯盟的目標而不包含了戰爭的願望，那是無意義而且不值得的。』（頁七四九）

第三，德國外交政策的中心原則，它『政治的戒條，』就是必須打倒歐洲其他每個軍事上的強國：

『德國爲了它向外活動而定的政治戒條，必須常常宣言：決不允許有兩個大陸上的強國在歐洲興起。在德國邊境組織第二個軍事強國的任何企圖，甚至只是形成了一個可能成爲軍事強國的國家，你必須留意對德國的進攻，你必須百計設法阻止這樣一個國家的形成，倘使已經存在了，應該不惜運用武力以使它立刻趨於瓦解，這不但是你的權利，也正是你的義務。』（頁七五四）

第四，修約派挑釁的目標，就是恢復德國的『失地，』只有用戰爭纔能達到：

『我們必須明白知道，失地的恢復，不能僅訴之於萬能的上帝，也不能虔誠寄望於國聯，而只有賴之武力。』（頁七〇八）

『被壓迫的各省不能以浮誇的抗議使之歸還於帝國，而只能以尖銳的利劍。鍛鍊利劍是民族對內政策的目標；進行鍛鍊並找尋武裝的聯盟，則是它對外政策的目標。』（頁六八九）

第五，德國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標，必須是土地的征服。

『正跟當時（戰前時期）代言人的態度相反，我們必須為我們的外交政策重復上述論點的承認：就是，使我們的領土與我們許多的民族相適合……土地和疆域是我們外交政策的目標。』（頁七三五）

第六，修約主義者挑戰的目標，實還不僅限於一九一四年疆界的收復；因為，這從種族的和軍事地勢的觀點看來還是不夠的：

『恢復一九一四年疆界的要求是一種政治的愚蠢。……一九一四年德國的疆界是全然的不合邏輯。就日耳曼民族的統一一上講，那是不完全的；就軍事地勢的適宜上講，那是不合理的。……』

一九一四年的疆界實無補於德國的將來。（頁七三六——七三八）

第七，爲了征取新的土地，德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必須特別針對於東歐，從東歐國家中去征服土地，尤其是蘇聯和許多的邊境國家：

『德國要實現確實的土地政策，惟一的可能就在於歐洲新土地的獲得……如果要在歐洲奪得新的土地，這又只能以犧牲俄國纔能達到。』（頁一五三——一五四）

『我們停止了向西南歐的不斷前進，而把我們的目光轉移到東方的大陸上……如果我們今日一談到歐洲的陸地，我們第一個只能想到俄國及其勢力下的邊境國家。命運似乎正在那裏替我們指示着……那東方的巨國是已頻於崩潰了。』（頁七四三）

『我們外交政策的未來目標，既不是西向，也不是東向，而是一個替我們日耳曼民族征服棲息地點的東方政策。』（頁七五七）

第八，要實現這些擴展的野心，德國必須努力與英意訂立聯盟，這樣可以破壞小協約，孤立『死敵』的法國，以及獲得戰略上行動的自由，因爲在現階段上，向英國奪取世界霸權的問題，還是談不到的：

『英國不願德國成爲世界的強國，法國更不願德國成爲世界的強國。但其間却有着重要的區

別。在目前，我們這不是爲了世界強國地位而鬥爭，而只是爲了我們國家的生存，我們民族的統一和我們孩子的麵包。如果我們懷了這個觀點在歐洲找尋聯盟，這裏只有兩個國家：英國和德國。（頁六九九）

『這樣的聯盟（與英意）給予了德國以毫無掣肘的從事準備的機會，因爲這種準備是必須順序進行的；而從這樣的聯合中，更可運用各種方法以達到對法的最後清算。這種聯盟的意義，實際上全在於此：德國從此沒有受突然襲擊之虞，而反對方面的聯盟却破裂了，那曾經貽患我們的小協約也解散了，這樣，我們最大死敵的法國，就被迫陷入孤立中了。縱使這樣的成功最初不過發生了一些精神上的效果，但却爲德國獲得了充分的行動自由。有效的發動是在歐洲新的英德意聯盟的手中，而不復在於法國了。一舉之間，德國就可進而從軍事方面不利的地位上解放出來。側面的有力保障，以及原料、食糧供給充分的保證，將是國家這種新安排的燦爛的結果。』（頁七五五——七五六）

第九，在書中附加的『結論』上所述，那最後的目標却是在於德國的世界霸權：

『德國如果是依照了同一（納粹）的原則所領導所組織，它必須在世界上取得適宜的地位。』

「一個種族受難時期的國家，而能盡力去培養其最優秀種族的份子，是必有一天成爲世界之霸主的。」（頁七八二）

這就是希特勒的野心的系統敘述，那是再明白也沒有了。在現代的任何國家中，出於最高統治者之口，從來不曾對犧牲鄰國的侵略和擴展野心，有過這樣公然的宣言。任何歐洲國家和民族，對納粹德國的野心而猶抱猶豫態度者，那實在是無可寬恕的。有許多鄰國確曾顯示了一種投入納粹德國懷抱的傾向，波蘭多少是如此，荷蘭和丹麥也有些是如此，這很顯然的表示由於無力抵抗的恐懼和絕望，他們只能這樣做。而這位騎士，他的言論今日正爲英國的主教、大主教和貴族所贊許，雖然明白說明了他根本的企圖，只是向英國獻媚，藉以使英國和法國疏離，藉以獲得軍事上行動的自由，但最後，在奪得歐洲的霸權以後，却還將進取世界盟主的地位，那就是，向英國掠奪它的殖民帝國。

所以，德國納粹獨裁者擴展的目標：第一是以歐洲諸小國爲犧牲；第二是特別以蘇聯爲犧牲；第三是摧毀法國的軍事力量；第四則最後從英國奪取世界盟主的地位（在

向英國獻媚以使英國與法國以及歐洲一般的集體安全制疏離的最初階段之後。）

這些目標，在德國納粹統治者的附屬文件中以及計劃大綱中更明白地縷述着。在正式的計劃大綱中，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創始的理論家費得（Gottfried Feder）解釋這種目標說：

『一切日耳曼血統的民族，無論是在丹麥人，波蘭人，捷克人，意大利人或法蘭西人的統治之下，必須在日耳曼帝國中聯合起來。……我們決不放棄一個德國人，無論他是在蘇特丹（Sudeten）在阿爾薩斯羅倫，在波蘭，在國聯殖民地的奧國，或是在從前奧國的繼承國家中』（Fe-der: Das Programm der N.S.D.A.P.P. 42）

納粹政治學ABC同樣地說：

『第三帝國是未來的基督教日耳曼帝國，它將是中世紀日耳曼帝國和俾斯麥（Bismarck）第二帝國的繼承者，它並將把一切棲居於中歐的日耳曼人統一起來。』（國家社會主義政治

學ABC頁116, National-Socialist Political A.B.C.）

這種目標，在納粹的外交「專家」納粹黨外交組主任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的著作中，敘述得更為完備，特別是在他的二十世紀的福音（*Der Mythos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及德國外交政策的未來路線（*Der Zukunftsweg ein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兩書中。羅森堡說：

『種族的光榮要求着土地，而且是充分的土地……在這樣的鬥爭中，無足重輕的波蘭人捷克人等沒有考慮的餘地。田地必須為德國的農民而開拓。』（羅森堡：二十世紀的福音）

又說：

『未來的解決，在於造成一個諾迭克（Nordic）種支配的歐洲，以及一個日耳曼人支配的中歐國家（*Mitteluropa*）。德國是從斯脫拉斯堡（Strasbourg）到米美爾（Memel）從歐本（Eupen）到布拉哈（Prague）和萊巴哈（Laibach）的一個民族的國家，是大陸上的中心強國，是南歐和東南歐的保障者，斯坎狄那維亞國家和芬蘭是保障東北部的第二個聯盟；而大不列顛則是北歐種族利益上所必需的西部和海外的保障者』（同書，頁六〇二）

納粹政策究竟打算怎樣實現這些企圖呢？那方法是非常明顯地擬定着，約包括爲：（一）分化歐洲其他的列強，利用英國的支持以控制法國；（二）在德國邊境各國中組織分支的納粹運動，並運用恐怖的方法，如暗殺企圖反對納粹的政治領袖等（已經證明者如奧國陶爾斐斯總理，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羅馬尼亞杜嘉總理以及法國外長巴爾都的被害等，他們都是積極反對納粹侵略的組織者，而爲那與柏林有密切關係的法西斯黨徒所殺害）；（三）戰爭的準備，一當重整軍備的必要程序完竣和國際情勢成熟時，戰爭就要發動。這個政策成功的必需條件就是破壞歐洲現行的集體安全制。

德國整個的外交政策就是爲了實現這些企圖而不斷地進行着。根據了這個外交政策，它一再指責集體安全的整個概念，拒絕東方安全公約和非難法蘇協定，以及宣布『戰爭局部化』的原則。關於這，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希特勒的演詞中曾有所吐露，該演詞斥責着『集體合作、集體安全、集體義務等等的熱狂』，而宣布了一種相反的局面化戰爭的原則：

「因了國際相互義務的交織，戰爭局部化的可能便必然消滅，而把許多國家曳入紛爭中的危險也益形增大，當那時候，巨大的禍變將更容易引起了……」

「集體安全制是無力阻止國際間的紛爭的，尤其是在東方。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很難決定究竟誰是禍首。……但如果當戰爭爆發之初，其他的國家都立刻站到雙方之外，自始不受條約的拘束而滾入漩渦，那末對於和平就要有貢獻得多了。……今日的德國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是正受了一種與蘇俄完全相反的思想統制着。」（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在國會中的演講詞）

這種德國法西斯主義所宣傳的「戰爭局部化」的意義，實際上是非常明白的。希特勒所主張的雙務不侵犯條約，例如德波條約以及德國向東南邊境各國提出的同條約，其主要特點，就是對於第三國一旦受任何簽約國的侵略，並無有所規定以延宕他們的行動。換句話說，納粹政策所推行的「不侵犯公約」雖然作為中東歐的相互保障公約，在原則上可不是維持和平的公約，而只是牽制反侵略的集體防禦藉使納粹得以

一個個吞滅犧牲者的公約。具體地說，假如德國一旦進攻立陶宛或奧國或捷克的時候，其他的國家應當立刻照希特勒的話，『在這樣的戰爭爆發之初，都立刻站到雙方之外，』那就是，讓納粹德國和立陶宛他們自己去對等的交戰。當一個犧牲者在這樣原則下被完全吞滅的時候，這納粹的獨裁者於是更向第二個進展，這樣以至於匈牙利、南斯拉夫或羅馬尼亞，然後衡量情勢，最終乃至於西方，或者，在初步增強中歐局勢以後，就發動自許的反蘇聯十字軍，以征服『新的大陸和土地。』這就是法西斯『戰爭局部化』的原則。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在羅加諾公約撕毀以後宣布的希特勒『和平計畫』充分地實施了這些原則。依照這個提議的原文，安全保障可以在西方提出，只拒絕南方和東方。換句話說，不侵犯公約固然被認為非常適宜於英國和法國；但是不侵犯公約對於奧國、捷克或立陶宛却尤其適宜。為什麼有這種區別呢？如果不侵犯公約足為東南歐諸國和平的充分保障，那末在西方又何需乎互助的特殊保障？反之，如果說沒有互助的

拘束義務做後盾，西方一切和平與不侵犯的諾言只等於白紙，那末，這同樣的邏輯爲什麼又在萊茵東岸失其效力呢？這計畫明指的結論是毫無閃避餘地的。西方保障的義務，爲現階段上納粹政策所必需，以阻止法國出而援助歐洲各國或履行法蘇協定；那在東方和南方所主張的雙務不侵犯公約，只爲了離間這些國家的任何的共同防衛；這樣，納粹獨裁者就可以從容地擊倒每個犧牲者。這計畫本身所顯示的，事實上很明白是參謀部爲未來戰爭所定的策略，但爲了矇蔽國外，特別是爲了英國公衆之故，却裝點成一種『和平計畫』（不幸已爲英國許多部分的人士所深信，不但是公然親法西斯的份子，同時也有至今懵於歐洲真實情勢的和平主義者份子）。

保障西方以獲得在中東歐的自由行動——這是現階段德國外交政策一貫的趨向，（雖這仍不能防止西方突然進攻的可能。）英國的支持借『和平』爲名的西方公約，而拒絕中東歐集體安全制的任何義務，只是幫助了這個公然爲擴展而備戰的政策。納粹德國整個的軍事政策，也一樣明白地爲了實現這些目標規擬着。希特勒我的

奮鬥中所明白表示的侵略和擴展的野心，並不是空中樓閣的夢想，而是有着最有力量的大規模的重整軍備的程序做後盾。這種備戰情形，世界上還是初見。從納粹集團握權時起，整個德國內部的組織就以備戰為目標，規模之大，是任何國家所不能比擬的。我們已經引述過，據邱吉爾的估計，納粹德國自希特勒執政以來三年中所用於重整軍備上的費用，約達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這筆支出又釀成了嚴重的經濟問題，終至更加速了戰爭的迫近。

也許有人問着，在納粹德國公開的擴展野心和備戰的威脅之下，歐洲各國為什麼不團結一致維護歐洲的集體安全制，並授給德國以加入這樣集體安全制的機會呢？如果它拒絕，就應該結成一個合力抵抗的陣線，以使順利的侵略成為不可能。

那答案是在於兩個矛盾的因素之中，而妨礙了上述的陣線：第一，歐洲其他各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第二各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他們都以親善的目光注視着納粹集團甚至它的暴行，他們以納粹為他們反社會主義主張的代表。

西方帝國主義老練的政治家勞合喬治，也曾經自覺地一貫地提出跟希特勒階級聯合的主張。一九三三年，他已曾這樣說過：

「假如列強把德國的納粹主義推翻了，繼起的是誰呢？不是保守黨，社會黨或自由主義的政權，而是極端的共產主義。這自然不是他們的目的。一個共產主義的德國比一個共產主義的俄國要有力得多，就是因為德國人知道怎樣有效地實施共產主義的緣故。……他會請求政府慎重地去進行。」（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勞合喬治在巴摩斯 Barnouth 演講詞）

他於一九三四年又曾說：

「在很短的時間中，也許一年或二年，我國的保守黨份子必將視德國為歐洲反共產主義的堡壘。她正樹立於歐洲的中心，如果她反共產主義的防線崩潰，——二三年以前，德國一個著名政治家對我說：「我不怕納粹主義，我只怕共產主義」——如果德國被共產主義所統制，整個歐洲必將隨之因為德國人是比其他國家更善於進行共產主義的工作。我們且不要急急忙忙的來處分德國。我們應該歡迎德國做我們的朋友。」（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勞合喬治在下院中的演講詞）

這種公開反動的呼籲，正爲希特勒所一再利用，以獲得各國對他侵略野心的支持，以隱蔽各國布爾喬亞對他們自己利益的直接威脅的判斷。

就是在那受希特勒直接威脅的法國，那反動的法西斯和布爾喬亞親法西斯的份子，也公然地支持着希特勒，不但違反了法國人民或法國安全的利益，同時還違反了法帝國主義在歐洲威權的利益。在這個階段上，證明了階級觀念是強過一個克里門梭（Clemenceau）或一個普恩加賽（Poincaré）的傳統主張。這些份子以拉佛爾（Laval）泰狄歐（Tardieu）拉羅格上校（Colonel de la Roque）等爲代表，他們主張法國與希特勒合作，聽任他在東歐的自由行動，即使犧牲了法國在歐洲的聯盟也不惜。鋼鐵委員會（The Comité des Forges）法國金融資本最有力的分子，和法國法西斯主義的主要撐腰者，會不斷的將羅蘭的鑛鐵供給希特勒，使他得以重整軍備。但正跟這相反，現行參謀部的主要勢力，却看到這種與納粹侵略合作的行徑是自殺的。並且還將替希特勒開了吞併法國力量和稱霸歐洲的先路，因此，意見雖仍分歧，現在終於維

持着法蘇協定的主張。但全面的問題終是受着法國內部社會政治衝突的牽制；只有到了人民陣線的力量在一九三六年五月選舉中獲得了壓倒的勝利，這纔完全挫敗了法國布爾喬亞反動派破壞法蘇協定的運動。

在英國，這種對希特勒的階級支持是還要來得顯著。City是公開親希特勒的，並且在經濟上與納粹集團有密切的連繫。英蘭銀行（The Bank of England）曾經資助德國的重整軍備（參閱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五日金融新聞 Financial News 所載關於「德國重整軍備的財政」的幾篇論文）；維克公司（Vickers）也曾積極幫助德國整軍（參閱一九三四年年會中主席勞倫斯（Sir Herbert Lawrence）對「股東質問的答詞，該股東質問公司是否曾經幫助德國的重整軍備」，他回答說：「我不能確定的給你以保證，但我可以告訴你，沒有得到我們自己政府的裁可和同意是什麼都不能做的。」）諾曼（Montagu Norman）和沙赫特（Schacht）的關係更是一向密切的。

英國對希特勒和德國重整軍備的支持，是由英國外交政策的一般原則所決定的。

自從凡爾賽和約以來，英國曾一貫的支持德國勢力的恢復，以平衡法國在歐洲的勢力。同時又設法把德國拉入西方反蘇聯的陣營。希特勒的握權正是推進這個方針的機會。在形勢完全變更了以後，那凡爾賽和約的不公平，忽然為英國布爾喬亞的幹部所發現了。從前曾經嚴厲地拒絕弱小的國防空虛的而酷愛和平的民主德國的，現在却親切地盡量傾給武裝的、侵略的以及正在公開備戰的納粹德國了。樂鄉勳爵的話，正說明了英國統治者的主張：

『德國必須給她以一個適當的國家地位，這個國家應當是歐洲最有力的一個。』（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樂鄉勳爵在上院之演詞）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太晤士報關於『英國外交政策』的社論，曾再三對上述的話加以贊許，認為是英國目標的一種精確的解釋，並且說『凡爾賽體系是已經試驗過了，但它不能給予歐洲的和平，』同時更進一步的補充說，要是西歐的安全有了保障，現行的情勢：

『却並不課英國以担負盟約中每項所規定的一般義務。老實說，沒有一個國家會願意使盟約第十條或第十六條在到處發生實效的。』（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太陽報關於英國的外交政策的社評）

這樣，不但是凡爾賽和約和集體安全制給公然拋之九霄雲外，就是舊時均勢的主張也給放棄了：承認德國是歐洲主要的強國，與英國相聯合，並給它在中東歐以行動的自由。這樣，由於其他各帝國主義列強的分裂，由於各國特別是英國統治階級有力部分的支持，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納粹德國雖因其發動力量的脆弱，和公開的侵略野心，終於得以一步一步的擴大其侵略，並一步一步的獲得成功，每個階段替第二次戰爭開着路，增加着戰爭的威脅。

第一個階段是開始一九三三年重整軍備的程序和拋棄國聯。一當納粹政權樹立之後，英國首相就馬上急忙忙的跑到日內瓦去呼籲『德國的公平』，同時提議加倍擴增德國的陸軍和裁減法國的陸軍（英國的『裁軍』計畫），然後又到羅馬去拉攏墨

沙里尼，以進行四強公約（Four Power Pact）或西歐帝國主義集團的計畫。

第二個階段是一九三四年一月的德波協約，奠定了反蘇聯的基礎。從此後，波蘭報紙曾發表許多關於共同分割蘇維埃烏克蘭計畫的材料，而戈林在波蘭的『田獵會』中更曾加以詳密的策畫。

第三個階段是一九三四年七月以刺殺陶爾斐斯來擷取奧國的企圖，以及德國所組織的納粹暴動。這企圖因意大利的反對和動員軍隊，結果是失敗了。這個時期的特點就是自希特勒在前一個月殺害他自己的親信的事變後，引起了英國對納粹德國暫時冷淡的感情和英國政策轉變的朕兆。對蘇聯加入國聯的支持，和那一九三五年二月的英法協定，就是這種新動向的說明。英法協定主張歐洲的一般義務，並包括了東方安全公約。可是一當德國拒絕接受，支配英國政策的勢力却又很快的冷淡了東方公約，而宣布它等於廢紙了。

在一九三五年初薩爾（Saar）投票收回之後，在重整軍備程序完成的兩年之後，

第四個階段是第一次公然向西方列強的挑戰——一九三五年三月的軍事法令恢復徵兵制並推翻凡爾賽和約的軍事條款。這個行動的反響逼成了英法意在一九三五年四月斯特萊薩會議 (Stresa Conference) 中聯合的判決，而同月在日內瓦國聯決議裏更判爲片面破壞條約。斯特萊薩會議的決議重申了二月英法協定主張據許多方面所傳，所謂「斯特萊薩陣線」就這樣的形成以反抗納粹進一步的侵略和破壞條約。事實上，英國政策却造成了這種陣線的虛妄。不出德國軍事法令公然挑戰的十日之內，英國外長西門果以「最親善的精神」跑到柏林去訪問希特勒了 (Communiqué)；而在六月中，更繼之以英德海軍協定，這對於凡爾賽和約和四月中的國聯決議案是一樣的挑釁，而這兩者就是英國所曾正式贊助的。

第五個階段是一九三五年六月的英德海軍協定，重建德國的海軍，佔世界最強大的英國海軍力的百分之三五，並允許德國以潛水艇與不列顛帝國相等的權利。根據潛水艇威脅的戰爭經驗，這樣的協定，從英國的利益着想實是不可解的，除非英德諒解消

除了對英國利益任何迫切的威脅，而只以建立德國在波羅的海及波羅的海諸國的統治地位爲目標。

第六個階段是一九三六年三月羅加諾公約的毀棄和萊茵的重行設防。這個打擊完成了以前德國有限力量的破壞，而一旦萊茵的礮臺告成，更替未來侵略戰爭留了地步，無論是在西歐、中歐或東歐，那須視情勢而定。一九三六年春隨後在倫敦舉行的談話中，英國公然自任爲納粹德國的辯護人，以反對法國（法國的代表曾在某一點上以離會相威脅），並主張接受德國新西方公約的建議，而對於西歐以外的安全，却不主受任何的約束。在這個基礎之上，英國並召集三國參謀部談話，給予法比在西方以軍事上的保證，同時在歐洲的其餘部分，却聽任它受戰爭的威脅。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希特勒隨後提出的『和平計畫』，我們已經分析過，貫徹了納粹挑戰的一般原則的戰爭準備，只提議着西歐部分和平的保障。這計劃受了英國官方和半官議論的熱烈歡迎；但是，一九三六年四月法國提出的相反計畫，主張建立維持全歐洲和平的集體義務，却不大

注意的給拒絕了。接着舉行的英德談話，那是爲了完成萊茵重行武裝程序和開始建築礮臺。

從上述六個階段中，可以看到納粹侵略繼續擴大的進展，以至戰機日迫。下次的打擊究將落在那裏呢？這個問題目前正脅迫着歐洲。有許多人猜想下次的打擊也許要落到奧國或捷克，在第一處經過內部納粹暴動的形式，造成直接干涉的機會。但由於情勢的非常複雜，這樣急切發展的假設也許是不可能的。據荷蘭報紙發表的半官消息，納粹侵略戰爭根本的軍略，約有三個可行的計畫：第一，戈林的計畫，與波蘭聯合，東向進攻，以併吞波羅的海諸國和征服「蘇維埃烏克蘭」；第二，主張併吞奧國的進攻，並與匈牙利聯合以分裂捷克，同時由波蘭和日本進攻蘇聯；第三，通過荷蘭和比利時的西向進攻計畫，萊茵的重行武裝就是此着的準備，據許多別的報告，說是通過瑞士。但這樣直接的發動戰爭，只能在國際形勢極端混亂的一霎那，當反對勢力的共同陣線到了總分裂的時候，當備戰的程度有了優越的強固自信的時候。同時，那擴展的進行還有賴於進一步的

重整軍備，有賴於鄰國中納粹分支運動的加強組織，有賴於分裂歐洲集體安全制度的企圖，有賴於拉攏聯盟國家的現行區域公約，以及英德的繼續合作，以獲得經濟上外交上的支持和收回德國戰前的殖民地。恢復戰前德國殖民地問題，已公開地成了德國目前階段上最迫切的要求；在英國官方的宣言中，很明白的顯示着英國政府是正在準備這一着。殖民地的恢復，自將更形加強了德國的備戰。

納粹侵略擴展以及一般法西斯修約派侵略的威脅，給歐洲許多小國的面前放下了日形尖銳的問題，因為他們都有被併吞或分裂的危險。那些二等或較小的國家，曾經不斷地企圖組織區域的公約，以共同防禦侵略。這種集團最老的第一個，就是小協約（Little Entente）包括了德意匈修約野心威脅之下三國繼承的國家——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第二個是巴爾幹互助公約（The Balkan Pact of Mutual Guarantee），那是希特勒執政後所組織而最後於一九三四年二月簽字的。這公約聯合了土耳其希臘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以反抗意德在巴爾幹的野心。第二個是愛沙尼

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波羅的海公約 (The Baltic Pact) 於一九三四年九月簽字。第四，斯坎狄納維亞的國家也密切地聯合起來定了一個協調的外交政策。還有，國聯中所謂「中立國家」的集團，如西班牙、荷蘭、瑞士和斯坎狄納維亞諸國，對於通過國聯的集體安全問題，也採取着一個共同的政策。

但在另一方面，法西修約派侵略勢力的侵入以及特殊國家個別的投降也是顯而易見的。法西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直接地跟法西修約派的侵略聯合着。自一九三四年德波協定後，波蘭也與納粹德國相聯合，雖然那法波條約 (Franco - Polish Treaty) 還仍舊維持着。芬蘭、法西黨與納粹德國有着密切的關係。納粹政策設法拉攏南斯拉夫以拆散小協約；在羅馬尼亞，那曾經刺殺杜嘉總理的親納粹的『鐵衛』 (Iron Guard) 正竭力活動着推翻現行的統治集團以攫取政權。在丹麥，納粹的勢力有着事實的證明，因為當一九三五年四月國聯決議判決納粹破壞條約時，丹麥也是拒絕投票的一國。在英國勢力統治下的瑞典，保守黨是強烈地親納粹的，而瑞典的報紙，且

公開地宣言瑞典的前途是繫於「英德波集團」。在比利時，英國的勢力也很強大，齊蘭（Van Zeeland）政府也有着同樣的傾向。

環顧歐洲目前的形勢和納粹擴大侵略的前途，可知英國外交政策的決定任務，是更形迫切了。直到現在為止，使納粹侵略得能順利進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國民內閣支持下英國政策的作用。這種影響並造成了許多小國個別的猶豫和投降。要是英國能夠採取斷然的態度，而與法蘇和一切愛好和平的小國相聯合，以集體維持全歐的和平，那末，結果不但可以阻止納粹的侵略，而且因和平力量的平衡，一定還可把一切動搖中的小國甚至於波蘭（那裏對於所採政策的意見是非常分歧的）拉到強固的和平集團中來，這樣，最後便可逼得德國也加入集體安全制了。但到現在為止，每到要緊的關頭，英國政策終是傾向到平衡的另一端，這樣便幫助了納粹的侵略，使小國的抵抗力量趨於削弱和萎靡不振，因而加速了戰爭的迫近。

這種英國國民內閣的政策，曾引起了劇烈的反對，不但是廣大的民衆，他們固無愛

於純粹的德國；不但是一切觀察清楚的維護和平者，而且也有統治階級的分子，包括着保守黨，他們看到了納粹稱霸中歐對於英國利益的最後威脅，而主張着歐洲的集體安全。這樣，在支持法西斯戰爭的陣營和無論出於何種理由維護集體安全的陣營（包括各種極端不同的分子）之間，分歧是在發展着。這種關係英國外交政策將來的鬥爭繼續在進行；而在英國，正同法國一樣，要是聯合的勞工階級陣線能夠奠定，要是反對支持希特勒和戰爭的政策的民衆勢力能夠聯合起來，那羣衆運動在最後結果上是有着決定的作用的。這次鬥爭的結果，對於歐洲乃至世界必將有很大的影響。

第八章 蘇聯與世界

「蘇維埃政府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一個國家政府。法國政府是法國的，德國政府是德國的，但俄國政府卻有着不同的意義。法國政府和德國政府，像我們自己的政府一樣，只是爲了推進她們自己國家的利益，而並不顧及其他國家的利益，除非這種利益影響到她們自己身上的時候。」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葛雷 Grey 子爵在上院演說詞。

自一九一七年後，世界劃成了兩大部分——社會主義的世界和資本主義的世界。在十九年中，這個不同的對照是一步步的明顯了。除開了資本主義世界綜合的危機和衝突，社會主義世界却在日益增強地進展着。在今日，這個對照打動了任何人的注意。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問題，根本左右着世界其他任何的問題。

現代世界的劃分爲社會主義部分和資本主義部分，是世界政治上的一種新形勢。

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的勝利，以及大戰結束後幾年中它在別國的失敗，造成了一個特殊的過渡的階段。這個過渡階段引起了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關係間特殊的新問題，並且關連着別國向社會主義的進展和世界社會主義秩序的實現。帝國主義以並不友誼的目光注視着社會主義的勝利，在過去，曾經一再想以武力推翻它，而在將來，是還想重作這種嘗試的。蘇聯因與國際勞工階級相聯合，曾經在過去挫敗了這種進攻，而現在是更形強固，在將來也是能夠擊敗他們的。爲了抵抗各方面的進攻，蘇聯竭力與資本主義世界維持着和平的關係，因爲如能每年保持和平，可以增強社會主義和國際勞工階級的前進，而世界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則只能由各國人民自己去決定。在目前，蘇聯依然是世界社會主義的本營，是給社會主義造就現存的榜樣，是各國勞工階級的兄弟，同時也是爲和平而奮鬥的領袖。

本書不擬檢視那正在蘇聯成長的新文化的成績，這得讓另一本書去研究。我們在這裏所涉及的，只是那因世界的劃分爲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因社會主義在

蘇聯的勝利，以及因帝國主義和蘇聯間關係而引起的世界政治的問題。

一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

蘇維埃政權的建立，代表着一種新的主義在歷史上第一次的勝利（半世紀以前存在不久的巴黎公社 Paris Commune 已經預示着）——那由工業勞動階級領導下的勞動大眾的統治，以生產手段公有為基礎，代替了以前少數私有階級的統治；那以前的統治，是以生產手段作為階級私有，以及對勞動大眾實施剝削為基礎的。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勞動階級在工人的黨，或布爾什維克黨（現在稱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的奪得政權，造成了這個轉變。那工人、士兵和農人的羣衆機關的蘇維埃，自最初發展成爲爭取政權的機關後，不久又成了新政權的機關，至今還是它的基石。因這種階級政權基礎的變更，隨着什麼都經變更，而終使以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成爲可能了。

新蘇維埃當局的第一要務，是樹立並維持它的政權，以抵抗它內外的敵人。第二要

務是奠定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以爲達到未來無階級社會的準備。

帝國主義對蘇維埃新政權的關係，自始是公然仇視的。所有帝國主義的勢力，德國、英國、法國、美國和日本，都發動了它們的武力以進攻新政權。他們用盡了各種方法推翻它，或以武裝的暴力，或以大軍的征伐，或以封鎖，或以資助反革命和匪徒的勢力，或以組織恐怖主義、暗殺、捏造事實和怠工等。在這個時期中，武力推翻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企圖，是公開宣言着的。科爾却克(Kolchak)鄧尼金(Denikin)友登尼區(Yudenitch)以及其他許多人都受着協約國金錢、物質和軍火的接濟。武裝的征伐隊從各方面侵入俄國的境界。精密的軍略上的計畫都定了出來。據勞合喬治後來的報告，單是英帝國主義，就曾化了一萬萬鎊的金錢，用於推翻布爾什維克的政權。太晤士報說：

『我們必須比過去更盡力的支持那在俄國爲其人民的權利而奮鬥的各種軍隊……這是一個十分完備的計畫，如果我們能够努力實行，那末，便能阻止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擴展，且可使之

崩潰的。』(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太晤士報)

可是這些帝國主義早就存在的希望，却注定了是要失望的。雖在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勢力優越的物質條件之下，經過了長期的和拚命的鬥爭，他們的進攻終於給俄國工人和國際勞工階級的聯合抵抗所挫敗了。這次勝利是由於俄國大眾對於革命的熱誠和英勇，他們爲了維持自己的土地和統治，以及反抗可惡的剝削者的重返而奮鬥着；是由於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分裂；是由於白黨軍官的腐敗和無能；以及由於各帝國主義國家內部革命運動的蠶起，阻滯了帝國主義的計畫，各國階級覺悟的工人都自覺地與俄國革命聯合而奮鬥。誠如一九二一年列寧所說：

『只因爲革命席捲了世界，國際布爾喬亞是再也無力阻撓我們了，雖然在經濟上在軍事上他們都是百倍的強過我們。』

一九二一年，帝國主義和反革命的主要勢力都給打敗了，而蘇維埃共和國就成了它領土內無敵的主人。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武力上第一輪的搏戰，終之以社會主義勢力的勝利。蘇維

埃政權是維持了。但是，接着那鬥爭却突入了經濟的範圍，突入到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設的艱業上。這個在自己場合上的鬥爭，嚴厲並不減於內戰。除了從腐敗的沙皇專制下繼承而來的全國低落的經濟水準，除了舊俄的齷齪、疾病、文盲和飢餓，以及未經開發的富源和對別的工業國家的倚賴性，七年的戰爭，內戰和封鎖，又從各方面添增了大批的困苦和貧窮。在敵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環伺之下，在落後他們數世紀的情形之下，這份社會主義建設的艱業現在所接受的遺產，只是在新世界的進程中放下了無數經濟的和財政的障礙，正同繼續的戰爭威脅一樣。以後十年中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就是反抗着這種環境，以實現它在世界歷史上全部的意義。

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步，就是取消那為應付內戰和干涉戰爭的需要，而暫時採行的所謂「戰時共產主義」或定額徵發制，而代以一九二一年的新經濟政策（一九一八年列寧本已預定為第二步驟，但因內戰和干涉戰爭而延擱起來。）新經濟政策在當時曾被資本主義世界廣泛地誤解為退却；實際上這是奠定了五年計劃進展的基礎。新

經濟政策是原始農業和落後工業國家中建立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它的策略就是把經濟的力量——如銀行、大規模工業、運輸、外國貿易，以及一般經濟的統制等——集中於工人國家的手裏，在小型經濟的範圍中，仍讓私人貿易自由存在着，而只一步一步的由新的集體組織去代替。因此，在開始的時候，國營和合作社的部分，或集體的部分，較之私營部分實是佔了很少數。但是國營和集體部分的比例日益進展着，直至那最後，條件適於第一次五年計畫的實施，適於大規模集體工業和農業集體化的發展。

在這時期中，帝國主義武力推翻蘇維埃政權的企圖既告失敗，乃轉而希望新政權之經濟的崩潰，及其向資本主義必然的投降，一面即行計畫着經濟的侵入。這些希望，由於蘇聯為取得其國家發展上的助力（實質上雖然很微）授予外國資本家以工業的「特權」而更形興奮起來。一九二一年十月，英國財政部長霍恩（Sir Robert Horne）曾很坦白地宣布了這新的策略：

「摧毀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最好的途徑，就是用高尚的商業方法侵入這巨大的國家。」

一九二二年基諾亞會議 (Genoa Conference) 的企圖，也是受這同一的策略所支配。著名財政權威英國駐柏林大使阿倍農 (Lord d'Abernon) 在其一九二二年五月的日記上記着：

『俄國是全部崩潰了，在未來的許多年中，是不能繼續進行大量的貿易了。』(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七日阿倍農日記，一個和平的大使 An Ambassador of Peace 頁三二七。)

一九二四年十月，英國保守黨領袖鮑爾溫進行着通過德國以開拓蘇聯市場的計畫，企圖從俄國工農取得戰債和賠款最後的償付：

『就我看來，我們所要分享的世界貿易，最好的辦法當是由德國去發覺俄國的貿易——她把俄國當作了市場，出超的收入便可作為償付賠款之用，因而也可多少償付我們對美戰債的利息。』(鮑爾溫在紐卡塞爾 Newcastle演講詞，載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日晨郵報)

這種認定社會主義在俄國的崩潰及其必然回復於資本主義的見解，當一九二四年還仍在資本主義者的圈子裏廣泛地傳佈着：

『這現行的制度是不能維持的。蘇維埃俄國，雖然其名義上的政府制度已存在了幾年，但是必將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的。』（茹文 J. L. Garvin 語，見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觀察者。）

然而這種帝國主義的希望，卻注定了是失望。一九二七年經濟學者的俄國增刊，不得不記了掃興的結論：

『經過了九年之後，國營工業和貿易的原來蘇維埃制度，依然是穩定的。國營化的變更雖然很多，但比較是不重要的。關於國營問題的原則，並沒有所削弱。在資本主義面前的退却，就外國人看來雖然很大，但在俄國國內卻顯得很小。國家在大工業上的優勢是非常之廣大的。』（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九日，經濟學者俄國增刊。）

這“City”主要機關報俄國增刊所無法抹煞的數字，就顯示了真象。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從事國營大規模工業的工人數為二、六八五、〇〇〇，而替私人資本作工的工人數則為六三、〇〇〇；只有在小規模工業中，私營企業仍擁有工人二四

〇、〇〇〇名，而國營的則爲三〇、〇〇〇名，合作社的一五〇、〇〇〇名，出口貿易全部是在國家和合作社的手中。即使是對內貿易，也有百分之三四是在國家的手裏，百分之四二在合作社的手裏，只有百分之二三是在私營商人的手裏。（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爲百分之四〇。）

這樣到了一九二八年，第二個階段的條件是成熟了：大規模工業化在工人國家手中的發展，以及農業的集體化，那就是最後脫出了國家的落後性，破壞了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根基。這是第一屆五年計畫的事情：第一屆五年計畫開始於一九二八年的年底，而以四年三個月的時間，完成於一九三二年底。現在，那社會主義建設的飛躍進展，已開始震驚世界了。

第一屆五年計畫的結果，使蘇聯從技術落後國家的地位，一躍而登歐洲第一工業國和世界第二工業國的地位。一九三三年的年初，斯大林報告一九三二年蘇聯的工業生產，竟三倍於戰前俄國的水準，而兩倍於一九二八年的水準；在同一年中，美國的工業

生產却只佔戰前的百分之八四，和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五六，英國佔戰前的百分之七五和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八〇，而德國則佔戰前的百分之六二和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五五。新的重工業發展着，曼納妥高斯克 (Magnitogorsk) 鋼鐵廠，烏拉爾—庫茨納 資克 (Ural-Kuznetzk) 的新魯爾 (Ruhr) 聶伯羅斯脫洛葉 (Dnieprostroi) 電力站，斯大林格勒 (Stalingrad) 和哈爾科夫 (Kharkov) 曳引機廠，高爾基 汽車廠以及鮑不列基—勃列斯尼基 (Bobriki-Beresniki) 化學工廠，就是許多巨大工廠中最先樹立的幾個。在國家總收入中，工業所佔的比率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二四昇為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四五。社會主義部分在工業總產額中所佔的比率昇到了百分之九九。還有在根本意義上更重要的，就是四分之三農業的集體化，大規模的集體農業經濟代替了原始的小型農民經濟，這種經濟的方式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是從來不知道的：二〇〇〇、〇〇〇處的集體農場和五、〇〇〇處的國家農場組織起來了。播種的面積增加了二千一百萬公頃。社會主義部分在農業總產額中所佔的比率從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

三昇到一九三二年的百分之七五。國家的總收入是加倍了。社會主義部分在國家總產額中所佔的比率從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四四昇到一九三二年的百分之九三。文化上的發展也跟這同樣進行着。工資增加了百分之六七。社會保險基金增加了三倍。沙皇時代的文盲也肅清了，到了一九三二年，已有百分之九七的成人能讀能寫，二千一百萬的孩子進了初級和中等學校，一百萬以上的學生進了大學和高級專門學校，日報的銷數從一九一三年的二百七十萬份和一九二八年的八百八十萬份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三千六百萬份。醫藥互助處的數目從一九二八年的一、九四二增至一九三二年的五、四三〇；醫生的數目從一九一三年的一九、〇〇〇增至一九三二年的七六、〇〇〇。

資本主義世界也不得不承認這歷史上空前的成績了。一九三三年的威斯忒敏斯特德銀行評論 (Westminster Bank Review) 這樣記述着：

「蘇俄已達到了驚人的進展，根據官方數字，現在已列入第二工業國家了……蘇俄共和國

依照了五年計畫工業建設的政策，使自己與今日世界貿易漸進的停滯狀態相隔離，因此在五年計畫時期中，使俄國的工業生產額幾乎增加了兩倍。這是最可驚的同時也就是最有意義的成功。』（一九三三年五月，威斯志敏斯德銀行評論）

這銀行家的雜誌又記錄着世界工業生產額中各國所佔比率的變動：

世界工業生產額的百分比

	美國	蘇聯	英國本部	德國	法國	日本
一九二八	四四·八	四·七	九·三	一一·六	七·〇	二·四
一九三二	三四·五	一四·九	一一·二	八·九	七·〇	三·七

鑒於這一相對力量的轉移，帝國主義開始改變它的論調了。說俄國經濟在社會主義統治下的崩潰及其必然回復於資本主義的舊日宣傳，是取消了代之而興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威脅』的新宣傳，說它大大的超過了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是無力與之競爭的。他們又虛構了許多關於由『奴隸勞動』（Slave-labour）所生產的蘇維埃工

業品在將來廣大『傾銷』的情景。一九三一年，太晤士報的社論引用一個商界的『領袖權威』的話說：

『如果世界的其餘部分不要共產主義，那末就應該一致拒絕以任何的方法與俄國通商，因為沒有幾年以後，一等到現在正在建立的所有工廠全部工作的時候，由於其國家內部廣大富源和一萬五千萬人民力量的結合，他們不但可以供給俄國人民所需的一切，並且還將以低廉的貨物壓倒全世界，那是其他工業國家不能與之競爭的。』（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太晤士報）

那社論又繼續說：

『倘使俄國……能夠繼續照現在的速度工業化，別的國家只有也把他們的生產和商業像俄國一樣大規模地組織起來，纔能與之競爭。』

英國首相鮑爾溫，由其秘書對製造業協會的訴願回答說：

『鮑爾溫先生正分擔着你們對俄國在本國工業上競爭的憂慮。照他看來，這個國家對於大不

列顯的經濟發展實是潛在的大危險。他覺得俄國競爭的威脅，多半是受了強迫勞動的支持，是必須予以克服的。俄國貨物的傾銷，還沒有達到五年計畫完成時所做到的程度。鮑爾溫先生在牛頓寺院（Newton Abbot）演說時會明白的指出，必須在這個時候到臨之前採取行動。他將提議以關稅的方法來對付這個問題，或者，如果必要的話，禁止俄國貨物的輸入，即使違反現行的條約，也所不惜。」（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日太陽報）

但這『傾銷』和『強迫勞動』的觀點，是並不為專家的意見所苟同的，如阿根廷代表在一九三一年世界小麥會議（World Wheat Conference）中所說，把這種威脅歸根於一個『經濟革命的制度，』因為這統一了生產，和『消滅了中間人（Middleman）』。

『他懷疑着是否可以說蘇維埃共和國是在實行傾銷，或甚至說俄國生產品的低廉是由於強迫勞動。他個人的意見以為這是蘇維埃政府所施行的一種經濟革命制度的結果，這取消了中間人，而單獨負起農產物的播種、耕耘、收穫、運輸乃至出售的責任。』（阿根廷出席羅馬世界小麥會議代表貝列茨，Perez 見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太陽報）

這樣，不是社會主義的無能，倒是社會主義的效能，從此成爲資本主義者怨恨的負

擔了。每個資本主義者論點的第一前提，就是社會主義生產無敵的優勢。他們從這裏推定摧毀社會主義的必要。反蘇聯的宣傳和公開的戰爭的煽惑，在一切反動的資本主義者的言論中，現在已開始日益彰著了。

這種論辯是值得探討的，因為這於整個將來有着根本的重要。它對於現實——就是蘇聯的輸出在世界輸出中還佔着很小的成份——的荒唐性和『強迫勞動』的奇談，與根本事實並不相符。對於威脅的競爭，資本主義的宣傳家自五年計畫以來就表示這樣的恐懼，究竟是爲了什麼呢？從一個長期受着落後發展阻礙的國家中，怎麼會弄得這樣危險呢？據一般所說，威脅的產生，因爲這裏出現了一個擁有一萬六千萬人民的巨大的國家經濟組織的新現象。然而，所有資本主義的權威，曾經從成千的演說中和成千的教科書中教訓過，任何的國家經濟組織是完全無力的、無效的、浪費的、不生產品，而各方面不適於跟私營企業相競爭的。那末他們怎麼又害怕牠的競爭呢？但是進一層的說明又來了：那競爭是威脅的，因爲這種國家組織能夠利用『奴隸勞動』而資本公司却必

須爲工資勞動付錢，因而不能相匹敵。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階級對另一階級的『自由勞動』正具有實際的奴隸性，而在無階級社會中，工人則是所有者兼統治者；上述詭辯的根據，就是在於不能辨別資本主義社會中真實的奴隸性和無階級社會中集體的教條。即使承認了這個前提（奴隸勞動），那結果是怎樣呢？據說競爭的威脅，是由於『奴隸勞動』所引起的；但是奴隸勞動是最不經濟的最浪費的最無效率的勞動形式，一當與工資勞動競爭時，是必然趨於破滅的，這是每本經濟教科書的常識，並不是現時理想的學說，而是有經驗根據的。

老實說，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給予了資本主義以一個嚴重的打擊，既不是由於牆壁虛造的『傾銷』，也不是由於同樣無稽的『奴隸勞動』，而只是由於證明資本主義的破產和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的優越。資本主義世界的理想家是陷於不知所從的窮途中了。他們也想放棄一切他們反社會主義的宣傳，而承認蘇維埃經濟組織是更科學的有效的組織，就是說：這種勞動的形式顯然遠勝於所謂『奴隸勞動』，而是較高的勞

働形式（斯泰哈諾夫運動便是明證）並且還超過了工資勞動，像工資勞動的超過奴隸勞動一樣。或者，他們也想放棄他們對這新式組織的「經濟威脅」的宣傳；但在事實上，他們却兩者都運用着。他們竭力堅持着這種組織形式的絕對無效性和奴隸性，同時又堅持它的競爭對於資本主義工業是無上的威脅。他們之所以這樣利用兩者的詭辯，立刻顯示着這只是宣傳家爲了掩飾日益深刻的矛盾罷了。

在這些「傾銷」、「奴隸勞動」、「強迫勞動」等等宣傳家口中玄妙的詭辯的後面，更深刻地潛伏着在社會主義勝利前面資本主義日益衰微的真正的恐懼。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危機，隨着生產的低落和大衆的失業，跟五年計畫隨着生產的昇騰和失業的消滅而同時展開着，這個對照粉碎了一切的幻想。帝國主義曾經有一次組織了「防衛陣線」（Cordon Sanitaire）以反抗蘇維埃制度的傳佈。在今日，蘇維埃制度反資本主義危機的一種新型的和平的「防衛陣線」却已顯示了，那就是對於社會主義不可思議的範疇，資本主義世界澎湃的經濟危機是不能通過它的；在資本主義世界之無

政府的破壞的和紛爭的黯淡氛圍中，它卻維持着一個健全的、和平的、建設的世界。一九三一年，英蘭銀行的經濟顧問會對這種資本主義衰落和社會主義發展的日益深刻的感覺加以解釋，他宣稱除非在資本主義範圍之內能夠做到幾種『有計劃的整頓。』

『本國的前途是只有慢性的衰落——但如果能够把個別的西方世界一般化起來，那末，這種慢性的衰落，也可能屬於正在俄國發展着的敵對的政權的。』（英蘭銀行經濟顧問斯不拉格

O.M.W. Sprague 在英語協會中演說，見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三日太陽報。）

在社會主義發展的第二個階段——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第二屆五年計畫的階段中，這種對比是更形顯著了。當第一屆五年計畫的時候，蘇聯人民還必須自覺地犧牲目前的利益，還必須用盡一切的力量，樹立那沒有資本沒有進益的重工業的基礎，還必須對付富農抗拒下農業集體化的第一個階段的困難。但到了實施第二屆五年計畫，因各方面繁榮的蒸蒸日上，努力的果實，已開始成熟了。重工業的基礎已經奠定，現在是可以推進輕工業和消費品生產的發展了。第二屆計畫的目標，是包括了兩倍生產

品的生產，增加消費品生產二又三分之一倍，使大規模工業的生產總額比戰前增加八倍以上；農業的總產額也是兩倍，穀物供給增加百分之五十，肉類增加三倍；此外兩倍實質的工資，三倍住所供給的費用，並增加社會服務的費用約四倍。蘇聯共產黨第十七屆大會，解釋第二屆五年計畫的『基本政治任務』說：

『根本清算資本主義成分和階級的關係，徹底消除產生階級歧視和剝削的根源，克服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在人民心理上的殘餘，而使全國的人民成爲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自覺的和積極的建設者。』

因着第二屆五年計畫成功的進展（現在正是它的第四年）——因着繁榮和『生活的愉快』（斯大林報告現階段的蘇聯和斯泰哈諾夫運動的意義時語）顯著的增加，以及因着像斯泰哈諾夫運動技術發展的新生活現象的出現——這不僅是單出於技術的專家，而是創見於工人們自己的工作——那資本主義世界對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日益急切不安的情緒，是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按下不提什麼『傾銷』

等等的惡魔了。社會主義部分在世界經濟平衡上的相對重量，每年每年的增加着。社會主義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間大眾生活情形的對比，每年每年的顯著起來，而且影響於各國。因着重工業的發展，社會主義世界在經濟上已能離資本主義世界而獨立了。再經幾年的發展，它在軍事上也將成爲完全無敵，而決不能爲脆弱的資本主義世界所攻破了。這種思想開始在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的反動階層中急切地發展着，且因經濟危機和長期蕭條的影響而日益加甚。他們以爲惟一所剩的武器，就是回復於從前干涉戰爭時所曾失敗的直接進攻，那就是，趁着現在帝國主義武力還佔優勢的時候，以更一致的策略，發動反蘇的戰爭。納粹德國和軍事法西斯的日本，正在各據一面，準備着這種武器和辦法。同時，也就是一切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國的有力份子，正在加意進行的新策略。

二 法西斯帝國主義的反蘇聯十字軍運動

自從干涉戰爭失敗以來，那進攻蘇聯以使之崩潰的企圖，並不會爲帝國主義的反

動份子所放棄。這不僅是『白黨保衛份子』(White Guards)及其在倫敦、巴黎、柏林、紐約或東京的有力支持者的問題，不僅是公開國家主義者和侵略主義者像羅塞密爾(Rothermere)和赫斯脫(Hearst)之流的問題，不僅是軍閥份子像福煦(Foch)和魯登道夫(Ludendorff)之流的問題，也不僅是直接代表金融資本利益份子像第脫亭(Deterding)和克魯吉爾(Kreuger)之流的問題。這同樣的主張，並且一而再的表現於政府的態度，以呼籲和外交談判的形式，促成帝國主義反蘇聯的聯合陣線。這種敵對的領導權，完全操之於英帝國主義最有力的份子，因為她是擁有全世界利益的最自覺的世界強國，自從干涉法國革命以來，就抱着摧毀世界任何革命運動的根深蒂固的傳統主張；她是世界反動勢力的中心，而現在正擔任着戰後帝國主義反對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爭的根本任務。在戰後時期的每個重要轉變點，這種傾向會一再的表現於英國的政策，不僅是在積極的領導干涉戰爭，並且還表現於連續的外交行動中，如一九一三年寇江(Curzon)的哀的美敦書，如一九二四年齊諾維夫(Zinoviev)的僞文

書，如一九二五年羅迦諾的策略，如亞科斯（Arcos）的侵襲及一九二七年的決裂，如一九二八年遣赴柏林的柏肯黑德調查團（Birkenhead Mission）以及一九三二年審訊工程師再度的決裂。英國曾一而再的拉攏列強加入帝國主義反蘇的聯合陣線，只是因帝國主義利益的矛盾而致計畫失敗。在最近時期中，雖由於國際形勢的日益混雜，由於納粹德國和日本的擴展所給予英國利益直接的威脅，自一九三四年以來就引燃一種武力的衝突；但是主要的力量却仍加緊地推進支持反蘇聯的戰線，因為即使在這樣情勢中，就他們看來，還是呈現着發動侵略戰爭的最有利的機會。

在目前，懷着瓜分蘇聯土地的公開侵略戰爭和擴展的野心，而對蘇聯直接的挑戰，是由德國和日本領導着。但是這種挑戰，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主要反動階層中，却有着有力的支持者，特別是在英帝國主義的統治勢力之內。德波日聯合反蘇擴展戰爭之外交的和軍事的計畫，在英國背後支持之下，今日已達到了一個很迫切的階段了。這個挑戰已成爲今日世界大規模戰爭潛在的最深刻的威脅。不過，我們却又必須明白地看

清這種形勢中的事實，同時還當顧到帝國主義陣營裏面的矛盾，以及那足以阻止它的和平勢力的力量。

這種挑戰，是以日本在東方和德國（並有波蘭的協助）在西方向蘇聯聯合進攻的意圖爲其中心的樞紐。

日本在東亞擴展的野心，及其對未來不可避免的反蘇聯戰爭的籌畫，是誰都知道的，而且爲統治的軍部所公開表示。由於這種野心，因此對於蘇聯一再提出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終是不斷予以拒絕。據軍部份子的半官文件中任意的表示，日本以蘇聯爲犧牲的領土擴展的目標，是針對了遠東省、蘇屬的庫頁島、堪察加、外蒙古（與蘇聯相聯合）以及——在更野心的計畫中——到貝加爾湖爲止的全部東西伯利亞。當戰爭以後的幾年中，日本軍隊本已佔據了貝加爾湖，直至遭受長期抵抗之後，纔又放棄。一九三一年以來擴大的日本侵略的戰爭，樹立了對『滿洲國』、熱河、察哈爾和內蒙古的軍事統治，同時也樹立了侵略外蒙古和蘇聯的基礎，爲了進攻蘇聯，軍事上的準備是正在積極

地推進着。

然而，如果沒有別的帝國主義列強的撐腰，日本對於進攻蘇聯的冒險，還是要躊躇的。在挑戰的第一個階段中，當一九三二年這個緊張的年頭，日本有着英法兩國有力的支持，而兩國保守的報紙也公開地鼓勵着日本前進，作爲遠東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前鋒。但是希特勒在德國的握權轉變了國際的形勢。法國在納粹威脅的恐怖之下，轉而與蘇聯維持密切的關係了。在另一方面，日本現在也找得納粹德國做它進攻蘇聯適當的聯盟，以分化蘇聯的力量。這樣，納粹德國遂成爲進攻蘇聯的最主要的角色了。

● 這階段最主要的就是一九三二年五月教王的通諭『Caritate (misericordia)』這，公開地呼籲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聯合陣線，用『一切合法的人類方法』推翻『無神的共產主義團體』，『社會秩序的敵人』，同時還特別把日本也包括於這個『基督教』國家的聯合中。『教皇因此籲請全體國家，放棄一切卑劣的自私主義，而把他們所有的力量在一個陣線上聯合起來，以討伐惡魔的軍隊，上帝的甚至人類的敵人。雖然，那以基督的名字爲光榮的人們，第一應

該參加這意志和力量的聯合，讓他們也忠誠幫助，那仍然信仰上帝和崇拜上帝的人，因為這危險威脅着一切，並企圖着推翻一切社會秩序和一切權威的基礎——那是效忠上帝的。在這爲宗教和社會和平的鬥爭中，必須運用一切合法的人類的方法。」

這位喝血的老人，想盡方法把日本帝國主義拉到他的推翻共產主義的『基督教』的十字軍去，其巧妙正跟納粹發現日本人是真正『亞利安』種的巧妙相等。

納粹德國在東歐以犧牲蘇聯的擴展戰爭的計畫，正跟日本在遠東的計畫一樣的公開無諱，這在上一章中已經討論過了。這些企圖，構成了納粹外交政策的中心。

帝國主義在英國領導之下，根本不能避免的反蘇聯戰爭的意圖，和德國處境的問題，在整個戰後時期中佔據着德國軍事的和外交的意見，同時也確乎成了羅迦諾談話的暗流。一派以爲在英蘇對立的基礎之上，正是德國重建威力最好的機會。另一派則看到了德國有變成西方帝國主義利益的貓腳爪的危險，而主張在東西之間巧避着。在大戰結束的時候，魯登道夫已想把軍事同盟授給福煦，以聯合進攻蘇維埃共和國。一九二

二年的拉伯羅條約 (Rapallo Treaty) 是由馬爾察亨 (Baron Von Malzahn) 領導下的東方派在總理維斯 (Wirth) 極端猶豫下所締成。一九二三年，英國駐柏林大使阿倍農去看霍夫曼將軍 (General Hoffmann)——那位布累斯特利托夫斯基 (Brest-Litovsk) 的『英雄』隨後在其日記上記錄着：

「他所有的意見，完全受其一般的意圖所支配，以為世界不能順利地下去，除非西方文明的強國能够聯合起來去摧毀蘇維埃政府……問到他是否相信英法德有聯合攻俄的可能，他回答說：『這正是必要，而且一定會實現的。』」（一個和平的大使）

這同樣根本的意圖，又支配了羅迦諾會議。阿倍農，他以英國駐柏林大使的資格而為羅迦諾公約幕後的主要策畫者，後來曾對該公約的真正意義表示他的見解說：

「西方文化正受着一種外來危險的威脅，這種危險，是大戰時候所產生的，它威脅着一種巨大的激變，羅馬帝國的崩潰纔能與之比擬……這種破壞歐洲文化組織的轉變的基本特質，也許會促使西方各國認清他們自己衝突渺小的性質，而聯合起來協力反抗這共同的危險。但這種

豫期也許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人性的弱點往往有誇大眼前的局部的和國家的傾向，而不顧更廣大的考慮……

『這種事實更加强了下面的論據，即就羅迦諾政策而論，注意力不應僅限於萊茵的邊境以及高盧（Gaul）和條頓間傳統的對立』（阿倍農，一個和平的大使，頁110—111）

這種見解，當時也曾為英國政府大臣奧姆斯倍·高爾（Ormsby-Gore）所公開說明：

『基督教文化的團結，是抵抗最兇暴的勢力所必需的，這種勢力不僅興起於我們的時代，即在以前的歐洲歷史上，也已存在了。』

『羅迦諾的紛爭據我看來只是爲了這一點：德國究將把她的前途去與西方列強的命運相聯結呢？還是去跟俄國合作以破壞西方的文化？』

『羅迦諾的意義是偉大的。這意義與現行的德國政府有關，它脫離了俄國而投入西方集團的懷抱。』（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奧姆斯倍·高爾在曼徹斯脫演講詞）

這羅迦諾政策根本的目標，却因英法帝國主義利益的衝突和斯脫萊斯曼（Stresemann）機巧的政策而崩潰了。斯脫萊斯曼不願使德國成爲西方帝國主義的工具。一反一九二六年法德在托伊萊（Thoiry）的合作而轉到英國所不願意的傾向。自從一九二七年與蘇聯分裂以後，英國就想取得巴黎和柏林同調的支持，但却沒有成功。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福煦上將在星期公論（“Sunday Referee”）雜誌記者的訪問中說，他在一九一九年就已提議盡量以軍力支持邊境的國家，使其一舉而摧毀所有『布爾什維克的威脅』。他至今還是主張這應該作爲英法聯合行動的目標；但是法國外交部却反對這樣主張，而與蘇聯進行互不侵犯條約的談判（到一九三二年纔訂定）。一九二八年懷着同種目標的柏肯黑德的訪問柏林，也一樣沒有結果。據一九二八年四月份半官的伏錫基日報所載倫敦通訊說：

『在過去幾個月中，英國使節曾反復向德國外交家試探，德國議會中的多數是否準備與俄國正式斷絕一切的關係，乾脆廢棄一切的條約，並實施對蘇俄的經濟絕交，以報答道威斯償付

計畫和賠款的最後修正。當經濟絕交時，德法英三國應該組成一個重建委員會（Reconstruction Syndicate）以支持俄國的布爾喬亞民主政府使她在蘇維埃政府崩潰之後，就可繼起掌政。』

每日電聞的柏林通訊述及一九二八年五月柏肯黑德的使命說：

『誰都知道，在他私人的談話中，他一再表示其意見，認為德國必須與西方列強採取共同的途徑以反俄。』

這些提議，却因斯脫萊斯曼的對案而取消，那對案就是要求返還德國殖民地和重整軍備權，作為支持的代價。英國反對第一點，法國則反對第二點。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德國防部長格羅納爾將軍（Groener）曾在一秘密的備忘錄中，對支配歐洲形勢的勢力及德國的軍路問題表示他的見解：

『英俄的對立是顯著的，……這種對立的爆發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德國的投入這個紛爭中，實是冒着最大的危險。』德國防部長格羅納爾將軍秘密備忘錄，由史蒂特 Wickham Steer

引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月份評論之評論)

在戰後時期中，英帝國主義一意企圖組織帝國主義反蘇的聯合陣線並利用德國作爲挑戰的工具，但這一切的企圖，終於因帝國主義在歐洲的矛盾，更因德國內部情勢的矛盾而失敗了。只要德國工人階級的力量一天不受挫折，德國政府是決不敢利用德國去當西方帝國主義反蘇聯的工具的。因此，帝國主義爲貫徹實行對蘇聯的挑戰，第一件事就是消滅德國工人階級的阻力。德國工人階級和法西斯主義的鬥爭，於是成爲世界情勢危急的中心了。只有當那工人階級和社會民主黨聯合的抵抗陣線起分化的時候，納粹獨裁者纔能建立它對德國大衆的恐怖統治，而到了那個時候，企圖利用德國人民作爲工具的帝國主義反蘇聯十字軍，也纔能把它的路徑肅清。那納粹，在他們執政以前就已跟英國保守黨的統治階層維持着密切的關係。它排斥了那對英國要求還不夠順從的斯脫萊斯曼和白魯甯，而宣布了替英帝國主義統治階層張目的外交政策。

納粹的外交政策已在上一章中檢討過了。在它所有的記載中，它自始公開地指示

着對蘇聯的敵視，和犧牲蘇聯的領土的擴展。它的要點是覓取英國的聯盟，利用英國的反法和英國反蘇維埃的情緒，以獲得德國的重整軍備，以箝制法國，以樹立德國在中歐的霸權。這樣，在勢力強固以後，然後東向發動以蘇聯及邊境國家為犧牲的擴展戰爭，並擊倒孤立的法國，最後乃至進而向英國奪取全部的殖民地。

這個政策的關鍵，是在於一方面與英國聯盟和一方面東向擴展的挑戰。我們在上章中已經看到過，英國的支持，使德國能成功地重整軍備，更以集中注意於西歐的安全，給予了德國在中東歐以行動的自由。

但是東向擴展的進攻，必需得波蘭的聯盟，纔能攻入蘇聯，而爲了走廊（Corridor）和上西里西亞（Upper Silesia）遷延不決的爭執，波蘭却正是戰後德國最大的敵人。納粹政策的第一步問題，就是要達到與波蘭聯結的目的。這個問題是由一九三四年的德波條約（German-Polish Treaty）解決了，或者快要解決了。（因爲波蘭內部對於未來傾向至今仍有爭執。）鑒於他們深刻的矛盾，這兩個國家究竟在什麼基礎上面聯

合起來呢？那只有一个基礎，就是共同的反蘇聯運動。

據各國的祕密通信的報告，一個德波聯合進攻蘇聯的計畫已經擬定（不知道是載錄於德波條約的祕密條款中，還是一種附帶的諒解）。同時日本也當在遠東發動戰爭，而以瓜分蘇維埃烏克蘭為第一目標。一九三四年，半月評論上有一篇勞頓（L. Lawton）所作明白的文章說：

『從前的德國政治家是東西兼顧的，現在希特勒却只注意於東方。波蘭也懷着東向擴展的計畫。……有許多地方，甚至有人疑心德波間最近締結的互不侵犯條約，包含了劃定兩簽字國在蘇聯特別是烏克蘭勢力範圍的祕密條款。熟習東歐地圖的人，誰也不會懷疑以別人為犧牲的德波妥協的極大可能。把烏克蘭包括於西歐體系之內的意圖，以及東向對俄國的行動自然是誘惑的。……一個獨立的自治的烏克蘭為歐洲經濟進展和世界和平所必需。通過烏克蘭是從西方到波斯和印度一條最短的陸路。……要是以烏克蘭為民主的聯邦制的一部份，那末就會產生許多大不列顛友好的國家。在東歐創立這樣國家集團的時機，已遷延很久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那與波蘭的統治階級頗為接近的每日郵報華沙通信報告說：

「根據可靠的消息，希特勒與波蘭獨裁者畢蘇賽基會見的計畫，是正在討論着，在這次會見中，他們將討論德波軍事同盟的可能，以及包括戰爭爆發時候烏克蘭從俄國分離的一切準備。」

波蘭報紙公開地討論着這樣的企圖。在那本一九三五年出版銷路廣大的斯都爾基 (Wladimir Studnicki) 所著波蘭的政治企圖 (Poland's Political Aims) 一書中，詳載着把蘇聯從東南西各部切斷的全部計畫，說：

「波蘭對於日本制服俄國的勝利有着最大的關心。如果波蘭在這點見解上能够與德國聯合起來，參加日俄戰爭也是可能的。法國是不必注意的，因為它今日只佔着次要的地位。波蘭和德國可以奠定一個偉大中歐集團的基礎。」（斯都爾基，波蘭的政治企圖，一九三五年版）

德國報紙也一樣公然宣示它的企圖；而每次政府的演說和納粹的廣播，總是公開反蘇聯的煽惑。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沙赫特與英蘭銀行總裁諾曼和法蘭西銀行總裁塔納萊 (Tannery) 相會見。法國記者潘蒂那 (Pertinax) 曾透露了沙赫特怎樣向法國代表提議法德合作的消息：

「我們無意於改變西方的邊疆。德國和波蘭遲早會分有烏克蘭的，但在目前，我們只要在波羅的海諸省增強我們的力量，就已滿足了。」（沙赫特與法蘭西銀行總裁之會見，載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卅一日巴黎回聲報）

同時，德國一面與波蘭一面與日本建立密切的政治和軍事關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柏林地方新聞解釋這種傾向說：

「遠東的事情是一天一天地影響到歐洲的地位了，雖然許多歐洲政治家還仍不願了解這事情真正的意義……現在，日本已想從海參崴開始求解決的方法，但是這解決的目標還是沒有把握的，因為世界歷史的推動，也必須同時在歐洲開始的。」（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柏林地方新聞）

一九三四年一月，太晤士報的柏林通信說：

「德國軍事和官方當局對於日本行動和遠東局勢的發展，懷着最深切的注意，已有好多時候了。日俄間軍力試驗的可能以及蘇聯結果受歐洲事件的牽制，是德國最大的關切。無論德國對日本的外交意向如何，過去幾個月來，兩國間是已做到許多所謂「文化的接近」了。日本對國

聯的態度和日本政策野心的有力的性質正授了國家社會主義份子的所好。」（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太陽報）

一九三五年二月，觀察者以下列的措辭，敘述德波日間的關係說：

『爲什麼東京目前的外交，在華沙和柏林是這樣的忙碌？爲什麼柏林又像一年以前拒絕波羅的海公約一樣拒絕了東方公約？莫斯科就是這一個問題的答案。德國、波蘭和日本的關係，是一天親密一天了。在時機危急的時候，他們就將締結反俄的同盟』（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七日觀察報）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日本駐歐洲的陸海軍武官會議舉行於柏林，在同月中，法國報紙就說日德間一個祕密的軍事協約，已由里本特洛浦（Ribbentrop）和日本的武官在柏林擬定。一九三六年二月，戈林將軍與日本軍事使節澤田將軍在華沙的會晤，據說就是更進一步的聯結。

德波日集團更進一步的企圖，還在於拉攏中歐和北歐另外的國家來反蘇。德國的

勢力已強固地樹立於匈牙利和芬蘭，並多少還及於斯坎狄納維亞的國家。一九三五年九月在東普魯士舉行的羅明德會議（Rominter Conference）德國以戈林和里本特洛浦為代表；匈牙利以總理博斯為代表；波蘭以法必烈西將軍（Gen. Fabrici）和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拉乞維爾親王（Prince Radziwill）為代表；而芬蘭則以馬納亨將軍（Gen. Mannerheim）為代表。這會議的目標，據太晤士報柏林通訊所說，是為達到——

『一個未來的德波匈意保——也許還有羅馬尼亞——的集團……』

『恐怕在有些保守派方面，不但空軍的佈置已經討論到，就是對於陸海軍的意見，也已交換了；還有保加利亞、芬蘭（她的對於海軍活動的重要地位也談到）甚至羅馬尼亞——蘇羅的接近，似乎已成爲虛張的驚傳——都被拉了進去。就是日本，料來也被列入這未來的夢想中。』（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太晤士報）

一九三五年九月里本特洛浦的訪問不魯捨爾，也是爲了這同樣的根本企圖，在有

一次對比利時總理齊蘭祕密的談話中，他表示，據報紙報告說：

『當一旦德國有事於東歐，如果比利時能够擔保决不採取任何行動以侵犯德國，那末，比利時對於重整軍備的德國，可不必有所恐懼。』

對土耳其也謀與之接近，雖然沒有成功。一九三四年五月，據菲列得爾菲亞公眾綜合報 (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 所載，那一月中抵莫斯科的土耳其訪問團團長愛斯明 (Esmiin Pasha) 告知蘇聯當局：日外相曾於三月間對土耳其駐東京代表表示，未來的日蘇戰爭當然不能避免，因此提議締結日土密約，規定一旦日蘇戰爭爆發時，土耳其不反對軍隊假道侵入外高加索；後來，日本海軍上將松島 (Matoussima) 又曾訪問安哥拉 (Angora)，重申前議，並且允以外高加索的土地割歸土耳其，作為報償，此外對柏林和華沙也曾作同樣的建議，並且完全給接受了。土耳其却拒絕了這些建議，土耳其報紙並且聲明土耳其政策仍忠守着她與蘇聯的友誼（見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法文“L'U”雜誌外論摘要）。

這樣，德波日反蘇聯戰爭的計畫，已達到了非常有準備的程度了。但是這樣挑戰的問題，却馬上引起了英法帝國主義確定態度的問題，他們仍然代表着歐洲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要是英法堅決不移地明白地與蘇聯站在一起以維持和平，那末德波日侵略戰爭的前途便將受阻礙，而波蘭也似乎會轉到較強一方面去的。

在法帝國主義方面，目前力量的平衡，正趨向於和平。那法蘇公約就是矗立於德波日侵略戰爭計畫道上的最有力的和平堡壘。因此納粹政府對於法蘇公約，懷着非常的憤怒。經過了法國內部左右勢力長期的鬥爭以後，法蘇公約現在已經批准了。正跟德國工人階級因聯合陣線不能實現的暫時失敗，替侵略戰爭開了先路一樣，那法國聯合陣線的勝利以及工人階級和民衆勢力的因而鞏固，也增強了和平的力量。拉佛爾領導下的法帝國主義的右翼份子，公然反對這種主張，而贊成與希特勒合作，允許他在東方的行動自由，以換得法國邊境的保證。當拉佛爾執政的時候，紐約捷論報曾經發表這樣一段話：

「總理而兼外交部長的拉佛爾，他是一個竭力主張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與納粹第三帝國妥協的人，據說他想撕毀那雖已簽了字，但還沒有經國會通過的法蘇公約，而代之以法德協定，規定希特勒政府保證法國的東境，而以在米美爾和烏克蘭行動的完全自由為交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紐約捷論報）

拉佛爾是失敗了，坍台了。反對這種立場的，不僅是法國的人民陣線，並且還有法帝國主義的份子，以參謀部為有力的代表，它明白地看到這樣的主張是自殺的，而且犧牲了中歐和東歐，更將替德國造成了歸併法國的地步。因此，只要人民陣線在法國維持着反右翼和反法西斯的強力，那法蘇公約是安全的。

那麼英帝國主義又是怎樣呢？這裏，因為已經把綜合的戰爭威脅的全般形勢在上章中檢視過，我們現在可以提出了決定的問題。假如納粹德國能夠獲得英帝國主義的支持，它必將直前進行其侵略：

「德國並不怕法俄的軍事同盟（原文如此），假如她能保持英國於「光榮的孤立」，德國是

歡迎孤立的。假如她知道英帝國將維持孤立，那時她必將自由行動了。」（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觀察者柏林通訊）

在經濟學者所載英國的選擇（The Alternatives Before Britain）一文的分析中，也承認英國政策的為和平或為戰爭之決定的任務：

「我們決不能坐視歐洲崩潰於一個侵略強國的霸權之下。赤裸裸地說，假使這裏發生了另一次的歐戰，而德國是其中的一個交戰國，我們是不能坐視「第三帝國」在西歐或東歐獲得勝利的。」

那末，怎麼辦呢？在一九三五年四月該雜誌的一文中，認定了列強的集體和平集團的可能性。

「他們也像我們自己一樣，是很熱切於維持和平的，因為歐洲現狀任何暴力的變動，使他們將喪失了一切，而毫無所得。這一類的列強，除了意國和法國之外，包括着俄國、小協約和巴爾幹集團。如果大不列顛把她的重量放到這一方面，那動員表制德國侵略的力量便將佔壓倒的優勢。

而使德國再也無力來冒這大不韙了——

『然而，這却不是實際的政治，因為英國如果參加了這樣反德的軍事同盟，那決不是英國的公意所能忍受的。』（英國的選擇，載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經濟學者）

換句話說，英國的加入法國、蘇聯、小協約和其他小國組成的集體和平集團，以反抗德國在歐洲任何部分的侵略，依照這個消息靈通的經濟雜誌的意見，是可以制止納粹的挑戰而保障和平的；但這『却不是實際的政治。』

那麼，究竟什麼是英帝國主義的主張呢？英國政策在一切官方的表示中都說是維持和平和集體安全。但同時，英國在實際上却支持着並且幫助着德國的重整軍備，給與納粹每一步的挑戰以便利，以及一再聲明說英國的義務必須僅限於西歐的安全，給『英國的邊境以萊茵河為界，』說英國不能接受東歐安全的義務，這一切的一切，實鼓勵了希特勒在東歐『自由行動』的意圖。一九三三——一九三六年納粹挑戰的躍進，最大的責任，應該叫國民內閣主持下英國的官方政策來負。

事實上，對於英國的政策也起了一種爭執。一派支持着德日的挑戰，認為這是削弱蘇聯的一個方法，同時還可把德日擴展的目標，轉移到英國利益的範圍之外，而阻止紛爭的蔓延西歐。另一派則力主整個歐洲的集體安全制。

那支持德日挑戰者的一派第一包括了法西斯和親法西斯的份子。這一派可以羅塞密爾系報紙的論調為代表（並得皮弗布盧克系報紙的『孤立主義者』論調的增強）

『那強健的年青的德國納粹黨是歐洲的共產主義危險的保衛者……德國應該要有可以自由伸肘的地方……一旦德國能够取得她在俄國西部所需要的土地，那波蘭的走廊問題就可以毫無困難地解決了……以德國精力的蓄積和組織的才能移到布爾什維克的俄國去，一定可以使俄國的人民回復到文化的生活，也許還可把世界貿易的潮流再行轉到繁榮。由於這同樣的進程，德國擴展的需要也可以滿足了，而現在那使地平線黑暗的日深的威脅，也可以永遠消除了。』（羅塞密爾語，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每日郵報）

這一派還支持着英法的防守同盟，以迫使德國東向進攻蘇聯。

「每日郵報」力說與法國締結防守同盟的適當，已經有年了。但是這種同盟的形式，必須不是針對德國的——這種同盟，應是保衛法國西歐領土的完整，消除東歐錯綜複雜的障礙，並給予德國在那裏以反布爾雪維克的行動自由。」（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每日郵報社論）

摩斯萊 (Sir Oswald Mosley) 和英國法西斯主義也曾發過這同樣的論調：

「德國的未來一定在她帝國東面的邊疆，那帝國的前途是無限的。」（摩斯萊語，見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星期報知 Sunday Dispatch）

代表保守黨右翼份子的前殖民大臣阿滿雷 (Ameny) 講到關於日本的進攻蘇聯時，也曾發表了相同的議論：

「無論是我們的政策，或是美國的政策，決沒有一點是助長日本和蘇俄間的衝突的，即使這樣的衝突擴而為戰爭，阻止日本在東西伯利亞的擴展，也不關我們的事。」（阿滿雷前途的展望，頁二八八，一九三五年版）

有些公務人員份子，也常表示支持納粹反蘇聯戰爭的公開侵略的主張，這可以飛機雜誌 (Aeroplane) 中所發表的意見為代表：

「好幾年來，我們已經說過，皇家空軍下一次偉大的工作就是到德國去幫助他們防禦俄國的侵入，因此我們認定，任何的西歐公約，應該是一切白種國家的聯盟，包括了地中海諸國，以反對華沙以東的黃色或紅色人種。」（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飛機雜誌）

這種對反蘇聯戰爭公開的煽惑，不斷地發表於英國侵略主義的報紙中，特別是大官翁「通行」的報紙。

這種英國極端國家主義和親法西斯主義者的公開意見，還不能說是英國官方政策的意見，雖然他們常是幕後策動的力量，正同那鼓勵一九一四年戰爭的宣傳一樣。無論如何，那國民內閣所主持的官方政策，其實還根據了更精細的策略。這種策略，在一九三四年已有很明白的說明了。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一位「著名的英國保守黨政治家」在維也納新自由人報 (Neue Freie Presse) 記者的訪問中說：

「我們給予了日本以對付俄國的行動自由……這樣日本現在所不得不採取的輸出政策，就可根本改變了。」……

「我們給予了德國以重整軍備權；我們與法國締結了同盟，這樣，因英法合作的結果，德國西向的擴展便成爲不可能了。在另一方面，我們替德國開了東方的路，給她以擴展的機會。這樣一來，我們遏止了日本和德國，同時又牽制了俄國。」

上述的策略是更接近了那國民內閣所代表的英國保守主義的支配意見，在帝國主義利益對蘇聯的階級仇視之外，那納粹德國和日本的擴展對於英國利益的威脅，也同時給承認了。那決定的策略就是利用一個敵人去打擊另一個。依照了這個策略，英國的政策是鼓勵日本和德國去進攻蘇聯，藉以轉移他們對英國利益範圍的侵犯，並且還希望從兩方面保守中立，這樣到了戰爭爆發之後，讓兩方面打得兩敗俱傷，英國則仍守中立，就從戰爭中抽取利益，而成爲最後的勝利者了。這就是英國政策的用意，但也爲法國作家台拉西（Francis Delaisi）所看到，台氏是以預言一九一四年戰爭的正確著

名的，他在其近作一九一四年的未來戰爭（*La Guerre qui Vient 1914 et la Guerre qui Vient 1934*；巴黎，一九三四版）一書中，認為歐洲未來的關鍵是在英國的手中。（『誰要預測歐洲的將來，必須第一通過了倫敦』）並且認為英國現在的政策是正在促成大陸上一次破壞的戰爭，在這次戰爭中，英國却並不參加，而想從中立造成勝利者。英國這樣的主張，重整了德國的軍備，拒絕了東歐的安全，並且堅持着戰爭不應展延到西歐，其結果只是鼓勵了幻想。

只要對上述這種的策略作更精細的研究，就可以看到即使從最狹仄的英帝國主義利益觀點說，它的性質也是自殺的。在事實上，『戰爭局部化』的意圖只是一種危險的妄想；這樣規模的戰爭，是無法阻止其擴大為世界性質的，而『孤立』正證明了是一種幻滅的夢想。假定承認英國一部份統治階級所擬的這種戰爭策略獲得了最大的成功，假定承認英國的勢力幫助了（在推倒左翼政府之後）法國法西斯或右翼政變的成功，宣布了法蘇公約的無效，而造成法德的合作，假定承認在這樣基礎之上，達到了德

波日在英國贊助之下的反蘇聯戰爭自由的途徑，這樣戰爭對於英帝國主義的結果是怎樣呢？且撇開不限於英帝國的全世界無法計算的社會的政治的結果不說，單是從純粹的軍事觀點看來，這樣的戰爭終不出於三個結果。或者是納粹德國和日本的勝利；或者是蘇聯的勝利；或者是不分勝負的延長的戰爭。要是第一個假定是對了，那末英國就是幫助她兩個威脅的敵人——德國和日本——造成了軍事上無敵的霸權，更因為他們侵略的主要障礙已經削弱，便重以加倍的力量回復到對英國殖民地的進攻。要是第二個假定是對了，英帝國主義就等於替那與她階級企圖相反的結果造成了地步，而且納粹德國和日本在戰爭中的失敗還將必然引起內部的革命。要是第二個假定是對了，那末，不分勝負的延長的戰爭無疑地會粉碎日本和德國的軍事法西斯政權的脆弱基礎，以至於崩潰，而社會主義的革命也許會迅速地展延於萊茵河乃至整個太平洋的東部。在無論那一個假定之下，英國因其從事於這種冒險舉動的最後結果，都將削弱她的地位。

在這樣環境之下，無怪有許多比較目光遠大和有經驗的英國保守主義的領袖，對於支持納粹挑戰的主張採取了批評的態度，認爲這於英國帝國主義的利益是致命的，而且從來未有的表示擁護集體安全的主張，以與東西歐各國相聯合；在國聯盟約的基礎之上，擁護集體安全（歐洲）的維持，認爲這是現階段上惟一適合於英國帝國主義利益的辦法。那在英國爲和平而奮鬥的羣衆的勢力，對於這些份子的前途雖然沒有同情，但是他們在阻止或糾正那支持納粹侵略戰爭的有力傾向上，也許有着部分的作用。

這種英國政策內部鬥爭的結果，至今還是不能決定。如果那爲集體安全主張奮鬥的陣營一旦實現，那末英國的政策，是可以從現在支持納粹德國和不受中東歐義務拘束的態度，轉變到積極擁護法蘇公約的主張和維持整個集體和平了，到那時候，德波日侵略的戰爭也許會稽延起來。但是這種政策上鬥爭的結果，事實上仍有賴於英國爲和平的羣衆奮鬥的力量，像以前在法國一樣。

三 蘇聯的和平政策

在別的帝國主義國家有力份子的支持之下，法西斯國家公開的侵略戰爭，恰與蘇聯堅持的和平政策成了日益顯著的對比。這樣，外交政策的兩極端，又與社會和政治機構的兩極端相符合了。

蘇聯的和平政策自其基礎奠定後就不斷地發展着。蘇聯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鬥爭中。在強權征服的第二天，她最初的行動就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的著名和平法令中，向各國的人民和政府呼籲不割地不賠款的無條件的和平。蘇聯和平政策顯著的特質，自始就不倦地爲其自己國家一樣爲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和平而奮鬥。每個在國際政治上和外交上所引起的機會，都加以徹底的利用。當蘇聯的力量日益增加和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日益迫近的時候，蘇聯爲世界和平奮鬥的範圍也不斷地擴大着伸張着。在今日，蘇聯已長成爲世界最強盛的國家之一，正進行着它歷史的使命，積極

地領導着各國的人民爲和平而奮鬥，以反抗第二次大戰日益迫近的威脅。

正跟每個資本主義強國的外交政策適合它的社會機構一樣，蘇聯的和平政策也是適合它的社會機構的。國際勞工階級和蘇聯的爲和平而奮鬥是相同的，因爲兩者的利益基礎相同。蘇聯不受任何驅使資本主義國家從事戰爭的力量的脅迫。蘇聯的經濟機構，是以那爲社會消費的有計畫生產做基礎，而並不是以那爲從資本中營利的市場的生產做基礎；蘇聯並不被迫使爲征服和霸佔市場而戰爭，以替那過剩的貨物找求必需的出路；它不需要資本輸出的出路，或是其他民族的歸併和順屬以取得貨物的進獻；它不需要殖民地，委任統治地或臣屬的領土，以替日益累積的資本尋求擴大的剝削面積；它沒有商業的營利的軍火工業，在全世界遍佈他們的代理人以煽惑戰爭，想從死亡中圖利。

一句話，蘇聯的和平政策是其社會主義基礎和其國際主義者觀點必要的說明。因此，在言行之間是沒有矛盾的。特殊資本主義的國家在特殊的階段和情勢中，也許對於

維持和平、阻止戰爭傾向有暫時的利益，和平却完全符合了蘇聯的、牠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以及國際勞工階級的深刻永久的利益。因此，爲和平的奮鬥，在蘇聯誕生的十九年來，只有她堅決地不斷地維持着。

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特質之爲和平的政策，就是保守的布爾喬亞的意見，也漸漸的不得不承認了。荒唐無稽的說法曾經很長久地給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竭力傳播着，而在今日仍爲法西斯主義所散佈，就是說，蘇聯因爲承認了她自己作爲未來世界社會主義秩序核心的任務，因此想努力在刺刀上面建立世界的社會主義。從革命的觀點看來，這種意思顯得是荒謬的，因爲在各國反抗剝削者的鬥爭中，社會主義的實現，只能由人民大眾的意志來決定；此外是沒有別的基礎的。這個原則，在一九二〇年蘇聯致美國的通牒中，很明白地說明着：

蘇維埃政府明白地知道，各國勞工階級的革命運動是他們自己的事情。她堅持着這個原則：共產主義是不能用武力強致的，各國爲共產主義的奮鬥，必須由其勞工階級自己來進行。在美

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中，工人還不會征服政府的權力，而且甚至還不相信有征服的必要。關於這一點，蘇俄政府認為必須與這些國家的現行政府忠實地維持着和平和友好的關係。」（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齊姬林 Chicherin 致美國國務卿柯爾倍 Colby 之牒文，載於美國外交關係一九二〇年文件彙編。）

十六年後，那『輸出革命』的荒謬說法曾爲史太林在一九三六年的談話所駁斥：『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都相信其他國家也將發生革命，但這是發生於那些國家的革命份子認爲可能或必須的時候。』

『輸出革命是全無意義的。任何國家如果具有這樣的願望，那末儘可謀自身的革命，如果沒有這樣願望，革命是不會發生的。』

他又說：

『如果你以爲蘇聯人民要用武力改變其周圍國家的面目，那你就大大錯誤了。蘇聯人民自然希望周圍國家能够改變其面目，但這是周圍國家自身的任務。』（一九三六年三月史太林對美國斯克里滋霍華特新聞社 Scripps-Howard總裁霍華特之談話。）

蘇聯自始就站在一切民族由人民大眾自決的自由基礎之上。在事實上，對於以前一切臣屬於舊日沙皇帝國的民族，蘇聯的民族政策毫無猶豫的給予了完全的自由，並包括着分離權，甚至像芬蘭這樣的國家——布爾什維克給予她以獨立，那是克倫斯基所反對的——獨立的結果却反成了布爾喬亞反革命統治和陷害工人階級的根據地。德國革命家盧森堡從「左」的觀點猛烈地批評布爾什維克這種民族完全自由的原則，認為違反世界社會主義的利益；但是結果却完全證明了列寧和史太林所代表的意見更深刻的瞭解，不但表現於蘇聯境內民族問題的完全解決，並且還表現於世界革命發展的正確基礎和蘇聯在其進程中的關係。蘇聯的民族政策，無條件的承認一切民族自決的自由，一切民族和種族的平等以及他們決定自己生活條件的權利，是不可分離地與其和平政策相連繫的；而這兩者的聯結已從實際經驗上取消「赤色帝國主義」中傷的毀謗了。

跟這種對蘇聯捏造和偏見的企圖密切有關的，當是帝國主義所加於蘇聯的「宣

「傳」問題的責任——那就是共產主義者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宣傳（這種宣傳在蘇聯誕生以前就已開始了，只要沒有實現，那是還將繼續下去的），以及這些共產主義者經過共產國際與蘇聯的共產主義者相聯結，或是一切共產主義者共同的國際組織，（那還是從一八四七年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國際共產主義聯盟經過數代傳下來的。）帝國主義政治家時竭力把蘇聯和共產國際一例看待，並且要求退止共產國際進行敵視資本主義政權宣傳的活動。這顯然是很奇怪的，敵視「宣傳」的責任竟由帝國主義政治家提了出來，他們自己不但在蘇聯進行大規模的宣傳（包括從英國警察總監部 Scotland Yard 偽造「真理報」以銷行於其境內，）並且還公然資助和武裝白黨反革命者，以及煽動內戰。在今日，更窩藏白黨份子，他們公開煽惑恐怖主義、暗殺和反蘇聯戰爭的文件以及他們的戰爭準備。但是，他們對於共產國際所提出要求，其用意是什麼呢？那就是等於要求俄國勞工階級必須與各國的勞工階級斷絕關係，而蘇維埃政府應該自任爲帝國主義的警察，以加強促成這樣的決裂。那要求只說明了它在認的性質，顯

得是對工人國家的基礎施行直接的進攻。這樣要求終於在一九二七年從人民委員會主席接得了它適宜的答覆：

『關於蘇聯勞工階級的問題，它的權利以及它與全世界勞動運動的關係，那怕就是保守黨，也從事實上知道我們的共和國是一個工人的國家，因此，不但是勞工大眾和勞工組織，就是我們聯邦的政府，也可以公開表示牠對勞工階級和各國工人友愛的階級的團結。任何的企圖，只要在強逼蘇聯勞工階級放棄它自然的權利，或是壓迫我們政府限制勞工階級對於各國勞工階級互助和聯結的行動自由，那就是竭力進行改變蘇維埃國家本身的性質。』（人民委員會

主席萊科夫 A. I. Rykov 在一九二七年第四屆全國蘇維埃大會演詞）

一步一步的，這種對蘇聯捏造偏見的企圖——這只是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階級仇視的表示——是在蘇維埃和平政策真實的前面削弱了。因為那和平政策已不得不為廣泛的布爾喬亞意見所承認。到一九三五年，就是像英國官方機關報太陽報這樣沒有好意的布爾喬亞意見，也不得不承認社會主義和平政策和法西斯主義戰爭

間的對照：

『一切有學識的觀察者都表示了一種確信——這就是，俄國是熱切於和平的。』（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太陽報）

『我們馬上可以說，如果歐洲任何的國家無論如何恐懼着侵入或侵入的威脅，那就是俄國——以及那介於她和德國通路之間的土地。在希特勒名著我的奮鬥中，一段一段的揭露着德國在這一方面擴展的企圖。元首的這一本書仍然是青年德國基本聖經的一種；而這同時也是東歐自信的敵人』（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日太陽報）

蘇聯的和平政策經了好幾個階段發展着，正跟蘇維埃的力量及其在世界政治中的影響的成長相符合。在最初階段中，主要的工作仍是抵抗帝國主義者積極的侵略，並從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取得承認，以進行和平的關係。在這時期，最顯著的造就就是在民族平等的基礎之上，樹立和平之建設的體系，這在她對亞洲各民族的關係上就可得到說明。一九三一年與波斯、阿富汗和土耳其訂立的條約，以及一九二四年與中國訂立的

條約，都明白表示取消帝國主義的原則，放棄沙皇時代所有強行取得的權利和佔據地，而建立友誼和平等的關係。一九二二年根據了同樣的原則，與那當時被帝國主義當作敗類看待的德國締結了拉伯羅條約。

隨後，一個與蘇聯所有鄰國所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只除了日本，她至今還拒絕締結——的廣範圍的體系從一九二五年起就一直發展着。蘇聯第一個核准凱洛格公約 (Kellogg Pact) 而坦白地反對帝國主義列強所提出的保留，因為這又使他們廢棄戰爭的規定失了時效；一九二九年初，一個使凱洛格公約的條款發生力量的議定書，由蘇聯與波羅的海諸國、波蘭、羅馬尼亞和土耳其簽了字，那不侵犯條約的密網，因蘇聯提出的侵略者定義而更形加強，這個定義爲一九三三年裁軍會議的安全委員會所接受，這個定義使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用以掩飾侵略的虛偽的託詞無所逃避。一個集體的協定，在這樣基礎之上由蘇聯與波羅的海諸國、芬蘭、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捷克和南斯拉夫簽訂起來，（當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會議在倫敦開會的時候，——這是

無結果的會議的唯一的結果，並且還等待着別的國家加入簽字。

只因爲和平可以由公約和互不侵犯條約來加強，因此蘇聯就在這個範圍內爲首領導，能夠做到多少就做多少。但是因着各方面軍備的擴張，因着帝國主義的公然趨向戰爭，這顯然還是不夠的。爲了領導全世界爲和平而奮鬥，蘇聯的和平政策必須進展到一個更高的階段。

到了一九二七年，因蘇聯國力的加強，已可能使和平在世界政治範圍中推入一個更高的階段而提出蘇聯的裁軍建議了。在一九二二年基諾亞會議的席上，蘇聯已曾提出裁軍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給帝國主義列強在議程上抹去了。在一九二七年，這個問題也不是可能的。蘇聯在裁軍會議的預備委員會中提出裁軍的建議而引起大大的震驚，這個委員會還是一九二五年指定的，過去只是爭論而毫無進步。蘇聯的提議就是在四年內做到普遍的全部的裁軍。這些提議在預備委員會和裁軍會議中，先後給所有帝國主義列強否決了。這個記錄是不會忘記的，現在的軍備競爭已使戰爭日益迫近。蘇聯

建議的坦直剝下了帝國主義和平的假面具，而在各國人民的前面，暴露了真相。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只除了說這提議是一種『恫嚇』以外，沒有話可以回答。那是非常明白的，如果他們真的是恫嚇，那末帝國主義列強只要很容易的接受了他們再來說恫嚇好了。可是相反的事實上帝國主義列強却聯合起來把那建議否決了，這就充分地證明他們們感覺着這些建議之並非恫嚇，而在他們看來，是一種必須打倒的危險；這樣一來，他們證明了他們的認識，那就是，裁軍只有跟共產主義纔能商量，而就這些帝國主義列強的正式代表的觀點看來，裁軍是不能與帝國主義談判的。

自從這普遍裁軍的建議遭了拒絕之後，蘇聯又於一九二九年提出了普遍的部分的裁軍建議，主張採用比率的漸減的方法以及廢止一切重砲、轟炸機等。這建議也遭了拒絕。同樣的，當一九三二年美國提出一般裁減軍備三分之一的建議時，蘇聯立即予以附和，認為這是初步的最低限度；但是這些建議也因其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反對而失敗了。

到一九三四年，很顯然的，那裁軍會議是死亡了。甚至最低限度裁軍的一切企圖，也因帝國主義的矛盾而失敗。重整軍備是直前席捲着。新的世界大戰的威脅是日益迫近了。在這個時候，蘇聯又提出了適應現實情勢的新建議，而來一次避免戰爭威脅的最後企圖。因為裁軍是失敗了，要消滅戰爭的危險，只剩了一條路——組織有效的安全和互相的保障，以反抗任何挑戰的企圖。這些建議由李維諾夫提出於一九三四年五月裁軍會議的演詞中。他指出裁軍的一切企圖是已經失敗了，戰爭的危險是迫切而且明白。他因此提議第一，裁軍會議應改組為永久和平會議（Permanent Peace Conference），以對付戰爭爆發的任何威脅；第二，應即組織有系統的區域公約和互助公約，以抵抗侵略者，因為當某些國家正在公開準備侵略的戰爭，一切中立公約和互不侵犯公約是再也不夠了。

蘇聯為實現上述的主張曾採取了幾個重要的步驟。第一就是於一九三四年秋間加入國際聯盟。第二是竭力組織東歐安全公約（Eastern European Security Pact）。

最後以一九三五年五月的法蘇公約而粗具形式，接着，又有蘇捷互助公約（Mutual Assistance Pact of Soviet Union and Czech-Slovakia）。

蘇聯的加入國聯，正當帝國主義內部和國聯內部均勢轉變的時候。最積極挑戰的帝國主義國家，納粹德國和日本，現在退出了國聯，而在會外進行着攻擊國聯的工作。國聯因此想發展成爲一個反對目前戰爭的國家的組織，而能夠在戰爭道上放上一個阻礙。這個可能是應該予以徹底的利用。但是國聯根本的錯誤，如盟約之帝國主義的觀點及其無力阻止戰爭的機構，則依然存在着。蘇聯在接受了加入國聯的邀請之後，就明白聲明她並不會改變對於這幾點的觀點，而且，她可以遵照盟約，忠實地合作和接受一切國際的義務以維持和平，但是盟約的某部分却必須特別除外，例如委任統治地制，這表示着帝國主義稱霸的原則，而完全違反了蘇聯的原則。這些保留，在李維諾夫加入國聯的演詞中明白地提出着：

「蘇聯是以一個新的社會經濟制度代表的資格加入國聯了，它並沒有放棄其任何的特質，而

——正像這裏所代表的各國一樣——密切地來保持着她的個性……

「我們已參加了國聯的盟約，我們却要堅持對於其中某幾條的意見。我們特別要反對的是承認戰爭合法的第十二條和第十五條……還有，我們要反對關於委任統治地制的第二十二條。我們也要抗議保證種族平等的第二十三條的刪除。

「但是這一切，却並不足以阻止蘇聯的加入國聯，好在一個組織的任何新會員只有對於經它參與或同意的決議纔負道德上的責任。」

法蘇公約的問題，以及集體安全的一般問題，已在第五章中討論過了。

這樣，蘇聯的和平政策便在現在達到了它最高的階段，而新的世界戰爭的威脅也到了最迫切和最危急的時候。在國聯之內，同時兼用了一切可能的外交溝通的方法和其代表向全世界人民直接的宣告，她積極地領導為和平的奮鬥。這次奮鬥的結果關係着重大的問題。法西斯帝國主義侵略蘇聯的戰爭向前進展着。在這樣的戰爭一旦爆發的時候，蘇聯已準備着自衛。史太林在一九三五年蘇聯共產黨第十屆大會中說：

「我們的外交政策是明白的。這就是保持和平以及與各國發展貿易關係的政策。蘇聯並不想威脅任何人，更不想攻擊任何人。我們擁護和平並且保衛和平的存在。但我們却並不怕威脅，而已準備以一拳還一拳來對付戰爭的營利者。那些希望和平而願意與我們保持商業關係的人終可以得到我們的擁護。那些企圖進攻我們國家的人也必會受到毀滅的反擊，以教訓他們休想把他們的豬嘴伸入蘇維埃的園地裏來。」

蘇聯的和平政策是不能單獨成爲反對戰爭爆發的保障的。這個決定，還靠着全世界情勢的總力量，一方面，須視促成戰爭的帝國主義力量特別是帝國主義法西斯部分力量的強度，而一方面，也須視那爲和平奮鬥的大衆力量以及帝國主義內部反對目前戰爭份子力量的強度。但是蘇聯的和平政策却動員了最大反對侵略戰爭的力量，也許可能阻止新的世界戰爭的爆發，如果不能，那末一旦戰爭爆發的時候，這些勢力必將準備與蘇聯聯合起來，繼續奮鬥，以反抗戰爭的製造者並達到和平與社會主義最後的勝利。

第九章 和平的奮鬥與世界組織的未來

「歷史上的布爾喬亞時代，須為新世界造成物質的基礎——一方面是建立於人類相互依賴之上的世界的接觸以及那種接觸的工具；另一方面是人類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由物質生產而成爲對於自然之科學支配的一種演變。布爾喬亞的工業與商業，造成了新世界的這些物質條件，好像地質的革命已經造成了目前的地面一樣。當一個偉大的社會革命，主宰了布爾喬亞時代的成果，主宰了世界市場與現代的生產力，並使受最前進的人民之共同控制的時候，那末，人類的進化才不會再如印度那教徒的偶像那樣，必須從被殺者的腦殼裏，吸飲甜液。」（馬克思論英國統治印度的未來結果，載一八五三年八月八日的紐約講壇報。）

從對於當前世界形勢的總檢討中，我們到底可以獲得什麼實際的結論？

這是明顯的，我們在各方面正趨向着一個極度的臨界點。新的世界大戰的威脅，是當前形勢中最動人的與最昭著的表現。但這個戰爭威脅的本身，不過是經濟的、社會的

與政治的各方面之諸問題的指示與後果而已。

新的世界大戰終於是不可避免的嗎？如今各方面都提出了這一個問題。

這一個問題，其實牽涉到兩個不同的問題，而必須加以判別。戰爭的最後克服，必須先改變現社會的制度。但這並不是說，在澈底的改變尚未實現以前，我們可以放任帝國主義自由進行戰爭。反之，阻止帝國主義戰爭的一種奮鬥，却也打開了帝國主義之最後克服的一種奮鬥的道路。所以，我們必須判別兩個問題，即眼前的問題與終極的問題，其實這兩個問題是密切地聯繫着的。

第一個問題是在目前的這一個階段中，當帝國主義仍然掌握着大多數國家的政權時，是否能夠阻止或延緩戰爭的爆發，使新興的勢力獲得充實本身的期間，以實現所需要的根本解決。

第二個問題是與第一個問題相聯繫着的，但並非同一的問題。這是整個世界組織之未來的廣泛的問題，必須要這一個問題獲得解決，才能最後地消滅戰爭。這一個問題

與社會制度之未來的整個問題，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

我們如今必須從具體的現世界形勢上來考慮這些問題。

一 和平的奮鬥

許多人已經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不可避免的了。美國已經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英國勞働學院（Labor College）的一本教科書，稱為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指南。因此，即自以為反對戰爭的人士，也已經為魔怪的睨視所催眠，而做了戰爭不可避免的理論的俘虜，就是說，已經放棄了反對戰爭的掙扎。

毫無疑義地，帝國主義如今正瘋狂地向戰爭邁進。但不可避免的假定更助長了戰爭的邁進。勞働階級如果不能夠奪取政權，先從內部摧毀帝國主義的勢力，那末，在帝國主義之下，戰爭最後確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如果把反對戰爭的一切力量預先動員起來，使它們能夠充份支持下去，則在任何特殊的時機，戰爭決不是不可避免的。

像這樣爲衛護和平而動員的可能性，就是當前世界形勢之現階段的中心問題。

目前帝國主義的侵略陣線，即集中於法西斯蒂國家的侵略陣線，而以各帝國主義國家內主要的反動勢力爲奧援，迄今爲止，已經一次一次地獲得勝利。在遠東，日本的廣大的侵略戰爭，自一九三一年以後，毫無阻礙地向前邁進。意大利對於阿比西尼亞的侵略戰爭，也毫無阻礙地向前邁進。德國國社黨的攻勢，破壞條約，公然準備戰爭，直到在萊茵河非武裝區域重行設防的現階段，也同樣毫無阻礙地向前邁進。但這並不是說，支配現世界形勢之擴大的侵略攻勢，是不可加以征服的，是不可避免地必須招致一般戰爭的最後結果的。各國反對戰爭的民衆所具的潛勢力，以及帝國主義內部反對立刻發生戰爭的份子，如果有效地組織起來，仍然能夠阻遏戰爭，使它不再向前邁進。法西斯蒂侵略陣線所以能夠一次一次地獲得勝利，就是因爲擁護和平的勢力尙未有效地動員起來。但這樣的動員並非不可能。

像這樣以反對立刻的戰爭威脅爲目標的動員，雖未提供帝國主義諸問題的最後

解決，仍然使更爲深入而必需的演變，能夠獲得充份的時間。在大戰爆發以前，革命的危機繼續發展，這仍然是可能的。如果立刻的戰爭威脅，仍然能夠受着一個時期的阻遏，那末，不必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地獄，而實現社會組織之必需的新形態與世界組織之最後的新形態，這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着的。我們仍然有着時間——短促的時間來轉移歷史的進程，並阻遏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於人類的不可估計的災殃。

這是世界形勢的現階段的中心問題，我們必須從一九一四年以後世界形勢的整個發展上加以觀察。

自一九一四年以後，客觀的條件已經充份完備，並迫切地需要消滅帝國主義以實現廣大的社會演變，但自覺的人類的力量，則尙未完備，這是現時代的基本的特質。帝國主義的統治，即對峙的金融資本集團所加於世界之生命與生產的支配，與世界組織不相容，而這世界組織却是目前迫切的需要，並爲人類的進步所不可缺少的條件。除了使人類屢次陷入大毀滅的屠場外，帝國主義不能夠尋覓前進的路徑，也不能夠尋覓自

身的矛盾之解決，一九一四年的大戰，就是帝國主義的最後定讞與警告。因此，介於帝國主義與文明之前途間的問題，赤裸裸地給暴露出來。新興的階級，即勞動階級，在人民大眾與殖民地民衆間獲得他們的友軍，本來可以單獨地排除資本主義，並組織一個以全世界爲基礎的不分階級的社會；可是，如果這新興的階級不能夠奪取政權，那末，唯一的結果將爲繼續增長的衰落，紛擾，苦難，新的世界戰爭與廣佈的野蠻主義，直到經驗的火花燒滅了一切的幻想，炙熟了向前開展的準備條件時爲止。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勞動階級的勢力還只局部地成熟；他們在俄國奪取了政權；他們在其它許多國家內也幾乎奪取到政權。可是，在俄國以外的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內，勞工運動的主要領導勢力，由於前一個時代的諸條件，仍然很緊密地與帝國主義聯繫着，並拒絕必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去援助重建立資本主義秩序，因此造成目前的戰後時期的形勢。帝國主義又把整個世界拖上了它的滅亡的途程，又顯示出它不能夠容合更前進的發展，並且，在招致重大的苦難與生產的

無組織狀態後，又進行瘋狂的軍備競爭，宛如一九一四年以前總合的世界大戰的形勢。這是戰後時期的歷史，我們必須加以檢閱。

因為世界的大部份尙未遺忘一九一四年的教訓，因為人類尙未準備接受基本的改變，所以我們如今又須面對「新的一九一四年」的威脅。各方面都這樣說：我們又臨到「一九一四年的前夜了。」可是，我們必須更爲詳細地考察這形勢的具體形態。

一九一四年之威脅的重臨，可以說就是歷史的進程的複演嗎？決不是的。事實上，歷史決沒有單純的複演。如果歷史的進程，從表面上看來，又觸到通常的場合，這就表示一個尙未解決的問題，又以加倍的力量而復回了。但它是在新的環境之下復回的。基本的客觀的問題，即克服帝國主義的問題，固然還是一樣。但由於二十年來所推進的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發展的整個階段不同了。人類的力量，已爲最近二十年來強烈的經驗所改變。資本主義力量與社會主義力量的整個對比，也已發生變化，這變化是不利於資本主義，而有利於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新的形態，這新的形態與資本主義

之沒落的更爲極端的階段相符合，而從法西斯主義上獲得最典型的表現。新興的勢力也已經獲得實力上的新因素。這新因素從蘇聯的存在上，從勞働階級，人民陣線與殖民地革命的普遍進展上，強有力地表現出來。這些力量關係的改變，階級關係的改變，以及國際關係的改變，擴展到全世界的每一個部份。所以，當前的諸問題，在性質上根本是新的問題，需要新的估量。所以，甚至也產生了足以擊退新的世界大戰之威脅的可能性，否則至少也足以使新的世界大戰很迅速地產生不同的結果。

現在的世界形勢，已非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形勢；這兩種形勢的任何比照，如果超越了新帝國主義戰爭之威脅的赤裸裸的事實，就成爲淺薄的，誤解的，並且使我們盲目於所面對着的當前新形勢之最最重要的各種力量，其危險的程度，正不下我們盲目於最近的一切的各種問題。這兩種形勢的差異點，比較它們的相似點更爲重要，因爲構成各種新問題的特質的，就是這些差異點。同時，這些差異點指出了解決的途徑。

一九一四年的戰爭，是兩個相當地勢均力敵的帝國主義集團，爲爭取贖物與領土，

爲分割世界而起的戰爭。勞働階級尚未在任何國家掌握政權。敵對的帝國主義集團，彼此具有多少相同的掠奪的目標（英國欲掠奪德國殖民地與美索巴達米亞，德國欲掠奪英國殖民地與中歐，法國欲掠奪阿爾薩斯勞崙與萊茵河左岸，俄國則欲掠奪加利西亞與君士坦丁。）這一次戰爭好像是兩個強盜集團搶劫賊物，所以在這一次戰爭中，工人們除了利用衝突使自己的階級奪取政權外，沒有其它利益。這是一九一四年大戰的形勢，也就是反抗一九一四年帝國主義戰爭的必然的路線，這路線是列寧所確定，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所實行的。

今日世界之再分割的問題，又在帝國主義的體系內，發展到衝突的燃燄點。但它是以後新的特殊的形態而發展着的，這形態與經過了二十年的資本主義之一般危機以後的特殊條件相符合。它是在這樣一個世界內發展着的：資本主義已經大大地加增了沒落的程度，勞働階級與殖民地民衆的革命性，已有很大的躍進，社會主義在六分之一的地面上掌握政權，資本主義獨裁在許多國家內已經發展到新的法西斯主義的形態，

即金融資本之最富侵略性的、鬪武的與反動的份子爲戰爭而組織起來的集中的政權。這些新的條件已經改變了帝國主義向戰爭邁進的性質。在戰爭的以前的舊形式外，又加增了新的形式，即在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戰爭，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或征服弱小國家的戰爭外，又加增了帝國主義進攻社會主義與蘇聯的戰爭，這一個問題影響着其它的一切陣容；不僅如此，帝國主義之內部的關係也已經改變，帝國主義國家的內部的社會政治形勢，也已經改變。

在帝國主義方面，現階段的最重要的新發展，就是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成爲極度沒落中的資本主義之公然的恐怖主義的獨裁，以遏抑勞働階級的勃興的反叛。但法西斯主義同時，也就是戰爭組織的最高表現。法西斯主義的這兩個方面，是不可分離地聯繫着的。一方面，所謂現代的「全體體的戰爭」，需要澈底粉碎一切民衆的反抗，消滅一切獨立的勞働階級的組織，甚至前進的自由主義的，或和平主義的潮流，並且需要把整個的人民與經濟組織起來，以從事戰爭。這是法西斯主義在國內方面所負的任務。另一

方面，法西斯主義因為不能夠解決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不得不趨向對外的冒險行動與戰爭，以謀取所企圖着的解決。這一種政策，就是金融資本之最反動的、鬻武的與帝國主義部份的政策的表现，而法西斯主義則為它的機體。法西斯主義實為現代帝國主義準備戰爭的最完全的組織。

國家組織的法西斯蒂體系與「全體的戰爭」間的整個聯繫，從所有的法西斯蒂文學上表現出來，這在法西斯主義已經奪取政權的國家內是如此，在尚未奪取政權的國家內也是如此。我們可以檢閱正式的德國軍事小冊子，稱為國家社會主義革命之軍事的意義（The Military Significance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Revolution），這一本小冊子的作者是德國陸軍部出版處主任郁斯脫少校（Major Jost），界以陸軍部長白隆培將軍（Von Blomberg）的序言：

『作者告訴我們，國社黨國家的形式，適合於現代戰爭的需要，現代戰爭需要全國所有道德上、身體上與物質上的一切資源。作者排斥在戰前期間所有戰略與政治的分離說，這一種分離說

使現代戰爭的全體性爲世人所遺忘。希特勒是國家的元首，黨的領袖，海陸軍的最高統率者，他已成爲德國的唯一主人，他的權力之大，歷史上沒有先例。所有軍人與平民間的抗爭，所有平民思想與軍人思想上的抗爭，都溶和於他的一身，而化爲烏有。』（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倫敦太晤士報柏林通訊）

希特勒軍官團的機關雜誌德意志的國防 (Deutsche Wehr) 對於新的社會政治觀，加以這樣的闡述：

「一個新的世界已經存在了，對於這個新的世界，戰爭是一個信條，是一切事物的準則。而且，在這個新的世界中，軍人製定法律，統治其它的人羣。……每一種人類的與社會的活動，必須當它援助戰爭的準備時，方爲合理。」（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號德意志的國防轉錄於 Albert Muller 的 Germany's War Machine）

墨索里尼於一九三六年三月間向第二次全國職工大會 (Second National Assembly of Corporation) 發表演說，也表示同樣的概念：

「意大利經濟的調整計劃，受着一個大前提的支配，這一個大前提就是：全國必須凝合成爲一

個堅實的戰鬥的集團。戰爭何時爆發，怎樣爆發，固然誰也不能預料，但命運的車輪却急速地向前轉動着……我們現正趨向於這樣一個時代：所有重要工業將不能再為私人的消耗而生產；因為它們既無這樣多餘的時間，也無這樣多餘的實力，它們必須絕對地或近乎絕對地為國家的軍備而生產。」

英國軍人方面對於同樣制度的愛慕之念，可以從羅溫·羅濱遜(Rowan-Robinson)少將所作法西斯主義之軍事含意一文中看出。該文載於一九三四年的「陸海空軍公報」，據作者的見解，如果英國採用法西斯主義，則全國的戰爭準備，將能最有效地組織起來：

『講到應付戰爭的緊急事變，工業準備與戰鬥員的保持及其訓練，幾乎是同樣重要的。所以，設置職團部 (Ministry of Corporations) 以措置貿易與工業的每一個部門，顯然有很大的價值，因為它將使各部門的事務簡單化。』

法國軍人方面也具同樣的概念，我們可以參閱莫達格 (Mordacq) 將軍所著「一九

「一四年的教訓與第二次大戰 (Les Lecons de 1914 et la prochaine guerre) 一書，

尤其是其中第八章關於第二次大戰的政治教訓的一段：

『爲實踐的目標起見，國內的政黨政治應該不再存在。國家的元首應該授以充分的信任與十分擴大的權力。』

從歷史上看來，法西斯主義的發展是與帝國主義的軍事組織密切地聯繫着的。德國與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運動，從最初的時候起，就是在軍人的鼓勵與愛護之下，逐漸發展，直到奪取政權（讀者對於這一個過程，如欲獲得更爲詳細的分析，可參閱作者於

九三四年出版的法西斯主義與社會革命）

法西斯主義的傾向，繼續增長地存在於當前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內，以金融資本的最反動的份子與一部份的高級軍警長官以及官僚份子爲後盾。不過，這些已經樹立完全的法西斯蒂獨裁政權的國家，如國社黨的德國，法西斯蒂的意大利以及法西斯蒂軍國主義的日本，却也已經實現了準備戰爭的最完善的國家組織（其它如法西斯蒂的

波蘭、匈牙利等國，也是如此，不過程度稍有差別而已。同時，在要求世界之再分割的帝國主義衝突中，這些國家又構成挑戰的修約派陣線。因此，法西斯蒂國家是現代帝國主義戰爭的先鋒，同時也是反蘇聯的帝國主義十字軍的領導者。

在現時期中，法西斯蒂勢力是促進戰爭的主要勢力。法西斯蒂勢力的這一種任務，不僅是德國、波蘭、意大利或日本等法西斯蒂國家的直接任務，同時也具着更爲廣泛的性質，即其它並非法西斯蒂國家內的法西斯蒂勢力，同情於法西斯蒂國家，並與法西斯蒂國家密切合作。這情形對於英帝國主義特別明顯：國民內閣的主要勢力即保守黨勢力，在日本侵略中國的較早的階段，給予後者以強有力的援助，自意大利發動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後，即不斷地企圖與墨索里尼進行談判，希望成立犧牲阿比西尼亞以維護英國利益的不道德的協定，並且一直到目前，對於國社黨侵略行動的每一個步驟，始終與希特勒密切合作。同樣地，法國的右翼勢力不僅與墨索里尼採取一致的立場，並且也與希特勒攜手，以反對法蘇互助協定。非法西斯蒂國家內居於領導地位的帝國主義

份子，所以援助法西斯蒂戰爭侵略陣線的原因，在前面幾章內已經加以分析，包括着很複雜的原因，即國際帝國主義對立的原因，對於法西斯蒂獨裁之階級同情的原因（認為法西斯蒂獨裁是抗拒社會主義革命的屏障），以及希望把法西斯蒂侵略戰爭轉變為反蘇聯戰爭的原因等等。結果所屆，在法西斯蒂侵略戰爭中，各帝國主義的最反動的份子，構成超越國界的結合。因此，反抗新世界大戰的鬥爭，與每一個國家的內部的社會政治鬥爭，緊密地相互聯繫着。

法西斯蒂侵略陣線，是法西斯主義進攻全世界人民陣線的目前的最高階段。法西斯蒂侵略陣線，以德國、意大利與日本為領導，以英國、帝國主義國家內掌握大權的勢力與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內的有力份子為後援，就是今日使帝國主義向戰爭邁進的主要推動力。目前為和平而奮鬥的關鍵，就在於能夠瞭解這一個具體的形勢。固然，我們必須繼續不斷地正視帝國主義矛盾對立的全貌，反抗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所有的戰爭政策，但在目前這一個階段，我們所進行的主要鬥爭，必須針對着這一個最具威脅性的侵略

陣線。

所以，帝國主義要求世界之再分割的鬥爭，如今正以新的與特殊的姿態發展着。挑戰的修約派國家，公然向戰爭挺進，同時也就是法西斯蒂國家。與法西斯蒂國家對峙的，則為飽滿的國家，既恐因戰爭的威脅而招致更大的損失，又未能把戰爭的組織發展到法西斯蒂國家的準備程度，因此它們相對地退處於防禦的地位；這些國家內居於領導地位的份子（指不同情於法西斯蒂的份子）暫時掙扎以延緩戰爭。這樣的分野，從國際聯盟的形勢之轉變上反映出來。法西斯蒂侵略陣線的國家，先後脫離國際聯盟，以更大的自由，去追求它們的戰爭的目標。其它處於被挑撥地位的帝國主義國家，懷着猶豫與矛盾的心理，則欲利用國際聯盟以保護它們的所有物，並延緩戰爭的爆發。因此之故，它們對於集體安全的概念，以及使國際聯盟成爲維持集體和平之工具的觀點，也開始給予某種鼓勵（當然，統治階級間的意見也並不一致）；而這一個概念，更爲國際聯盟內大多數的小會員國所積極支持，因爲小國直接地受着法西斯主義的戰爭計劃的威

脅，自然期望着國際聯盟能夠給予它們以集體的保護。帝國主義陣營內的這一種形勢，給予爭取和平的勢力以某種可能性，使爭取和平的勢力得利用帝國主義陣營內的這些矛盾，在向戰爭邁進的路程上佈置障礙物。

在這一形勢中，小國的地位具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法西斯蒂侵略陣線直接地威脅着歐洲小國的生存與獨立。小國都恐懼着戰爭的威脅，因為它們知道戰爭一旦爆發，它們無論何時會遭遇末日。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知道德國的眼睛，虎視眈眈地看着它們。比利時與丹麥的情形也是如此。奧國是德意兩國奪取支配權的戰場，雙方均以法西斯主義的形態抗爭着。德意兩國並在巴爾幹各國間發揮擴展的慾望。小協商各國則互相團結，以反對修約派的侵略陣線。因此之故，大多數的小國熱烈地反對新的世界大戰。任何一個小國的反法西斯蒂侵略陣線的鬥爭，將具以維持民族獨立為目標的民族解放鬥爭的性質（列甯於一九一六年曾經這樣指示：如果勞動階級的革命不能成功，如果反動政權在歐洲樹立起來，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數十年間，這樣性質的鬥爭，可以

在歐洲爆發。爲和平而奮鬥的份子，跟國際勞働階級一樣，必然將支持反法西斯蒂侵略陣線的這一個鬥爭。歐洲的小國焦急地期望國際聯盟防禦侵略；而這一個形勢又導成小國間的新傾向，即小國期望蘇聯爲和平而鬥爭，爲反抗侵略而號召堅決的集體防禦，期望蘇聯做它們的鬥爭的領導者。

所以，帝國主義陣營內如今已展開了新的勢力配列；這新的配列與目前的矛盾相符合，並且提供了爭取和平的某種可能性。那末，勞働階級以及反戰反法西斯主義之人民勢力的形勢又怎樣了呢？這自一九一四年以後也已發生了廣大的轉變。

最明顯的第一個轉變，即使一九一四年以後之形勢完全改觀的轉變，就是勞働階級在六分之一的地面上掌握政權，在蘇聯的領土內建立社會主義，已成爲居於全世界第二位的工業國家，已成爲全世界最偉大的唯一國家。通過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如今能夠在國際關係的範圍內直接行動，能夠發揮它的力量於和平的一方面。這對於小國爭取和平的戰鬥，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各種勢力的衝突，具有強大的疑固的影響。蘇聯

在現存的國際關係中，已成爲爭取世界和平的領導者。

同時，法西斯蒂侵略陣線則以主要的一面進攻蘇聯。資本主義的有方份子，看到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必然招致世界資本主義的最後的滅亡，所以也推進反蘇聯的戰爭。因此帝國主義的戰爭配列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整個問題，又增加了新的複雜性。而這種形勢更將發展。在許多國家內，已逐漸呈現出工人奪取政權的可能性。因此，現階段的戰爭問題，不僅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戰爭問題，不僅是帝國主義進攻殖民地民衆或弱小國家的戰爭問題，却也是帝國主義進攻社會主義或工人政權的戰爭問題；甚至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戰爭，也可以迅速地變爲進攻蘇聯的戰爭。對於這一個問題，各國的工人與人民大衆決不會漠然視之的，因爲社會主義在世界任何一角多得一寸土地，就是替他們多築一個堡壘；反之，這一個問題是他們的死活問題，他們是萬分關切着的，在進攻蘇聯或進攻任何一國工人政權的時候，蘇聯的敵人或任何一國工人政權的敵人，必然將被挫敗。所以，蘇聯的爭取和平，實與全世界人民大衆的利害相同。這一個配

列是世界政治中的新形勢。

第二，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勞働階級，已有重要的轉變。一九一四年的大戰產生了共產國際，即勞働階級的國際的革命組織。這一種轉變隨着二十年來的經驗與鬥爭而繼續開展。資本主義的沒落，不斷地損害着勞工貴族的地位；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的經驗，給予在帝國主義體系內自由發展的幻想以重大的打擊。最近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法西斯主義所給予合法民主主義幻想的打擊，以及蘇聯革命路線之成功的結果與資本主義世界改良之新路線之慘敗的結果所形成的對照，更加速了轉變的過程。因此之故，昔日機會主義者之社會民主主義政策與領導地位的基礎，已大見削弱；工人羣衆現正移向於一個新的方位。這一個過程從第二國際的當前危機上與勞働階級聯合陣線的推進上反映出來。而勞働階級聯合陣線則從反戰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長成出來，開展出來。這樣，勞働階級聯合陣線，不僅是反戰反法西斯主義陣線的中心，不僅是反帝國主義戰爭政策之羣衆鬥爭的中心，同時也準備着未來鬥爭的諸條件。如果帝國主

義戰爭終於是無法避免的話。

在社會的其它階層間，也發生性質相同的轉變，動搖着舊秩序的安定，並削弱着金融資本統治的基礎。所謂「中等階級」或中間層的危機，小有產份子，都市小布爾喬亞，智識份子與自由職業層的危機，以及農民大眾或小農民的危機，隨着世界經濟恐慌的爆發及其產生的後果，已經激劇地發展着。這些階層以前都是反對勞働階級維持金融資本統治的主要基礎，是政治冷漠與階級協調的主要基礎。如今他們已經十分積極地參加政治鬥爭，尋覓解決自身諸問題的方法。他們一部份暫時受着法西斯主義的誘惑，法西斯主義給予他們以不能實現的許多諾言，而在掌握政權後，則使他們感到更重大的失望。但在大多數的國家內，他們逐漸與勞働階級攜手，認識到在反戰、反法西斯主義以及反金融資本之反動經濟政治政策的共同鬥爭中，他們的利益與勞働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這認識從許多國家內廣大人民陣線的發展上表現出來：人民陣線包含人民中的最大多數的羣衆，而以勞働階級爲反戰、反法西斯主義的中心領導。所以，資本主義

國家的內部的社會形勢與政治形勢（不論是法西斯帝國或非法西斯帝國）與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形勢顯然不同，並暴露出緊張、不安定與劇烈階級鬥爭的更高的程度。

殖民地民衆在擺脫帝國主義統治的解放鬥爭中，已經發展到非一九一四年所能比擬的階段。中國的革命軍近十年來保持獨立的政府組織，成爲中國民族革命一切勢力的聯合陣線的中心；印度革命達到了成熟期，在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前線，工人與農民逐漸居於領導的地位；土耳其民族主義已經從反抗帝國主義勢力的武裝鬥爭中，建樹獨立的政權，並在親近蘇聯的基礎上維持它的獨立；非洲各民族也逐漸覺醒；許多南美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都向着奪取政權的目標邁進。帝國主義的基礎現正動搖着。這一種形勢於是使擁有豐富的殖民地財產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更爲猶豫躊躇。同時，法西斯蒂挑戰國家則乘機絞勒崛興的殖民地民衆（如意大利在非洲，日本在中國與印度等），因此顯示出法西斯蒂侵略陣線，同樣地也是殖民地民衆的直接敵人。

殖民地民衆是勞働階級反帝國主義的最有力的聯盟，殖民地民衆的鬥爭是反帝國主義挑戰國家的共同陣線的主要部份。關於這一點，阿比西尼亞人民爲保持獨立而進行反抗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之侵略的戰爭，已經充份地表明出來。所有非洲與亞洲的殖民地民衆，所有國際勞働階級，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內的人民陣線，所有各小國與蘇聯，都公然同情於阿比西尼亞的獨立鬥爭；反之，法西斯蒂份子與帝國主義國家內的親法西斯蒂份子，則公然同情於法西斯蒂的侵略行動；這一個問題在許多國家內成爲政治鬥爭的問題；國際聯盟則因這一個問題而成爲對抗勢力的衝突的舞台。我們由此不難判別出世界兩大對抗陣營之表徵的與前奏的指示。

那末，我們從世界形勢的這些集合的新勢力量上（所謂世界形勢係對戰爭的威脅與和平的奮鬥而言）到底可以獲得什麼結論呢？很明確地，帝國主義的推動戰爭，隨着目前法西斯蒂侵略陣線的形成，已經達到了強度的最高階段。這一個威脅支配着目前的世界形勢。可是，由於崛興的階級勢力的繼續增長，由於資本主義的更大的崩潰，由於

蘇聯的存在，以及由於帝國主義陣營內的分裂，在目前關係的對比中，可以爲和平而動員的勢力，較之以前任何時期的勢力，要更爲強大，並且這些勢力如果聯合起來，將較法西斯蒂侵略陣線的勢力，更爲強大，足使後者受着阻遏。這樣爲了和平的有效動員，迄今尙未存在；侵略陣線迄今以加速的步伐進展着。現世界形勢的中心問題，便在於這一點。

法西斯蒂侵略陣線，在現階段中構成了帝國主義趨向戰爭的主要推動力，如果能夠給予法西斯蒂侵略陣線以阻遏，則在全世界的每一部份，甚至在法西斯蒂國家內，開闢了一條急速進展的道路，這進展在最近的將來，能夠招致反帝國主義勢力關係的決定的轉變，而逐漸消滅戰爭的真正的原因。目前唯一的主要問題，就在於如何動員每一種勢力，以阻遏緊迫的侵略陣線。爭取和平的戰鬥，實在是今日反抗居於支配地位並最富侵略性的金融資本勢力的主要侵略陣線之中心。

這種爲了和平的有效動員，在現階段中的條件是什麼？

最重要的一點是各國爲爭取和平的廣大羣衆的勢力，必須聯合起來。一切以信任

帝國主義各國政府的行動爲基礎的和平估計，必然歸於失敗，因爲帝國主義各國政府受了自身法則的支配，只能追求自身的各殊的利益，而不能採取集體的目標。國際聯盟所以迄今未能成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只有當要求和平的獨立的大衆鬥爭具有堅強的力量時，才能夠在某種形勢下逼迫特殊帝國主義國家採取某種行動，以輔助鬥爭的特殊目標。和平陣線的主要根據，必須是各國爲和平而進行的覺悟的與積極的鬥爭之大衆陣線，與蘇聯以及恐懼帝國主義戰爭的小國相聯合。

建立這樣一個全世界的和平陣線，需要國際勞動階級的聯合，後者是反帝國主義之最強大的勢力，並爲反戰反法西斯主義的領導者。勞動階級必須能夠在和平陣線之內居於領導的地位，和平的大衆陣線才能夠發生力量，才能夠不爲帝國主義所利用。到目前爲止，第二國際仍拒絕第三國際所提出國際聯合陣線的建議，所以，勞動階級的國際聯合，仍爲第二國際中少數有力份子的反對所阻遏。這是目前和平陣線的最嚴重的弱點；而這責任應該由英國的工黨來担承，因爲英國的工黨對於第二國際多數人士願

意談判聯合陣線的一點，迄今加以拒絕。爲了爭取和平的利益計，爲了樹立反抗侵略陣線的共同陣線計，爲了國際勞工運動的整個將來計，這些障礙應該迅速地加以克服。像這種國際勞動階級聯合的實現，即以反戰反法西斯主義的積極共同鬥爭爲基礎，能夠迅速地改變整個世界形勢的性質。

一方面，勞動階級是爭取和平與反帝國主義侵略陣線的中心與主力，另一方面，勞動階級，在這個鬥爭中還能從各國人民的廣大階級層間獲取友軍。爭取和平之共同的直接的目標，可以得到廣大階層的擁護，並且可以使鬥爭集中於推動戰爭或援助法西斯蒂侵略陣線的金融資本的有份份子。法國與西班牙等國的人民陣線，已經表示出構成這種廣大陣線的可能性，並且也表示出它對於某一國家之政策的整個路線以及對於推動反侵略陣線的鬥爭所能發揮的力量。

這樣一個大眾的和平陣線，聯合蘇聯與恐懼戰爭的小國而共同奮鬥，在國際關係的現階段，對於阻遏侵略陣綫確具決定的影響。因此之故，大眾的和平陣線對於國際關

係的當前諸問題，必須採取積極的與明確的和平政策。而帝國主義陣營內的現存的分裂，確也提供了這樣的可能性。帝國主義的一部份，即法西斯蒂國家與其它帝國主義國家內的親法西斯蒂份子，公然地推動戰爭，同時，帝國主義的另一部份，包括非法西斯蒂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其它有力份子，爲了上述種種原因，目前尚猶豫躊躇，尙欲延緩大戰的立刻爆發。這一種客觀的形勢，使大衆的和平陣線得利用這一種矛盾，以阻遏侵略陣線。這基礎具備了樹立集體和平陣線的可能性，所謂集體和平陣線，包括蘇聯，小國以及那些尙欲延緩大戰之立刻爆發的帝國主義國家，其力量足夠阻遏法西斯蒂侵略陣線。像這樣集體和平陣線問題，實在是目前最迫切最嚴重的國際關係問題。

像這樣一個集體和平陣線的有效性，需要具備下面幾個條件：第一，參加集體和平陣線的國家應該履行明確的互助義務，以反抗侵略；第二，蘇聯所提出的並已爲許多國家所接受的侵略國定義，應該普遍地被接受，作爲基礎；第三，互助義務應該是普遍的，不是區域的。這一個目標的實現，需要強化國際聯盟的現基礎，或需要訂結一般的安全公

卷，或需要擴展法蘇互助協定，如訂結英蘇互助協定等等。如果像這樣的集體和平陣線能夠有效地實現（其有效性憑藉着大眾和平陣線的力量，那末，它就能夠阻遏立將發動的侵略戰爭。像這樣一個和平陣線應該一視同仁地允許法西斯蒂國家參加；但它們的拒絕參加不應該引爲放棄集體和平陣線的藉口。如果現存的法蘇互助協定因訂結相同的英蘇互助協定而更強化，如果英國能夠因大眾的壓力而改變它的政策，即從給予國社黨德國以外交上的支持與拒絕接受西歐以外的和平約束，轉向聯合蘇聯、法國、小協約各國、巴爾幹協約各國與其它小國，以維持集體和平，反抗侵略，那末，在當前的形勢中就能夠建立一個反法西斯蒂侵略陣線的堅強的壁壘，而在這環境下，法西斯蒂國家也就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加入這樣的集體制度，另一條是虛弱無力地孤立於集體制度之外，期待着集體制度的破裂。

關於集體和平陣線的問題，已經惹起了廣泛的爭執。我們在第五章裏（第四節涉及集體安全）對於爭執的數點，已經在原則上加以考慮。帝國主義內反動的與親法西

斯蒂的份子，對於集體安全的任何制度一概斷然加以反抗，他們處於反集體制度的最前線。他們贊成『戰爭區域化』或公然攻擊國際聯盟或企圖削弱它的基礎，如取消盟約第十條與第十六條，代以孤立主義的區域制度，更或企圖破壞法蘇互助協定。他們在援助法西斯蒂戰爭路程上所盡的任務，是很為明顯的。

但集體和平陣綫問題，即在擁護和平者的陣營內也引起了相當重大的爭執。這些爭執的所以發生，一部份是由於若干和平主義者所具的傾向（即布爾喬亞和平主義與改良主義的典型的傾向），他們主張絕對信賴外交的集體機構，就是說，絕對信賴帝國主義政府的行動，以代替獨立的大眾鬥爭。過去的一切經驗已經證明這一條路線的虛妄性與危險性。這一條路線將造成大眾的被動性，並使帝國主義政策獲得自由發揮的機會。結果反幫助了戰爭的推進。謀取和平的任何集體機構之有效性，憑藉於謀取和平的獨立的大眾鬥爭之有效性，而以勞動階級的行動站在鬥爭的最前線。反法西斯蒂侵略陣線的鬥爭，相等地需要每一個國家內反法西斯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戰爭政策的

鬥爭。

另一方面，即反對這一種傾向的一方面，對於現形勢中的集體和平陣線問題，採取完全消極的否定的路線，對於勞働階級與布爾喬亞相聯合的一點，只見其危險性，而不見其他。這一種表面上反帝國主義的傾向，客觀地支持了帝國主義之最反動的法西斯蒂份子的路線——反集體和平的維持，因此却助長了法西斯蒂侵略陣線。在每一個形勢中，勞働階級必須保持自身的獨立，不爲布爾喬亞所影響，這是反抗帝國主義戰爭的第一個條件；但這並不是說，勞働階級在特殊的戰略的形勢中，決不能利用布爾喬亞陣營內每一種因素與每一種分化來促進它的目標；對於這一點，列寧曾屢加指示。放棄了這一點，等於與戰爭的問題相兒戲，等於不爲和平而嚴肅地鬥爭。跟這相聯合的另一種傾向，則堅持資本主義下戰爭的最後「不可避免性」，視社會主義爲理想的最後選擇，於是在這個基礎之上，把現形勢中的推動力出賣於帝國主義，確認大眾的被動性與虛弱性，這樣也助長了侵略陣線。

擁護和平者陣營內的另一部份，則恐懼集體和平陣線的發展，僅足以造成對峙的同盟，與包圍法西斯蒂國家的形勢，而招致戰爭的最後結果，故認為正當的解決在於向法西斯蒂國家妥協，對後者的要求，表示讓步，殖民地重行分配等等。這一種傾向又助長了侵略陣線。集體和平陣線同樣歡迎法西斯蒂國家參加，所以不能夠認為與對峙的同盟所採取的『包圍』政策相等。目前的『現狀』並非理想的『現狀』，這是完全真實的；但這個問題不能夠在帝國主義內謀取解決：在目前形勢中，主要的任務是阻遏侵略戰爭。對於帝國主義內殖民地賊物與榨取範圍實行和平而『公正』的再分配，這僅像虛幻與反動的夢想，在互相頹頹的帝國主義的貪慾之前，是不能夠實現的。實則每一次的讓步僅促進侵略者的貪慾而已；自一九三一年以後的整個經驗告訴我們，向擴大的法西斯蒂侵略陣線繼續屈服的政策，僅加速了推進戰爭的步伐而已。反之，集體和平陣線如能夠充份地有效地開展，則足以梗塞目前趨向侵略戰爭的路程，因為法西斯蒂等獨裁鑒於反抗勢力之優越的可靠性，不致嘗試侵略的冒險行動。目前鼓勵侵略並促進戰

爭的，就是反侵略勢力的「不可靠性」以及帝國主義陣營內其它支持法西斯蒂獨裁的份子。同時，阻塞法西斯蒂獨裁推進戰爭的路程，就是給予法西斯蒂國家內的民衆以最直接的援助；因為法西斯蒂政權的內在的矛盾，將以缺乏戰爭的出路而強化，法西斯蒂國家內的民衆將處於更爲強固的地位，去推翻他們的壓迫者。

擁護和平者陣營內這許多爭執的問題，現在妨礙着反侵略陣線一切勢力的動員與集中，應該迅速地加以清算，同時，利用和平之每一種可能性的有效共同陣線，應該迅速地加以發展，這兩點具有極大的重要性。

鑒於帝國主義勢力的極端不安定，謀取真正集體和平陣線的鬥爭，固然並非阻遏戰爭之爆發的最後保障，因此也不足以代替反帝國主義的大衆鬥爭，但在現階段中，爭取和平的大衆勢力必須積極地推動這一個鬥爭，作爲封閉法西斯蒂侵略陣線之路程的手段。

在目前的形勢中，反抗法西斯蒂侵略陣線的迫近的危險以維持和平的集體鬥爭

路線，包括帝國主義國家在內，可以解釋為戰爭的危險能夠被消除於帝國主義的本身之內嗎？就是說，帝國主義能夠變為相反的東西嗎？（自由主義之和平主義的妙方確是如此。）關於這一個問題，實在不能夠有誤解的餘地，不能夠認為所謂集體安全的路線，足以代替反帝國主義的大衆鬥爭的路線。有許多人士認為這一個路線，等於向自由主義之和平主義者的錯覺表示讓步；對於這些人士，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間李維諾夫向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所發表的演說，提供了最明晰的解釋：

『我們瞭解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帝國主義的性質，帝國主義的對外問題及其功能：這些問題與功能基本是並不變更的。所變更的，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而採取的策略，以及這些策略的運用——適合於歷史的地變更着的環境。這些變更着的策略就是世俗所稱的外交。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基本特徵是這樣的：它以國外的目標置於眼前，而據它設想，這些目標的實現，非靠武力的運用不可，非靠戰爭不可……』

『可是，並非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在任何時期，或在每一個時期，都常常願望同樣程度的戰爭。任何國家，甚至是最帝國主義性的國家，在任何特殊的時期，可以成爲有力的和平主義者。譬如，當

一個國家在戰爭中遭受挫敗時，或當一個國家有着實力更強的一個敵國或數個敵國，而一般的政治形勢又不利時，它就需要若干休養生息的期間，才能從事新的戰爭；譬如，當一個國家因屢次的勝利與征服而已告飽滿時，它就需要若干消納同化的期間。此外，還有其它因素，足使許多國家反對戰爭，例如國內的動盪不安，經濟的貧弱等等。」

戰爭是一切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基本政策。所有特殊的資本主義國家或帝國主義國家，在某種形勢中或時期內欲避免戰爭的和平傾向，不過是一定期限內特殊的與具體的形勢之暫時反映，並且這些傾向是隨着這些條約之存在而存在的。所以，利用這些和平傾向的可能性，只是「暫時的」可能性，並非戰爭問題或戰爭原因的永久的解決。但這些暫時的可能性之被利用，具有極大的重要性，自然並非爲了能夠永久地消滅資本主義內的戰爭——這樣的目標是自由主義之和平主義者的虛妄的理想——而是爲了能夠「延緩」戰爭的爆發。這是爲和平而鬥爭的急迫的或最先的目標。

如果在帝國主義之下戰爭終於是不可避免的話，那末，以種種方法來延緩第二次

世界大戰的爆發，爲什麼還具有這樣的重要性呢？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給予人類以不可估計的災殃，包括物質的、生命的與文化的空前大毀滅。第二次世界大戰固然不會妨礙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但在這情形之下，將以最重大的代價與最慘酷的犧牲來換取勝利，而復興的工作也將更爲困難更爲遲緩。在大戰的爆發之前完成社會演變的目標只要還有些微的可能性，由此使戰爭永遠不再爆發，那末，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第二，因爲延緩可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足以增長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相對的實力，並削弱帝國主義陣營的相對的實力。和平的每一個年頭，增加了蘇聯前進與資本主義世界沒落之間的距離。和平的每一個年頭擴大了工人動員他們的力量，實現國內的與國際的聯合以及開展他們的反資本主義的階級陣線等等可能性，準備着未來的決定的鬥爭。同樣地，和平的每一個年頭更推進了殖民地的解放勢力，更損害着帝國主義的本身。因此之故，和平能夠多保持一個年頭，則更有利於新興的勢力，而在戰

爭爆發以前傾覆帝國主義的可能性也隨着增加，如果這一點仍屬不可能而戰爭先行爆發，則至少能夠更爲迅速地使戰爭在大多數的國家內變成社會主義的勝利。

第三，因爲要求和平的鬥爭直接地幫助着動員各種勢力，並準備反帝國主義的更進一步的鬥爭之憑藉。以國際勞働階級爲中心的和平陣線，聯合着各國中間階層，農民與大多數的人民，對於他們，戰爭是唯一的災難與禍殃，畏懼戰爭的心理，正不下於反抗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民衆。這樣普遍全世界的廣大陣線，把金融資本家的寡頭政治孤立起來，並把全世界的人民大衆與勞働階級的領導相結合，對於世界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實在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從它的性質上說來，要求和平的鬥爭並不能給予戰爭問題以最後的解決。戰爭既然是隨着矛盾的獨佔的利益以俱來，既然是隨着帝國主義的國家制度以俱來，則戰爭的最後消滅有恃於世界組織之單一形態的實現，因爲必須實現了世界組織的單一形態，才能消滅矛盾。對於這一個深遠的目標，要求和平的鬥爭只能完成暫時的與局部的

任務。我們根據了前面對於世界形勢的研究而必須最後地加以考慮的，就是世界組織的最後問題，這一個問題在今日的環境之下，已經逐漸明顯地愈見其迫切了。

二 未來的世界社會

我們又回到世界組織的基本問題上；但這一次我們對於這一個問題的具體狀況及其解決，已經有過較為詳細的分析了。

一九一四年的大戰告訴我們，世界經濟撞擊着現存國家形態的壁壘，在技術與發展之現階中段的生產力提供了這樣的可能性與必需性，即需要普遍的世界經濟組織以充份有效地利用生產力。但在技術與發展之現階段中的生產力，因此也宣佈了獨立國家與帝國主義集團之現存制度的死刑。

帝國主義出現於資本主義的環境內，最初所負的使命原為企圖克服現存的國家的限制，並擴展資本主義統治的更為廣泛的範圍。被宣揚的帝國主義的福音，即以所假

想的現環境下之必需性的更高概念——大規模的，超國家的，更廣泛的並膨脹着的經濟政治領域，來代替舊學派的「狹隘的」概念，如「小英國主義者」（Little Englanders）等。

可是事實上，帝國主義僅把初期的矛盾推展到更高的平面上而已。國與國之間的衝突，演變到龐大的帝國主義「布洛克」的現代衝突，許多小國或居於衛星國、附屬國與小卒的地位，或維持着沉淪不安的獨立，成爲更大的帝國主義矛盾之活動點的緩衝者。而帝國主義「布洛克」的衝突，比較過去的衝突更爲殘酷可怕。

因此，憑藉帝國主義解決矛盾的設想，不僅在根本上是虛偽的（它的基礎建立於殖民地的奴役與榨取，而非真實的經濟合作，給予嘗試中的聯合組織以不可避免的損害與最後的破裂），即在表面上也同樣地不能夠解決矛盾，反使矛盾以更強化的姿態而再現。即使幾個巨人的大決鬥逐漸代替了許多侏儒的小戰爭，這樣的轉變並不足以使世界的團結更爲接近；反之，它却具有相反的影響，因爲由於本身力量的薄弱，小國往

往相對地更傾向於參加集體合作的形式（小國在國際聯盟中的地位就是典型的表示），而爭取着世界支配權的世界帝國主義「布洛克」則為世界聯合的主要的敵人。

所以，世界聯合問題在帝國主義的理想家看來，等於是「超帝國主義」問題，即以和平的或非和平的手段實現單一的世界帝國主義問題。當代歷史家與帝國主義的自主主義理論家托恩皮教授（Professor Arnold Toynbee）認為一個未來的世界國是不可避免的，並指示這未來的世界國的形成，非出於現存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自動聯合，即出於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終止，而代之以凌駕各國的「宇宙國」。托恩皮教授的這種主張，可以作為上述見解的典型的表現：

「當我們研究歷史時，我們知道目前所把握着的這一代社會中的政治問題，決非沒有先例。整個的主權為許多區域的國家所分配，因此釀成政治的無政府狀態的災禍，這災禍曾經使我們這一代以前的其它社會受着苦難，但在以前的環境中所發生的同樣形勢，總是暫時的。因為無政府狀態遲早能夠治療自身，雖然方法或者有不同。治療的方法可以出於自動的、和平的、合理

的與建設性的努力，這正是我們目前所進行着的努力，這一種努力剝奪了地方國家的主權，以利整個的社會，同時却保留它們的生存。另一種治療的方法可以出於盲目的，暴烈的，非理性的與破壞性的實力之衝突。地方國家如果拒絕放棄它們的主權，則將彼此繼續鏖戰，直到這一種求生存的政治鬥爭最後爲「致命的一擊」所消滅，方告罷休。這一個治療方法的結果是：除了一個最強大的國家外，所有其餘的地方國家最後都注定了滅亡的命運，不僅犧牲它們的主權，並且犧牲它們的生存；因爲在採定了這一個方法以後，無政府狀態的終止，不是憑藉協調，而是憑藉武力；不是憑藉國際聯盟的和平組織，而是憑藉一國征服全世界後的「宇宙國」的強迫實施。」

這就是說，二者必居其一，非現存帝國主義國家放棄它們的主權以贊助一個世界中心而實現自動的世界聯合，卽爲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征服其它國家而完成世界聯合。至於第二個治療的方法，卽帝國主義的內部可以發生變化，現存的國家形態並非鞏固不動的結晶體，人民大眾可以推翻現存的國家形態，而於推翻的基礎之上樹立世界社

會主義秩序，托恩皮教授則並未把它列入視野之內。

可是事實上，我們對於現階段中世界發展之真正勢力的整個觀察，却也已經表明帝國主義除了征服與支配的手段外，不知道有其它擴張的方法。帝國主義之和平聯合的概念，僅係自由主義者的一種幻想，並未估量到經濟的基礎與帝國主義的結構，並未估量到對峙的獨佔集團的利害衝突，並未估量到和平地分配榨取的利益與權取的範圍之不可能性（除非以相對的實力為基礎），而且也並未估量到欲在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法則下實現任何穩固的協調之不可能性。資本主義在素質上是反集體制度的，只能聯合起來抗拒共同的敵人，故不能產生或容許全世界的集體的結果（關於這一點，若千布爾喬亞的幻想的著作家都認為必須先發明一個共同的敵人，才能實現世界的聯合，像莫洛亞 *Maurais* 甚至滑稽地提出反月球的遠征。從布爾喬亞的標準上說來，這邏輯是正確的。人類為積極的與建設的目標而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對於科學家、工程師與工人們頗易瞭解，可是對於這些『幻想的』著作家，就超越了它們的幻想力。

了。更進一步，世界的聯合與生產手段中的私有財產，也是不相投合難於共存的。這一個問題在第五章裏已經充份地討論過了。

所以，技術與經濟發展的現階段，正如政治形勢的厄境一樣向着世界的聯合推進，這仍然是不錯的，但帝國主義所欲遵循以實現世界聯合的路線，帝國主義依據了自身發展的法則所可採取的路線，只有一條鬥爭與征服的路線，從連續的擴大的戰爭，達到對抗勢力的最後消滅，達到一個帝國主義集團的最後勝利，以完成世界統治。在帝國主義的環境與條件之內，這是達到世界聯合的唯一路線。

目前世界帝國主義『布洛克』正以全力武裝着、準備着這一個最後鬥爭。世界統治的最後目標，有意識地與無意識地從帝國主義代言人的口頭宣示出來。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奮鬥一書中，看到有意識的表現：

『任何人真心願望在這個世界中和平主義概念獲得勝利，他必須虔誠擁護德國人征服全世界……因此不論好歹，必須毅然決然訴諸戰爭，以完成和平主義……實際上，要到超越諸色

人等的一個偉人征服全世界，成爲地球上唯一的主宰者的時候，和平主義者的人道思想或許也能出類拔萃。』（我的奮鬥，第三一五頁）

依據帝國主義自身發展的法則，每一個帝國主義都向主宰世界的戰爭邁進。國社黨挺進隊的歌詞就這樣表示着：

『今天，德國是我們的德國；

明天，世界是我們的世界。』

這樣的意向實際上就是每一個帝國主義的中心的意向。希特勒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在僧城所發表的演說，也同樣明確：

『我不相信各國在未有同一的法律與制度以前，能够保持和平。因此之故，我希望國家社會主義將來能够擴展到全世界。這並非幻夢，而是可以成功的目標。』

英國保守黨領袖之一並曾任殖民地大臣的愛米萊（L. S. Amery）最近在所著前瞻（The Forward View）一書中，宣示英帝國主義擴展而囊括全世界的夢想，他

附帶地建議實現這一種夢想的第一個適當步驟，即以瑞典、挪威、丹麥、冰島與格林蘭合併於不列顛帝國：

「我們的任務是爲不列顛帝國的團結與強盛而奮鬥，保持它的活力，保持它的組織之廣博的彈性，保持它的見解之寬大與勇敢，庶幾可以使它相等地適合於領導世界聯合之最後計劃的促進，或適合於提供一個核心，逐漸地擴展起來，囊括全人類。」（前略，第二六九頁，一九三五年出版）

跟愛米萊的夢想互相呼應的，我們還可以摘錄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倫敦太晤士報所刊載的一封信，這一封信是牛津大學的一位大人先生寫的：

「有一天，不列顛帝國也許能夠擴展它的疆界，囊括一切真正爲和平與國際合作的理想所感化的國家。」

可是，墨索里尼的觀點就大不相同，他的心目中的不列顛帝國，是沒落中的不列顛帝國，他在每一次的演說中，宣示古羅馬帝國的命運將主宰全世界。

跟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獨霸世界的迷夢背道而馳的，是美帝國主義的企圖。美帝國主義驕傲地宣示它的彰明較著的命運，以經濟侵入的手段，實現世界霸權的目標：

「勝利的『感覺』傾向於美國的一方面。這是美國的時代。青年人的『決勝的意志』以及那種意志所產生的精力與勇氣，使美國向前邁進。那一種對於『彰明較著的命運』的感覺，是具有傳染性的。……古老的不列顛帝國如今不僅向真正的挑戰者搏鬥，並且向世權霸權的活靈搏鬥；世界霸權的活靈魂隨着古羅馬軍團而奮起，曾經很久地領導不列顛帝國，如今似乎爲美國而搏鬥……」

「歐洲的美國化以及遼遠地域的美國化，逐漸開展……我們一度做過英國的殖民地。在它耗竭之前，它將做我們的殖民地，不一定在名義上，而是在實際上。如今，更好的工具正給予美國以統治全世界的權力……」

『試問，英國有什麼機會來對付美國？全世界有什麼機會來對付美國？』（參閱 Ludw. Wellenring 所著 *America Conquers Britain* 第四〇四頁至四〇七頁，一九三〇年出版）

而在太平洋的對岸，日本帝國主義則又這樣加以答覆：

『我們的皇道精神是日本國家之真正靈魂與日本民族之偉大理想相互結合的表現，它必須宣揚於四海之外，廣播於五洲之上。任何阻礙必須用堅強的毅力加以摧毀，雖運用真正的武力也所不惜。』（參閱荒木大將發表於一九三二年七月號現行社月刊中日本所遇之問題一文）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我國利用中國的一切資源，可以進取印度、多島海（Archipelago）、小亞細亞、中亞細亞甚至可以進取歐洲。』（參閱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田中奏摺）

這些顯然是狂妄可笑荒誕不經的概念，都為贖武的好勇鬥狠者的呼聲。而這些概念却也是每一個現代帝國主義之最積極的推動力的呼聲，是金融資本之無限止膨脹慾的意識形態的反映。同時，它們也是帝國主義為策動加速的行程所不得不採取的唯一途徑之準確表現。

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都懷着同樣的夢想。可是，它們的夢想不是都能夠實現的。尤其極，只有一個夢想能夠實現，勢必犧牲了其餘的夢想。就是說，只有一個帝國主義能夠完

成世界霸權，勢必以其餘的帝國主義做犧牲。而這樣的路程，即完成單獨的世界帝國主義統治的路程，勢必跨越積滿了鮮血的海面。

但在實踐上，完成所謂單獨的世界帝國主義統治的前途究竟如何呢？單獨的帝國主義國家實現世界統治的最後勝利，在理論上固然是可以設想的，但在真正的歷史過程中，由於目前對峙的帝國主義集團實力對比的接近，由於在戰爭爆發以前政治的與社會的矛盾已經極端尖銳，這樣的一個搏鬥或許多搏鬥的實際後果，必然是帝國主義勢力的整個毀滅與現存社會結構的削弱，而在任何一個帝國主義獲得最後的世界勝利以前，勢必招致帝國主義基礎的動搖與廣大地域上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在六分之一的地面上造成世界革命的勝利。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將造成什麼呢？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並不憑藉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展。反之，這樣的發展對於樹立安定的政權與進行建設工作，在若干方面却將造成最不利的與最困難的條

件，因為資產階級在臨死的苦難中，必然會放縱大規模的毀滅，無政府狀態與野蠻主義。如果勞動階級的勢力在新的世界大戰爆發以前足以奪取政權，那末，這樣的發展就遠勝於上述的發展了。

可是，即使資產階級能夠在勞動階級奪取政權之前發動新的世界大戰，最後的結果也是毫無疑問的。現代戰爭與革命的辯證法已經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中表示出來；而目前各方面的條件則猶遠勝於過去。現代戰爭在各方面憑藉着大眾，不僅指前線的大眾，同樣地指維持工業活動的後方的大眾；最後，現代戰爭還憑藉着一般平民對於大規模毀滅的最新戰術所發生的反響，所謂大規模的毀滅，不僅指直接的屠殺也，指內部社會組織所受的動搖。（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邱吉爾在下院發表演說，討論空中轟炸所引起的諸問題，略謂倫敦如為繼續不斷的空中轟炸所威脅，則至少有三四百萬的平民將逃避郊外，沒有吃，沒有住，沒有維持秩序的設備，這將成為政府最感棘手的『行政問題』而且必然將『吸取軍隊的精力』。可是，萬一連『軍隊的精力』也不

可靠，便如何呢？他却不肯更進一步地討論這問題了。帝國主義者確有畏懼新戰爭之最後危險的理由。然而，帝國主義的必然性却迫使帝國主義者向戰爭邁進。據夏伯特爾（Chaptal）的記錄，拿破崙對於工人間極小的騷動，比較打了一次敗仗還要畏懼。可是，拿破崙在他的時代，還既不需要應付機械化生產的現代環境，也不需要應付現代工人運動啊。

在戰後的十年間，有一種理論以爲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革命的結果，沒有重復發生的可能，因爲軍事戰略的未來，將採取少數的精選的機械化軍隊，撥斥大眾的任務，後者向被帝國主義認爲是『危險的』。這理論實毫無根據，因爲機械化的進展就是提高了產業工人的決定地位。而且，這理論的最初假定也就是虛妄的，我們可以舉出最近的事實來做證明：當國際政治形勢有利於破壞凡爾賽和約時，德國的參謀部——資本主義世界中最精於戰爭技術的幹部——就宣布廢棄所受少數職業軍隊的束縛，而採取普遍的徵兵制。由此可以看出，帝國主義仍不得不以最後的武力決斷置於人民大

衆的手掌之中。

帝國主義國家爭取世界霸權的不可避免的搏鬥，也就是帝國主義國家企圖在帝國主義環境內解決世界組織問題所有行動的表現；不論它是否達到世界戰爭的程度，一種搏鬥的環境，必然將產生足以改變這些環境的新勢力，發展爲正相對的條件，這樣終於由勞働階級的奪取政權，由世界經濟的一元社會主義組織，完成了世界組織問題的最後解決。關於世界組織問題的布爾喬亞理論家，完全沒有設想到這一條路線，因爲在他們看來，這一條路線不過是遼遠的與臆說的未來之幻象，並且，他們也不能夠從它的真正的性質上，把它認爲一種活着的，真實的勢力，每天從現存環境與矛盾的泥土中滋長出來。這一種勢力，馬克思在一百年之前稱它是共產主義的『世界政權。』

世界組織的必然性，如今逐漸爲各學派所認識。但欲在帝國主義環境內解決這一個問題的方法，不論是出於對峙帝國主義國家的自動聯合或團結，抑出於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征服其餘帝國主義國家而完成世界霸權，都是烏托邦式的妄想，這些方法不僅

不能夠解決這問題，並且因帝國主義的矛盾也缺乏實踐性。在另一方面，從現存的矛盾到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最後結果，從現存的矛盾到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最後世界聯合，像這樣終極的發展——甚至也已經並不遑遠——不僅是現存矛盾與對立的唯一的最後解決，使有目標的中心組織與人類自由相團結，並且也是唯一可以實踐的目標，趨向這一個目標的路程已經從現存的條件中一步一步地顯示出來，而這一個目標也已經在實現的過程中。一百年之前當馬克思與恩格斯草擬共產黨宣言書的時候，對於這一點，在原則上已有明白的理解，如今在世界政治的生動經驗與事實中，這一種理解更爲廣大份子所接受。

所以然的原因，實由於這一個問題所具的條件。企圖在帝國主義環境之內實現世界組織的致命打擊，就是獨佔資本對峙集團間對立的傾向，換言之，就是世界布爾喬亞實現根本聯合的不可能性。英國許曼教授 (Frederick L. Schuman) 在他的巨著國際政治一書中，曾以布爾喬亞的觀點，估計這一個問題的未來的形勢。他對於世界共產

主義革命之最後勝利的遠景，表示不可掩飾的恐怖與焦慮。可是，他又不得不承認布爾喬亞是一個不能實現世界聯合的階級：

「如果在這世界社會中，能够有一個世界統治階級存在，那末，世界政治聯合的問題可以大大地簡單化。但事實上並無這樣一個幹部，具着世界團結休戚相關的意識。居於支配地位的布爾喬亞，尖銳地分裂為互相抗衡互相衝突的國家集團。抑又進着，這些統治階級也不能實現權力的世界協調，因為權力的本身就是相對的，它所要求的不是利益的共享，而是利益的分歧……」

成爲權力之合體的國家與政府，必以其它國家與政府爲對象時，才能發生作用，它們不能够在全世界抽象地發生作用的。」（國際政治第八三一頁，一九三三年出版）

反之，他却不得不承認世界無產階級能夠實現世界團結：

「如果事實的發展確遵循着共產主義者所預示的路線，如果共產主義者的計劃最後能够勝利地見諸實施，則全世界或世界的最大部份將在現世紀結束以前完成政治的聯合。」（國際政治第八四一頁）

他驚惶地閃避這一種解決，閃避這一種解決所欲引起的鬥爭。可是，無情的事實的

邏輯，却又使這位布爾喬亞政治理論的教授尋不到第二條出路。爲閃避他自己的分析所獲得的必然的共產主義結論起見，他不得不以虔誠的希望做該書的結論，這虔誠的希望是：帝國主義或許可以放棄「用關稅保護主義，經濟獨裁，金元外交與金融帝國主義等手段以掠奪個人的利潤，」而改取「合作方法以促進世界社會中各個國家的一般福利，」換言之，即帝國主義可以不成爲帝國主義。在世界組織問題上，布爾喬亞理論的破產從這裏可以看出最典型的表現。

爲資本主義之特性的世界經濟矛盾，並最高度地表現於帝國主義之本身的世界經濟矛盾，並非必然地產生於世界經濟的固有的自然物質條件，也非必然地產生於各民族間生產關係之組織的固有的自然物質條件。它們完全是產生於階級社會中生產的社會關係，產生於無政府狀態的世界市場的爭奪，產生於資本主義資產所有者對峙集團利害的衝突。這些矛盾必須在集體的世界經濟組織中才能加以消滅。但這樣集體的世界經濟組織，需要剷除生產手段中資本主義私有權的障礙，使整個世界經濟的得

按照整個計劃組織起來，以適應世界人口的需要。不僅表現於目前國家制度中的政治主權須加揚棄，即表現於目前資產關係制度中的經濟主權，也須加以揚棄。實則政治主權僅為經濟主權的反映；布爾喬亞國際主義的改良者，企圖與分裂的各個獨立國家的制度所產生的罪惡相搏鬥，不過是「隔靴搔癢」。徒勞無益，因為他們並未瞭解這一個制度是根植於現存階級關係之上，根植於對峙的獨佔集團間生產手段所有權的分裂之上。

像這樣世界社會組織之必然的未來前途，並非烏托邦式的遙遙無期的夢想。蘇聯已經明白昭示：像這樣一個國際的集體組織能夠實現於六分之一的地面上，具着完全的平等與民族的自由，包括發展階段各不相同的許多民族，這許多民族操着一百五十種不同的語言，前進的民族積極地援助落後的民族，迅速地達到平等的技術水準與文化水準。即在最近的期間，也沒有任何技術上的條件足以阻礙這一種過程的擴大。從技術上與經濟上看來，實現世界組織的一切條件俱已存在。為實現世界組織起見，只有一

個問題尙待解決，即政權的問題。資本主義的政權，帝國主義的政權，必須加以摧毀。政權必須移轉到勞働階級的手中，以領導勞働大眾。這樣，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最後世界聯合，或勞働階級之聯合的國際統治，才能夠實現，以推進世界社會主義組織的任務，並準備未來世界共產主義社會的大道。

達到這一個階段的路程，並不是懸空而起，却產生於現存的環境與矛盾。雖然經歷了意外的挫敗，勞働階級及其友軍的力量在目前的歷史階段中却繼續增強；殖民地民衆向着解放之途邁進。雖然採取更爲暴烈的手段以維持統治，帝國主義終於破裂起來了。

這結果從歷史的過程上說來是不可避免的，因爲除此以外，任何一種解決方法必然將以自身的矛盾而失敗，因爲從這些矛盾中，將來的新興的勢力日增月長，沒落中的世界的勢力則逐漸削弱。但實現的遲早則有特於人力的因素，有特於大眾鬥爭之覺醒與發展的速度。這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威脅成爲十分嚴重的問題。

如果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急迫的威脅，不立刻動員大眾的和平陣線，如果不立刻推進反法西斯主義反資本主義侵略陣線的必然鬥爭（發展到勞動階級奪取政權的決定鬥爭），那末，大戰是不可避免的；達到最後世界社會主義組織的路程必將通過大毀滅與人類浩劫的一個時代。

但實現別一條路程的可能性，目前還是存在的。如果今天我們能夠迅速組織大眾陣線，不僅為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當前威脅而鬥爭，並且也推進反資本主義的決定鬥爭，推進勞動階級奪取政權的決定鬥爭，使若干國家內的革命能在帝國主義捲入新的世界大戰之前獲得勝利，因此阻止大戰，從內部搖撼法西斯主義，那末，我們就是完成了最有利的條件，以最小限度的犧牲與毀滅，以最急速的步伐，向未來的世界社會邁進。這一種可能性，我們今日必須以全力支持，同時應準備接受其他更爲有效的任何方法。

譯 後 語

世界政治譯校後，好像有幾句話想說，現在寫出來以代序言。

平時因對國際問題頗感興趣，所以常有機會得讀國外作家關於這方面的論文，其中最使人感到不凡的當是本書的作者杜德，他那尖銳的筆鋒，透澈的見解，讀後總使人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輕快。去年春天，看到歐美各雜誌上登載他的世界政治行將出版的預告，就向上海的西書店預約了一部，以便「先睹為快」。適巧那時生活書店叫我寫點東西，我就把這本書推薦給他們。但杜德的書一直等到去年八月，才送到我的手中，於是立刻看了一遍，並決定翻譯出來。同時爲要使這書能夠早日與中文的讀者相見，就約同宗漢賓符二兄合力翻譯，預定去年年內出版，後因印刷所方面工作過忙，以致延遲到現在方始出版。

我們的翻譯工作是分三部進行的，譯後曾互看了一遍，校正譯名與文字，不過我們的能力有限，時間又極短促，錯誤是一定難免的，希望讀者能予以指正。

至於本書的價值，簡單的說，是在以一貫的理論，來解釋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六年所發生之複雜的國際關係，全書理論與事實並重，一掃一般庸俗國際問題專家的堆排事實的流弊。關於這書的特點，我不想在這裏多說，讀者閱後自會領受到的。現在僅介紹一個書評來做諸君的參考。英國的保爾（Wm. Paul）在去年九月號的勞工月刊（*Labor Monthly*）中說：

「世界政治的出版，給予每個現代問題的研究者以極大的貢獻。我知道有許多態度嚴正的自由主義者，看了杜德對於他們所認為不能解決的複雜問題之明顯的解釋後，他們的觀念是完全改變了。」

保爾的書評發表於杜德所主編的勞工月刊上，而且他們二人思想同流，上面的話也許有「互捧」的嫌疑，所以我們還得引用與杜德一派思想完全不同的政論家的意

見。現在舉有名的國際問題專家盤恩斯(C. Delisle Burns)對於本書的批評來做代表。盤氏的書評發表於英國著名的國際事情(International Affairs nov. - Dec. 1936)二月刊上，他開頭就說：

「對於歷史事件的解釋常比單純的記錄要有價值得多。杜德先生關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六年政治經濟的解釋(即指本書)對於與他意見不同的人是很有益處的。這是一本應用前進的理論來解釋現代國際政治的力作，文字優美，引述豐富。他所引述之政治家與新聞記者的言論，在深信我們這一派思想的任何人看起來，都是無法解釋的。」

張弼 一九三七年一月於上海





◆ 冊各列下出已 ◆

本叢書目的在幫助讀者大
 衆認識世界大勢，灌輸時
 代知識，以客觀的態度，
 分析和研究國際政治經濟
 文化等各項重要問題。執
 筆者均爲當代國際問題名
 家，立論正確，文字流
 利，可作學校補充讀物及
 自修參考用書。

新著 預告	萍踪憶語	輪奐著	印刷中	太平洋問題十講	黎乃益等著	四再	四角版	弱小民族小說選	茅盾等譯	六再	六角版	現代十國論	張仲實等著	三再	三角版	世界知識讀本	張錫著	四再	四角版	中日問題講話	錢乃器等著	三	三角	戰爭與間牒	英·路威著 胡愈之譯	三再	三角版	戰爭·軍火與利潤	賽而特斯著 邵宗漢譯	四	四角	國際問題研究法	平心著	三角五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之書叢識知界世

治 政 界 世

每冊實價國幣壹圓
外埠酌加郵費

印刷者

發行者

譯者

著者

生活印刷所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張邵實
宗
彌漢符

R. Palme Dutt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活生

\$ 1.00